

内幕

第一章 勾魂摄魄的“一箭三雕”

1987年9月17日下午三时，我正在参与筹划一项袭击行动，突然电话铃响了。从电话里我接到一项执法史上重大而离奇的案件。我离退休仅有两年了，然而我仍在毒品侦缉署纽约市分署带领一班人马，负责监管一个街区。正在策划中的这次袭击行动是逮捕一伙交易数以千克计的贩卖可卡因的孬种。他们龟缩在纽约市南布罗尼斯一个十分坚固的公寓里，有一条凶猛的猎犬把守着大门。我们行动组有十名男特工、两名女特工，共十二人。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决定：将这帮孬种引诱到大街上，然后下手，尽量避免自己人的伤亡。去年像这样的扫荡平均每周两次，时多时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负过伤，希望我们同样能平安地闯过这一关。

我在毒品战争的前线战斗了二十二年了，领教过众多的虚伪、谎言与腐败。这一切的一切早就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头，我实在腻烦透了，它像越战一样庸俗、丑陋。官场上的政客们、大人们多半各打各的小算盘。这个世上无论什么法律、无论是谁统统奈何不了他们。曾经有一次，那些大人们和他们的后台老板一直死盯着我，我差一点被他们干掉。我明白不可能再有这样的幸免，为此吓得不敢作声，恐怕只有等我退休了才会觉得安全。我要去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在那里将我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写成书。最后的念头使我觉得自己还不是一个十足的懦夫。

但是，说实话，我也很胆怯，我决定也得为自己打算打算：在我退休前的最后两年里，我愿意接受他们指派给我的任务，尽量多抓些毒品贩子。然而更重要的是得让那些为我工作的人都能活下来。

另一个令我感到最不安的问题就是那些大人们头脑发热，他们也许会在某个场合通过新闻媒介将内情泄露出去。那样，那些为我工作过的人就会必死无疑了。那些狗杂种就爱在背后捅刀子，他们正在吞食着一切。我实在不能再这么沉默下去了。

“麦克，你的电话。”分队秘书路易莎叫我。她大概一定忘了我关照过她今天我不接任何电话的事。我犹豫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了我的心。近来行动频繁，类似的电话实在是不胜枚举。我心灵深处似乎已到了相当疯狂的境地。一桩桩的命案接踵而来，这也敦促我尽快结束自己的戎马生涯。再这么下去真要像蹩脚电影里描写的那样，完全变成精神失常的人物了。我走进自己办公室里面的小卧室，带上通往警卫寝室的门，拿起听筒，摁下那颗红色的按钮，将电话接了进来。

“您好吗，麦克？”我立即听出这是纽约警探理查德·史勒的声音。尽管我们已多年未见，失去联系，然而他的声音听来依然那么熟悉亲切。据我所知，最近他在临近退休之际反而荣升为毒品侦缉署圣地戈的副头目，他是我有限的几位至交中从普通巡警提升为头头从而进入上流社会的唯一一员干将。与他共事总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我们曾在一起交流经验，生死与其，在各方面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前些年史勒还是纽约街头的一名缉毒便衣警探，有一次他为擒获毒品贩子，一手伸入毒品贩子的汽车里，去夺取汽车钥匙。谁知那家伙转动钥匙，打开电门，启动发动机。使车开动起来。史勒被车拖住，身子斜挂在汽车上，穿过纽约好几条街道。史勒拼命地开枪，子弹击中了那家伙的头部、脖子。最后转轮枪里的子弹全打完了，汽车也“轰”地一声坠毁了。史勒只受了点

轻伤，总算逃脱了。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位毒品贩子并没死，尽管子弹穿透了他的脖子、脸、腮，但均未击中要害。几个月之后他们又在审判庭上仇人相见。

“官”，就一般老百姓来说，是既无本领又没有幽默感的那种正人君子。不过史勒绝不是这种“官”。无论他做什么，只要他搭上手，就会让你无法逃脱。要不是他打这个电话，恐怕这个离奇的故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你真的这么忙吗？”

“那当然。”我答道，然而我的心已经乱了方寸，只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记得十年前，他邀我出发前的一个电话，也是用了这句话。过后他便调往内部安全科工作。不久他要求我接受一项秘密工作：查出毒品侦缉署内部的一些奸细与败类。我接受了这项工作，就去了波士顿和康涅狄克州。在那里我俨然是一个贩毒组织的龙头大哥。果然缉毒署有个把内奸，通过毒品侦缉署的秘密计算机系统，出卖了我。

当查实那些轻易出卖别人性命的家伙和我一样也是戴缉毒徽章的特工时，我被气糊涂了。我为人本份，有时甚至到了憨厚的地步，这一点我问心无愧。我敢担保，我从未欺骗过这两名出卖我的特工，而他们可以为了钱去干昧着良心的事。在康涅狄克州旅馆的房间里，我与其中的一位过手成交这桩出卖特工性命的买卖。为了便于将声音送入暗藏的麦克风里，就故意扯着清晰而宏亮的嗓门对他说，我要宰了那些他所提供的名单上的人。

提供名单对他们来说是件小事，但他们的开价是：提供一个人的名单及材料需五百美元，还得外加一些可卡因。这件案子后来闹得沸沸扬扬。两年后我去了阿根廷，史勒去了加州。一晃又过了十年，在这些年里我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相互断了联系。

“我知道你时间很紧，但我这件事也许你会感兴趣的，”史勒道，他说话的口气仿佛过去的十年我们是在同一个汽车俱乐部里度过似的，轻松愉快，“你到过圣地戈吗？”

“没有。”我答道。这时，我从门缝里窥见我卧室门外那帮弟兄们，正穿着防弹衣挤在警卫室里，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猜出他们期待和不安的心情，期待着我快点放下电话。“我听说过，挺棒的。”我听见自己这么说。

“绝对棒，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

“是吗，我得找个理由去你那里才行啊！”

史勒笑道：“我有一桩十分有趣的案子，这案子对你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你愿意耐心地听我给你说完吗？”

“这是看你的面子噢！”我道，因为他知道我从不拒绝有趣的案子。

史勒立即单刀直入，讲述了有关在俄克拉何马州监牢里的一个名叫戴维·雷亚德·卫腊的罪犯走私八百克可卡因的故事。“这家伙为逃避服刑居然摇身一变，背弃他的祖国与母亲。他讲话的口气就像他的人格一样卑鄙无耻。缉毒署告诉他，让他滚蛋。你知道他后来干了些什么吗？他竟然打电话给海关了。”

卫腊是个贪婪的读者，他读到关于美国议会严厉批评海关总长威廉·冯拉伯指责墨西哥政府腐败缺乏有力的证据的文章后，立即从俄克拉何马的监牢里同海关取得联系。他表示愿意为海关提供墨西哥最高领导层人物腐败的情报。这是这个老骗子、毒贩子藉以脱身的唯一希望。

海关方面很快就中了他的圈套，这连卫腊自己也感到意外。告密者别有

用心的话正好证明冯拉伯总长没有欺骗议会。为了取证，冯拉伯曾在墨西哥官员身边安插亲信，鼓励他们加倍努力监视墨西哥政府的腐败现象。一项官方的窃听行动“军刀行动”就这么开始了。“你能否简单扼要些，我要教训这些墨西哥杂种。”卫腊已脱下囚衣，离开俄克拉何马城，开始了新的生活。由美国政府供养他，用一千二百美元买了一双鳄鱼皮靴，又花一万二千美元买了只罗兰克斯金表，住进加州拉加拉风光宜人的海滨别墅。在那里，他便开始与他所谓腐败的墨西哥的警察哥儿们挂上线。卫腊还从未过过如此奢豪的生活。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自己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舒坦。海关不仅为他的花销付帐，而且还承担了他两个十几岁小孩的生活费。这事又一次令人感到奇怪，史勒以为这里头一定有什么瓜葛。

卫腊不管到哪里均暗中打电话同一位名叫帕罗·吉荣的墨西哥人联系。此人曾要求加入墨西哥联邦警察。早吉荣一年，卫腊也曾有过同样的要求。那时，卫腊是墨西哥国家安全理事会的一名成员。他们曾在一起做过毒品生意。吉荣告诉卫腊说：“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网络。”并且希望卫腊为这个网络组织寻找顾客。卫腊则拼命地欺骗墨西哥人来美国走私。他说，任何法律责任都由海关方面直接承担，可以躲过缉毒署的盘查。现在海关和卫腊都发狠心了，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联合起来。只有吉荣还欣欣然准备以身试法。更具讽刺意义的是，目前联邦政法界正责令海关将毒品调查权归还给缉毒署。

“我来干些什么呢？”我问。

“我需要一位对南美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来充当龙头大哥。”史勒道，“我想你曾和罗伯托·苏亚雷斯的案子打过交道，这是我从玻利维亚的一个贩毒团伙中打听到的情报，所以我想此事交给你是最合适不过的。再说，我也需要一个好的帮手，来接管此事。我们不要去为难海关，但是我们得起主导作用。”

“你的意思是让我接受此案，却又不要让海关的人知道我在干些什么。”

“说得对！有关毒品的事，是毒品侦缉署的地盘，这一点他们知道。那位‘卫老板’在离开这里时，与海关的头目取得了联系，海关方面和他关系进展不错，为了不伤感情，就按‘卫老板’的要求办。卫腊已答应墨西哥和玻利维亚人，让他们的船停在加州的巴加海域内，交易一吨可卡因，过手在船上进行。在交易进行之前，他们想见见龙头大哥。海关为这次交易准备了一艘快艇，里头载满了船员……，真是妙极了。麦克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对此说不准。我曾参加过秘密缉毒工作，与玻利维亚的上层可卡因贩子们打过交道，但是从未听说过他们在外国成交的事。如果你要玻利维亚的货，他们倒能给你搞到几十吨上好的可卡因，要多少给多少，但是，你根本无法打入他们的内部。温文尔雅的绅士不可能了解里头的激烈争斗，相互欺骗等等，还没有打进去就可能一命归天。哥伦比亚人在过去十几年驾驭着整个毒品市场，他们的秘诀之一就是：他们不在乎打进玻利维亚，尽管玻利维亚生长着世界上刺激性最强的可可树叶，只要买进便可制成百分之九十纯度的可卡因原料。哥伦比亚人愿意买进原料，在哥伦比亚加工成可卡因走私到美国。然而毒品买卖也同别的买卖一样，有时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好吧，谁是案子的代理人？”我问，同时竭力不表现出我内心的疑虑。一桩案子的代理人关系到案情鲜明的风格，它牵涉到许多领域，甚至会影响我所肩负的责任。我怕这会不会是机构间为争夺地盘，故意制造假案情，为

对方设下的陷阱。我经历过两个机构间因权力斗争而引起的内耗。1973年以前，我曾是海关的特工，有段时间，如果抓住对方特工或使对方特工出丑，机构给予的奖金、荣誉高于拘捕一位毒枭。我曾有过一个念头，计划写一部书，书名叫《无法理解的战争》，已搜集了一大堆的资料，也许此案又能带给我新的素材。但是苏亚雷斯案给了我一个教训，这个念头也就好比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史勒说，“你听我说，麦克。你知道那帮加州佬是怎么办事的。再过两个月我就要退休了，我要有一个能接替工作的人。可是没有人来替我，此案可能要成为悬案了。我正急切地等待事态的发展。”

我在加州工作毫无经验，无法想象那些街头缉毒便衣是怎样办事的。为了我自己，我得去看看。史勒手下满是警探，可偏偏要横穿美国来找我，我感到有些受宠若惊。正是这好奇的心理使我产生了接受这项任务的欲望。

“总部的意见如何，他们同意用我吗？”我怀疑地问。自从苏亚雷斯案以来，一些高级官员对于任何对我的启用都十分敏感。此案听起来好像纯粹是无稽之谈，但是它至少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已经查问过了，说实话我曾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和非议，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同意了。我也去凯文那里查过，一切都清楚了，就看你的了（凯文·哥莱弗尔为纽约缉毒署特工副主管）。麦克，按我说的办吧，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选。我觉得此案还挺有趣，说不定真是桩大案子。”

对此他已不再留有余地。

“好吧，我干。”我带着一种迟疑的语调回答，就如同我此刻的心事一样。我不能拒绝他，因为从未拒绝过他。

“还有，麦克，你认识莉迪亚·苏托吗？”

“认识。”我说着，想起她曾是一位有魅力的海关年轻女特工，她曾被派往副总统布什在迈阿密的特工组。那时我也在那里工作，不过我对她了解不多，她似乎才貌出众。

“啊！她目前是这里海关的督导了，她要求我们迈阿密毒品侦缉署调人来和你一起合作侦破这桩秘密案件。调来的就是她的男友，汤密·夏普。假如我对她说你要来此工作的事，你不会反对吧？”史勒道。

我记得夏普是迈阿密人，他从前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是一位西班牙问题的专家，我想这事不会对我有什么伤害。“好！如果正像你所说的那样，这可是一锤子买卖，当然会令人开心的。”

1987年9月19日，我抵达圣地戈，在机场遇到了此案的代理人哈伯特·胡帕，一路上他像词典似地向我一一介绍了每一个流动岗、静止岗，还有冷漠的年轻警察如何将警车开得慢条斯理。他忘乎所以地笑了好一阵，直到加州的一些司机们气愤地将车开到他的身边，一个急转弯，表示抗议地挥挥他们的拳头，其中有辆车几乎撞到他车子的保险杠上。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表现。过了好一会，他像是服了镇静剂似的，一言不发。他属于电影中谦逊型的大英雄，但是在便衣警探的世界里，与这种缺乏攻击性的人合作，反倒是最危险的事。不久我们便来到圣地戈毒品侦缉分署的办公室。我总认为史勒的一番话还有什么埋伏打着，没有完全跟我谈透。

到了办公室，我和史勒寒暄一阵，便注意到胡帕的信箱上有钢盔的记号，上面胡乱地用蜡笔写着他的名字。

我想还是先保留我的判断。

傍晚，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轿车，将我接往拉加拉的卡特曼丽娜宾馆，我就在那里下榻。出示证件之后，又几经周折，最后胡帕开车带我去了一幢秘密房子，在那幢房子里，我们聊了好一会。在我走出车门时，我能听到海浪拍打海岸发出的哗哗声，能闻到大海的气息。我禁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心里暗喜总算没有白来，圣地戈之行实在是太短暂了，机会难逢，谁能像我这般幸运呢？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般机缘。

这幢临海的房屋是加州农场式建筑，盖在一个悬崖上，能凭眺太平洋。

胡帕领我穿过停车场，走进大厅，我便问：“他们都不在吗？”

“是啊。”他机械地回答。

起居室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十分宽敞，配有一套相当豪华的家具；靠海的一面是一垛玻璃墙，显得尤为轻松活泼。技师们精心布置的摄像机、电子监听器的线路，隐藏得天衣无缝。海关的六名特工人员早就围坐在那套豪华的家具上。

胡帕把在座的各位一一介绍给我。

第一位站起来同我认识的是吉姆·罗斯，他是海关委派的特工，负责监视卫腊。他是个热心人，秃头，因用脑过度，头发有些花白。他对烟草类毒品的检验有的是经验。交谈中得知他也是首次参加这样的行动。其他人对胡帕的介绍显得有些不以为然。罗斯精力旺盛，是海关方面一位举足轻重的特工人员。他着手处理这件大案，可同冯拉伯总长直接联系汇报此案的进展。罗斯是海关方面的核心人物，实权派。他的眼神和他的行动告诉我，他判断力强，反应灵敏，足智多谋，说明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接着，其余五位同我一握。莉迪亚·苏托和汤密·夏普紧挨着坐在一起。夏普昨天刚从迈阿密赶来。他们看上去相当的恩爱。莉迪亚比四五年前我在迈阿密遇着那会又增添了几分老成，她橄榄色的肌肤依然如旧，只是又多了副蓝色镶边的眼镜，她那双秋波一样的眼睛依然闪烁动人，令人看了就上劲……。我们在那样的场合见面彼此都有点尴尬。这一路上，我曾反复估摸着，让她加入这类秘密行动简直是开玩笑。尽管偶尔也有女特工出场的事，但是现在面临的是秘密缉毒，怎么能让她这样一个弱女子去对付那些恶魔呢。等我再见到她时我的顾虑就消失了。她变了，变得令人捉摸不透……。

一切并不如我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她是上头派来监视罗斯的，她尽可能掌握她所需要的材料。我不知道这里头错综复杂的内幕。在座的海关特工们暗地里正在为此案进行着一场内耗战。

随后站起来的是位大高个儿，棕色的皮肤，憨厚的笑容，他是美籍墨西哥人。他向我介绍他叫乔治·尤瓦乔。尤瓦乔说着伸出手来同我紧紧地握了握。在办案期间海关派他作为卫腊的一名陪同，与卫腊一同生活和工作。尤瓦乔是位讨人喜欢的铮铮铁汉。

最后认识的是这位卫腊先生。我注意到他对我十分地留意，从头到脚地打量了我一番。他身材瘦长，秃顶，长着一只鹰钩鼻子、一双念珠小眼睛，看上去不像只有四十五岁，而是显得偏老了一点。我们大家认识后，都坐下来进行交谈，由卫腊唱主角。他十分健谈，找些迎合我胃口的话题，滔滔不绝地聊个没完，但他所谈的东西还是未能引起我的兴趣。

他妄想压倒我，真是太狂妄了。他谈了许多琐事，有些与其说是他的丰功伟绩，倒不如说是一些天真的残暴行为，有的甚至是他即兴编造的故事。

谈得最多的还是中央情报局违法走私的事以及一些政客和好莱坞名星的私生活。我注意到，这些琐事一般人很难去考证，他所谈的一切，任何一个精明的人只会表示沉默，甚至连密探也不愿去打听。他说，他的父亲被指控是因为替中央情报局工作，甚至暗示他自己跟中央情报局有联系。他似乎知识渊博，其实什么也不在行。

当他提出打算将参色米拉（一种无籽的大麻植物）移植到墨西哥时，我向他提出了一连串有关他掌握的财源、具备的物质基础等等方面的问题。将参色米拉移植到墨西哥，这在毒品界就好像发明一种新式武器一样，耗资巨大。他得具备十亿美金的财产，若没有十亿至少也得有好几亿。但他坦率地表示要介入麻醉药品的交易中，口气之大，像是要买下整个“通用”汽车公司。然而他只是个穷光蛋，他和他的两个孩子，目前全仗着美国政府的帮助来维持生活。我朝胡帕和在座的这些洗耳恭听的海关特工们看了一眼，他们对此没有表示一点怀疑。他们是百分之百的被唬住了。在这样的场合我不得不允许他这样的撒野，就让他去胡说八道吧。

接着他终于被我找出了明显的纰漏。俗话说：言多必失。一点不假。他吹嘘在凯曼群岛上他与人合伙开一家酒店，在那里还拥有一家大银行和一个庞大的销售渠道。但是他没料到，他声称的酒店合伙人正巧是我的一位朋友。调查此事我完全有把握，只要给我的朋友挂个电话就真相大白了。

第二个纰漏出得更有点微妙。谈话的话题转到了迈阿密缉毒分署，我和苏托都在那里混过。卫腊却插进来说：“我对迈阿密缉毒署干的一切都不信任。”当他正激动的时候你是无法让他冷静下来的。

我随口问道：“为什么不信任？”

“他们这些人就像地狱里肮脏的鬼魂，他们会把我们在座的统统都出卖的。我过去曾亲自从他们那里买过情报。他们是些最不要脸的家伙。”

“你在骗人。”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同时看了一眼胡帕。他正在听着，脸上仍然挂着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微笑。

胡帕作为本案的代理人，有责任报告这个“腐败宣言”，这在缉毒署可是件相当大的事。我将要同卫腊合作执行这次特殊的行动，因而我决定还是别再谈论这个话题。

在那会儿，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卫腊向我发起进攻投下的一颗炸弹。我已进入了一场无形的战争，这不过是这场战争的序幕。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俄克拉何马缉毒署对他表示怀疑。他还有过一段性变态的历史，曾骗一位年仅十五岁的小男孩到他的房里观看描写性交的电视录像。我从事这项秘密工作大半辈子，曾与南美可卡因毒枭打过交道。使我觉得纳闷的是，居然会有人同卫腊这么个不讲信用的人做毒品买卖。他在俄克拉何马被逮捕时，身上只携带八百克可卡因。这些东西对南美的毒品大王们而言，还不够做样品。是谁在跟他开玩笑吧？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犹如地狱一样的虚幻世界。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事。行程三千哩，丢开已分派的一项任务，却来对付这么一桩案子。除了有些好奇之外，我对这件差使并不抱多大希望。然而现在却慢慢开始有点投入起来。这在秘密工作中也是极少有的稀奇事，我的确从未经历过。我已卷进了一个漩涡中，我不得不设法使自己摆脱出来。

我很快意识到另一个问题。从1973年海关失去调查权以来，他们主要从事毒品检验，只有极少几位特工有调查方面的经验，派不出人来处理本案。

卫腊不仅有赢他们的信心和把握，而且他有巧妙的应付能力，为了自己脱身，他又物色了一位同他一样有丰富阅历的骗子。卫腊了解的行情比在座的要多。

卫腊可以稳坐钓鱼台，呆在办公室里命令海关的年轻特工。有一件事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坐着，胡帕给他点烟。卫腊看见我赶紧眨巴眨巴眼睛。记住！这可是保释出来的惯犯，他的罪行足够判上四十五年徒刑！我心里暗暗嘀咕。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向我详细地交代我们在何处接受任务？”我说着，眼光从罗斯扫视到胡帕，故意将卫腊排除在我的视线之外，“我们应该开始拟定一个初步工作方案。”

他俩都朝卫腊望了望，他仍然微笑着道：“这里实在没有太多的事让你干。我已将一切都安排好了。”他表示他的朋友帕罗·吉荣，一位墨西哥的联邦警探，曾经和玻利维亚的一个贩毒网络有联系，他能提供“成吨的可卡因”。卫腊已告诉吉荣，他在为一家犯罪集团的上层工作，势力正在向纽约渗透，不管吉荣提供多少毒品他都买下。“买卖已安排妥了。”他道，那双白鼬似的眼睛飞快地朝每一张脸扫了一遍，接着说：“你们都该知道怎样扮演教父吧。”

我静静地听着，记住他说的每一句话，他说话时，坐在他身旁的这群年轻的崇拜者都默默地聆听着。这些联邦的特务，全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奶油小生，其中当然包括这位脸上毫无表情的史泰龙式的人物胡帕先生。

“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心想。

“我已谈了全部的部署，”卫腊煞有介事地道，“他们就要见见你这位龙头老大。”等了好一会，还是卫腊接着道：“看看谁跟他们去打交道，这一切已安排好了。”卫腊表示他要的那一吨玻利维亚产的可卡因，现在已到墨西哥人的手上，目前存放在海滨一条轮船上。我们假如在巴加海滨遇到他们和一条停着的快艇，就说明他们都被逮住了。

罗斯说：“海滨守卫正严阵以待，他们开来了一艘巡洋舰，目的在于提供必要的火力配合。”

所有的事听起来就像是在空谈。我曾参加过许多秘密行动，和玻利维亚人打过交道，从来未见过也未听说过他们有这么大规模的国外交易。他们总是格外的小心谨慎，宁愿将货物出售给哥伦比亚人，因为哥伦比亚人会来玻利维亚提货。虽然哥伦比亚人将价格压得很低，但也减少了不少的麻烦和风险。玻利维亚是一个内陆国家，小孩能骑自行车，能开飞机，但还从未听到过他们承办海上交易之事，更不用说有人会驾船。

这事总令人有几分疑虑，我决定保持沉默，看看事态的发展。干我们这行的总会出现许多怪事，在这个奇妙的麻醉品世界里你什么也说不准。

海关按卫腊的要求，已准备好派一艘秘密快艇，里头有全副武装的秘密船员。一艘从贩毒者手里缴获的“海特勒斯”号旧巡洋舰也准备就绪，这艘舰艇装备有高级雷达系统和大马力的引擎，价值超过一百万美元。

帕罗·吉荣估计再有两天就到，他会带着可卡因和那位居住在玻利维亚的墨西哥人来见我，然后就过手成交。“我说过，一切都安排好了，”卫腊又重复了一遍，这次大约是第六回说这句话了，“见你只不过是形式，让你干的只是保证他们的安全。我告诉他们，你和黑手党有关系，他们才肯同意跟我们做这笔生意。这可是件轻松愉快的差使。”其他人向我和卫腊微笑、

点头。在他们的心目中，此案已是既成的事实，正如卫腊所述的那样。看来海关的特工们不仅已在那里计算着他们将要拿到的奖金，而且正为这笔奖金的数额，在那里争多论少。

“价格怎么说？”我问，“当然，我不会跟他们去作价的。不过他们会想，我们做生意怎么不问价格？”

“我已考虑过此事，”卫腊傲慢地道，“我们得到的报价是每千克一万二千美元，你不要再作价了。”

我开始感到十分的紧张，这种紧张的感觉就像我从前在阿根廷经历的一样：也许被抓起来的是我，而不是毒品贩子。整桩交易漏洞百出，根本无法证实这桩买卖是否是真的。仅有一人出面，而且只有卫腊才认识他，与他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帕罗·吉荣。再就是玻利维亚人从不通过第三者进行这种交易，一般的商人总喜欢面对面地直接谈生意，从不牵涉什么警察，而且这位吉荣先生到底是不是墨西哥的警察还很难说。

还有件事，卫腊把我给弄糊涂了，他用不着把这样秘密的事告诉在座的每一位。我从他那双可怕的小眼睛里，能看见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从他骨瘦如柴的体形中，能感觉到他那副油嘴滑舌的丑态。我本能地暗示自己：盯着他，不要气馁。但是他属海关管辖，而且缉毒署不让我跟海关闹翻。不管咋说，他总是在我的上风，要在他双手沾满鲜血的时候，再让他服法，现在不能信口开河的乱说。

讨论的话题突然转到了莉迪亚·苏托，她要求和汤密·夏普呆在这幢秘密的别墅里，参加第一次接头的谈判。这对夫妻用不同的方法暗示他们要参加“表演”。

“这可是第一次谈判，”我对她道，“再别添乱了！最多只能有两个保镖，已经有乔治、卫腊作为特从，再添人不容易应付他们。”

莉迪亚不爱听我的话，我俩争了好一会。很显然，她要自己和夏普都上镜头。所有海关的特工都清楚，冯拉伯总长将亲自察看这些录像带。这意味着奖金、提升将随之而来，有关人员的大名将出现在报纸上，照片将出现在海关的宣传栏里……

“我想这个方案不错，”卫腊突然插进来道，他那双念珠小眼睛直挺挺地望着莉迪亚，“让他们扮演一对了不起的夫妻。”这只狡猾的狐狸随时都在加剧海关与缉毒署之间的磨擦。

“这不是在做游戏。”我恼羞成怒，这是我第一次发脾气，“我是为制止一场毒品交易来这里，不是来拍什么秘密交易的电视剧的。”

第一次会议就这么结束了。苏托和汤密都很不开心。我要么等着交易的发生，要么干脆转身回纽约去。我看着我的那位同行胡帕，他则是给了我一个史泰龙式的笑，什么话也没有说。

那天晚上，在当地的一家中国菜馆吃的晚饭，总算没有像平时那样，老是不停地听卫腊编故事。等我们大家包括苏托和夏普回到那幢房子里，就又继续扮演我们各自的神秘角色。在这之前，我在附近转了一圈。为了使自己演得更逼真些，我得先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和这幢房子。周围布满了高级电子监视设备的线路。我决定查查其中的奥妙，了解它的性能，知己知彼，在今后的秘密谈判中能清楚什么位置最易被录像、录音。阁楼很容易到达，只要放一架梯子就行。通过天花板就来到汽车库的屋顶，转弯就是控制室，在那里通过电缆把暗藏的麦克风、摄像机传来的楼下所有的动静、对话变成清

晰的图像和声音。可以看出，对起居室的监视或监听比较困难，也无法录音和录像。

当我查清楚情况之后，在房里稍稍喘一口气，卫腊那副令人讨厌的腔调又在我身后响了起来。我赶紧穿过一道玻璃移门，眼前出现了一片被修剪、护理得很好的小草坪，在草坪的尽头便是陡峭的悬崖，下面是一片汪洋大海。我站在悬崖的尽头，这儿竟然没有一根安全护栏。我静静地站着，企图能看清下面的海浪拍打岩石隆起部时溅起的白色泡沫。借着皎洁的月光，我能看清周围沿着海滨上上下下零乱地盖着好些房子，这些房子的周围也都没有安全护栏。我心想，加州佬都是一些古怪的家伙。一转身，只见乔治·尤瓦乔正站在我的身后望着我，他整个晚上几乎一声不吭，看上去有点心事重重。

“我猜还没人来过这后门。”我道。

“没有。”他温和地笑道，“嗯，这么着，”他不自然地道，“整个行动开始之前，我有些事想告诉你。”

“是什么事啊？”

“我办过许多的秘密案子，但是从来未办过麻醉毒品案。”

我瞧见他那宽阔文雅的脸膛。我说：“我猜你一定骗过许多人，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是吗？”

他微微一笑。乔治告诉我，他办的案子绝大部分是牵涉腐败的内容。他最早在美国国内税务检查处工作，后来到了海关总署。他过够了这种比囚禁还沉闷的生活，他离死只差一个死亡的宣言书了。

“别担心，”我告诉他，“生活本来就是假的，你就得像演戏一样地把它演真了。多动动脑筋。倘若你是个真正的谍报员，说你该说的，做你该做的，那样你就不会出差错。”

“谢谢，”乔治犹豫地说。看来一定还有别的什么事萦绕着他的心，他又不便告诉我。我也不能责备他，他对我还不了解。

此后不久，我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一项初步的行动计划，假称我们是来自“东海岸”的一个神秘的投资组织，我扮演这个组织的龙头大哥，一个意大利人与波多黎各人的混血儿，名叫路易·冈萨雷斯，卫腊和尤瓦乔扮演我的两个雇员。如果秘密交易谈判时墨西哥人的条件我们不能接受，我就会说，我得跟我的投资人再商量一下。这个借口可使我们赢得时间，重新制订报价计划，而且又不会中止谈判。这项计划最终得到大家的同意，作为卫腊可卡因交易计划的补充。

除了卫腊外所有的人都满意这项计划。“如果你是龙头大哥，为什么你要回去问你的投资者呢？”卫腊道。

“啊，想象一下，如果面临的是墨西哥人，咱们支出好几百万的美元，”我耐心地对他道，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让一位出卖情报的人参加这类计划的筹策，“先生，这可不是迈阿密之声，毒品侦缉署目前还没有这档子钱。我不会对他们说，我是政府的特务，我不允许你干这档子事。相反，我得说：‘让我跟我的投资者再谈谈。’过一会儿我会说：‘我的投资者不了解你们，因此他们眼下不肯出任何的钱。’我把他们都摁倒了。当我用这种手段对付他们时，他们就自然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叫逮捕，逮捕懂吗？”

“我和这些墨西哥人认识多年了，”他反驳道，“他们从来就不知道，我会受雇于什么人，我总是一个人干这档子事。”

蠢蛋，我心想，你总是一个人干的，就这么几盎司的毒品就被送进俄克

拉何马的监狱里；你总是一个人干的，你早成了 子，密探了。我情愿放手让你一个人去干吧。但是我还是什么也没说，因为我不想激怒了海关的特工。我朝罗斯和胡帕看了看，他们也都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想你们都同意我的看法吧。如果不行，干嘛让我来这里扮演这个该死的龙头老大呢？”

辩论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天凌晨，卫腊的观点越来越被看轻了，因为他是毫无根据的。我的怀疑也越来越有所增加。我实在有点憋不住了，真想跟他说：“你这个该死的 子，暗探怎么会成为我们的兄弟。给我把他关起来，让咱们自己来调查这桩案子。”然而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脾气以及我的这张嘴。考虑到还是再给他一些时间，抓住他的把柄，戳穿他的西洋镜，让他自己了断吧。

到了凌晨三点我终于镇服了卫腊，他答应采用我的计划，这只是搬开了一块绊脚石，算不了什么大事。

1987年9月21日的早上，卫腊和乔治将他们借来的那辆梅赛迪斯轿车停在了美墨边境城市蒂华纳，等着三位喜笑颜开的墨西哥人走进加州。他们都认识拎箱子的便是帕罗·吉荣，其他二位都不认识。

那位瘦高个子，满头白发的，自我介绍他叫艾菲尔。他确切的名字叫艾菲尔·门德萨·杜那兹，从缉毒署总部的计算机档案中得知，他是墨西哥人，也是玻利维亚可卡因团伙中的一名执法者，计算机上显示“此人极其危险。”后来我才知道他身体瘦弱的原因是因为子弹曾穿过他的胃，迫使他的半只胃被切除了。再一位就是赫克特。胡帕告诉我，此人就是赫克特·阿瓦兰兹，曾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墨西哥前总统）在新闻界的一名亲信，曾为墨西哥总统大选出谋划策。

傍晚，所有的人都沉浸在莫名其妙之中。乔治和卫腊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在那里款待墨西哥人，这是顿毫无价值的中餐。现在可以一个人在这幢秘密房子里轻松一下。从中央控制室的荧屏中得知这些墨西哥人并没有像卫腊所说的准备带我们上船，去提那一吨可卡因的货，而只是想见见“东海岸”的一帮兄弟，兴许会考虑谈谈这档子事，也没有暗示他们知道船和货的事。我终于领悟到卫腊所干的一切。

“他在撒谎。”我悄悄地同一边的胡帕和罗斯道。

“嗯？不会吧，”罗斯耸了耸肩说，“这可能出了点差错，他没有收到吉荣确切的消息。”

“出了点差错？你如何解释一吨的可卡因已装在墨西哥的军舰上了？这只是出了一点差错？”我朝胡帕看了看。他是唯一一位缉毒署特工，我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只是默默地耸了耸肩，笑了笑，一声不吭。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他用这种方式解释了成千上百个难堪的问题。

“这事假不了。”罗斯坚持说。

“他可是你的线人。”我说着记起不要冒犯了海关的事，“如果他是我的线人我会去问他为什么要撒谎。”

罗斯微微一笑：“那么怎么能让我相信你说的又是真的呢？不管怎么说，难道这几位墨西哥人是来下饺子的吗？”

晚上6点半，从阁楼上控制室里的荧屏中显示出那伙墨西哥人有点神情紧张。我将自己打扮得富丽堂皇，穿了一身雪白的外套，戴上一只钻石黄金戒指、一只钻石黄金手镯、一条金项链。路易·冈萨雷斯该登场了。

门德萨其人我有印象，缉毒署的计算机信息库显示，他有一个玻利维亚

毒品网，这个玻利维亚毒品网能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得到任何数量的可卡因。那两个像是他的左右随从和帮凶，只希望在这宗买卖中得到一些钱财之后就上路。如果毒品买卖做得顺心的话，按理说他们每位可得到一笔介绍费，通常是按成交金额总数的百分之几结算的。

卫腊和吉荣都是局外人，如果有什么成交，那肯定是在我与门德萨之间进行。

我喜欢戏剧，秘密工作本身就是生活中一种可笑的戏剧。我扮演的是黑手党中的掌权人物；乔治站我的身后，十分贴切地扮演了我的随从，仿佛我是教皇，来访问当地的教区。他为我送上水果汁，帮我倒咖啡，对我毕恭毕敬，用西班牙语喊我先生，从头至尾都这样称呼，甚至卫腊也进入了角色。这场戏可以说是演得相当的出色。那三位墨西哥人对我说话也采用表示十分尊重的西班牙语。至于门德萨，我可以看出他还表示没有完全进入我们布置的圈套。此人不轻易上钩，他十分留意地审视着我。

赫克特·阿瓦兰兹坐在几英尺远的一张长沙发里，对我认真地观察着。只有他的眼光好像有点与众不同，我心里暗暗有点不放心。

经过几分钟之后，相互简单地交换了生意上的事。我温和地将事情展开来谈。墨西哥人则处于一种守势。“这个人，”我说着用手一指卫腊，“同我讲所有的事都已准备好了，他也已准备了该准备的一切。我准备好一只船，钱也备齐了，我的那些投资者催得很急。”我将卫腊所说的“一切都已安排好了”的内容又重复了一遍。

吉荣听了吃了一惊，他不明白怎么卫腊会作出这样的申明。时逢总统选举，我根本无法保证货安全通过墨西哥，就是把货放在军舰里也不安全。“戴维一定是曲解了我的意思，”他说着奇怪地看了一眼卫腊，“根本不会那么说的。”

我看了一眼卫腊。他不敢正视我。

为什么他要撒谎呢？

显然那位老头，门德萨，对我的一番话正在作判断。在卫腊回答之前他先开了腔，解释他在玻利维亚的工作就像一位可卡因制造的“收藏家”，他可以按我的要求提供一个能量巨大的网络体系，但是他们从来不在海上做这类买卖。“胡闹，”他笑着道，“我们从来不跟大海打交道。”我看见卫腊的脸由红变紫。“他们有许多广阔的地盘和飞机，”门德萨继续说，“在玻利维亚，人人都会驾机上天。所有的货都是从空中走的。”门德萨提出的飞机运货，正是我所预料的，这是玻利维亚人做可卡因买卖的习惯。他要我的这个“神秘组织”派飞机和飞行员，私下飞入玻利维亚的森林，去提可卡因。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又从我的心里冒了出来。确切地说，在八年前罗伯托·苏亚雷斯的案子里，我曾干过此事。

“兄弟，这种事我以前还从未干过。”我回答道，“我的投资者们有自己的赌场，他们不会拿他们自己的钱作为赌注的。”门德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全是因为卫腊的谎话使得我一下子踌躇不前，几乎暴露自己的身分。一个真正的毒品贩子，在我的印象中不会因为船上走私不成而善罢甘休，况且他所说的从加州到玻利维亚的空运并不是在哄骗我们。我肯定门德萨已经嗅出有人告密，或者有缉毒署的人参与此事。

我继续恭听着门德萨的“玻利维亚式”的生意经。当他讲完，我感觉时间差不多了，就站起身来。“实在非常抱歉，我们未能成交。”我说着和门

德萨握了握手，“不过对我们之间的认识我很高兴。也许下次还有机会。”

“你认为可卡因最便宜的价格是多少？”在我摊底之前门德萨又问了我一句。

“你说个价。”

“你们打算出多少价格？”

“一万二千美元一千克。”我说着看了一眼卫腊，他又把目光避开了。我想罗斯能在阁楼上的控制室里通过监视器看见他这只圈子红得发紫的脸。

“我可以告诉你，我以五千美元一千克卖给你。”门德萨说着看看我的脸，等着我的反应。我装出有点惊愕又像有点遗憾的样子。

“你现在感兴趣了，对吗？”门德萨道。

“是的，”我说。的确我太感兴趣了，这样便宜的价格我还是第一回听到。记得纽约街头可卡因的售价是一百二十五美元一克。

如果这是真的话，真是绝顶的便宜。老头一定是有这么多吨货的货主的代表，这可是位王中王。我有一点发烧，跟在他的后头。

已很晚了，我和艾菲尔·门德萨达成一项协议。由我说服我的投资者们派飞机和设备飞往玻利维亚，运载至少两吨的可卡因，价格定在每千克五千美元。

门德萨不管成交可卡因数量的多少，只要总成交金额在二百万美元以上就付介绍费。至于今后我们是否再和玻利维亚人来往这不打紧。如果我真要成交，还得为这批货去一趟玻利维亚。

“我的人最不放心的是派一架价格昂贵的飞机进入玻利维亚。”我道，“我们看见报纸上毒品侦缉署已派人去玻利维亚扫荡。据说毒品侦缉署在反毒之战中有一项重要的行动，叫‘雪峰行动’。”我提这事是想试探门德萨实际的智力和能力，同时也想看看老头的资格。

门德萨温和地笑道：“路易，他们只是摆摆看看的，没有多大的威胁。那些派去给那帮外国佬工作的人都会随时给我们报告他们的情况。他们的行动队飞来前三天就有人告诉我们了。我们的组织控制着整个玻利维亚的民用航空业。绝对不可能用法律的手段来干涉我们。”

八年前在贝那空港饭店的一次秘密会议中，在赛罗·阿巴尼兹这位罗伯特·苏亚雷斯的得力助手、前玻利维亚的农业部长那里，我确实听到过类似的事情。

门德萨再次证实了不用船做生意；表示保证我去玻利维亚提货。他还要说些什么呢？正巧，毒品侦缉署的一项巨大的计划“新方向”已被缉毒署的高级官员们推出，招徕新的志愿参加者。因为这项行动毫无结果，使我大为扫兴。“雪峰”行动已实施一年多了，还没有资料显示该行动是否被取消，如果这一切正如门德萨所说那样遭到惨败，总部也许不会再采用这种方式。我们目前最重要的是将这项情报报告华盛顿当局，来对此事进行评估。这不仅仅是投资一笔钱的问题。我们还得派遣一批年轻的反毒将士，贴着兰伯斯卡的上空飞行，降落在南美洲的大森林中，才能找到在那里的可卡因实验室。这兴许是条危险徒劳的道路，大家都应该知道，从前有人就是死在这条道上。

我问帕罗·吉荣是否能将可卡因经墨西哥带进美国。“没法走我这条路。”他一口回绝，“得等到大选结束新政府掌权后。”我真想知道卫腊这位铁杆兄弟是否也是位撒谎的老手。这两位活宝都挺“老到”的。这位声称是墨西哥联邦人员的人看上去倒有点像好莱坞电影中描写的那种掮客。一个是贪污

致富的警察，一个则是贩卖毒品的痞子。这完全有可能。卫腊既然可以欺骗美国政府，这位帕罗当然就有可能欺骗毒品贩子。说不定他们就是靠欺骗为业的。不管怎么说，不管有没有这等事，这一对墨西哥人至少没有实现电话接头中所谓“一切都安排好”的承诺，这足以证明这是他们兄弟的一场阴谋。唯一确定的是，这二位安排这次可卡因交易，各自怀着相同的目的，那就是在这笔交易中大家捞它一把，然后溜之大吉。那有这么便宜的事。

可以肯定，如果门德萨和我有什么生意成交的话，这位吉荣就一定有介绍费进帐。“你干得值得。”我说着，确定他是这桩阴谋中的同谋，并决意产生逮捕他的念头，“如果没有你的介绍，就不会有这场生意。”我想他定会上前来吻我的手。

“你们三位，我还有话跟你们谈。”我神秘地说了一句，“我和我的投资者们从不通电话，我得一个个地去拜访他们。我需十天的时间给他们答复。”

“随便几天都行，路易，”门德萨道，“不急着马上答复。”

“我还想跟那些货主当面谈谈，当场解决一些细节上的问题。”我说着请他与我，咱们两位真正的主角再单独谈谈。

“当然，”门德萨回答道，“那是做生意的规矩。”

我告诉门德萨和吉荣，他们才是我要找的那种真正的生意人，对这桩生意我充满了信心，所有的事得从长计议。

他们赶紧同意我的要求。其实我只是让他进内室的另一间房间。在会谈结束之前，我告诉他们在这座别墅里跟乔治和卫腊交往，有什么情况可同我直接谈。

我放心不下的那位赫克特·阿瓦兰兹终于得到证实了。当会议临近结束时他请求允许加入我们的餐桌。连续的交谈中他不断地打量着我。他想知道我到底是干什么出身的，他尤其对我发达的肌肉十分感兴趣，他请求我允许他捏捏我的那块二头肌。我同意了他的请求。

只有一件事我是不会让这位陌生人做的，那就是亵渎我们祖国的灵魂。

会谈结束之后，吉荣随我一同出来，上了那辆梅赛迪斯轿车，在黑暗中他用西班牙语对我说：“路易先生，这次我没能帮上你的忙，但是我与即将当选的墨西哥总统关系密切，这次大选后我要提升为蒂华纳警察局长。到那时也许我们真可以合作。”这条狐狸大概想断了卫腊的财路。又是个十足的骗子。

“别急，兄弟，”我说着，一把握住他的手，“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之间还有很多的生意可做呢。”

事后，我们重放了有一段我们都不在现场的录像。房子里只剩下这三个墨西哥人。只见门德萨奇怪地稍微摇了摇头用西班牙语道：“那家伙是一只鸡。”他的意思是，同我做生意不容易，我是位棘手的要价人。这表明他正在意识到，刚发生的一切似乎有什么问题，没准他的确想到过我是一位秘密警察。

“我就是个老太婆也会被他迷住的。”赫克特道。

我离开了圣地戈，总的来说，谈判给我留下了美好回忆。卫腊留给我一幕幕淡淡的回忆，他曾执意要抢着扮演他为自己设计好的角色。乔治的表现很令人满意。我独自飞回纽约，将这桩谈判就留给圣地戈海关和缉毒署去办。临行前我对大家说，我们应该找个中性的地方跟玻利维亚人再碰次面，凯曼

群岛不错，那里就是卫腊吹牛说有一个“庞大的销售渠道”的地方；或者去巴拿马。在这桩调查活动中，我的角色到此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这并不能反映我在整个毒品战争中所扮演的所有角色。

我回纽约不久，就又投入了对两个住在维克多·凯曼，哥伦布大街 71 号的哥伦比亚可卡因贩子的调查。我受纽约毒品侦缉署特遣队的委托，又一次作“龙头大哥”捣毁了一个贩卖可卡因的大团伙。已查明该团伙每月从国外进口一千五百千克左右的可卡因到纽约地区。在三个钟头的晚餐会上，我查明哥伦比亚人每人偷运的可卡因数量不超过四十千克。据他们说这是件十分危险的事。

“听我说米格尔，”一位哥伦比亚籍工程师赫卡托说，他认为买卖可卡因的确是件一本万利的生意，“我喜欢你，也相信你。然而第一次交易，没有资格偷运四十千克以上的可卡因，而且不得压价。我们组织上个月获得了一万二千千克的可卡因，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这个数目，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才知道此事。任何一位主顾都不能要求偷运的可卡因数目超过四十或五十千克。如果我们中的一位主顾出了问题，会牵涉到整个组织的安全。”

他说得在理，我也不好与他再争。数量多少这无关紧要，主要是能说服他，他真的被我说动了。后来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了七十二千克的可卡因，逮捕了赫卡托和其他两名罪犯，并请了一流的律师为他们辩护。然而这些哥伦比亚人没有一个愿意同警方合作。这是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的根在哥伦比亚。他们明白这叫恶有恶报。

他们难道真的期望过这种漫长的监狱生活吗？当然不是。服刑是一种极其艰难的生活，那些政客们随时都在对他们进行训斥、责骂甚至体罚，就连起码的敷衍也是少得可怜。如果在玻利维亚森林中的“雪峰”行动搁浅的话，那么我们的努力就到此为止了。这个美国老牌赫卡托组织仍旧每月进口一千五百千克的可卡因，除非他们现在有点自知之明，要不然我们很难制止他们的行动。

9月29日，我又接到史勒的电话让我谈完那桩“生意”。在我这位“龙头大哥”离开的这几天，卫腊和三个墨西哥人之间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相当频繁，结果使我方向对方提出的问题洋相百出、前后矛盾。史勒和海关的人都认为此人已无法控制局面，有些事也就不直接跟他联系。胡帕作为毒品侦缉署负责此案的代理人，最后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不能也没法靠他自己的力量，来维持这个局面。看来这个案子似乎已到崩溃和下马的边缘。

“如果你要找我同这些玻利维亚人见面，”我道，“我和你说白了，我有一个条件，得直接让我和上头当面谈谈。”我开始有点担心会走八年前阿根廷苏亚雷斯案的老路，但很快又打消了这种顾虑。在我的记忆里，那桩事带给我太多的痛苦与创伤。

1987年10月2日，我接到了哈伯特·胡帕打来的电话，他让我拿着话筒，让罗斯也加入我们这次通话，这是一次由三方一起通话的电话会议。他们告诉我，卫腊还在和门德萨用“路易”的名义谈判，他们之间暂时达成协议，所有的问题将在巴拿马解决。

“我准备一下，”我说着想起了卫腊的“海上交易”，心里就有点动摇，“不过让我再考虑考虑。”

10月10日我接到吉姆·摩迪打来的电话。摩迪是圣地戈一位出色的警探，对南美有丰富的经验。他已被派去帮助胡帕制定这项战略计划。摩迪抱

怨说，他有点无法理解，他完全相信自己可以把卫腊甩掉，然而海关的人却把卫腊当作一件“宝贝”，老是护着他。

我什么也没有跟他说。

当我把电话挂上时，我又沉浸在几年前的另一场恶梦里。我决定尽可能快地办完此案，离开这个秘密工作的岗位，退休算了。这一行我已干够了。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再这么下去很有可能会引火烧身。这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我又不是傻子！

10月13日胡帕又打电话给我说，卫腊“谈得太臭了”，玻利维亚人已怀疑他说的是真话。这对我来说并不奇怪，因为我没教他该怎么谈。而我也没有心情去知道这些情况。“结果，他们在谈他们自己的生意。”胡帕道，“据说，他在墨西哥有很硬的后台。他们说，他们要在巴拿马见我们。他们的有些报价我们无法拒绝。”

后台很硬？卫腊？我还是不能相信。“后台很硬”不过是吉荣以为这桩买卖已经成功，在那里激动得发疯罢了。对“有些报价我们无法拒绝”，我想了好长一会。在我以往的经历中也听到过这档子事。

“告诉卫腊，让他跟他们讲：‘路易太忙，脱不开身去巴拿马，只想听听你们的报价。’让他们告诉他，先把报价通过电话接过来。”

11月3日哈伯特·胡帕打电话告诉我，秘书出生的赫克特·阿瓦兰兹对我很欣赏，他曾为萨利纳斯·德戈塔里竞选墨西哥总统当过参谋。“要我离家，这仍然缺乏诱惑。”我记得自己是这么说的。这个外号叫“钢盔”的人，总有一张不会笑的脸。

“我们发现什么新情况没有？”我问。

“卫腊倒有新的进展。”

我一声不吭。

“他们决定向你提供两吨可卡因和五吨大麻。”胡帕又道，“吉荣不明白为什么要延期。”

“瞧着吧，除这个人，”我指的就是那位警察，“他们不会再告诉我们什么新的内容。让我们去巴拿马与他们见面，这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一个真正的毒品贩子肯定想知道，他踩进去的到底是个什么泥塘。我们应该把他们都拿下。我甚至还不知道卫腊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我必须等他们进入我们的圈套。也许他们给我们这个报价是有意让路易去巴拿马和他们谈判。”

11月16日，我接到阿尔伯特·斯科佐的电话，他是胡帕新的行动组长，刚从曼谷调来。在圣地戈那会儿我曾注意到他的信箱上用颜料笔写着“法斯特·阿尔伯特”。

胡帕的上司，阿尔伯特·斯科佐，现在直接过问日常的调查情况。按照秘密工作的规定，我同样受他的指挥。这位“法斯特·阿尔伯特”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我还从来没遇见过说话这么慢的人。毒品侦缉署指派他作为行动组长，来尽快处理此案，因此我自然而然地猜测他在总部一定做了什么手脚。

斯科佐频频地向我发动电话攻势，最后在罗斯、胡帕和他本人参加的四人同时通话的电话碰头会议上，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罗斯报告，卫腊已同门德萨有过私下接触，老头竭力主张在巴拿马碰头，卫腊已经答应了。

罗斯继续讲述了卫腊如何难以理解地提出交易通过巴拿马银行转帐进行，使得所有的联系差点中断等情况。这一切不像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倒更像好莱坞电影中所描写的反毒故事。玻利维亚人很快有所警觉，在南美

毒品贩子是绝对不会以这种方式来做这笔生意的。他们很快就会在墨西哥查出他的犯罪档案。很显然，这是件有诚意的事，根据他提出的情况，他们或许会将毒品运过墨西哥，或许让吉荣倍加努力赢得时间，找人作担保，或许还有其他的途径。总之吉荣是他的唯一担保人。不管什么结果，这案子还有一线希望。

“门德萨说，已准备了十六吨可卡因。”罗斯道，“如果第一吨成交，他们准备增加到五吨一次；他们只想看看我们所说的是否是实话。”

十六吨，这会是真的吗？这几乎是“雪峰行动”近几年来在玻利维亚缴获的可卡因数目的六十倍。就算夸大了一倍，我们从事的这桩案子仍然是迄今为止人们还从未听说过的一桩巨案。

自从在法国人的网络里缴获七十千克可卡因以来，我们走过了一条漫长、艰难的道路。

罗斯似乎在想，我们能够确定，玻利维亚人已将可卡因偷运到了巴拿马。我并不这么想。我已经跟他们打过太多的交道，相信他们不会在玻利维亚之外进行毒品交易，这不符合他们的惯例。我敢肯定他们同意跟我们在巴拿马碰头只是为了查清我们的底细。在他们决定是否同我们进行交易之前，能在毫无拘束的情况下，观察我们的行动。他们所谓的“碰头”，这一招真是太狠了。不管怎么着，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卫腊已经连累了我们，棘手的是这个狗娘养的，他还在那里撒谎，以我的名义在那里谈判，而且尽可能地满足门德萨和玻利维亚人的要求。不管他对他们撒了些什么谎，都得让我去给他圆谎。只有在巴拿马才能把这事给摊开来。卫腊成了我心中一块最大的心病。

“我们去巴拿马是什么生活标准？”我问，“这个问题关系重大。”

“我已同邓肯联系过了，”——阿尔弗雷多·邓肯是国家毒品侦缉署派驻巴拿马的全权代表——胡帕说，“他说他会照顾好我们的，他还会带我们去一个绝对豪华的地方，他已发传真过来了，还有……”我默默地听着胡帕和罗斯在那里激动地谈论着。这些好似一次“好莱坞式”的安排，他们说话的口气有点像一对童子军在计划一次野营探险。他们的天真不禁使我有担忧。这可不同分派的一般秘密任务。我们现在的脑袋是拴在曼诺尔·诺列加的地盘上。一切都是生疏的，到处危险重重，这次与上次那场闹剧截然不同——它是一次绝密的行动。

如果门德萨真的像咱们之间在谈判桌上约定的那样，那么我们这次行动是毒品战争中迈出的巨大的一步，走到了这场战争顶峰。我们值得远征来保卫我们的祖国。逮住此人，不仅是缉毒署和海关联合的一大胜利，更重要的是被他们残害的大众已在觉醒，形成一种威慑的力量，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要揭穿骗人的把戏，我们的行动必须无懈可击，只准成功不许失败，这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对其他人我敢说，我一点不感到害怕。然而冒这么大的风险，我以为他们不要过于自信，恐怕他们会被玻利维亚人所察觉。

11月11日，是我儿子的生日。我接到一份来自圣地戈的电报，里头摘录了毒品侦缉总部要求我们去巴拿马会见艾菲尔·门德萨和玻利维亚毒枭的整个行动计划以及批复的命令：

“门德萨·杜那兹列入美国政府‘雪峰行动’，要摆出不会威胁到他们的可卡因制造活动的架势……”

11月13日，星期五，这是我离美赴巴拿马的前一天，我接到阿尔伯特·斯

科佐从圣地戈打来的长途，这位说话慢悠悠的加州人，还是用他习惯了的腔调跟我谈话。

“你知道我们正在行动的事吗？知道所有的人都在南美哪里下来吗？”

该我倒霉，我想，“雪峰行动”是没有什么国家机密可言的。

“是的，我都知道了。”

“好。嗯，总部——嗯，祝你们行动顺利。他们，嗯，按他们的情况，开动脑筋，随时调整方案。嗯，你知道在那里，该怎么干……”

他说话的口气是在兜着圈子，有点难以让人理解，而我听见自己在那里一个劲儿地说：“太好了，太好了。”其实并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他带给我的消息里唯一的凭据是“总部”，单这一点，就是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我们的行动连接着“雪峰行动”。

真太没意思了。墨西哥老头曾表示“雪峰行动”毫无价值，是桩冒险的行动。那么就让他们见笑吧。

然而我应该知道我所要去的地方，去那里体验一下情报人员的生活。这是一种什么滋味呢？这是一种虚无的感觉。

第二章 诺列加地盘上的冒险

11月14日，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到达巴拿马。在走下飞机舷梯之前，我们很快被分成两个组，一组是由我、乔治和卫腊组成的行动组，另一组是由罗斯和胡帕组成的联络组。在公开场合，我们之间互不搭腔。从我们到达这会儿起，若有人遇到紧急情况请求援助，可以和毒品侦缉署驻巴拿马首席代表阿尔弗雷多·邓肯或者雷纳·德拉卡佛联系。

那里到处是毒梟的耳目。诺列加地盘上很容易收买各种各样的恶势力。

我们比佛罗里达迈阿密联邦法庭对曼诺尔·诺列加将军与走私毒品有关提出控告还早三个月的时间。

当我们在移民局排队过境时，一位巴拿马的“官方买办”朝我看了一会，便走上前来。我们小组给了他六十美元的排队费，那人就溜进移民局的办公室，在我们的护照上迅速地贴上一张路单，我们就算过了第一关。

外交官阿尔弗雷多·邓肯是毒品侦缉署派驻巴拿马的总代表。他说，有一条特别的路子，直通诺列加，已同诺列加本人联系过了，不过还没有作出有关的安排。胡帕曾说，邓肯已许过诺。其实他什么也没有安排好。他对这次调查行动，似乎尽量使自己躲得远远的。他把我们介绍去马丽奥特大酒店，这个地方费用昂贵，几乎花去了我们带来的所有的钱。

两个组分头搭乘出租车去旅馆，在登记住宿相互碰见时都没打招呼。

到了11月16日的早晨，我们还是和玻利维亚人联系不上。卫腊打电话与墨西哥人取得联系。到了下午两三点钟时，我们打听到玻利维亚人已经到巴拿马二十四小时了，但还没有和我们联系。

晚上8点，卫腊打电话到门德萨的房间里，才知道玻利维亚人认为我们是毒品侦缉署的特务，因为我们下榻的饭店在巴拿马是有名的“毒品侦缉署的专用旅馆”。卫腊脸色煞白地和其他几位走进我的房间。

我怒声说道：“给门德萨打电话，告诉他，让他自己滚蛋吧，就说路易已经走了。”我觉得这又是老方一贴，有点像苏亚雷斯案的感觉。邓肯在干些什么，这家伙总是在拆我台。他干得真漂亮，怎么会于出这等蠢事。此案总有些奥妙，也许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此事完了！此事完了！”我不断地思忖着。这让我怎么回去交待。我呆呆地看着这对“天真无邪的童子军”，这些废物真叫我无话可说。

“我们为什么不再等等，就这么走了呢？”罗斯问，他苍白的脸上显得有些紧张，“我打老远的来……”

“只有该死的特务才会等着他们出现！真要是毒品贩子，难道他们是在发疯，会那么远的路到巴拿马来，然后等着束手就擒？他们这是在追着我们玩。如果他们想逃，早就滚得远远的了。相信我，现在已没有该死的时间去等待一切了，现在得装得像真的吸毒者一样。”

我气得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气愤的情感使得我在这件丑事之后不久，就提出退休申请。我气恼的是当我与门德萨和玻利维亚人打交道时，邓肯居然安排我们去这么一个饭店。我瞧见一张张的脸都在望着我，似乎在说他们都是清白的。

“但如果你把他们惹急了，那些人真会离开这里。”卫腊道。

“你给我听着，你这个下流坯。”我朝他瞪了一眼，“你他妈的跟他们直说了吧，就说我已经疯了。”

他们都直挺挺地看着我，像是我真的疯了一样，就这么愣了好一会。不

管怎么着，这事该我倒霉。卫腊告诉门德萨说路易正准备打包回家。我命令所有的人真的把自己的行李打点好，走得远远的，来吓唬对方，表示我们对此事无所谓。如果我们还继续哄骗对方来和我们碰头或者等着他们出现，那么他们会认为我真是缉毒署的人。

这个办法果然灵验。门德萨打电话到卫腊的房间里说，玻利维亚人想见我。我让卫腊转告他：“路易说：‘让你滚一边去！’”并告诉他路易要走的原因是，他不同做游戏的人做生意。

这时罗斯、卫腊甚至性格非常温和的胡帕联合起来反对我。尤瓦乔却保持沉默。“你这样做，不是把他们逼上绝路？”罗斯说。

“这是扮演一个吸毒者的角色。”我讨厌给这家伙上职业培训课，还是决意将我们的行李运出巴拿马，只有用这个方法他们才会上钩，才会救活这个案子。

“我作为一个重要的‘大客户’，决不会在附近转一圈回来去见这些杂种，那样，日后他们会把咱们当作米鼠看待。如果我说卷铺盖走，他们有诚意，自然会来求我们不要走。到那时，我们再提出我们的‘交易’条件。”

一阵激烈的争论之后，最后决定由卫腊和尤瓦乔去同他们见面解释：路易决定不再做这笔生意，决定回美国，对此表示由衷的歉意。

深夜，他们四位把我从梦中叫醒，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原来玻利维亚人恳求卫腊和尤瓦乔把我留下。希望给他们一个机会解释，这是因为我们住在毒品侦缉署的旅馆里而引起的一场误会。

“明天他们特别邀请你去进午餐，一起去开开心。”卫腊说着，将念珠似的小眼睛睁得又圆又大，我还从未见过，“主啊，你是对的，不过别太过分了。”

他们都期待地望着我。我看了看他们的每一张脸。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将面临的局面也许是十分的险恶，甚至卫腊也流露出天真的乐观。我清楚一些缉毒署特工人员在海外缉毒中被谋杀的事件，我曾破获了一起发生在哥伦比亚美国大使馆的办公室里的一名缉毒特工被枪杀的案件，为此我曾荣获国际缉毒组织授予的“日内瓦八项金奖”；我记得，柯克·卡玛利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他的墨西哥办公室门口被墨西哥警察带走，严刑毒打至死。这类事的发生有时与希望正好相反。

“我猜这些人都是些极其危险的家伙，”我道，“最终，让我们去钻他们安排的圈套。”

11月17日的下午，我们与门德萨以及他的那些玻利维亚人在一艘名叫“巴拉布”的游艇上碰头。刚一上船，屁股还没有坐下，卫腊就说，他做毒品生意时知道，这个地方是亿万富翁、大毒枭出没的乐园；另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大港口的海员也在这里酗酒、歇脚，等待他们的船只经过巴拿马运河。

这个地方十分嘈杂，我戴了一副茶色变光眼镜，摆出一付疏远冷漠的架势，让他们来恳求我。

这场秘密“钓鱼”的全过程开始了。

我很快瞄准了门德萨，他的脸看上去十分担忧，但偏要强颜欢笑。当我们朝那张桌子定去时，有两个人立在他的身边，他们的眼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成千上百次的秘密行动所积累的经验告诉我，第一瞬间主宰了一切，在毒贩子的身上有着他们自己的一种本能，第一印象会留下一个十分深刻的烙印。

半晌，我握住了一个玻利维亚人的手，他向我自我介绍说他叫贾杰。我曾听说过这个名字，此人生产和掌握着价值好几亿美元的毒品，而它们的成本还不到二十美元，专供那些旅居美国的大款们消遣用。他不是一般的人，他就是贾杰·鲁曼。他的出现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他有一双阴险的眼睛，矮个子，阔肩膀，阔得同他的身材有点不相称，肤色微红，一头黑发，胡须剃得精光，一看就知道他不是欧洲血统。他是一位地道的玻利维亚人。他看上去和我年龄相仿，约摸四十五六岁。我顿时觉得他有一种凝聚力。

贾杰·鲁曼对于形势的分析十分客观，甚至对任何一个细节都不会放过。他说话也十分有分寸，甚至在说俏皮话时也不例外。他的性格我十分了解，和我有点相仿。我的一举一动必须小心谨慎，鲁曼坐在离我仅有几步路远，全神贯注地听着我的谈话。他的心里有点害怕：这位自称是路易的新客户说不定就是位缉毒署的特务。

我内心充满着必胜的信心。我过去曾在巴拿马暗中同世界上最大的毒枭交过手，今天相信也能取得胜利。

玛利欧·瓦加斯是另一位玻利维亚人，有鲁曼一样温和的风度，说话和气，爽朗的笑靥似乎在敞开心扉，驱散隐忧。大家很快恢复正常，鲁曼说话的语气也有所改变。在我们坐下以后，已有两次谈到实质性的问题。贾杰·鲁曼都明确作出回答，其中有一项还作出了具有吸引力的答覆。

吃午饭时，双方都未涉及生意上的事。这是到了考验的时刻了。毒品贩子每次遇到一位新顾客，他们会提出他们黑道上的生活经历来。从坦诚的闲聊中足以找到起诉他们阴谋集团的罪行，将他送进监狱，让他们蹲一辈子的牢。从鲁曼的眼神里我可以体味到他是个反应敏捷的人，他说话的语气轻柔。后来，他告诉我他在巴西的一件往事，当时周围有窃听器，由于他说话声音轻柔而没有将他的声音录进去，从而免遭逮捕。

我干完了一杯酒之后，鲁曼说：“这个马丽奥特大酒店是毒品侦缉署的窝点，路易，你不必再回去了，现在毒品侦缉署的特务们就住在那里三楼。”他认真地审视着我的反应。

我心里打了个寒噤，但是还是正视着他的目光。他已查清了胡帕和罗斯的身分，我也顾不上去注意卫腊和尤瓦乔的反应。很明显，鲁曼在过去的四十八小时并没有在浪费时间。此刻我只想问问卫腊和尤瓦乔是否明白我们已处在千钧一发之际。

“贾杰，怎么让我相信您说的呢？”我温和而又急切地说，“我以前仅到过一次巴拿马，不过不是做生意，而是作为巴拿马政府的客人，参加1974年的‘日本柔道’邀请赛。”

我的用意也是想驳斥一下卫腊曾信口开河地跟我吹嘘的他在巴拿马拥有很多生意，并且与银行界关系密切。在卫腊曾作过一番陈述和夸耀的地方，我故意在谈话中加以额外的提醒，表明这只不过是些不符事实的道听途说罢了。我缺乏巴拿马金融界的知识，也很少有和他们打交道的经验。我想鲁曼有这方面的经历和知识，不过这没有关系。我肯定那位鲁曼已经掂量出卫腊只是个骗子。尽管是个骗子，可对我有着利用的价值。不管怎样，我知道不能让他们把我看成是毒品侦缉署的巴拿马官员，因而所举的例子不能有任何虚假的因素。邓肯这个不负责任的家伙，自我们到达之后，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在那时，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吓得要将自己藏得远远的。我必须按我自己的思路尽快、尽可能地弄清这一事件的内幕。

“日本柔道”提起了他的兴趣。我告诉他，美国柔道队的运动员出征南美、加勒比锦标赛的事。慢慢将他的注意力从不信任我们的气氛中转移开去。我还告诉他，有一次在周末狂欢时，汽车载来了好些妖艳的女子，后来，我在那次滥交中得了淋病。他很喜欢听这类风流韵事。我忽然发现我可以采用心理攻势把他给制服。他有一种不健康的精神迷恋，但是惧怕爱滋病。在我一提到这些性病时他的精神就萎靡了，他的眼睛滴溜溜的转个不停。

贾杰十分亲近地问起我这个波多黎各和意大利混血儿的身世，我把自己的遭遇的一些憾事罗列起来，尽可能地将这虚拟的故事编造得如同真的一般。谈得最多的是在阿根廷的那段往事，因为在那里我曾呆了三年。我告诉我在那里开始了毒品走私生涯。当他听说我父亲是个高利贷者时才真正跟我热火起来。他感叹高利贷者对人性有卓越领悟，在玻利维亚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接着，他给我讲了个有趣的故事，从中也使我领悟到人心深处的本质。

“在圣克鲁兹，”他开始道，“我认识一位高利贷者，他比任何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更了解人们的心思。曾有一个女人向高利贷者借钱，他问她借多少？女人告诉他要借钱的数目。高利贷者将钱拿给女人，当着女人的面，他没有点数目，但高利贷者心中有数。然后把它搁在女人跟前的台子上。‘我把它包一下好吗？’他问。‘不用了。’女人答道，说着将钱往包里一塞，便向他道谢，起身要走。高利贷者赶忙将她拦住。‘把钱还给我。’他说。‘这是为什么？’女人反问道。‘因为你根本不想还我借给你的钱，……你连钱的数目都没点一下。’”

我们在一起喝酒、嘻笑，我回答了鲁曼提出的所有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以这个秘密身份从事着我的工作，此刻这个路易真的好像就是我自己一样。尤瓦乔在加州就扮演我的雇员，他的表现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很快由沉默转为活跃，露出了活泼的笑意，最终竟毫无顾忌地哈哈大笑。

卫腊算个什么呢？他会干些什么呢？在那种场合他只能学学他那带美国腔的西班牙语。鲁曼看看卫腊，又看看我。从他脸上的表情中便可得知他在那里问自己：路易怎么会用这么个鲁莽的小丑？不管怎么说，这个鲁莽的乡巴佬的确是我的“雇员”，但他实在太不够格了。鲁曼的神经渐渐地松弛了下来，放松了警惕，但他永远不会百分之百的放松警惕。

在这场海阔天空的交谈中，我显得有些拘谨，没有太大的放松，也许在我说话的语气里表现出有些犹豫，回答问题的腔调也显得有点不自然。鲁曼很快抓住了这一点，他的黑眼珠子一亮，又有些警觉起来，他朝门德萨使了个让人难以理解的眼色。这是我们这次会面中致命的一个弱点。

我只能微笑着继续介绍我自己的情况。此时我能用以防卫的只有那些胡扯的故事和我天才的演技。我必须让此人对我产生兴趣，让他尽快地喜欢上我，信任我。没有有吸引力的工作就不会有信任。对秘密工作来说，采用何种手段达到目的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吸引力，一种魅力，才能引鱼上钩。

在我们吃饭的这几个小时里，相互的交流是从微笑、松弛、频频的大笑，一直达到无话不说的境地。这说明我们已克服相互间交流的障碍。我给鲁曼留下成功的印象，他已相当了解我了，并且开始信任我。事实上，更多的是受了我柔道和爱滋病的启蒙，这个狡猾的玻利维亚人才渐渐地显出放心的样子，才肯将话题转到生意上来。

鲁曼和瓦加斯掌管的可卡因实验室，每天可生产两百至四百千克的可卡因，鲁曼确信他的实验室足够满足各种客户的需求。但如果由于某些原因而不能达到客户的要求，也没关系，他和瓦加斯这一帮子兄弟还拥有一个巨大的玻利维亚可卡因联合生产集团。“你曾听说过那个‘公司’吗？”他问。

“没有，”我谎称道，希望所指的不是那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毒品交易组织“拉公司”，这组织简直就像哥伦比亚麦德林卡特尔一样，据传，它统治着所有的国家，控制着成千上百万吸毒者的生命。尽管这里头有许多事实被夸大，但它确实有点像曾风靡一时的美国黑手党。它很少吸收一些不必要的会员。我从未听说过秘密缉毒警察曾与“公司”的会员有直接的手交。

“我们都是会员，”鲁曼道，“它是一个集团，有许多像我们一样的生意人。如果你们要的数目超过我和玛利欧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们可以和其他的会员联系，你即刻就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数目。我们可以控制整个玻利维亚的货。比如说吧，我知道你曾买过哥伦比亚人的货，对吗？”

“是的，”我不加思索的答道，这意味着又得进入一场新的考验。

“他们卖给你是多少钱一千克？”

“我实在不能说。”

他微微一笑，似乎理解不能回答的原因。说实话，我其实是不知道在那段时间哥伦比亚每吨可卡因确切的成交价是多少。我想毒品侦缉署其他人也不会知道这个行情。干脆我就什么也不说，装出对这事有所忌讳，并不是我真的不知道。

“请原谅，”他说，“我们以前还从未和美国人打过交道。我们所有的客户大都是哥伦比亚人，偶尔也有些巴西人。美国人总以为我们供应给麦德林卡特尔的可卡因精只在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然而真正的数据是，”他吹嘘道，“可以说有百分之九十。”长期以来，一些人一直主张关闭哥伦比亚的可卡因基地。看来最好的途径，是首先封掉玻利维亚的可卡因源头。如果鲁曼所说的全是实话，那么这个“公司”间接地提供了走私来美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卡因。

“为什么你们冒这么个风险，到这里来和美国人做生意呢？”我问。

他的脸一沉道：“哥伦比亚人想控制我们，他们先是要按他们的要求付钱，然后又向美国人漫天要价。如果我们能找到合适的美国客户，就用不着他们再来作中间商。”

我又一次陷入了回忆之中，这简直就是八年前苏亚雷斯案的翻版。这些话和当时听到的一模一样。我的内心有一种冲动，真想将这些阴曹地府的一切丑恶的东西都一网打尽。

麻烦事终于来了，我能感觉到；此事倒并不是来自玻利维亚人的。

我曾隐隐约约地听到过一个企图吞并鲁曼的计划。我想那计划可能没有成功，但他总有一天会被吞并掉的。他为了获得自由，偷偷地跑来与我见面，他成功了。他极其明智地用请我喝酒的方式来取得我的欢欣。原来，他并不纯粹地为了某一桩具体的毒品买卖才这么做的。鲁曼说他晚上要休息一会，仔细地再考虑考虑。我们双方应该步调一致。明天早上就要开始真正严峻的谈判了。

当我们在俱乐部的前面道别时，鲁曼突然决定要单独送我一程。“当然可以。”我说，那颗心却突然在我的胸口“嘣嘣”地跳了起来。他可不是一个做事没有意图的人。他领着我走上一个浅水码头，这个栈桥至少有150码

长，笔直笔直地通入海湾，上面没有一个旁人，仅有我和他。我们走得很慢，快走到尽头时，在我们后面老远的地方有几个人跟了上来。我等着他跟我说些什么，但他始终一句话也没讲。当我们从栈桥的那头往回走时，经过一个小土堆，我指指远处的罗斯，让他给我俩留个影。我转身去看鲁曼，他的眼睛却盯着另一个方向。我这才明白，他的人不知在附近什么地方正监视着我们。

那天晚上我们大家都没合眼。晚上八点大家碰了头，开始计划明天谈判的内容。前半夜，我们主要为谈判准备一份长长的商务清单，这也是一份购买成吨可卡因的确认书，里头尽是些很小的细节问题，从价格、品质、双方的责任到数量，以及一些无法预测的事件，真是应有尽有。这份确认书还对交易前、交易中和装运后每一项可能发生的钱或可卡因的遗失或其他损失都一一列明，其中有些条目是摘自伦敦劳合社的贸易保险条款。这是一份地道的利害关系分明的购货确认书，也是一份地道的毒品交易的合同。

我不想成为鲁曼故事里的女人。

到了后半夜，我们排练着各自的角色，反复思考着即将来临的谈判，看看还有什么考虑不周的地方。驻巴拿马毒品侦缉署的官员仍未同我们联系。这使我有些担心。这倒并不是担心少了他们的那份保护，其实他们也保护不了我们，我担心的是他们是否会结成什么营垒来拆我们台。

这次的绝密行动发生在海外，是一件极其被动的事，更何况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帮我们。除了罗斯、胡帕和他们携带的一些照相器材外，我们没有别的武器和可以防身的保护伞。毫无疑问，那两位玻利维亚人肯定派人在暗中监视、观察我的动静。我们不信任当地政府，也不会向他们求助。我们办理这件案子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这需要每个队员加倍努力，而不光是毒品侦缉署或海关的某一个人努力就行了。这就像一句老话所说的那样：“秘密工作没有一条安全路可走。”

11月18日，上午八点整，双方在“巴拉布”游艇俱乐部的露天停车场碰头。卫腊驾驶着一辆借来的西德拜尔轿车，鲁曼、瓦加斯和门德萨坐在一辆计程车里，比我们先到一步。计程车的司机是一位又瘦又黑又丑的巴拿马人，他是鲁曼在巴拿马培植的许多亲信中的一位。门德萨下车坐到了我的那辆车上，作为我们的向导，跟在那辆计程车的后头。

前车司机使我们的车也开得很慢。汽车在环形道路上盘行，前车司机的那双眼睛盯着反光镜，监视着路上的动静。幸好我们预先已经决定，罗斯和胡帕不要尾随跟踪，就怕出现这种危险，所以这次出动只有我们行动组的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司机竟然开车把我们带到了美国哈瓦德空军基地。在海滩上有一个荒凉的快餐馆。鲁曼说，他喜欢在这里谈生意。在我们歇脚的不远处就是毒品侦缉署“雪峰行动”特工训练基地的宿舍。

我和鲁曼分别要了一杯咖啡和苏打水。半晌，卫腊、尤瓦乔和瓦加斯走了出去，他们去海滩上找野餐桌，管他们自己轻松去了。门德萨和司机神秘地回城去办别的事了。我拿出那份确认书道：“我想我们责任的范围就是这些，至于这里没涉及到的，就不用履行义务和权利。”鲁曼微笑着，像是在说，让我回去再研究研究。看来他已接纳了我。随着时间的推移，确认书最终被通过了。

“此地不是谈生意的地方，”他说着，迈开步子，“跟我走。”这是我第二次跟他两个人单独散步，在我们后头不远处有几个人正跟着我们。他沉

默了许久，我心想这大概又在重复昨天的那出戏，但他却开了口：“我妻子前几个月刚去世。”

“太不幸了。”我安慰道。

“你知道，”他要继续往下说，但好像又说不出话来，“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几乎有三十年了。”他沉默了半天，然后说：“生活对我来说不再有什么乐趣可言。”

贾杰·鲁曼没再说什么。我们继续沿着海滩默默地往前走。之后我老在想，他说的这些话真令人费解，他是在警告我呢，还是他对我有某种预感。

门德萨和司机回来了，鲁曼又一次让我们跟在他的后头。几分钟以后，我们跟着飞奔的计程车，沿着巴美高速公路，穿过国际立交桥来到了中美洲。大概过了一个半钟头之后，汽车行驶在一条废弃的公路上，又过了一会，计程车离开了柏油马路，开进了一条高低不平，满是风沙的泥路。不一会，泥路也不见了，两辆汽车一前一后行驶在一条满是荆棘的鸟道上，穿过一大片足有十英尺高的野草丛。我突然产生一种可怕的念头：我们要被扣起来了。我的心怦怦直跳，缉毒署花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才在墨西哥找到柯克·卡玛利纳四分五裂的尸体，我们的尸体也许他们永远也找不到了。

汽车噼噼啪啪地开出了野草丛，驶入了另一条泥路。我们隐隐约约地看见前面一个村庄，一幢幢小木屋排列在泥路的两旁。当我们驶进小村庄时，我看见那些居民穿着五彩缤纷的印第安人的服装，鼻子上穿着大金环，戴着一种古怪的小帽子，眼前就好像到了一个梦幻世界。一个印第安人，戴着用血画成的彩色的脸谱，手里攥着一块大石头，蹒跚地向我们扑来，他的后头跟着好些印第安人。两辆汽车疾驶，将一切淹没在车后扬起的尘土之中。谁都没有吭声。门德萨看样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

计程车领着我们又突然地向左拐。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已在一家十分古怪的菜馆的停车场里了。我一生中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地方：低矮的房子，屋顶是由棕榈树叶铺成的，出了屋子是一个天井，院子里有几张桌子。这地方看起来很荒凉，在这里呆得时间再长也不会令人注目。

“这才是谈生意的好地方呢。”鲁曼高兴地笑道。

开始之前，鲁曼先喝了两杯美国威士忌。我们达成一项协议，我向他购买五吨可卡因，价格就按每千克五千美元计算。两周内先买断一吨，剩下的四吨在第一笔交易成交后十五天内进行。如果大家合作愉快，我们将再次碰头，重新谈判购买另外十吨的可卡因。所有交易的总额达七千五百万美元。这笔交易的可卡因到美国“批发市场”一晷，就是三十六亿美元。

这绝对是当今世界上一场最大的秘密毒品交易，我竭力掩饰自己的表情，好像我整天就谈这类买卖。我朝尤瓦乔眨眨眼，他则犹如一个深藏不露的高人。

鲁曼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道：“路易，来吧，用你自己的眼来瞧瞧我们的设施。我们那个地方大得可以停一架波音747。就在靠近玻利维亚同巴西接壤的边境森林里，我建起一座完善的地下城。我可不是吹牛，路易，你亲自来看看吧。”

“我也许会带些人去参观。”我道。我肯定鲁曼不是在吹牛。在我们离开巴拿马以前，总部已批准卫腊去玻利维亚，真是机会难得。缉毒署派秘密特工去玻利维亚又不通知玻利维亚政府，这是绝对违背国际惯例的，这档子事缉毒署永远不会再干了，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对一个秘密特工来说，这反倒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差使。利用这次机会，可以了解每天生产几百千克可卡因的实验室，这个地下工厂已被“雪峰行动”那些全副武装的特工和玻利维亚军队围困了一年半了。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次机会可能使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毒品战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最终取得彻底的胜利。

“路易，他们一定非常欢迎。”鲁曼在一边又道。

这是我的荣耀，是我磨练了一辈子的结果，也是我们天天念叨的毒品战争捣毁毒源的杰作。袭击“公司”牵涉最高领导层，今后可能会受到我无法抵御的冲击与压力。这两位神秘的小人物，在森林中生活得如此悠闲，他们眼睛眨都不眨一眨，就同意我十五吨可卡因的交易，他们到底有怎样的底细呢？

“如果第一次成交相当成功，我派人同你商谈数目二十吨或三十吨的合同……当然价格得合适。”我试探着跟他说。尤瓦乔在一旁咳嗽了几声。鲁曼用锐利的目光逼视着我。

“路易，”他道，“如果你开一架波音747来玻利维亚，我们公司会把可卡因装满了，你要多少就给多少，只要你能表明自己是一位‘重要’的大客户。”

“那我该怎么做呢？”我说着尽量使自己的眼睛不眨一眨。

“你先用现金买下这一吨的可卡因，那样我们才相信你是一位重要的大客户，然后再接着谈我们以后的生意。”

“那自然，”我说着，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计划。

难道我真的花五百万美元去买下他一吨的可卡因吗？这是个机会，是长期以来所有毒品泛滥国家摆脱困境的唯一机会，也是反毒史上最大的一桩案件。想到这里，我决定用行动来叫他们相信我。花五百万美元来换取一种信任，有了这一份信任就能轻而易举地造成他们更大的损失。尽管此事把握还不大，但我还是决定采用花钱买进毒品的方法，那样才能真正打击我们的敌人。

过一会儿，我问：“就没有别的方法让我进玻利维亚？”这顿长长的中午饭吃完了，鲁曼手上的那杯酒只被他呷了四口。鲁曼坚持让我们去玻利维亚提这一吨合同上列明的可卡因。他的行为和我推测的完全一样：玻利维亚人从来不在国外交易数目巨大的可卡因。你要它？那你就来取它。这是他们的规矩。哥伦比亚人正是利用这一点阻碍了他们经济的发展。我朝卫腊瞟了一眼，来回敬他的“海上交易”。

“啊，路易，”鲁曼和蔼地笑道，“让我告诉你，我们是怎样同哥伦比亚人打交道的，……你来玻利维亚比你在自己的国家还要安全得多。”门德萨和瓦加斯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美国报章说，缉毒署派了许多的特务和军队去了那里。照报纸说，他们对此事抓得挺紧的。”我照着“雪峰行动”的内容就事论事。

鲁曼和瓦加斯相互对视了一番之后，放声大笑。门德萨则是摇摇头，意思在说，我早就同你说过了。

“路易，”他仰天大笑，那双阴险的眼睛里闪烁着寒光，“你真的相信你们那些报纸上说的吗？让我也来讲讲这些美国佬的故事吧。他们只有几架直升机，在那里飞上、飞下，”他说着用手上上下下的比划着。“这就是他们所干的一切，其实等于零，什么也没干，是我们控制着一切。”他说着，

又笑了起来，“请别去理睬这些头脑简单的美国人，”他补充道。接着又是一阵更加疯狂的大笑。

毒品侦缉署在这场毒品战争中的那些风流人物，又一次被他耻笑得一文不值。我也跟着笑了起来，内心却不禁生出了一丝忧虑。门德萨并没有夸大其辞。这次挥金如土的缉毒行动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还是把这些钱用在打入玻利维亚的行动中，让我去揭开这个万恶的秘密吧。

鲁曼在台布上比画着玻利维亚广袤的森林，嘲笑似地标出很小的一块，表明这是美国人的位置，飞机只能在这很小的一块范围内活动。这简直是在丑化美国人。我不禁想起越战的初期，有人也曾有过类似的谈话。

在鲁曼对缉毒署进行讽刺挖苦之后，我说：“我相信你，但这并不能证明咱们就可以在那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万一有个闪失，我们的损失不就太大了嘛。让我派飞机去玻利维亚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呢？就在巴拿马，你把货放在甲板上，我即刻付现金给你不就完了嘛，或者再选个其他什么国家也行，为什么非得要在玻利维亚呢？”

鲁曼停了好一会，打量了我老半天，那张长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没问题，就这么着，路易，你真不愧为高利贷者的儿子。”他说着伸出手来，“就这么定了。”我赶忙握住他的手，就在这刹那间，捣毁公司的计划也在我的心中形成了。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案子啊，必须把它办好了。

第二天，我和尤瓦乔跟着鲁曼和门德萨去了巴拿马拉斯维加斯大酒店。饭店小巧又干净，所处地段僻静。我们朝酒店的大堂走去，只见大堂里面有一个保安人员和两位戴墨镜的便衣警察，那两位便衣腰上别着的手枪能透过外衣隐约显露出来。他们三人都十分留意地注视我们的到来。鲁曼冲了进去，跑到柜台后头去打电话。

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位于六楼半的一间套房里，鲁曼把我们介绍给一位深沉的、看上去很有教养的、讲话柔软的玻利维亚人。他叫伦巴多。“我们在巴拿马的大部分钱就是这位先生替我张罗的，”鲁曼介绍道，“他很快就会收到你们第一笔五百万美元的款子。”

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打消了对此案的任何恐惧，又沉浸在秘密警察那种奇妙的幻想之中。我遇到了反毒史上最大的一场地下毒品交易，在巴拿马又遇到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洗钱人。他们的阴谋和他们的所作所为被搜集起来，足够判他们坐两辈子的牢。更令我高兴的是，这场交易的整个过程是由腐败的墨西哥政府的上层人物所策划的，此人也定会被提起诉讼。我们将着手打击这三国毒品走私中的顶峰人物，这就好像一箭发出去要射中三只雕一样。我们脚下的路还很漫长，首先我们得用金钱换得这“一箭三雕”的人场券。

当我们离开宾馆时，门德萨向我们讲述了那位伦巴多先生，他不仅是公司所有钱财的掌管人，而且与哥伦比亚的许多卡特尔有来往。“他的兄弟是公司的最高会员之一。”门德萨说。

我大喜，毒品案不会再大过这桩案子了。我心中不禁自问：伦巴多不依靠诺列加，能在巴拿马享受如此豪华的待遇吗？在下令抓人时必须考虑周全，接下来的整个调查计划必须做到胸有成竹才行。

鲁曼不愿意与马丽奥特大酒店相距太近，连声再见都没说就要走。“没关系，”我对他道，“我们可以再叫一辆计程车。”我们四人拥抱、握手，就分开了。我们同意通过无线电报话机保持联系，在两周里由卫腊和“我的

组织”的飞行员去玻利维亚参观公司的设施。在我们分别之际我能看到鲁曼那双眼睛里流露出对我们的依恋之情。

我要这些耻笑我们祖国、残害我们同胞的狗杂种们加倍偿还情感上的痛苦。只要稍稍合计一下，再加上几份运气，我就能制定出一项让他们痛心疾首的计划。当然这也是执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在收场的时候我要取出我的勋章挂起来，给他们来个出乎意料。我会对他们说：睁着你们的狗眼看看，我，就是你们所耻笑的缉毒署的一名特工。飞机，就是你们所说的，在头顶上“飞上、飞下的直升机”。那时，我还要向大人们宣布，这才是真正的缉毒大胜利。

那天晚上，我开始起草这项令人着迷的“一箭三雕行动”计划，设想着如何一举捣毁三国中最大的毒巢。

第一步，是花五百万美元买下一吨的可卡因。初看起来，似乎货价太大，但是“雪峰行动”已花去两亿美元，却毫无一点收获。买下一吨可卡因，至少减少一吨毒品在街头的流通，更何况能买得他们的信任，那样就能实现在巴拿马与拉公司上层会员的再次会面，商谈更大的买卖。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鲁曼、瓦加斯和门德萨要回去开会。我不花一分钱就已经得到了他们的信任。

然后我就等着，等到墨西哥总统大选结束，再拿一笔相当数目的钱，去打通关节，打开一条横跨墨西哥的水上可卡因通道。我要通过门德萨和吉荣取得与墨西哥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联系，让他们都到巴拿马来与我当面对话。要知道，钱是最能引诱这些杂种的饵料。我敢肯定，这五百万元换来的信任，也会叫他们眼红。

巴拿马最大的洗钱人也逃脱不了。

等到那次会谈实现，那他们就谁也甭想再回去了，统统地，都得被我抓起来，这就是这次行动的结局。

这第二步嘛，我叫它“特洛伊马”，里应外合的战术。就在巴拿马执行大逮捕的同时，“雪峰行动”的将士们和玻利维亚军队就乘飞机来到玻利维亚森林的上空，那帮玻利维亚人准以为是运可卡因的飞机来了。就在这时，我们正跟着鲁曼在森林里一个个地参观那些可卡因实验室。飞机一到，正好将它们一个个地消灭掉。这一锤打下去，释放出来的能量，将成为执法史上最大的一次打击毒品生产基地的行动。

我反复地仔细地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确信这场围歼可卡因的战斗定会取得成功。当然这得给我一个优越条件。至少，这次行动会真正动摇毒品卡特尔的权威地位，叫他们在国际反毒史上一败涂地，让局势来个彻底的转变。此案的胜利也许使美国真正取得控制权，控制玻利维亚可卡因生产基地。这就意味着第一次真正控制了世界上最大一部分可卡因的生产，使这些国家在毒品战争中，对美国的态度由嘲笑转变成敬佩甚至于尊重。

计划十分简单明了，就像拳击手在拳击场上相互寻找攻击对方的机会一样。玻利维亚人已在退缩，敞开弱点让我们攻击。如果缉毒署放过这个机会，那么就说明缉毒署放弃一切。从逻辑上说，这项计划也是恰如其分的，以往的经验告诉我，这绝对是件正儿八经的事，我还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来推翻它。

我的脑海里又一次浮现出袭击苏亚雷斯的事件，我竭力使自己摆脱这种纠缠。不会再发生那样出格的事，绝不。那只是一次例外。如果让毒品瘟疫蔓延开来，这可是一场恶梦。美国人民对此不会再次表示原谅。

一个朋友有次跟我说：“麦克，人总有些事会纠缠不清，问题是你如何努力，去摆脱这种纠缠。”这位朋友说得确实不错。

第三章 高楼深宫里的决策者

我正是抱着一种天真的傻气，欣然于1987年11月22日搭乘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回华盛顿，斡旋这项“一箭三雕”缉毒计划。因为我不信任毒品侦缉署的秘书，也不想把我经办此案时头脑里梦想的取胜这场战争的秘密泄漏出去。于是将计划草案输入了我那台私人电脑中。

1987年11月23日，在缉毒署总部的音响资料室里，我慷慨陈词，谈了“一箭三雕”行动计划，并汇报了这次调查的结果。缉毒署总部的最高决策者们对此表现出十分的冷淡。在座的除了“钢盔”哈伯特·胡帕、阿尔伯特·斯科佐外，还有海关的吉姆·罗斯。

大人们面对这一切，在那里“嗯”、“噢”地打着哈哈。我重复了鲁曼嘲笑美国缉毒署直升飞机的那番话，模仿着他的腔调，手舞足蹈地比画着美国直升机飞上、飞下的情景。我本希望这番话能直接激起缉毒署的决策者们对玻利维亚的可卡因贩子、巴拿马的洗钱人和腐败的墨西哥官僚的愤恨，然而恰恰相反，他们把这种愤怒统统发泄到我头上。他们的反应似乎表明，这番话是在有意诋毁缉毒署。

“我知道这并不奏效，你不要跟我们谈些咱们不知道的事。”人事协调官员阿特·伊哥伯特气愤地道，语气中直接流露出对这项计划态度的改变。

“‘雪峰行动’才是署里明确要执行的，”他接着道，“谁要不信任这项行动，谁就不是这个署里的人。列文，你怎么不明白，议会要问起缉毒署有关可卡因的问题，我们拿什么回答？‘雪峰行动’才是我们最好的回答。如果‘雪峰行动’失败了，缉毒署在新闻界的声誉就会一落千丈。”此事之后不久，缉毒署总长约翰·劳华要求每个缉毒特工开展讨论，他在一份文件上写道：缉毒署特工不愿参加“雪峰行动”是绝不能容忍的。

“这是玻利维亚人说的，并不是我的态度！”我坚持道，“他们攻击‘雪峰行动’说：‘不管怎样它都是无效的。’他们还说，他们控制着大部分主要地区，美国飞机只能控制一小部分地区和可卡因。”

“我们知道他们在笑话咱们。”伊哥伯特恼火地道。接着，他坚持要缉毒署给予“雪峰行动”财力上的支持。他还在源源不断地朝这个无底洞里扔钱。他几乎什么都谈到了。他说，玻利维亚人是“冲着钱来的”；飞机到不了可卡因实验室，不是因为缉毒署腐败无能，而是“无法逾越”；对每次行动前三天就有人通风报信的“雪峰行动”，他却称作是“一份让我们振奋的礼物”。他还说，按缉毒署估计，拉公司拥有的可卡因比鲁曼所说的更多。他看似千方百计地要证明玻利维亚人在说谎，然而事实上他却处处在长人家威风。

最后，他所说的话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我吃了这么多年的缉毒饭，还从未听说过这种逻辑。他说：“他们生产出那么多的可卡因，只抓住一吨、两吨或者说三吨，不管多少，都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像鲁曼这种角色也许有一百多个或者两百个，根本不值得去用买毒的方法解决问题。”

我真想破口大骂，为什么今年仅为该死的几盎司可卡因，就断送了两条缉毒特工的性命呢？这真是一文不值吗？那么又为何要像入侵越南似的派特工闯入森林呢？真的一文不值吗？这话已到了嘴边，但一想到果真那样说了，就意味着“一箭三雕行动”彻底无望，还是沉默吧。但是，这并不等于一言不发。

“你知道，”我还是开口道，“我想，只要将‘雪峰行动’所缴获的可

卡因总数与所消耗的资金比较一下，就会明白了。如果缉毒署作最坏的打算，即使我以五千美元一千克买下了这批毒品，也抵得上‘雪峰行动’的收获。”

伊哥伯特瞪了我一眼，就好像我在咒他的祖宗八代。他道：“我们组织起这帮人马在那里着陆，只是一次临时任务，他们都干得挺棒的。‘雪峰行动’也许不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它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所有的大人们都把这次“雪峰行动”当作一种赌注，由此引发了一场毒品战争，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赌马性质的游戏。什么纳税人支付的税金，什么特工的性命，什么麦克·列文所干的一切，在这场赌马游戏中都一文不值。但是我仍决定要竭力争取实现买毒计划。我手上还有两件法宝，就是事实的真相与合乎逻辑的推理。就在此时，我看见胡帕和他的上司阿尔贝特·斯科佐在朝我使白眼。

我偷偷地朝长长的会议桌周围望了望在座的人一张张冠冕堂皇的脸，这些掌握着国际缉毒大权的大人物，都在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望着我。我这才知道自己已被这些官僚、政客团团包围了。他们中哪一个有过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经历，然而却在那里煞有介事地指挥这场战争。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干，却在那里指手划脚地领导他们的下属。毒品侦缉署不仅是个表面上的执行机关，而且是一个政治的工具。这话也许是对的，要不然它为什么老出那样的事呢？

这次会议还有位重要的缺席者，那就是丹弗·法罗。他是街头特工出身，思想敏锐，经验丰富。很多年前，我曾同他合作办理过秘密案件。后来，他调任总部工作，负责一些重大的秘密行动计划，是一位身居要职的务实派。起先，我跟总部联系，想通过说服法罗，来批准“一箭三雕行动”，这类行动计划最适合他的胃口。但是不久前的一次电话交谈中，他向我暗示，他对此事已无能为力。“可卡因司来要这个案子。”他向我透露道。这个司是一个新设的部门，是联邦调查局介入后机构调整的产物。

联邦调查局第一次号称“清洗毒品侦缉署”，新增或改组了缉毒署的职能部门，于是便有了这个可卡因司。改组后的缉毒署第一任总长由联邦调查局头子法朗西斯·马勒兼任。作出那样的决定是为了提高缉毒署的战斗力和战斗力。改组后管理监督毒品调查的部门，是按毒品的种类分的，因而又有了海洛因司、可卡因司、大麻司等等。改组前则按不同的地域分，例如南美洲部、欧洲部、中东部等等。这一变动，本意是为提高效率和战斗力，这仅是理论上的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国际毒品调查的控制，其实，它只是一次不符逻辑的重新瓜分，使缉毒署陷于官僚的混战之中。从那次改组后就再未恢复原来的状态。

毒品贩子才不会将他们的组织按毒品的种类来分。哥伦比亚的一个毒品组织，可卡因、海洛因、瓜路德斯、大麻全有，这就使缉毒署的四个部门分别对他们进行管辖，也就意味着要成立四个单独的调查组织，要以四倍的人力物力对付这个目标，官僚们就可以利用内部的勾心斗角维持他们的统治。这些内幕情况，使得新闻界倍感兴趣，这可比芝加哥的大选更肮脏，更卑鄙，更狡诈。

法罗是在海洛因司工作，指挥一项与海关的“军刀行动”类似的行动，目的也是揭露墨西哥现政府官员的腐败。自从“一箭三雕”射中了墨西哥官员和玻利维亚毒品贩子之后，他兼管着可卡因、海洛因两个司。我对法罗接管“一箭三雕”十分高兴。我从巴拿马回来后，我们已通了好几次电话。他

对我的行动计划中安排一吨可卡因的交易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后来可卡因司要把这次行动并入“雪峰行动”，开始发动了一场游说活动。法罗的缺席已表明，他们将他赶走的目的已经达到。

接下来的一小时，辩论越来越激烈，我为这次买毒行动施加压 53 力。伊哥伯特则不断地重复，他不关心能搜缴多少吨可卡因，其他的大人则频频点头表示赞同。“数量是毫无意义的，”他又一次重复，“这是上头让我们做的，是最高领导层。”我还是以事实来说明，买毒能买到信任，然后邀请三个国家的最大的毒梟去巴拿马或其他地方谈生意，这就使我有机会把他们都逮捕。我讲的这一席话，大人们好像都听不懂，似乎我讲的不是英语。我面对着官僚们疯狂的狡辩。在他们的逻辑中，衡量是非的标准是官衔的大小，他们可以不理睬任何别的观点。停了一会，伊哥伯特深深地吸了口气，定了定神，开始为捍卫“雪峰行动”对我进行长篇的抨击。这时大家已开始交头接耳，发生一阵阵“嗡嗡”的嘈杂声。

又过了一会，法斯特·阿尔贝特·斯科佐首先开了腔：“嗯，嗯，我同意伊哥伯特的意见，”他说着话，那条腿在那里微微地颤抖，那种紧张而又坐立不安的神情，就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在课堂上举手要求上茅厕一般，“我，嗯，我想咱们应该策划一个‘佯买真逮捕’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在付钱交易时将所有的人都逮捕。他朝桌子周围环顾了一遍，试图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的心中不免有些失望。在我去华盛顿开会的前两天，在斯科佐同我频繁的电话联系中，我已预感到他将会接替这个案子。最近他调到圣地戈一事，说明他已是此案的接替人。他既缺乏办案的经验，又缺乏南美可卡因交易的经历。咱们曾商定，全力争取买毒计划的实现。但是现在，显然出现了差错。

伊哥伯特的反应让我觉得有些奇怪。“他娘的，追查、搜缴毒品的线索烦得我够呛，”他不耐烦地怒道。斯科佐的脸涨得通红，他坐在椅子上的样子，像是小便尿在他的裤管里一样。“我们查明了玻利维亚人所有的可卡因，来次大的搜缴是不成问题的。我需要一些人，也许能逮住几个大毒梟。这是明摆着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要讨论究竟是采取买毒方案还是采取买捕方案的原因所在！”我说话间，已经领悟了其中的奥妙，我感叹自己原来是在犯傻，这些人难道真的听不懂吗？“如果我们采用买捕方案，我们不仅断了这条唯一的可卡因线索，而且无法保证我们能够诱使墨西哥人再去第一次会谈的那幢别墅。出了那个地方，我们就无法逮住他们和其他的玻利维亚人。因而，我们就得带钱去巴拿马。让我去付钱给那位洗钱人，他是唯一一个我最终要抓的人。”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接着道，“我能用买毒的方法，来换取他们对我的相信，我能预订十吨、二十吨甚至一百吨的可卡因……。”尽管我说话的语调没有一点绝望，然而我的心里确实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我竭力突出“一箭三雕”的重点，观察着大人们一张张毫无表情的面孔。

“不错，”我下结论道，“买捕行动我们除了搜缴一些毒品，其他什么也得不到。而采用买毒行动，不但能抓获这些人，而且能逮住这三个国家里的总后台。”我严厉地反驳了伊哥伯特的逻辑。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眨巴着那双眼睛，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是默认了我的观点。我注意到斯科佐焦虑的样子，他显得十分别扭。胡帕则将他整个身子躺在座位里，眼睛显然是

在看着会议的主席。海关的特工罗斯此刻就像犹太人到了清真寺，紧张而又兴致勃勃地关注着这一切的发展。

斯科佐突然脱口而出：“嗯，你们以为，买捕行动是否比买毒行动更高明？”

伊哥伯特没有去理会这个评论，反倒假惺惺地向我一一询问了有关买毒计划的许多具体问题，涉及到了所有可能出差错的环节。其他的一些大人们马上也都参与进来：倘使那些坏蛋要你把钱带到一个危险的地方怎么办？倘使他们把你扣作人质怎么办？倘使他们让你把钱带到玻利维亚怎么办？倘使……，倘使……，倘使……？我当即以自己早已准备好的答案，解释了这些问题，并说明我们将如何采取各种应变的措施。我指出，我们正在成功地执行一项复杂的秘密行动计划，这是项称得上绝密的行动，它有点类似于苏亚雷斯事件，类似于起诉玻利维亚内政部长路易斯·阿克·戈麦兹的“虎行动”。它同其他的绝密行动一样，当然无法保证一定成功，但是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但这番论述仍毫无作用。他们显然在搜集否定买毒计划的材料，不断地攻击这项行动。越来越明显的是，他们不仅反对买毒计划，而且反对再作进一步的调查。他们根本不想“一箭三雕”计划获得成功。他们的对策是，既不肯定这项行动的合法性，也不厚颜无耻地直接否决这项行动。这实在是高明的手段，再合适不过了。在那会儿，他们最好的办法是拖延时间，等着这项行动计划自然地被淘汰。

“你们知道，”最后，我对所有的与会者道，“今天所有的讨论还是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结论。毒品贩子给我们的时间有限。在这个期限内，他们相信我我是个毒品商，不是缉毒特工。如果再这么拖下去，他们就不会再跟我做这笔买卖。”

会议桌周围的反应再一次告诉我，我已是孤立无援。伊哥伯特怒视了我一眼，眼光中充满了对我的憎恶，只是强忍着。“我们这个署，”他慢吞吞地开了腔，不再拿眼睛瞧我，“‘雪峰行动’是第一位的，任何事得靠边让道。如果‘雪峰行动’失败了，我们署在新闻界将一落千丈。‘雪峰行动’受议会和联邦执法委员会的委托，在波特马可河流域推行，不管它将来是成是败，都得推行。”接着，他用警告的口吻对我说：“‘雪峰行动’是缉毒总署总长、执行官威斯权特先生的一块心头肉，什么也动摇不了它。”

我又一次被这番不知所云的话弄得晕头转向。我们绕了几个圈子，又回到了会议一开始的话题上。他们的出发点仍然只是关心“雪峰行动”，而不是“一箭三雕”。在他们看来，“一箭三雕”的出台威胁到“雪峰行动”，因而，不准调查，不准行动。不管怎么着，“雪峰行动”还是出现了徒劳无功的结果，它根本无法扭转南美的毒品战争的局面。

伊哥伯特突然转身离去。两个多小时下来没有一点收获。另一位可卡因司来头不小的大人道：“威斯权特先生今天下午专门抽出半小时的时间给你，他很忙哦。如果你真的要推销你的行动，最好向他好好地介绍一番，这可是你唯一的一次机会，……要简单扼要，又要娓娓动听。我要是你，”他又添了一句道，“一定准备一份提纲，威斯权特先生爱看提纲。”他把我从电脑里打印出来的“一箭三雕”行动计划的文本，放回到桌子上，然后走了出去。

望着这批大人从会议室里一个个鱼贯而出，我不禁暗想，行动计划是好好地推销一番。我的行动？我唯一的一次机会？……难道这场毒品战争是

我一个人的战争吗？

“我们最好再合计合计这……这份提纲。”斯科佐说着话，脸涨得通红，一双手在那里不停地颤抖。他猛然意识到，这是在决策者的高楼深宫里，在这个官场里，他已得罪了那些大人，成了让人讨厌的家伙，这会给他的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失。伊哥伯特对此事似乎大为恼火。

“好吧，”我接了一句，一种厌恶的情绪一下扩散到了全身，“威斯权特先生爱看提纲。”我重复了那位大人的话。

“你想，”他急忙对我说，像是我要打退堂鼓，“嗯，我想，他们不愿接受买毒计划。就按刚才我说的，草拟一份‘佯买真逮捕’计划。”

“那，你按你的去干吧。”我道。我不知道下一步让我过的是什么鬼门关。我朝那位海关特工罗斯注视了一下，他也正用一种奇怪的笑脸注视着我。我无法理解他的这种神秘的笑意。

“嗯，嗯，你可知道怎么才能确立我的大纲和提要呢？”斯科佐又问道。

“让他们实行买毒计划，无异于逼他们下地狱，”法罗用一种严肃的口气对我道。他在办公室门口的过道上一直候着，观察着，就好像是埋伏在那里的士兵，随时期待着抢劫团伙的到来。“你要办的案子在‘雪峰行动’看来，简直是该死的浪费。”

“不！这决不是浪费。”我辩解道，“这会是一次很好的行动。”

“把这些都留着，告诉他们，”法罗道，“他们总爱把署里的成就和荣誉跟议会扯在一起，这根本就不会有结果的。这事看来是凶多吉少。”

“威斯权特先生这个人怎么样？”

“你这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雪峰行动’是他的心头肉，”他说的与伊哥伯特完全吻合，“你别再指望这该死的事会有什么着落。”

“让我再试试。”

“再用脑袋分析一下，别再做梦了。那家伙从不会出办公室一步，他只在纸上做着美梦，大人们把文件端到他的手里。他们向议会汇报说，‘雪峰行动’三年来，已经销毁了可卡因生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你会相信吗？现在他们正死抱着它，不肯放手呢。”

那天下午，我遇见了大卫·威斯权特这位总署相当有影响的实权派人物。威斯权特有一张又圆又饱满的脸蛋，红润的脸颊，金黄色的头发，与其说他是缉毒署秘密行动的执行头目，倒不如说他像是大型唱诗队的领唱员。当他被大人们护着，疾步走进会议室时，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站起来，一直等他坐下，才一一就座。他高傲地朝室内环顾了一周，然后点了点头。我按要求准备了一份既简单扼要，又娓娓动听的行动计划大纲。在那里，无论什么都好像是不可辩驳的。

斯科佐清了清嗓子，耸耸肩，然后迟疑地站了起来，那双手有些发抖，他一边结结巴巴地打开了话匣，一边还在那里胡乱地翻找着记在本子里的提纲。接着，他将潦潦草草写着的那二十多条内容，照本宣读了一遍。这份简单轻率的大纲不知所云，甚至连我了解内情的人都被弄糊涂了。我注意到一些大人在那里东张西望，不断地咳嗽，暗暗发笑。

我仿佛看见鲁曼也坐在我座位的对面，正和大人门一起，在那里“嗤嗤”地笑：你难道没有看见，这些笨蛋又在和我们开玩笑吗？

当轮到我发言时，我不得不再从头开始。我听见自己在心底念叨着：只要我活着，我可能还会再做梦，去竭力推行“一箭三雕”行动计划。我将一

一切都陈述完毕之后，威斯权特先生当着大人们的面，提出了一个有关资金筹集的技术性问题。我感到他们对我的“处理”是十分的谨慎。也许有谁已向他提起过发生在我手上的苏亚雷斯事件，也许有谁告诉过他关于我的一切。没有人会讲一句任何反对行动的话，没有，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当我想用目光朝大人们探视个究竟时，他们一个个都将目光盯着脚下。我不知道“一箭三雕”的命运究竟如何。

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才告结束，但仍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威斯权特先生只是提出了一些令人较为窘迫的问题。他说，他将考虑这项计划。然后他被那些大人物簇拥着，仪态大方地走出会议厅。我心中暗想，他们将会干些什么呢？他们只是不作任何的决断，让这桩案子自生自灭。他迟迟地不肯决断，恐怕是不让我有所行动，让鲁曼对我起疑心，然后拒绝同我做买卖，这简直跟毒贩子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我感到气愤、懊丧，这种心情代替了二十五年来间谍对间谍的那种细心、机智的心情。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与官僚作对，不能感情用事，不能直截了当地硬拚，得用智斗。你得转过身去，背对着墙，寻找着他们的弱点，等他们忘乎所以地暴露出他们的弱点时，你就冲上去，对准这些弱点狠命地咬一口，咬完就走。

会议结束后，一个弱点终于暴露了出来。

“你愿到海关总署来吗？”吉姆·罗斯问我，“鲁斯伯里特先生是此案的最高负责人，他想见见你，跟你简短地聊聊。海关总署冯拉伯总长将此案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是真的？”我道。他们也许想扼杀“一箭三雕”，这总会被弄个水落石出的，这里有这么多的目击证人。

我同罗斯、斯科佐和胡帕乘出租车来到美国海关总署，我们到达时已是黄昏时分。办公室都已关门下班，只有鲁斯伯里特先生还在那里等着我们。威廉·鲁斯伯里特是海关总署执行官，第二把手，他身材高大而结实，讲话办事干净利落。他认真仔细地阅读了“一箭三雕”的计划草案。我们四个则在一旁静静地等候着他的反应。他看完之后，提出了几个有关战略和技术性的问题。从他的谈话中表明，他已了解了这项计划的内容。在我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时，他对我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鲁斯伯里特先生没有含糊其辞，他十分赞赏这个方案。他对此事稍稍考虑之后，很快赞同了我的观点，并带着几分热情，打电话给大卫·威斯权特先生，告诉他，他对此事“印象根深”，认为这是一桩“恰到好处的行动”，应该执行。他决定从海关的“走私基金”（这笔钱来源于毒品走私者，被缴获后，作为联邦缉毒组织经费，在预算困难和资金紧张时，常用来应急）中，支付这次买毒行动所需资金的一半即二百五十万美元。这一决定几乎使我高兴得晕倒。威·斯权特在电话中告诉他，这个方案正在考虑。我们都坐着，听着鲁斯伯里特在那里劝导威斯权特作出决定。他告诉威斯权特，完全可以相信这个方案，耽搁、拖延此事显然是毫无道理的，再拖下去，就会暴露两位特工，这次行动就会被发觉。但是威斯权特哪里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呢？

这一变化倒确实是件好事，缉毒署与海关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他们之间的信任度，甚至还不如对玻利维亚人。现在缉毒署面临着一次抉择，他们不可能不考虑海关方面的反应，去扼杀“一箭三雕”行动。毒品侦缉署在新闻界总的形象，也许不怎么光彩，他们真正担心的，仅仅是这一场机构间的较量。

接下来就是鲁曼的期限问题。在巴拿马那次会面之后，那些玻利维亚人在等着我同他们取得联系。在一周内邀我去参观他们那地方和他们的实验室。一个真正的毒品贩子，一接手像我们那么大的一桩买卖，决不会有任何的耽搁。美国秘密警察在秘密行动范围内，不通知有关国家政府，是不能进入这个国家的。如果那么干，多半要违反国际惯例的。类似的行动我和缉毒署的其他秘密特工以前也曾干过，一般总是危险重重，收益不大。因而就决定由卫腊和一位在缉毒署受训过的私人飞行员兼情报员作为我的雇员。

利用这次机会能真正看清大森林中可卡因实验室和那片曾被鲁曼谈到过的停得下飞机的旷野。机会难得，希望缉毒署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不出十二月中旬，我就会对这些玻利维亚人和墨西哥人不客气了。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给总部，一遍又一遍地要求派飞行员。最后，总部终于派了一名飞行员给我们。

这位飞行员叫杰克·萨尔，由佛罗里达州但普城一名行动组组长迈克·鲍华斯推荐。鲍华斯对他评价颇高。我认识迈克，多年前我们曾在一起工作过，相互都有关照。迈克告诉我，那位萨尔曾为中央情报局、毒品侦缉署在南美和远东执行过空中飞行任务，有过经历。按迈克的说法，完全可以把他当成咱们自己的特工。这使我非常放心。萨尔和卫腊作为我的眼线，去核实鲁曼所说的一切。尤瓦乔和卫腊在那幢特殊的秘密别墅里，通过无线电和电话与玻利维亚人和墨西哥人保持着联系，要他们相信，我们的耽搁完全是因为“组织”固有的那种极端小心谨慎造成的。我们不知道这事接下去会是怎么个样子了，但是用这种心理状态来解释，至少能将“一箭三雕”计划从濒临破灭的边缘上拯救过来。

12月11日，我飞抵圣地戈，为萨尔和卫腊扮演我那个“神秘组织”的两位雇员进行紧张的排练。他们“表演”的成败不仅关系到本案能否成功，而且也关系到他们能否活着回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缉毒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买毒计划作明确的表态。在这两天的排练中，我从海关总署一位刚从联邦调查局调来的新任督导阿尼·杰拉多那里得知，海关越来越鄙视缉毒署决策的无能，因而他们将收回支付买毒计划所需的那一半款子的承诺。

阿尔贝特·斯科佐也告诉我，他已向总部请示，是否对买毒计划作出决定。总部认为，全由萨尔和卫腊在玻利维亚视事而定。“如果那里的情况正像鲁曼所说的那样，他们将同意实行买毒计划。”他轻描淡写地道。就在12月11日，在美国海关圣地戈分署举行了一次碰头会。我相信海关会将他们提供款子的承诺再保留一段时间。

“一箭三雕”，这个探索性的计划，现在要分四步走。

第一步，是卫腊和萨尔即将动身赴玻利维亚参观可卡因实验室，然后他们必须回到迈阿密，在迈阿密向我——“路易”报告。倘使他们所见到的情况能令我高兴，那么就要派他们开着“我的”飞机去库拉索，在库拉索等待进入玻利维亚。还会有一名“公司”的飞行员来给他们领航。飞机飞入玻利维亚大森林，降落在那秘密的旷野中，在那里，载上我买的第一吨可卡因。

第二步，我飞往巴拿马，带上这笔五百万美元的款子，把它付给伦巴多或者其他指定的玻利维亚人。不久我就会收到用飞机安全运来的那吨可卡因，然后通过无线电台电告对方“货已收讫”。这就算完成了第二步。

第三步，让留在那幢秘密别墅里的乔治·尤瓦乔打电话给墨西哥人，让他们来圣地戈取他们的佣金。

第四步，假若毒品侦缉署反对买毒，那么本案到此就算结束了，也就是说，不管是谁，在他们到巴拿马和圣地戈会面时，分别将他们统统扣起来，然后逮捕他们。

实际上，玻利维亚人和墨西哥人也许都只会派些地位低下的雇员，或者是一些缺乏经验的业余毒品贩子来取钱。这会使此案完全失败，根本就无法真正地打乱他们的阵脚。

我请求斯科佐与总部联系，要求批准并调用我纽约行动组的两位特工刘易斯·彼萨罗和加纳·伯拉哈托，让他们冒充我“组织”的两名成员，赴巴拿马执行任务。“我要他们为我护钱。”我吹嘘道。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要几位目击人，他们两位能力我守着家园的后门。

12月13日，我从圣地戈飞回纽约。我的行动组是在越南缉毒时重新组建的。就在这一天，卫腊和那位飞行员萨尔也离开圣地戈飞往玻利维亚。我告诉彼萨罗和伯拉哈托，将他们的东西打点好，这一两天内将去巴拿马。

12月14日中午十二点，我接到斯科佐打来的电话，他慢吞吞、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卫腊在玻利维亚丢了他自己的钱包和飞机票，我们那位萨尔不得不专门改变计划，帮他摆脱困境。在玻利维亚机场，卫腊把提包放在自己跟前，不知是谁的手伸进提包里，把东西偷跑了。斯科佐还有更“好”的消息告诉我。“总部又给我们添了新的清规戒律，让我们服从。”他说，“他们正准备命令我们，将现金存入一家银行。”

玻利维亚人在最近一次跟卫腊和尤瓦乔的电话交谈中曾说过：“告诉路易，不要牵涉银行。”那些大人可领会得真快。

“他们会毁了这桩案子的。”我道：“你跟总部说一声，我们必须把钱存在一幢别墅里，或者租一间房子，或者别的地方。”斯科佐表示，一定将口信带到，而且还会比我表达得更周全。我不想让大人们察觉，这样他们会把我看成是个胆小鬼。到时候，我会成功地通过像海关那样的渠道，给他们施加压力。我建议斯科佐也给巴拿马的邓肯打个电话，让他帮忙租一间别墅，或者给我们找个安全的去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在那里拿钱给玻利维亚人看。我真弄不懂，缉毒署派驻巴拿马的特工头子到底在干什么，想什么，他11月的行为真令人费解。他会不会是一名奸细？在我们带上这五百万美元赴巴拿马之前，最好弄个水落石出。

就在那天傍晚，我打电话去圣地戈，了解一下他们到底进展得如何。“你知道，”胡帕比以往显得更激动，他压低嗓门，神秘兮兮地跟我说，“海关事实上承担了所有买毒的款子。”

“你别逗了。”我心中大惊。

“五百万美元哪……总部正在打退堂鼓。”

“什么？他们的理由呢？”

“没有。”

我挂上了电话，心中大喜。整个晚上都沉浸在将能实现这次袭击行动的喜悦中。这件事使得我连魂带魄都被“一箭三雕”勾走了。

我兴奋得开车出去。晚上10点，我在“东河车道”追踪一辆汽车，结果给我逮住了一名专在中国做海洛因生意的毒贩子，他叫迈克·克里斯帕。

12月14日中午十二点，斯科佐打电话来说：“我和总部吵过了，什么方法都用了……。”他说话的腔调十分的笨拙，他们要求斯科佐为钱的事拍电报给巴拿马，这个斯科佐却傻乎乎地理解不了。他用那种怪声怪气的腔调

聊了好一会。在此之前我就料到，咱们之间聊不出个道道来。总部乐意用他这种人物，这一点都不奇怪。

“你指望巴拿马方面会有什么奇迹吗？”我问。一种向往和好奇心驱使 我改变了话题，这能使谈话变得更直截了当。

“我还没有找到邓肯让他帮忙，我不想提这个家伙。所以，只打了电话给可卡因司，跟他们讲了这事，……让我们谈点正经事吧。我们正在聊啊。最他妈糟糕的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也混在里头。……要在一周内租到房子，怕不行。……那些该死的家伙都知道，马丽奥特大酒店是美国政府的落脚点，但是缉毒署还强迫我们，二进巴拿马再住在那里……。”

他也没法子，那些大人才不理睬你们特工的死活，你再怎么大吵大闹也没用。晚上九点，我床头边的电话铃又响了。我拿起电话，卷入了胡帕和罗斯一次长长的电话会议之中。胡帕说话时显得很生气，才一会儿功夫我都认不出他了。他说，卫腊从玻利维亚打电话来报告：他们所见到的真难以让人相信，一切比鲁曼所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卫腊报告说，看见十七块种植地，每块地至少可以收获五吨可卡因，总共可收 105,000 千克（原文如此——译者）。这个数据比缉毒署在这些年来缴获的全部可卡因数的两倍还多。

但是有个问题：卫腊和萨尔已知道得太多了，很有可能卫腊将作为人质被扣留在玻利维亚，等交易完全结束为止。

“买毒计划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我厉声问。如果买毒计划到现在还没有着落，那么他的性命就保不住了。

“他们还在研究这个事。”胡帕道。

这桩在缉毒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巨案，它的领头特工居然是个办事诚惶诚恐、拖泥带水的家伙。我对这种不见成效的讨论、研究真是痛恨极了。“就让它搁在总部吧，”我道，心里唯恐这桩案子从我身边溜走，如果真的失去它，对我也是无伤脾胃，“我们每走一步，他们都要挑我们的脚筋，就让他们敲定了主意再说！”“哦，飞行员萨尔 17 日已从玻利维亚出来了。也许我们应该参与他们的讨论，至少那时总不会再拖了。飞行员定会带来好多情况。我们是否得去那里，还得视他所说的情况而定，你懂我说的吗？”

我仍旧一声不吭。

“根据方案和飞行员带回来的情报，也许我们的境况会有所好转。因为卫腊提到，他们参观完后，飞行员能从原路返回任何地方。”

我追问道：“他那么说的？他在电话里是那么说的？”“嗯，就那么说的。”

“这个蠢货！这种心照不宣的事，也会在电话里说出来。”因为玻利维亚人肯定会监听电话的内容。

“他们在电话里还谈了很多事呐。”罗斯道。

我气极了。“如果玻利维亚人在电话里监听的话，他们一定想，这些谈话内容咋像缉毒署特工的口气。”

“哦，这他们不会。”胡帕结结巴巴地说。

“你肯定？”我问道。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毒品组织，让这两名美国探子这么随便说看一眼就看一眼，他们心里毫无防备才怪呐。“他们是在旅馆的房间里打的电话。”这个外号叫“钢盔”的胡帕又道。

我很想发作，但是只好笑笑。我记得鲁曼在巴拿马跟我说过，在马丽奥特大酒店里，有一楼已住着我们的特工。这些大人可真自作聪明，难以置信

的聪明。

“你认为，玻利维亚人不会控制这个旅馆吗？”

“这不会。”胡帕道。

我的脑子里升腾起一股无望的感觉。

“嗯，也许我们应该让飞行员把这些情况简要地再说一说，”胡帕语无伦次地道，“然后，我们就能决定到底买不买毒。”“胡帕，”我道，“我认为，我们把这些都留给高级官员们，让他们中的哪一位来最后拍板决定。”

“哦，嗯。”胡帕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好应道。

“这不是我们能作的决定。”我道。

“嗯，嗯。”胡帕应道。

“你们是在跟别人的性命打交道，依我看，我认为我们应该接着干下去，买下那批东西。”

“对，对。”

“这就是我的意见。”

“对，对。”

“你们不是已经弄清了十七块种植地，每块至少可以收五吨可卡因的事嘛，像这样错综复杂的行动，难道我们只想缴获一吨可卡因，而不对这个组织作进一步的深查吗？真如此，我们的做法就毫无意义了。”

“嗯，有道理。”

我突然觉得，我要干的事有点茫然。我正想大发一通脾气，但碰上个态度温和，神情惶恐的胡帕，又觉得起不了那个火性，尽管他本身没有错，但是他坐在这个案子代理人的显赫位置上，现在总部要看着这个案子完蛋。我要他给我去和大人交涉，恐怕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我已明白，情况危急，他们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

“卫腊已陷得很深了，他们兴许要杀了他。现在是不是向总部提出这事的最好时机？”胡帕问。我才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心里不禁骂我自己。

“是啊，”我道，“这个部分是要求推行买毒计划的基本思想，但记住，我们不能去作这个神圣的决定，总部的那些家伙，总在挑我们的脚筋。他们非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是不会做这个决定的。……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想，责任全在他们。你把利害关系跟他们摆清楚，那一位正挣扎在死亡线上。”

“嗯，”胡帕答应着，好像十分理解。

“要逼着他们作决定！”

“对！”

“没有什么事抵得过一条可怜的性命。”我道。

跟他们讨论，请他们抉择，让卫腊从玻利维亚安全脱险的计划，真是令人觉得太累，太绝望了。“我们应该考虑，放弃整个计划。”我说着话，心里对战胜那帮大人不由产生了动摇，“我们也放弃整个计划，放弃买下那批货的打算。一定要把一切担子统统卸给总部。”

“嗯。”胡帕应道。

“停止这桩买卖，我们真得仔细考虑一番。”罗斯道，“自从卫腊指出通过银行交易，玻利维亚人已经不相信我们了。”

你得去感谢那些大人，我心想。还有这位“上档次”的毒贩子卫腊先生，也居然会重复这种白痴的计划。罗斯没错。假如我突然停止这桩买卖，这就等于断送了卫腊的性命。我们已无计可施了。玻利维亚人让萨尔走了，将心

比心，这种冷遇，也算是合情合理的。我们还有时间，但是已经不多。

“如果我是本案的代理人，”我对胡帕道，“我会打电话给威斯权特先生本人。有必要的話，直接打电话到他家里去。这是我们摆脱困境的一个办法。”

胡帕说，他什么事都得向斯科佐汇报。

大人们就爱玩这一套把戏。

一晚上都无法入睡。早上起来，已是12月16日，我决定打电话去圣地戈，问问情况有什么变化。斯科佐接的电话。他又打电话给胡帕，我们三人在电话里碰头。胡帕说，尤瓦乔在那幢秘密房子里，接到了一个卫腊打来的电话，玻利维亚人对他显得十分的冷淡。杰克·萨尔正在设法订回迈阿密的机票，17日或18日即可到达。

“和这些人谈生意，卫腊的感觉一定很痛快吧。”法斯特·阿尔贝特道，“他今天说话的口气十分的傲慢。他只关心要去巴拿马的事。他话里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用上回在巴拿马用过的方法，去和这帮家伙理论。他说‘别指望再用那个办法了’；他说好些地方都有所不同了；他说：‘可真是今非昔比了。’”

“唉，是谁告诉你他说的这番鬼话？”我问。真让人不明白，卫腊为什么要在电话里说这一番不经过三思的话语。这家伙肯定想达到他自己的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开始纳闷，有关他被扣作人质的整个事件，是否更像是他编造的胡言乱语。

“他说，”胡帕道，“‘我们大家都得回巴拿马去，重新谈判这桩买卖。只有这样我才能从玻利维亚返回，来配合这桩交易。’”

不管是斯科佐还是胡帕都拿卫腊的话没办法。谁也管不了他了，他的那张嘴实在太危险，就像带着一瓶硝化甘油骑在摩托车上一样，一触即发。

“唉，我们是否非得去巴拿马，”胡帕道，“就像阿尔贝特所说的那样，等他们一出现，就统统逮捕他们。”

又转到斯科佐。他说：“我想，这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买卖，到末了无非是将他们都拴住。你知道，他们老在想入非非，他们那种样子，就像要将整个身子都跳进水里，去泡上一泡。他们已开始急得换上了快档。你知道我说话的意思吗？”

我又一次不知怎么办好。

他接着又道：“我认为上头现在，嗯，他们觉得对待人质的事有更完全可靠的方法。嗯，假若再怎么周旋还是没有效果，嗯，上头很可能愿意采用‘佯买真逮捕’的方法。所以，嗯，照我想，就采纳这个方法吧。”

“才一百万元，怎么个佯买法？”我道，实在忍不住他这种慢吞吞的蜂鸣腔。顿时，我又赶紧收住自己的嘴。法斯特·阿尔贝特说话的意思似乎也有了变化。闲聊到此，他的话又变成了另外一层意思。

“我，嗯，实在不知道咱们该怎么办。”这倒是句实话，“我的意思是想谈谈，总的一个方向，有点背水一战的味道，以便使咱们能成功地渡过难关。换句话说，也就是毒品……”

蠢货！大人们说，他们要的是毒贩子，不是毒品。我心里骂道。“是啊。”我只好应道。

“最主要……啊……情报员萨尔，能按我们希望的那样，尽快地把情况说出来。有了情报，我们可以接着跟另一帮人碰面……啊……有了情报，就

能确定他们参加的地点……啊……有了情报，就能攻击那个地方，最后逮捕那几个家伙。那就是所谓的背水一战……啊……”

他又开始拿腔拿调起来，真让我忍受不了。接着他又突然将话题一转扯到其他方面，开始谈论起有关安排飞机以及在迈阿密准备一笔巨款，为在巴拿马再次碰面或买捕时所用。最后，他把我完全弄糊涂了，居然让我退掉订好的机票。

我试图让斯科佐回到买毒的话题上来，提醒他，总部曾说过，如果萨尔和卫腊所见的“情况确实”。将选择买毒计划。他甚至有点害怕我的买毒计划，立即将话题扯到别的地方去。

“你知道，”他道，“我们正在忙什么嘛。我们打算……啊……我肯定上头也在准备这事。你知道，他们对我们第一次提到的情报相当的高兴。你知道，他们准备在迈阿密跟我们见面呐。”他忘了刚跟我说过让我退掉飞机票的事，“高斯帕德里克，可卡因司的协理员，打算去那里，还有好些人要去那里。我想，咱们会捏成一个拳头。我们要将这桩事干得像一起军事行动那样。而且不出周末，我们就会有所动作。说句实话，明年的元旦，我们也许就能了了这桩事。我想，很多人听到这个决定，会高兴得跳起来的。”

斯科佐在结束谈话时，又一次提及让我把机票给退了。

等挂上电话，我平生第一次想要自己放弃不干了。我只能在那个劣等探子卫腊设置的轨道里行事，连绵不断地卷入海关与缉毒署之间长期以来的那场勾心斗角之中。我同大人和官僚们斗争了这么些年，也算得上是个老手了，我对他们的嗜好了如指掌。缉毒署的督导们，尤其那些在海外任职的，要赢得这份差事，不是凭你的资历，而是凭你的为人。“一箭三雕”的整个过程，已让我卷入了一场巨大而险恶的交易，而这一场交易正在越演越烈。

下午一点，在袭击布罗尼斯一个海洛因作坊时，我和特工刘易斯·彼萨罗、威利·格雷，击毙了一条守门狗，这条德国牧羊犬一直紧追彼萨罗不放，结果彼萨罗的腹部让它给咬下一块肉来。我和威利一起朝这个畜生开了几枪。这件事令我很沮丧。我过去在战斗中，也这么对待过一条看门狗。对狗来说，它只能这么干，这是它被驯化的结果，这一点也没有违背它的本性；可耻的是人，不应该动这样的杀机。

下午三点，我还在埋头作长篇大论，这是特工每次动枪之后，一定得作的一份书面报告。胡帕打电话给我，说，行动被“通过”。“总算定下来了，”他说着话，好像对这个决定，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外，“我们都得面临这一切，直到结束为止。没有任何推辞的余地，不管是度圣诞节，还是其他任何事情，都不例外。”

我又要参加“一箭三雕”剩余的行动，明天在迈阿密集中。胡帕已确定我们的计划，他要说的只是一句话：“我们正打算在巴拿马找到一个存放那五百万美元的地方，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惊人的结果。”

“我们去巴拿马会住在哪里？”我问，竭力屏住自己的呼吸。

“驻巴拿马缉毒分署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小披屋，到时给你一间。”

“那就是说，不用住旅店了？”我问。

“不用住了。”胡帕答道。

我松了一口气。

大约到了下午4点，胡帕又打电话过来，说，玻利维亚人对一切已相当的冷漠了。“他们终于放卫腊走了，”他道，“他将在巴拿马同我们会合。”

等我再挂上电话，不禁觉得又迷惑起来。我只知道，我是缉毒署行动组的一员，去巴拿马，带上五百万美元，受法斯特·阿尔伯特·斯科佐的指挥。只有一件事我是清楚的，那就是，在那会儿无人知道我们到了那里将要做些什么。

第四章 迈阿密入油锅受熬煎

12月17日的早上，我终于订到当晚可达迈阿密并可在19日转机赴巴拿马的飞机联票。在迈阿密有四十八小时的逗留，正好参加最后一次的秘密计划会议，行动组的斯科佐和胡帕已从圣地戈走另一条道到了迈阿密。到那里后，去提这次巴拿马行动所需的五百万美元。毒品侦缉署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我不知道这些钱是真的拿来花的，还是仅仅摆着看看而已。我只知道，玻利维亚人要我在19日去巴拿马，用这五百万块钱买下他们的毒品。

飞行员杰克·萨尔也已从玻利维亚赶回迈阿密参加这次会议。另外，还有两位从总部赶来的高级官员，在我们出发前，要作最后的指示。至于最后是否决定选择买毒，还要根据杰克和卫腊所见到的真实情况而定。这样看来，我们的一切全仗着卫腊的电话密报了，而它的真实性和准确度，则一概不管，这个探子是多么的荣耀风光啊。杰克则另当别论，他曾受缉毒署的派遣，多次飞往南美，早已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大人们已说了，愿意根据卫腊的见闻来作最后的决定。

那天早上我才听说，莉迪亚·苏托也将参加这个秘密行动组。她已到了纽约，准备跟我一起去迈阿密。海关方面还要求另一位在巴拿马的秘密特工也参与这次行动。缉毒署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一项绝密行动即将发生在巴拿马这个由毒梟们控制的国度里，那绝不是人越多越好的事，但是还是那么定了。我不知道会跟她一起执行任务。事后等我到达那里，更不知道到底让我干些什么。我只知道，我去那里要的人，一定得是些能叫得应、拉得出、打得胜的“铁杆”。总之，我要的是能够帮我一把的人。

我打电话给“铁杆”特工加纳·伯拉哈托和刘易斯·彼萨罗，让他们二位来我的办公室。尽管相对而言，这两位都是新手，但是都已经历过好多次的恐怖事件。他们跟着我，在短期内，在抗暴的实践中，已积累起经验。加纳思维敏捷，是位攻击型的秘密特工，有三年的街头工作经历。刘易斯是波多黎各人的后代，他的母语是西班牙语，上大学那会曾是一名拳击师，虽然从事街头工作还不满一年，但是，在多次的抗暴事件中，显露出他非凡的勇气。这两位才是我想要的人。我曾经跟上头提过，是否能让他们二位跟我去巴拿马，现在总算如了愿。

“伙计们，让你们去参加一项绝密行动，完成一项真正的国际缉毒任务。”

“你是在开玩笑。”加纳道。

“但愿是吧。我指名要你们二位，就在于让你们把所看到、听到的以及所干的一切，都给我记下来，你们就是我的目击证人。我想你们会感到相当惊奇吧。”

这是为我，也为那年的行动，暗暗留一份见证。

加纳和刘易斯预订了19日离开纽约的机票，他们打算等飞机停靠迈阿密时，在机场与我会合，一同前往巴拿马。

我和莉迪亚·苏托同机抵达迈阿密之后的那天晚上，便去找胡帕和斯科佐，结果这两位老兄住错了旅馆。按理，他们是住在迈阿密空港马丽奥特大酒店，结果他们却住在迈阿密黛德兰马丽奥特大酒店，这两家马丽奥特相距二十英里。当我最后在电话里找到胡帕时，他却埋怨开车的出租车司机。我担心，如果他们在迈阿密都不能与出租车司机沟通的话，将怎样在巴拿马这

个鬼地方立足办事。

这次绝密行动发生在诺列加的地盘上，我在猜测这些家伙将如何当我的监护人。

12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我来到黛德兰马丽奥特大酒店斯科佐的房间。苏托因有点私事就呆在住处。不多一会人都到齐了，有胡帕、斯科佐和另一位圣地戈名叫贝尔·布朗的特工。据斯科佐说，他加入这次探险行动，是因为“有许多南美的经历”，并且能说西班牙语，同时也是为了表示特别重视这笔从迈阿密银行保险柜里提出来的五百万美元的现钞。一架海关的秘密专机将把他们从迈阿密送往巴拿马。

总部派来的两位高级官员，一位是鲍勃·麦考尔，“雪峰行动”的代表，另一位就是可卡因司的那位罗恩·高斯帕德里克。他们二位穿着黑色的办公制服。而迈阿密气温高达32℃，显然已无法穿住这身厚厚的制服。老实说，他们已没有兴趣再在这个屋子里呆下去了。一会儿，高斯帕德里克就在屋子里，一个人独占了房间里的那架电话机，想尽早订票飞回华盛顿，去参加缉毒署的圣诞晚会。

斯科佐站在高斯帕德里克的电话机旁，一边等着他打完电话，一边抱怨迈阿密缉毒分署拒绝帮助运钱的事。趁着时间尚早，他已一杯接一杯地干了好几杯酒，乘着酒兴，说着一些不可思议的废话。

飞行员杰克也在那里。坐在他边上的一位叫史密林·乔克，中央情报局的飞行员。假如我们还要大老远地去玻利维亚装载一吨可卡因的话，这二位便是去玻利维亚的使者。乔克穿了一身迷彩飞行服，脖子上居然还系着绸纱巾，头上戴一顶澳大利亚的大草帽，嘴上叼着一个弯曲得古怪的烟嘴，走进走出显得十分忙碌。原来他是在和人争抢着门外的一架电话机打电话。阿尼·吉拉多，那位海关督导，在房间的过道上朝我眨眨眼，像是有什么令人振奋的喜事。显而易见，这次行动是已经被批准了。我把杰克招呼到一边。

“你见到什么了？”

“我看了真不敢相信，”他激动地告诉我，“逗留的那段时间，我见到的实在太多了。我想他们是不会让我回来了，但是，那个卫腊，滚动那张三寸不烂之舌，这么一转，哼，真叫怪呐，他们就不杀我们了。”

“你到底见到什么了？”

“简而言之句话：我们见到了七块种植地了。”

“你估计有多少毒品？”

杰克想了想，“我想每块地是有五吨，也许还不止，麦克我告诉你，”他接着道“你可以去问迈克·鲍华斯，这些年我飞过多少趟哥伦比亚，这趟才真叫他娘的过瘾呐。这些年，一直谈论着要找出谁是曼德林卡特尔供货人，没想到，嗨，竟是他们。”

“你把这些都跟他们讲过没有？”我用脑袋指指在座的那些高级官员。这并不像卫腊所夸大的那样有一百多吨可卡因，但是，三十五吨这个数目也够多的了。如果玻利维亚人肯展示这个数目的可卡因，那么表明在大森林里，他们必定隐藏着为这个数目百倍以上的货。

杰克摇摇头道：“麦克，我真无法理解那帮家伙。”

“他们是否谈起成交的事？”我急切地问。

他摇摇头表示没有。“我真不想告诉你这件事。我想他们在来这里之前，已反复思考、周密计划过，我反倒不理解缉毒署是怎么想的。玻利维亚人有

一个自己的军事机构，这个机构采用正统的西点军校的教材。真是不可思议。”杰克接着讲述了大森林里可卡因制造中有一批复杂而庞大的先进军事设施、无线电通讯设备以及每块种植地里备有现代化的直升机。“毫无疑问，”他道，“那儿生产可卡因的规模，可以和通用汽车公司媲美。”

阿尼·吉拉多一个人边踱着方步，边聆听着我们的谈话。“我们海关要撤回所有的承诺和那部分钱，”他温和地道，眼睛望着那几位高级官员，那几位则好像都没有听见，仍旧集中精力在联系他们的回程机票，“我们对缉毒署官员如此优柔寡断，实在不能满意，跟他们真是无法理论。”他最后的这一句话是对着我说的。

他不必再为此事去烦恼了。

高斯帕德里克终于打完了那个电话，很快又被怕事的斯科佐给缠住了。他显然已订到了机票，他和他的那位同伴现在马上就要回华盛顿了。圣诞晚会就安排在今晚，缉毒署的人全知道，倘若你想升官或挑一件美差，或为你以往的工作领到奖赏，圣诞晚会是个最好的机会，在晚会上可以拉拉关系、搞搞交际。

“买毒计划怎么样了？”我问。高斯帕德里克的反应，是将脸一沉，整个房间除了斯科佐还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埋怨迈阿密缉毒分署的官员，谁也没有作声。大家都似乎猜出了这个反应的含义。

“买毒完了，”他声音低沉地道，“威斯权特先生要的是买捕行动。”

“我不信，原来说定按飞行员看到的情况来定，这难道是废话吗？”

“这才叫决定。”他说话间，脸刷地变白了，还带着几分恼怒。可紧接着又浮现出几分笑意，表明他同我的争论就到此为止了。

这也就是说，在两位飞行员去玻利维亚运走一吨可卡因的同时，所有的行动都将转到巴拿马，逮住所有出场的角色，将他们收容起来就算完事了。乔治·尤瓦乔还呆在那座拉加拉的秘密房子里与帕罗·吉荣这位墨西哥的“联邦人员”联系，诱骗他去加州取这桩买卖的介绍费，我可以担保在那里逮捕他，真是太容易了。“一箭三雕”完了，彻底被毁了，不会有人再为它去解释、去游说。我们失去了一次查清、捣毁一个毒品组织的机会。这个组织包揽了美国街头毒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我们失去了一次揭露跟这个组织关系密切的墨西哥政府高层人物合伙参与贩毒活动真相的机会。大人们总那么干，将专横的欺诈都转而成为成功的新闻报道。

海关总署的冯拉伯总长需要抓住事实来揭露墨西哥高层官员的腐败，以换回公众的好感。缉毒署则要将此事通过专题新闻报道来取悦公众。大人们端庄有礼的样子，当然容易被人们接受，人们还会相信所有花言巧语和谎话：秘密警察在巴拿马缴获了一吨可卡因并逮捕了毒枭，缉毒总长和海关总长还会联合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互相祝贺表示团结。然后大人们就得去那些政治家那里，请求调拨更多的资金，再策划几个像“雪峰行动”一样的行动。

我不知道高斯帕德里克在想些什么，他反倒对我似乎早已胸有成竹。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对准我的要害狠狠地一击。总部已命令：行动必须在巴拿马马丽奥特大酒店进行。

二位大人脸上都挂着得意的神情。我明白，他们都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玻利维亚人等我19日赴巴拿马呐，这个皮球又踢到我这里了。如果我拒绝出席，缉毒署肯定求之不得，这案子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那样他们也就不用担任何的风险。就算我去了，这件案子仍很少有取胜的把握，甚至没有。

曾有人在华盛顿说过：“雪峰行动”也许不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它是唯一的必须保留的选择。

二十五年来，我就生活在这么个卑鄙、两面三刀的环境里。唯一令我感到庆幸的是我的健康、生活、家庭、事业都很完美。我大笑一阵，就闭上嘴，沉默了。然而面对这些杂种们，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这场毒品战争对我来说，不是一场儿戏，它使我为之付出毕生的心血。就咽下这口气，沉默吧，然后回我的旅馆，准备动身去巴拿马。

我一个人呆在旅馆的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踱着，脚击打着地板，在空中发出“咚咚”的声响，像是在咒骂我自己一般。我的情绪被一种气愤和沮丧的情绪缠绕着、驱使着。我永远是个斗士，谁敢与我在战场上拼斗？到底谁是真正的敌人，到底是谁？我打开收音机，强迫自己安静下来。我坐下，将刚才所有的对话，比如在什么场合，谁对谁说了些什么，以及每个细节，凭着自己的记忆加以整理，然后将它写了出来。我不停地写啊，写啊，思绪就像泉水一样奔涌。我的一双手在不停地颤抖。我意识到，要竭尽全力保存好这些秘密笔记，因为等会议一散，所面临的不是那些毒枭，就是那些政府的特工。

为什么这档子事又会降临在我的身上？我突然有意识地让收音机播放出一首摇滚乐，这曾是七年半以前的一首流行歌曲。那会儿正是我刚办完苏亚雷斯案，从阿根廷回到迈阿密的时候，这首歌不禁令我回想起当年的情景。

1980年的春天，苏亚雷斯曾对我道：“我对玻利维亚的统治权力超过了我们国家的总统。”之后不久，我便住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扮成美国黑手党的一名代表，一位印第安人和波多黎各人的混血儿。苏亚雷斯要我保证，我们组织每月向他购买一吨可卡因，他说这番话时，正赶上边境检查站查获二百千克可卡因的走私事件，这是走私记载中破纪录的一个数字。当时正逢我们认为毒品走私问题“对犯罪影响有限”，也正逢吉米·卡特总统的高级顾问彼德·布鲁诺斯在大谈“可卡因问题至多只是一种温和药品的非法私买，只是这种私买在流通中不断扩散而已”。

当我打电话给总部的一位上层头目，要求发布一份诱敌行动的授权书时，他说：“你完全在胡闹，苏亚雷斯的名下根本就没有资料，就连计算机的软件上也没有。列文你怎么试图去干这么一桩骗局？”

半年之后，播音员迈克·华伦斯就在全国电视节目中说：“苏亚雷斯是活着的最大的毒枭。”至此，我们才了解，原来并不知道苏亚雷斯手上有一份美国国务院的文件，这里头有所有驻玻利维亚的美国缉毒署特工的花名册和完整的图片资料，甚至连特工的家庭情况和病史等等，也都齐全。

我办案居然击中了这么个疯狂的家伙，于是电话、电报像轰炸似地向总部袭来。缉毒署对此进行了还击。当时我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最后我得到了一位权威人士的勉强支持，才得以继续执行这项任务。这个署级官员出于个人原因才勉强支持这桩案子的调查，不过他告诫我：“总部的许多人想看着这项行动搁浅。”他还对我说：“只要看着你自己的饭碗。”这话从我一只耳朵进去，又从另一只耳朵出来，就像风吹蒲苇草，一阵风刮过还是老样。这件历史上最大的诱敌案，为什么咱们政府中所有的要员们都要它“搁浅”呢？

这次诱敌案是派一架飞机，秘密飞往苏亚雷斯的森林种植地里运载一千磅的可卡因。如果成功，我将去迈阿密付给苏亚雷斯的使者九百万美元的货

款。

为了破坏案子的进展，缉毒署做出了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决定。他们强令秘密特工使用一架飞机，它一个月前还在玻利维亚公开露面，执行缉毒任务，并且沿用了当时缉毒飞行时用过多次的机名。但是此案还是于1980年5月13日胜利告结。当我们的秘密飞机在玻利维亚运走了将近九百磅可卡因时，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买毒计划终于结束。

那天下午，在迈阿密银行的地下室里，我把钱付给阿尔弗雷多·哥蒂纳兹和琼斯·罗伯托·加塞这两个历史上最大的毒梟。他们得到九百万美元后就双双被捕了。当时新闻界称它是“执法史上最大的一次诱捕案”。在“一箭三雕”之前，这也算是一桩最大的骗局了。

琼斯·罗伯托·加塞是欧文·加塞的儿子，欧文是玻利维亚实力雄厚的右翼实业家。很快，通过迈阿密的律师事务所，欧文把他的儿子从拘留所里保释出来。此案压根就没有审。除了我，没有人有足够的证据起诉这位花花公子。迈阿密联邦法官爱克列·哈斯丁把阿尔弗雷多·哥蒂纳兹的保释金从三百万美元降到一百万美元——这个哈斯丁在随后的另一桩案子中受贿后，居然判罪犯“无罪”。这一事件于1989年10月20日被参议院检举后，他被调离公职——哥蒂纳兹答应将保释金汇入美国后，便免于服刑。为此，我在阿根廷打了几次电话给总部和迈阿密分署，恳求他们把罪犯投进监狱，但无济于事。他又回到了玻利维亚，只是坐了几小时的飞机而已。这桩历史上最大的“诱捕案”，最后的结局竟然是没有被告的。

苏亚雷斯和哥蒂纳兹在玻利维亚悬赏二十万美元要我的脑袋。他们叫我“El Judiotrigue ode Argentina”，意思是：来自阿根廷的黑不溜秋的犹太佬。

我的这个诱敌行动从未得到过玻利维亚政府或什么反毒团体的帮助，因为这些团体都受过苏亚雷斯的恩惠。玻利维亚的经济是依仗着可卡因才繁荣起来的，苏亚雷斯的组织完全控制了它的政府。在迈阿密逮捕的那几周里，凭着苏亚雷斯组织和欧文·加塞的经济实力，加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一场流血政变开始了，这是玻利维亚历史上的第189次革命，也是最大的一次流血事件，美国国务院称其为“可卡因革命”。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被严刑拷打、被屠杀。最终玻利维亚政府完全彻底地被苏亚雷斯的组织所控制了。玻利维亚不久就成为初出茅庐的哥伦比亚卡特尔的可卡因基地和主要货源，通过哥伦比亚人，玻利维亚生产的可卡因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难道缉毒署就没有对他们高抬贵手过？美国中央情报局更是积极地暗中相助。美国国务院驻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的一位外交官曾表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完全由毒品贩子组成的政府。

我觉得有义务拯救那些失足者。我最后一次在阿根廷指挥另一桩案子，目的是为了深入了解玻利维亚的秘密。侦察结果，逮捕了一名名叫雨果·休塔多·凯地亚的家伙，并为起诉玻利维亚新政府，包括琼斯·罗伯托·加塞在内，违反美国麻醉药品法，取得了重要的情报，替缉毒署和司法部追踪调查这位现在已完蛋的巴拿马军事强人曼诺尔·诺列加。然而起诉书和证据一开始就神秘地失踪了。各种压力和行政干预在跟我作对，他们在监视我的行动，并命令我将我的调查材料呈送给中央情报局。

“你怎么来得这么容易，”一位大人在美国大使馆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说，“你在阿根廷，这不是个原始国家，那里有那么多的特务，竟会没有一

个比不上你。你在这段时间为什么不出去旅游，或者去乡下走走呐？”

为反驳来得容易的论调，我只得求救于新闻界。我写了一封信给一位记者，并答应回答他复信中提出的要求，为他提供一组调查报告，结果他在《新闻周刊》杂志上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缉毒署在玻利维亚发生的真实故事。在信中，我列举了所有苏亚雷斯事件中的奇怪现象；指出我们政府不仅庇护世界上最大的毒巢，而且帮助他推翻了一个政府；并提出愿意合作提供所有的调查情况。但是，我再也没有收到回信。相反，接下来的几周里，我被可怕的缉毒署内部稽查处提审。

审查持续了一年多，并且涉及到我的职业、私生活等各个角落。我对此真是深恶痛绝。最后查出我的“八大罪状”：

- 假公济私游山玩水；
- 参加黑市交易；
- 与一名女特工有不正当的性关系；
- 在美国大使馆打私人电话；
- 在美国大使馆内，故意将录音机中的摇滚音乐放得很响；
- 身在美国大使馆，居然不知道中央情报局的地位；
- 在过去的执勤中，有过多的缺席；
- 未能保存适当的文件资料，致使秘密工作遭受损失。

所有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被频频地传讯，并回答各种各样的质问。随后，在我的电话上偷偷安上窃听器，稽查处的特务们秘密派人去阿根廷，跟我的邻居、周围的朋友进行联系，企图得到诋毁我的证据。可笑的是，纳税人所支付的税金，不是用于对苏亚雷斯的调查上，而是用于对我的审查中。

不久，我被从阿根廷调回到缉毒署的总部，在那里被严加看管。与此同时，稽查处对我的审查还没完，他们就派我去参加一项绝密行动——“虎行动”。这是我戎马生涯中最险恶的一项行动。一时间，我对自己生命安危的担心超过了对那场官司。我默默注视着新闻界连篇累牍地报道的高级官员们说的有关在毒品战争中如何不畏艰险、英勇战斗的谎言。最终，对我的审查有了“定论”，说是在执行苏亚雷斯案中沒有妥善地保存文件资料，致使秘密工作遭受损失。在此之后，我又闲荡了五年。

律师们劝我提出诉讼，这样明显不公的责罚就连律师也未见过。所有的搏斗我都没招架住，大人们终于赢了，他们打得我不敢作声。对有些人，我是永远不会原谅的。

我躺在迈阿密旅馆的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一直想到这里。心想，这次行动简直就是上次事件的翻版。这些大人物的所作所为，旨在迫使我放弃行动。现在，如果有可能，我会对他们放任自流的，然而我又毫无理由单独离去。我的命唷！我的运唷！真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骗局，而他们，就是这场骗局的导演。想到这里，我正想揍他们一顿，甚至就像揍一个敌人，一个毒品贩子一样。

我将把这个设想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底，永远、永远……。

我不知道此去巴拿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这似乎表明，这场追查可卡因源头的事件肯定要失败。在我头脑里，唯一清晰可见的计划，就是将曾经发现的一切，一五一十地都记录下来。大人们要破坏“一箭三雕”行动，但是我一定要弄清其罪恶的真相。

12月19日的早上，我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处理一场误会。我弄了一本佛

罗里达的假驾驶执照，上头用了化名——路易·冈萨雷斯。这个名字与我秘密护照上的名字不符，因而引起了这场误会。等我回到旅馆，已是大约下午一点半光景。我整理一下我的行囊，等下午五点钟的班机飞往巴拿马。

电话铃响了，原来是莉迪亚、胡帕和斯科佐，他们十分慌张地说，他们打了一上午电话找我。行动组忽视了向总部要正式的任务授权书。任何国外行动都要有一个文件，上面记录着很多的个人评估意见，既要有直接行政长官同意的批语，又要有其副手中一名官员的相同意见。“不仅如此呐，”莉迪亚说，“他们还没有得到迈阿密分署帮助运钱的许诺，他们要咱们替他们运钱。”

“我来处理这事吧，”我道，“你去飞机场听我的消息，我们在那里碰头。”

我在电话里又听见胡帕的声音。“我们已打了一个上午的电话给总部，想在总部找些人来帮忙，”“钢盔”道，“问题是所有的人都在圣诞晚会上闹了一个通宵，找不到人了。还有个问题让莉迪亚跟你讲，好吗？”

我撇了撇嘴，道：“嗯，这真太荒唐了。我们抓紧时间帮你运钱，别耽误了飞机。迈阿密有特工好几百，还找不到两个人来帮你的忙，这不让你见笑吗！”

“至于授权书，”我接着又道，“为什么不打电话到劳恩或者威斯权特的家里去，这么大的案子，他们总不至于忘了发那个启程的授权书吧。”

胡帕一声不吭。我挂了电话，又开始整理起行囊来。

到了下午四点，我来到迈阿密国际机场。我立即打电话给霍姆斯德空军基地，估计胡帕、斯科佐和布朗会在那里带钱出发。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居然全在那里。“我们自己把钱运来了。”胡帕道，“你能想象我们没有请到一个迈阿密特工帮忙的那种滋味。”

“是啊，我能想象，”我答道，“那么总部的授权书又怎样了呢？”

“最后，我们找到了高斯帕德里克。他得到了威斯权特的口头授权，但是，他特别指出授权的范围，我们只能在马丽奥特大酒店内进行这场交易。”

“巴拿马见。”我说着挂上了电话。

下午五时，我、莉迪亚上了飞往巴拿马城的巴美 977 号航班的飞机。加纳、刘易斯已在机舱里了，我见到他们心里又踏实了不少。

“别忘了我说的让你们做笔记的事。”在回到后头的座位上之前，我又一次提醒他们二位。接着我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一会便睡着了。

第五章 巴拿马火坑中的洗礼

飞机迫降、俯冲带来的剧烈震动把我惊醒，窗外已是黑洞洞的一片。飞机徐徐地滑行到通道口上。热带炎热的气浪不知从哪里渗了进来，并且把玻璃窗抹上一层水气。

我们四人朝着旅馆候机楼的出口处行进，边走我边对大家说：“伙计们，从现在起可是动真格的了，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记住，是任何情况。你们全是我的雇员，记住了。”彼萨罗和伯拉哈托相互笑了笑。过了大约五分钟，我们还没有走进真正的候机楼。

又过了一会，我们从一条长长的电梯上下来，走过一条长廊，长廊的尽头便是移民登记处，我能从电视屏幕上看见我们每个人的样子。我们慢慢朝登记处的柜台上走过去。我忽然发现，少说有四个便衣保安人员在监视我们。他们的行动也实在有点太明显了。我预料他们就会来抓我们。我只是不作声，因为不必有任何的反应，还是走着瞧，等被抓了之后再说，一切听其自然。

当轮到我经过时，其中一位保安人员从移民登记处的柜台后面走过来，一把拽住我的护照，仔细地察看，我的护照上写着：姓名：路易·冈萨雷斯；籍贯：波多黎各，圣胡安。

“冈萨雷斯先生，请跟我走一趟。”他操着结结巴巴的西班牙语道。

“当然可以。”我说着，跟着他走了。在我的后头，其他几位保安人员正带着莉迪亚、皮萨罗和伯拉哈托走进了讯问室。他们疑惑地望着我。我只能微笑、耸肩，这神情举止好像在说：伙计们，正如我刚说过的，任何情况都会发生的。

等他们把我们的包裹行囊都搜遍，又将我们所有的文件都一一复印之后，我问，究竟出了什么事了。

“我们是反毒品警察。”一个黑黑的、胖墩墩的、看上去有几份像土著印第安人模样的人答道，他像是挺有点资历的人。我还在那条长廊里行走的那会儿，他就拿眼睛盯着我，一刻也没有放松。我能看得出，他对我这张脸的印象并不好。

他们一定是怀疑这伙人从美国走私毒品到巴拿马。这看起来似乎有点太离谱了。于是我道：“好了，我们已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你们还想干什么？”

接着，我们又被盘问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来这里干什么？你们在何处落脚？等等。我们的回答简直是毫无准备地瞎编。他们知道我们在说谎，但是这些谎话看来并没有使这些家伙担心。有一桩事他们是一定要查的，那就是我们是否是美国秘密特工。

长长一阵盘问之后，他们看来还是没有查出个什么名堂来，便嘀嘀咕咕地轻声商量着，其中一位贪婪地望着莉迪亚。那位资历较老的官员说了几句之后，终于作出了决定：加纳·伯拉哈托被带进后屋，被剥光了衣服进行检查。

“真见他妈的大头鬼，这叫什么事啊？”事后加纳埋怨道。这时我们终于乘上出租车，行驶在晚间交通杂乱、拥挤的道路上，向巴拿马市中心驶去。

“玻利维亚人已经到了这里了，”我道，“确切地说，他们正在后头。”

“神圣的欺骗！”加纳懊丧地道。

“别再多说了。”我一边提醒道，一边观察着司机的动静。我猜他没准就是一位探子。“拉公司”每月过手的现金比毒品侦缉署、联邦调查局和海

关三家合起来的预算经费还多。我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就曾秘密化装成出租车司机，载过毒品贩子，将他们拉到他们的接头地点。这位司机的一举一动就同我那时一模一样，他的一双眼睛盯着汽车边角上的那块反光镜，他肯定点滴不漏地注视着我们每一个细节，聆听着我们之间的交谈。这可不是件容易的活。12月20日这天，正巧是我48岁的生日。早上，“一箭三雕”行动组所有的人都在巴拿马马丽奥特大酒店会合了。我和莉迪亚·苏托被安排在顶楼三间一套的套房里，加纳和刘易斯分别住在与我们同一层楼的两个单间里。斯科佐、胡帕和布朗带着五百万元钱，就住在我们楼下。卫腊前几天就到了，在那里迎接我们。早上七点，我让卫腊跟我共进早餐，在我们同斯科佐和中央情报局谈话之前，我要跟他先谈谈，摸摸底。

“见鬼！我真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当我告诉他，我们将必须呆在马丽奥特做这笔买卖时，卫腊说，“去他妈的！这样的授权！你知道，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

“你想缩回去了吗？”

“我怎么同你一起去跟玻利维亚人说呢？”他看上去就像一名斗士。

“当然得说。”

“胡扯，我可不愿去送死。”

自从我们认识以来，只在那一霎那间令我记得，他算是让我有一点好感。

到了上午八点，我和卫腊去了斯科佐的房里，胡帕和布朗也在那里。我们进了屋子，过了一会，斯科佐便开始唠叨起他怎样运钱的经过以及差点误了大事等等一些千难万险的事。他从缉毒署迈阿密分署一直聊到巴拿马分署，前言不搭后语地聊了一大堆。我注意到屋里有几只空的啤酒瓶，还有一瓶开了嘴的威士忌，于是我便决定，不再提起让他们掩护我们完成计划中上午九点的第一次会谈之事。

那些玻利维亚人都呆在拉斯维加斯大酒店里，那个酒店就是我们11月份遇见洗钱人的地方，我们到过那里，也见过所有的保安人员，但是如果我真要惹什么麻烦的话，就是再好的特工也帮不了我们。我们只能像上次那样，处于防御的地位。

当我们说要离开时，斯科佐答应道：“噢，好吧，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落实到底是哪架飞机，哪些飞行员去执行这桩危险的飞行任务。”

“你这不是开玩笑吧？”我道。

“我没在开玩笑，总部又遇到麻烦了。飞行员史密林·乔克说，毒品侦缉署上次雇他参加飞行任务的钱还没付呐。他说，得等给了钱再飞。我还听说，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弄到一架该死的飞机。”

等我们挤下电梯，卫腊悄悄对我说：“我真不敢相信。”

“是真的，”我道，“全是真的。”

“他们会干些什么呢？会把咱们抓起来给宰了吗？”

在离开马丽奥特之前，我告诉加纳和刘易斯弄清斯科佐的部署。“我要你们在这里给我看着他。”我知道，不必我多说，他们二位不会脱身离开的。

上午九点，卫腊和我乘出租车来到了拉斯维加斯大酒店。一个穿制服，三个穿便服的保安人员在那里等候我们，其中有一个人的右额上有块伤疤。我们很快被让了进去。升降电梯一抖一抖摇摇晃晃，嘎嘎呀呀地叫着，慢慢地升到了二楼。卫腊瞅着我在那里发笑。他刚结束了在玻利维亚一周的折腾，看上去显得十分的苍白。我见他两眼呆滞，十分地恐慌，我自己的心也怦怦

地跳得好快，心想自己的脸色也一定充满着恐惧。

116号房间的门开着，贾杰·鲁曼喜气洋洋地站在门口。他见了我，热情地和我拥抱，把我让到里面的小间。狭窄的小屋内摆着两张床，一张桌子，还有一个小厨房。许多年来和南美最大的毒品商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好莱坞所描写的毒枭与真实情况完全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两件事。在现实生活中，越是大的毒枭，生活越是过得普通，他们在偏僻的地方居住，显得十分谨慎；他们从不在花费方面创造新的纪录，一切都按寻常的标准。

一个三十刚出头的黑黑的墨西哥人站在那里，他胡须剃得光光，见我们进了房门，就忙着来招待我们。他同我握了握手，经自我介绍，他叫吉苏斯，但是我们宁愿叫他“口香糖”。他的面容和蔼可亲，那双眼睛具有洞察一切的本领。无需鲁曼介绍，他一定是一位贴身的保镖，说不定就是门德萨提供的大批人马里的一个。

鲁曼招呼我们点各自的早茶。咖啡、果汁、饮料都是“口香糖”的手艺，我要了一杯咖啡。房间开始热起来了，那里仅有两个小窗，都敞着，却还不够通风，又没有空调。我心想，这不叫人热死啊。

“我们有一个问题，”我决定开始言归正传，“昨天刚到时，我遇上了一件麻烦，我和我的两名雇员还有我的女人，在机场让毒品警察给搜了身。”

我说着细细地观察着鲁曼的反应。他毫无动静。于是想看看在角落里的“口香糖”，可他只是含糊地轻轻一笑，还是看不出个名堂来。我继续讲述了许多细节：对我们的盘问、复印我们所有的文件等。鲁曼还是没有反应，那双眼睛时而在小心地打量着我，时而又回避着我。

这笔五百万美元的毒品买卖关系到我同他两个人，机场的事，按理说应该使他感到奇怪，警察怎么才一转眼的功夫便会盯上我们呐，然而他没有，这背后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指使警察来找我们的麻烦，来盘问我们。现在我得把皮球踢给他了。

“因此，我不得不住在马丽奥特。”我最后道。

“你说什么？”他跳了起来，一双脚就像被牛踩了一脚似的。“你怎么这样做，以后的一切咋办呢？”

“这个地址，我把它写进咱们的移民文件里了。我肯定警察已在监视我们了，我没法子才去那里的，他们有那份文件的复印本。不仅如此，我的投资者都十分害怕，他们让别人带钱去了酒店，那班人是乘私人飞机来的。”

“你是说钱放在旅馆里了？”鲁曼双眼暴瞪，他胖墩墩的脸就像动画片中的青蛙克米特一样。他实在逗得我想笑。

“贾杰，你让我怎么办呢？我的投资者们对我很相信。我有责任向他们汇报发生的事。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投资人对马丽奥特集团公司很感兴趣，他执意要把钱带去那儿。”

鲁曼自顾自地在房子里踱来踱去。“你怎么能这么办呢，路易？以后不要再出这种事了。哪里都行，就是不能去马丽奥特。上帝啊！你咋能这么办呢？”

“请不要逼我，兄弟，”我道，“我的投资者确实十分提心吊胆，他们认为也许你是机场事件的幕后指使人。”

“你不懂，我总不能提着脑袋去做这桩买卖，”他说着又否定了我的说法，“公司许多成员都说，我们不应该做这笔生意。他们说，整桩交易看起来怎么像是毒品侦缉署的圈套。”

他说的“圈套”是指十年前我办的那个苏亚雷斯案件，大人们把我们推入了一个几乎像复制品似的行动之中。我已意识到鲁曼受到来自拉公司的压力。他居然带了探子来参观他们的种植地和可卡因实验室，暴露了内部的设施。假若我们真的要打这场毒品战争的话，这些设施容易被摧毁，他不得不受到严厉的指责和审查，因为到时候没有一个人会活着。对他们来说，这场交易的成功，比贾杰·鲁曼重要。这一点也就是我能利用的把柄。

“兄弟，我还有个问题，”我决定再用尽全力，狠狠地推他一把，“自从墨西哥人无法给我们一条安全的通道做这笔交易后，我不得不在圣诞节去迈阿密预备一批货。而这一天，我们国家政府的大部分职员要在那里度假。”

罗曼停了一会，点点头表示赞同。

“这次备货已花去我们相当一笔钱。海关的人要我们必须在那无跟他们接头，如果迟了，他们就不再负责。也就是说戴维不得迟于明天晚上，就得离开这儿去库拉索，等咱们自己的那架飞机。您的飞行员也得在那里。”说着话，我又记起斯科佐当初的那番话，默默地祈求能在那里有一架飞机，“如果误了时间，整桩买卖也就误了，”我对鲁曼道。

“我们这方面一切都准备好了，”鲁曼道，他激动得有点狂热，“我们的飞行员已准备好了，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启程，你们所有的货款也得准备好等着。反正我们绝不能在马丽奥特大酒店交割。假若我告诉我的人，他们宁愿砸了整桩买卖。”

“兄弟，这事我作不了主，”我说着耸耸肩，但愿我们这方面也和玻利维亚人一样都准备好，“昨天晚上，有位投资人说，‘我们肯冒险派飞机去玻利维亚、带钱去巴拿马，他们也该冒险去马丽奥特取钱’。我想我毫无理由拒绝他。”如果鲁曼站在我的立场上，恐怕也无法拒绝这一点。在接下去的二十四小时中，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条理由。

我和鲁曼在两间房里绕来绕去，走了好几个钟头，讨论开始激烈起来。他提出几点理由说：“哪里都比马丽奥特好。”他还建议我们用他自己的出租车司机，他介绍道：“此人相当可靠。”

他讲述了这位司机如何可靠的一件往事。那是另外一桩五百万美元的交易，那事也发生在马丽奥特，结果让毒品侦缉署缴走了二百万美元。“只有这位司机帮了我一把，他替我带上余下的三百万美元，逃了出来。”他道。接着他还谈起了他如何同司机带着钱东躲西藏地度过了两天，一直到鲁曼通过银行的关系，才使这些钱变得安全起来。他说，整个洗钱的过程，又花了两个百分点的钞票。

听着鲁曼的一席话，我意识到，尽管缉毒署百般刁难，但我也已失去自己身上最重要的财富，那就是完全地信任了鲁曼。我确实听说过那事，但是不知怎么的，总莫名其妙地觉得这桩案子还得依样画那只葫芦。

“兄弟，实在抱歉，因为我的投资人把接下来的一切都安排好了，不用再劳驾你私人的司机来运送这笔钱了。”

鲁曼还不死心。他也理解我们害怕的心理，可是他不能理解，我为什么拒不接受任何别的地点。他要求将交易转移到银行的金库里，然后转到他巴拿马的朋友家，最后再把钱划帐划掉，这一系列方案以及那些地方，他用过，都熟了。

有一点是他的失误。为了证明洗钱能行，他拿出由巴拿马的伊比利亚美国银行签发的一张支票，票面金额达六万美元。我估算过，这家伙仅在巴拿

马就已经有一百万美元的毒品交易，他在那里必定有巨大的影响力。办案中不管发生什么事，在瞬间里，记住各种有用的情报是非常可贵的。

我继续同他聊着。我告诉他，等回旅馆后，把这些意见尽可能地转达给我的投资人，说不定他们会改变主意的。“这些人真是相当的小心，贾杰。”我道，“这就是个很好的理由，但是我们从未谈起过。”

大约到了中午十二点三十分，会谈气氛仍显得十分的沉闷，我们四人被热带的暑气烤得透不过气来，大家精疲力竭地围着桌子坐着，屁股坐着的地方湿漉漉的，令人难受。我想试探一下鲁曼。“兄弟，你知道，”说着话，我将手放在了他的肩上，“不管出了什么事，你是够朋友的，我有幸结识你。不过我想，这事咱们最好还是到此为止吧，反正咱们的友情还在，我肯定哪一天咱们还会有生意可做的。”

贾杰瞅着我，过了好一会，他阴沉疲惫的脸上又浮现出笑容来。“路易，我以前也提起过这事。毫无疑问，你真是高利贷者的儿子，要不然我们咋会称你‘精利鬼’。去，回旅馆跟你的人去讲这些事。我同玻利维亚再联系一下，和我的人谈谈。我们就在这里，把这桩生意全了结了。”

戏同意在下午三点回来。

当我们快要离开时，卫腊突然说：“为什么你不让巴图打电话给我，待会儿我们的飞机就会在天上飞了，我们把钱就付给你。”

这个狗娘养的，又吹过了头。他提到的巴图，是巴图·皮萨罗，玻利维亚拉公司的著名首领。鲁曼把他介绍给卫腊，但是皮萨罗实际上并没有理睬卫腊。鲁曼的脸部表情告诉我，此话说出格了。卫腊说这番话的用意，我估计，是他试图向我证明一个事实，他已见过这个人。而我反倒怀疑他所享告的内容里定有什么隐情，在这种紧张的场合，他还居然在那里玩这种把戏。

我朝卫腊眨了眨眼睛，没有多作什么反应，随口便道：“你看好自己的事！”鲁曼似乎这才满意。这家伙在玻利维亚呆了一个星期，这可以肯定，鲁曼看出他是个吹牛大王。这个长长的、难熬的早上总算过去了。

等我脱险来到外头，就埋怨起这位在玻利维亚电台中外号为“天线”的、身高一米九三、瘦得像豆荚似的家伙，“你这个该死的雇工，真是狗娘养的，……你怎么能这么直截了当他说呢？”

当我和卫腊回到斯科佐的房间时，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啤酒瓶满地都是，威士忌酒瓶也空了一半，斯科佐和布朗看上去喝得烂醉，胡帕看上去还同往常一样，他坐在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房间远处角落的床边上放着两只箱子，里头装满了那五百万美元的现金。

我和卫腊在外头谈判到现在，斯科佐却一直在喝酒，喝得脸色铁青，他大概是在巴拿马过圣诞节吧。跟他说话，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谈些什么。“这桩买卖已做不下去了，除非我们同意换个地方。”我说。

“好啊，这些该死的家伙，让他们必须按我们的计划来！”斯科佐吼道，“见鬼，把他们带过来，让他们看看这些该死的钱。如果他们真的要钱，他们会过来的。”

“也许他们不愿那么干，”布朗脸色啡红，一只手还拿着一杯酒，“我在南美泡了那么多年了，我想他们不会再想做这笔生意了，这仅仅是他们的缓兵之计。”

“嗯，”我开口道，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他们让我们派人去看了足有四十吨的可卡因，你以为这只是缓兵之计吗？”“嗯，总部说让我们在

这个鬼地方成交！”斯科佐咆哮道，“我们就得在这个鬼地方成交！”

“有没有飞行员和飞机的有关消息？”

“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还没有飞机。”斯科佐道。

“没有飞机？”卫腊取笑地顶了他一句。

“给我闭上你的狗嘴！”斯科佐大怒，“没有飞机！”卫腊没趣地摇摇头。在这种场合没有人会尊重他。

“就把那些人带到这里来吧。”布朗含糊地道，“就把钱拿去给那些该死的家伙搪塞一下，那样才能打发那些蠢驴。给他们看那些该死的钱。如果他们真想做，他们会那么做的。”

卫腊看起来又想插嘴，我赶紧拉住他的胳膊，阻止了他。“邓肯怎样了，他在哪里？”我问。

没有人知道这位缉毒署巴拿马的代表在哪里，也不知道何处能找到他。

在离开斯科佐的房间之前，我要他和上层保持电话联系，争取飞机，最好能使总部让我们换个别的地方，随便哪儿都行。“我敢打赌这桩交易算完了！”我和卫腊说着便来到门外。“这事太冒险了。”卫腊嘀咕着，说要去和赫墨斯参议员谈谈。我没吭声。尽管他是缉毒署这次行动的线人，是生活里最卑贱的一种人，但是在那时我们相互结成了联盟。

我们来到楼上的套间里，发现莉迪亚、刘易斯和加纳都在那儿。他们三个离开斯科佐的房间是因为房间的主人们在酗酒。我并没有责备他们三位，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已足够了。说到纽约的这两位特工，我记得他们能把谈话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在脑子里。

莉迪亚告诉我，她一直在和加州的海关保持联系；乔治·尤瓦乔还呆在那座秘密房子里，与墨西哥的帕罗·吉荣保持着电话联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海关的头头们执意要她加入这次行动，她在这里是为了确保冯拉伯总长了解本案中有关墨西哥政府腐败内幕这一既得利益。这桩毒品案眼看就办砸了，海关方面十分焦虑，我不能指责他们。

下午两点半，我和卫腊又回斯科佐房间去转了转，看看是否有什么新的情况他们想关照咱们。斯科佐说，他已和总部联系过了，对我们的命令没有变化，还是照旧在马丽奥特酒店内执行买捕行动，别的地方一律不予考虑。

“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是否有飞机。”他又重复了一遍，“那些该死的飞行员说，缉毒署雇他们飞过好些地方，他们都照办了，如果总部还不将钱给他们，他们这次就不飞了。”我朝房里环顾了一周，看上去就像进了啤酒瓶森林一般，那五百万美元还在老地方放着，对它的照看有点松懈。

下午三点，“口香糖”光着膀子，将我们让到一间像火炉似的房间里。贾杰疲倦地坐在床边看着我们进去。“我的人要我通知一下，整桩买卖到此为止吧。”他说话间的功夫，那扇门关了起来，“他们认为有些事非常令人怀疑。你知道吗，毒品侦缉署的特务现在正住在你们下榻的旅馆里。”

这个最后的结论并不令我感到奇怪。斯科佐和中央情报局正在频繁接触，我估计他们现在正在马丽奥特旅馆里制作重要新闻呐。

“兄弟，”我说着话，碰到他直视过来的目光，“我想，我同意你的那些人的意见，我们应该使所有的生意都到此为止吧。这桩生意做得相互都太过于不信任了。”我便又提起了机场的事，再给他来个闷头一棍，“他们还是那句老话：他们无法理解，既然我们能冒险去玻利维亚，能冒险将钱带进巴拿马，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去马丽奥特，带走这两只六十磅重的手提箱？这

只手提箱看上去完全和门厅里过往的其他手提箱没有什么两样。”

鲁曼疲惫地摇摇头。“你知道，路易，只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你不是缉毒署的人。所有的事，真太无聊了。本来也不可能有什么缉毒署的人介入。但是，假如你真不是缉毒署的人，那么你就得把钱交给我，要不然你就是缉毒署的人。”

我笑了笑没有作答，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这是一条没法逾越的鸿沟。

“路易，我们已到了这种程度了，”他还是疲惫地摇摇头，呆板的声​​音中夹杂着绝望的语气，“我不想让这次机会就这么丧失了。如果你能保证你的人能完成这场交易，除了马丽奥特大酒店，哪儿都成，我可以保证一切。”

“哪儿都成？”我问。

“我有个主意，”他突然道。他边说边走到墙边的电话机旁，拨通一个号码。一会儿他和一个叫曼诺尔的在那里通话。从谈话中能断定对方完全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一切。鲁曼问对方我们是否能借他的房子一用。鲁曼真的非常的绝望，干出如此失礼的一桩事。我开始摇摇头，表示厌恶。鲁曼立刻挂上电话。

“我完全不了解，那些人对我们的这场交易是怎么看的？”我道。鲁曼呆呆地望着我，像遭雷击一般。他的错误正好是一个天赐的良机，我正好利用他的单纯来进行防御，“兄弟，我对你有些不理解，为什么那些人一定要同我们做生意呢？他们又为什么要知道我的情况呢？”

鲁曼的脸上升起了一团怒气，他看上去像要哭出来一般。“你是对的，路易，我不再想了，所有的一切弄得我快疯了。……你不知道，我用脑袋向你保证，刚才和我通电话的是个银行家，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朝我脸上望了望，“你是对的，这是场误会。”

“如果我把这事同我的人说，肯定他们会嘱咐我赶紧离开的。”我道。

“我恳求你，真的，求你相信我，路易。那些人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相信你，兄弟，要不然我不会再来这里了。”我能看出这家伙正进退维谷。我担心的反倒是，最后他同意去马丽奥特饭店，而总部还是态度不明朗，对派飞机和飞行员的事，仍然一片混乱，我不能冒这个险，“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让整桩交易到此为止吧。现在有太多的人反对这桩交易。也许将来还有机会。”

“不，”他坚持道，“我们还呆在这里。我肯定咱们能就这桩交易达成协议。”

“这已经太迟了。”我提醒他，“我们最后的期限是在圣诞节，最后一趟去库拉索的航班是明天早上。”

“立即启程去库拉索吧。”他对卫腊道，“我肯定我们对这桩交易能达成一致。如果你能让你们的人确定一个地点，哪里都比马丽奥特要强，我们会做成这笔买卖的。为什么你不告诉你们的人，我们甚至会把你们作为人质扣起来，直到把那批货安全送上天为止。”

“咱们不是土匪啊，贾杰。”我微笑着，在这种场合我尽可能扮得慈祥宽厚些，“假如出了什么事，你想我会做些什么呢，会杀了你吗？那不是我干的事。咱们不是杀手，咱们是商人。”我说话时，特地把“杀”字用玻利维亚语说。

这些年来，在国际秘密缉毒“游戏”中，我常用这个字，从来没有败过。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温和国家的人，坚持不懈地摆脱来自哥伦比亚人的

盘剥，因为他们厌恶同好莱坞匪徒式的哥伦比亚人做生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知道他没有办法，只能让我离开的。甚至“口香糖”已在那里微微地笑着。

鲁曼突然看看自己的手表，表示歉意地说：“我得上楼打电话给玻利维亚。”他急匆匆地走出房间，回头仓促地跟我说了声，那是预先约好要打的一个电话。在楼上有一间伦巴多的套房。两个月前，我们从邓肯那里得到伦巴多的地址，想必我们已经在电话上安了窃听器了。安窃听器在国外调查中简直是家常便饭，几乎每一件案子都有类似的情况。如果鲁曼在伦巴多的房里打所有的电话，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途径，可以将这次行动中所涉及的人的把柄都抓住。

当鲁曼离开之后，我和卫腊两人各自在屋里呆着。“口香糖”为卫腊倒了一杯墨西哥特产“坦贵拉”，给我倒了杯桔子汁。屋里热得让人受不了，我脱掉身上的衬衣、鞋子和袜子，放在了鲁曼的床上。

记不得这话题是如何开始的，我们三个人相互讲述了好些与警察交火之类的英雄故事，还有一些各自的往事与经历。卫腊讲了许多恐怖故事，讲得天花乱坠。

“口香糖”也不去反驳他。但是，猛然间他转过身来，将T恤衫翻起，脱下长裤，露出屁股。他的屁股上有一处隐隐约约的伤痕，还有一处清晰可见的枪伤，直径有半英寸，很像是被45毫米口径子弹击中的。这是墨西哥联邦警察惯用的武器。他说，有一次，他企图逃跑，被一个内奸开枪击中了这个部位。

“他们抓了我五次，”他漫不经心地道，“然后他们对我进行严刑拷打。我坐了七年的牢，我从未讲过这事。”

卫腊一声不吭。我也帮不上忙，只能眼睁睁地望着这个家伙在那里出卖老朋友，来求得自己的苟活。卫腊端起那杯饮料。我心想，他内心是否觉得有点内疚。我在办案中遇到的像他那样的人实在太多了，可以说是数以千计，我对他们从来都十分的鄙视。我心灵深处潜藏着一种价值观，那就是，憎恶那些为自己的生存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开脱罪责的人。此刻，这种内在的价值观似乎活跃起来，并且猛然从我的内心迸发出来。我干脆闭上自己的眼睛。

在一片沉默中，我听见只有户外微风吹打树叶的响声，室内这间小屋里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这莫名其妙的一阵沉默似乎变得越来越使人无法忍受。我只觉得自己有点昏昏欲睡。

等我睁开双眼，鲁曼已在房里了，我伸手看了看表，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我已睡着了四十五分钟。

“我的人认为这事有点悬。”鲁曼道，“他们要我放弃一切。”

“我同意，兄弟。”我坐在床沿上昏昏沉沉地答道。

“但是我不同意！都快成功了，我们就在这里，一定得试试所有的可能性，决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很简单，什么可能性都没有了。”我提醒他，卫腊已订好去库拉索的机票，我们最后的期限只能到圣诞节为止了。我恳求他还是取消这桩交易。就算他此时同意接受在马丽奥特交割那笔款子，我也没有把握，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清楚总部是否会派飞机和飞行员来。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真叫人不可置信。拉公司和我都劝鲁曼放弃这桩生意，但他还是执意不肯。

“让你的人同意换个别的地方，再试试看，我肯定会去的。”我同意和我的投资人再谈谈。快到下午5点了，我们约定在晚上8点继续碰头。

当我和卫腊离开这间房子时，我伸手想与鲁曼握手。他拒绝同我握手。“就那么分手了，兄弟？我还没有和你道别呢。”他爽朗地一笑，那双眼睛里闪烁着奇怪的眼神。他已完完全全地相信了我，我也喜欢他，并且尊重他，是他使我能够竭尽全力，去捣毁一个地狱，这一切反而远远超过了在马丽奥特露面的那些自己人。

世上居然还有这么一位缉毒警探。

当我和卫腊再次来到斯科佐的房间时，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那里。屋子里烟雾腾腾，空啤酒瓶又增加了一倍。莉迪亚坐在角落里，怒视着阿尔贝特和布朗。这两位都显得有点烦躁不安。胡帕还同往常一样，静静地呆在另一个角落里。等我和卫腊向他们讲述了我们这次碰头会的情况后，布朗怒道：“他们不可能动真格的，那些家伙不会真的来作这笔买卖。”

斯科佐突然起身，向着我走过来，道：“嘿，要是他们把卫腊扣为人质怎么办？让我们还怎么进一步办案？你考虑过这些问题吗？”

“我考虑过，让这桩买卖到此为止算了！”我尽量使自己心平气和地回答，甚至不想了解斯科佐说这番后的用意何在。“可是对方不同意就这么罢休。”我又道。

“我们怎么能让此事就这么结束呢！”斯科佐怒道。他使我想起一位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的动画人物，除了他随身携带的十字架之外，遍体通红。“我们投入了众多的设施，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这事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斯科佐接着又道。

“我们可以答应他们一切条件，”布朗在旁边补充道，“但是，他们不会答应我们的条件。我认为那些家伙不会真心诚意地同我们做这笔买卖。”

“他们不会真心诚意地做这笔买卖？”我气愤地又回敬了他一句，“我们正想法让他们在地球上再找个地方，接受这五百万美元的毒品买卖，但他们说，不想再去任何地方。难道他们这也不是真心诚意的吗？”

我暂时将自己的心里话隐藏起来，目的是为了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这种因为酗酒带来的隔阂。我朝刘易斯和加纳递了个眼色，他们幸运地目睹了这起缉毒署有史以来最大的案子的经过。我说：“鲁曼说，如果我们更改交易地点，他会同意达成这桩交易。该怎么给他回复？”

“好，告诉那些杂种们，我们答应他们的条件。”斯科佐嚷道，“就同那些杂种们摊牌吧。”

“我想他们不会那么干的，”布朗贸然插嘴道，“我认为他们是在拖延时间。”

“我不想再作什么解释，”卫腊也突然挤进来道，边说边奇怪地瞪了斯科佐一眼，“请问，我们的飞机，还有飞行员，落实了没有？”

“那个正在联系！”斯科佐叫道。

“你肯定有把握吗？”卫腊又问，“你可明白，我这条性命就快完了。”

“闭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斯科佐魁伟的身体威胁似地朝这位瘦骨嶙峋的告密者步步逼近。这两个人的个头都差不多，但是斯科佐比他起码重六十磅。卫腊涨红着脸向后步步退缩着。

“你喝了几瓶酒了？”莉迪亚突然气愤地问道，“我估计足有二十瓶吧？”房间里突然鸦雀无声。我看见斯科佐和布朗的两双眼睛都充满害怕的

神色。莉迪亚是海关老资格的特工人员，不会宽容、包庇这两位缉毒署的酒鬼同行。她作为职业道德委员会的成员，出于一种本能，勇敢地站了出来，监督这两位酗酒者，并与之斗争（职业道德委员会的前身是国内安全局）。舌战还在继续，然而却慢慢地缓和下来，斯科佐和布朗都奇怪地望着莉迪亚。

他们曾用这样的目光对待过我。

斯科佐吹嘘自己能直接通到总部的权威人士那儿，来设法更改交易地点。这时，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

原来是毒品侦缉署驻巴拿马的特使邓肯来了。他的到来使我很高兴，因为唯独他对这次行动自始至终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奇怪的是，他作为毒品侦缉署驻一个国家的代表，对这么重大的案子，居然老是躲躲闪闪的。

斯科佐在拨打长途电话，布朗却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吹嘘他在南美的经历。这些家伙才真是“在拖延时间”呐。我试图从邓肯那里获得一些信息。我们相互都认识，在阿根廷，他曾为我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对他重复了鲁曼在马丽奥特饭店里损失过二百万美元的故事。邓肯很快地将此事笔录下来，却没有对这事多加一句评论。我告诉他有关鲁曼与玻利维亚人在拉斯维加斯大酒店的六楼套房里通电话的事，他只是说了句：“马上安上电话窃听器。”

突然，斯科佐打雷似的嗓门震撼了整个房间，不管在房间的那个角落，都能听到他打电话时那付令人难受的腔调。“……我们这些人会在这里把那些东西办妥的，我们只是还想知道，是否将我们的‘大鸟’准备好了吗？他们都急得想在操场上玩玩这只大鸟呢，我们在这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你们明白，这些‘东西’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邓肯微笑着望着我，他的微笑里表明了一切。

到了晚上七点，大家同意，由我和卫腊通知鲁曼：我们正在寻找安全的公寓或别墅，也许明天就有什么消息了。邓肯将帮我们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到了午夜，斯科佐透露他可以保证总部批准变更地点的计划。我问他有否飞机和飞行员的消息，他答道：“我们总算有一架破飞机了，总部总算准备停当了。我们要运送这么多纸币和设备，现在上头对这事总该放一码了吧。”

“倘若他们将卫腊扣为人质咋办？”我忍不住问道。他茫然地朝我看看。“不过没关系。”我又自言自语道。

等我上楼来到那间套房里，气愤的莉迪亚告诉我，斯科佐不仅在飞机的落实上毫无主见，而且擅自中断了她同海关领导人的正常联系。她担心的是，海关将失去那几位墨西哥籍的被告人。那些墨西哥人打电话到那幢秘密房子里，想了解延期的原因，也不知道尤瓦乔如何对他们作出解释。

“莉迪亚，”我很遗憾地对她道，“我只能假定，将要执行这次秘密行动。如果我是你，我会把这些事向我的上司汇报。”我的建议她也许会采纳的。

刘易斯和加纳都感到十分震惊，对此我反而感到高兴，他们的惊讶正好说明他们是本案最好的见证人。等这案子了结，一切都烟消云散之后，我还有许多更秘密的材料没有透露呐，我还要好好地于它一番。不过目前还不知道怎么个动法，反正一定得好好地动它一动。

晚上八点一刻，我一个人又来到了斯科佐的房里，卫腊在酒店的大厅里等着我的回音。说来也巧，我与斯科佐会晤的次数和同拉公司的毒品贩子会晤的次数正好都是三次，而且所有笔录的数量也都相当。我在毒品侦缉署工作了这么些年，也学会了采用“攻其不备”的方法。我懂得怎样在执行任务

时导演一出毫无瑕疵的剧目。同时得收集文件、材料、证据，并使这些内容具备丰富的人情味。这些内容里，有斯科佐抽烟将整间屋子熏得乌烟瘴气，酗酒将屋子弄得满是酒味。我觉得自己正在绞尽脑汁，来对付那些曾认为是我的合作人和监护人的家伙，这样做只是为了复仇。

斯科佐、布朗和胡帕还在那间屋子里，我问有否什么新的动向。“告诉那些家伙，你们可以找随便什么地点接头。”法斯特·阿尔贝特道，“一切都协调好了，我已和华盛顿方面派来的人通过电话了，他们完全愿意为我们撑腰，一切按今天早上所计划的办，加茜加太太（莉迪亚的化名）和她的雇员另去租个地方。我们其实已考虑好一个很适合毒枭去的地方。”

“假若那些家伙不是在胡说八道的话，”布朗又夹进来道，“现在他们该恪守诺言了。”

我几乎插上不嘴，只听着斯科佐在那里发表长篇激烈的演讲。唠叨着这桩案子花了多少钱，多少时间……。“那么飞机和飞行员落实得咋样了？假如鲁曼同意的话，他们还要去库拉索吗？”最后我也频频追问。

“总部通知我，一切都安排好了。”斯科佐道。

“太好了。”我说。他们三位跟我总有一点贴不到一块的味道。我看看手表，已过了十分钟了，便道：“我想也没有其他的什么事可以多说。”转身要走。这似乎扰乱了斯科佐的情绪。

“等一下。”他叫住我，“你认为我们把这些钱搁在这里还是搁在大使馆更安全些？”

我朝塞得鼓鼓囊囊的两只皮箱看了一眼，这事差点叫我给忘了。我不知道鲁曼会怎么说，怎么做。“最好还是将它搁在这里。事已至此，为什么不碰碰运气，这有什么不值得呢？”

“好吧。”斯科佐说着话，拍拍其中一只皮箱道，“就将它摆在这里吧。”

等到晚上八点三十分，我和卫腊又来到116号房间的门口，轻轻地叩了一下房门。鲁曼将另一房间的门开了。他显得有点笨拙、严肃、疏远，看起来比我们刚离开那会儿又添了许多疑心。准又发生什么事了。他要卫腊立即离开，去库拉索，却闭口不谈由我们选地点完成这桩交易的事。“我保证，我们会策划好一切的。”他一人把这事全包下来了。

我觉得自己像到了天上，有点飘飘然，便道：“这好像有点不合情理，等我们完全同意这桩买卖之后，再让戴维离开，我实在想取消这桩买卖。”

鲁曼知道说不动我，暂时同意在合适地方完成这桩交易。“但我必须征得玻利维亚方面的同意。”他最后道。

他作出的一点让步是：任何地方都比马丽奥特要强。他并且追查询问了好些有关早上飞往库拉索航班的事。“地点的寻找，”他继续道，“我相信到了早上自然会答应你的。”说着用一种奇怪而冷淡的眼光打量了我与卫腊一番。一定是我们的某些试探已败露，他一定得到拉公司的指示。假如我真是毒品贩子，花费这些时间、精力之后，肯定会立即答应派卫腊去库拉索，然而事实上，我没有那么决定。

“我会叫戴维在早上达成第一笔买卖的。”鲁曼说话间，领我们来到门口，他同我冷淡而草率地握了握手。1987年12月20日，这场秘密会谈总算结束了。我看了看手表，这次谈判仅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

“一定出了什么事。”等我离开拉斯维加斯大酒店不久，卫腊对我道，“他一定闻出什么味儿来了。”

“你也察觉到了？”

“是啊，但是我不希望出那样的事。”

我同卫腊回到马丽奥特，下了电梯，熟门熟路地来到斯科佐的房里。这些天来，这位大个子的心绪第一次显得有些平静，他穿着一件浅青色的花格衬衣，在昏暗中显得尤为耀眼。啤酒味和香烟味早被科隆香水味所压倒了。斯科佐独自呆着，我能理解这是为什么。

“出事了。”我说，“我认为这事完了。”卫腊在边上也谨慎地附和着我的观点。

“胡扯！”斯科佐说着话，抓起一叠钱往自己的口袋里一塞，关上门，急匆匆地出去了。他边走边叫道：“一切都计划好了。总部现在为我们撑腰，明天就落实新的交易地点了。我现在要去会会那些伙计们，咱们已在这间无聊的房里关了整整一天了。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安排的这一切，现在要下马了。”他说着就不见了。

我同卫腊默默地乘电梯上了楼，来到顶楼的套间里。还没进门，加纳就告诉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位电视新闻记者爱德·伯雷德就住在我们同一层楼里。我一转念，此人来访似乎有些不妙。记得在办苏亚雷斯案时，也是因为新闻界插手而惨遭失败，我曾被害得好惨啊。此刻，我不得不有所提防。

一进门，让我大吃一惊，加纳、刘易斯和莉迪亚已匆匆地替我准备了个生日庆祝会，还准备了一只小蛋糕和生日蜡烛。一会儿，我们便沉浸在欢笑之中，几乎忘了我们现实生活的环境。我们实在已是无路可走，只能这么苦中作乐。莉迪亚告诉我，到目前为止，斯科佐对飞机和飞行员的事仍毫无消息，他根本就不同楼上商量怎么寻找新的交易地点的事，等到了早上，我们还是什么也没有准备好，看来我们肯定是要倒霉了。加纳和刘易斯告诉我，等我离开最后那次秘密碰头会之后不久，斯科佐就将那五百万美元的现金转移到大使馆的一间密室，那样他们就可心安理得地出去逛大街了，但是没有想到你们一会儿工夫就回来。

毫无疑问，鲁曼很想看看这笔钱。然而现在不管怎样推断，鲁曼已不可能实现他的愿望了。这场打击拉公司的秘密行动计划又被彻底破坏了。斯科佐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只要总部的人稍稍咳嗽一声，不管他是什么职位，都会弄得斯科佐神经紧张。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猜出这个哑谜。

将近午夜了，今天可是我48岁的生日。我敢发誓：此时此刻，我真有些莫名其妙。我受到那些吃里扒外的蛆虫令人费解的白眼，这些家伙想方设法让我错过这场反毒战争。在那种环境里，我能干的，只有将这一切事实都记录下来。

到了12月21日，凌晨一时左右，我房间的电话铃响了。我从梦中惊醒。电话里传来了莉迪亚气呼呼的声音。她说，海关内部议论纷纷，说我拒绝再做这场生意，而且马丽奥特是个跨国集团，它的生意一直延伸到墨西哥境内，帕罗·吉荣起了疑心，这位墨西哥联邦警察已打电话给尤瓦乔，表示对我们的行为和举止感到奇怪和不解。帕罗和赫克特表示拒绝去加州，等情况明了之后再谈。

这还不算。“斯科佐告诉我的上司，”加茜加太太怒道，“所有的秘密决定由冈萨雷斯先生定夺，他只是负责监督这些决定的落实。他还说：‘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海关方面还得知，那几位飞行员不愿意接受飞

行任务，因为缉毒署以前拖欠他们很多飞行费用。

对此，海关方面不得不感到惊愕。冯拉伯总长计划逮捕吉荣和赫克特的闪电行动，现在看来要泡汤了，这条直通华盛顿的电话专线，一定是热得发烫了。“对不起，”我对莉迪亚说，“我实在作不了主。”我挂上电话，记下这次通话的时间与内容，然后就翻身睡着了。

到了早上九点半，我接到斯科佐打来的电话，他慌慌张张地让我赶紧去他的房间。鲁曼打电话给卫腊，要卫腊单独去他下榻的酒店。

我来到斯科佐的房间，见卫腊被吓得缩成了一团。斯科佐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这个该死的邓肯，他什么也没干。”他气愤地道，“我跟他谈，要么由他给我们带路，要么让他滚蛋。一切由我们自己来处理这事。”我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也没有多在意。

“你怎么看？”卫腊也不顾边上的斯科佐，直接问我。

“我想玻利维亚人起了疑心，但他们不至于认为我们是特工人员，或者说，还不会马上调集人马。”

“你认为我应该去吗？”

“如果你去了，”斯科佐在边上道，“我们对你不负任何责任。”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道，此刻我好像忘记要顾全斯科佐的面子，“如果他打电话给我，我保证赴约，那里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从斯科佐的房间出来，和卫腊结伴同行。卫腊朝酒店大堂走去，脸色苍白。我对他道：“听我说，我要是你，就去赴这个约。假如鲁曼真想动手，你和我，咱们两人早就见阎王去了。”

我叮嘱他赶紧叫车赴约。卫腊走后，我转身来到酒店大堂。此时，我恨不得一拳将斯科佐打得个肝脑涂地。

上午十一点三刻，我回到寝室，见桌子上留着一张纸条：“情况紧急，速与斯科佐联系。”

我正在看这张纸条，电话响了，电话里传来了斯科佐的声音：“赶紧召集你的人马，立即离开酒店，他们怀疑你是特工。我命令你和你的那些人，现在赶紧离开酒店去机场。”

我也不想同他理论，干脆将电话给挂了，然后又打电话到卫腊的房里。我猜他这时一定在房里，想让他到我房间来，一起商量下一步的对策。莉迪亚、加纳、刘易斯都来到我的那间卧室。不一会，卫腊也走了进来，开始激动地向我们叙述全部经过：“我一到，还不到两分钟，他们就要我在大使馆给他们挂个保证电话。”

“噢！我全明白了，原来让我卷铺盖滚蛋只是为了这个！”我道，“你能否给我们讲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事？”

“今天凌晨两点，玻利维亚的那位老大巴图·皮萨罗打电话到鲁曼的房里，把他从梦中唤醒。我无法理解，咱们为什么要坚持在马丽奥特大酒店成交。那个老奸巨滑的鲁曼说，他们只认识我，不认识什么路易。他还说，你那样固执地要在马丽奥特接头成交，是为了侮辱他们，让他们捉摸不透。那位皮萨罗在巴拿马有银行户头，受巴拿马军事强人诺列加的保护。巴图已嘱咐鲁曼，让咱们把钱存入他的户头里。这是他们给咱们的最后一次机会。咱们要么在明天照办，要么赶紧打道回国。”

“我提议，将钱存入那个户头里。”卫腊又道，“我想楼下也会听从我们的劝告。”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按买毒计划办？”我插言道，并且朝莉迪亚、加纳、刘易斯眼。他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毫无疑问，这三位都同我一样被惊呆了。我此刻就像掉了魂似的，不知所措。

“谁来拿个主意，”卫腊举起双手在空中挥舞着嚷道，“斯科佐和布朗说过，‘我们可以那么干，把钱汇入那个户头里去，也许能查出个蛛丝马迹，毒品侦缉署和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的总部也有那样的要求，他们愿意将钱存入那个户头。’但是他们不知道上头到底会不会批准。我想，这也是为了打消墨西哥人对我们坚持要在马丽奥特成交这桩买卖引起的怀疑。但是，现在他们已冷静下来了，准备去加州拿他们应得的佣金。”

卫腊跟我语无伦次地唠叨了半天，好像我从未见过那帮墨西哥人一般，把他们的事同巴拿马发生的事混为一谈。假若他们就是在加州见过的那帮人，他们绝不会如此急急忙忙地钻进这么明显的陷阱中来。真正的毒品商在尚未完全成交之前，是不会付佣金的，只听说过有人追着要佣金，没听说过逼着对方来取佣金，这是一般的常识。卫腊的发言，又一次令我感到奇怪。

接着卫腊又开始将话题绕开去，他介绍了斯科佐和布朗的另一件事，然后慢慢地将话题转到钱上头来。他主张干脆就带钱去拉斯维加斯大酒店，等着这场交易的到来，就在那里把这事给了结了。我看见加纳的眼盯着天花板，在那里一个劲地打转。这个卫腊非但不傻，反倒更像是缉毒署的人，在那里打着他自己的小算盘。然而在那时，我得考虑，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咋办。”我说着，打断了卫腊的话匣，“我去一下斯科佐的房间。”

半晌，我心中像有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令我坐立不安，心想，这次可真被套牢了。我以前执行过成千上万的秘密任务，有几起还是世界第一流的大案呐，可还没遇到过这么棘手的事。我敲敲斯科佐房间的门。布朗打开门。这二位都绷着脸，见我进来，态度十分冷淡。

“请问，下一步打算怎么干？”我彬彬有礼地问，“听说，要我带上人马立即离开酒店。”

“嗯，”斯科佐开了腔，他说话的语调相当地慢，比他原先的那股腔调更加斯文，“我们想请示一下，让部分钱挪挪位置。”

我望着他们两人，很想弄清，他们到底是真的笨到了家呢，还是在故弄玄虚。付钱给鲁曼的计划，看来是成了泡影了。自开始拒绝在马丽奥特以外进行毒品交易时起，它就完全是一场荒唐可笑的闹剧。玻利维亚人就快察觉这场骗局了。这两个家伙对我来说，才是真正危险的人物。

“直说了吧！让我咋办，我就咋办！”我直截了当地把话挑明了。

“除了马上离开酒店外，你真的什么也甭干。你们走后，我们还得将所有的事重新系统地计划一番。你知道他们同卫腊说了些什么？他们限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决定。更重要的是，眼下墨西哥人还没有启程，万一要有个闪失怎么办？要知道，加州的特工们正妄想着在边境上钓到大鱼。”

“嗨！”我叹了口气，“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这件事有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这就是我奉命必须呆在这家酒店里。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这个案子现在就没有门了。”

“你想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应付呢？”斯科佐随口问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答道，但愿自己是在和一位真正的武士比武，这两位便是我接下去的敌手。

“只要上头允许将钱作为诱饵，那就好办了。”

“我希望你成功。”我说。但我心想，广大的美国纳税人会相信吗？“我敢向上帝保证，希望它能有所进展。”我又添了一句。

“我们已搞到一架飞机，正飞往库拉索，我们主要用它装这批毒品和钱。”

“你真有种。”我懊恼道，心情就像打了败仗似的，“有那么多的人都起了疑心，就是因为我们执意要在这个缉毒署的旅馆做这笔生意。”

布朗突然插进来道：“倘使我们付钱给他们，兴许会挽回信誉。”

“我真希望此事能成呐！”我道，“但是我想不会有转机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布朗居然会扮演一名决策者的角色。他在迈阿密突然地出现，以前他对本案一无所知。他说他在南美工作过好几年，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听他的西班牙语，只会几句简单的会话，而且还让人费解，说出来的句子不合语法。

“我们还要派卫腊去玻利维亚。”斯科佐道，“还得带上一笔钱，虽然现在还不知道究竟带多少钱，但是不管带多少，至少对方会说：‘来！让我们再来做这笔生意！’我想只要给他们钱，就能使这桩案子有一点转机。”

“但愿如此。”我笨拙地回答，试图从这两个似醉非醉的家伙口中探出点什么来，好证实我刚从那个骗子卫腊那里得到的情况。

“我就不信，那些玻利维亚人的计划会比我们好！”斯科佐叫道，“我同一些与他们打过多次交道的人谈过。假如你想去库拉索或者回家过圣诞节，都请便。你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倒真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反而突然想起我在空军生活的那段日子。那时我住在一个院子里疗养，为了配合精神疗法，我和同院两名伙伴打扑克牌。一开始他们似乎还都很守规矩，可是玩着玩着便开始出现了犯规动作，叫牌不守规则，甚至相互看对方的牌，使得我接连受挫，气得我正想把牌一扔了之。为了不扫大家兴，我便发明了一套自己的叫牌方法，只有当轮到到我出牌时，才用这种方法。后来这两个对手都十分地紧张，他们直楞楞地望着我，毫无办法。现在对付斯科佐和布朗，我同样毫无发言权，只有轮到到我“出牌”时，才能让他们瞧瞧。

“走着瞧。”我不禁脱口而出，“鹿死谁手，这还是个谜。如果你要我帮忙的话，就尽管说，我乐意效劳。”

“你什么也不必说了。”停了一会，斯科佐道，“你孙须马上踏出马丽奥特的大门，最好现在就走，不然就晚了，连老命都得搭上。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带上你的行李去什么地方避一避，等整桩交易完了之后再说。”

111

等离开斯科佐的房间，我才知道，他要我同加纳、刘易斯去“大陆机场饭店”就住，等他的消息。

斯科佐最后交待我们：“你们就呆在那里，等我们找到合适的行动方案再说。我想咱们一时也找不到什么别墅、公寓或什么别的地点。”

布朗的临别留言则是：“你先出去避一避，等我们先执行了A或B计划再说。”说着他朝我使了个奇怪的眼色，“这可是到了紧要关头。”

我瞪了他一眼，他也没办法。我猜他能够理解我的愤怒心情。多年来，我从事过许多绝密行动，这种事也见多了，还是明智点，知难而退吧。我苦笑道：“祝愿你们马到成功。”

一小时后，我和刘易斯、加纳叫了一辆的士，直奔大陆机场饭店而去。莉迪亚可能接到海关方面的指示，仍留在马丽奥特大酒店，按海关的命令监视着一切。我上车时，又回头看了看马丽奥特大酒店。很快地，酒店的身影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我忍不住放声大笑。加纳和刘易斯呆呆地望着我。我无法形容在那一刻所感觉到的自由。

下午五点三十分，斯科佐打电话到大陆机场饭店说：“让你的这队人马离开那儿吧，此案已了结了。”

“那就是说，我们可集合回美国了？”

“对。”斯科佐答道。

我想打听出到底发生了什么。斯科佐只是说：“我方人员要求撤出这里。”

晚上七点我们集合完毕，等待第二天早上去迈阿密的航班回国，然后折道去纽约。我又独自乘的士到了马丽奥特，去胡帕那里取回我的正式护照、缉毒署的工作证和别的有关身份证件。这些东西是我离开迈阿密时托胡帕保管的。我看见莉迪亚、胡帕、布朗和斯科佐统统都在斯科佐的房里，他们又在那里开怀畅饮。我感觉颇不自然。我从胡帕那里取回了我的那些证件，还有那支枪，带上这些东西就准备回纽约自己的办公室去。

“噢！这样，玻利维亚人就真的不会相信你这个路易了。”布朗在一边笑道。

“是啊，”我答道，“我真他妈见鬼。”说着转身就走。

“你知道，也许整个过程就是玻利维亚人设的圈套，他们故意让我们来钻。”布朗还在那里高谈阔论。

将近子夜了，卫腊打电话给我，说：“所有的事又起了变化。”斯科佐告诉他所有的人都得逮捕，包括那些正赶往加州的墨西哥人，这中间还有位将军，可能有好大一帮人。“这项计划完全得重新制定。”他对我道，“斯科佐会通知你的。”

我放下电话，就马上拨打斯科佐的电话号码，只听见“嘟——嘟——”的信号，电话没有人接。

1987年12月22日早上八点三十分，胡帕打电话告诉我，也许我还得同玻利维亚人再打交道，去执行一项更机密的任务。“总部决定，逮捕所有参与贩毒的人。”胡帕还有更新的消息。他说，尤瓦乔报告说，有种神奇的诱惑促使墨西哥人去加州就擒。“我们就在这里逮捕玻利维亚人。”他最后道。

早上九点三十分，我接到斯科佐的电话命令，让我取消飞回美国的计划。他说：“他们所有的人将作为‘参与贩毒’而被逮捕。”他拐弯抹角地唠叨了好一会，全是些毫无意义的废话，最后才告诉我留下待命的事，他的用意是想拖住我。

上午十一点，我还是没有听到他的回音，于是打电话到他的房里。布朗接的电话，他告诉我，斯科佐去大使馆打一只秘密电话，说着他便把话题岔开道：

“莉迪亚和戴卫出去为你找一个能亮钱的地方。”

“照这么说来这事还是按原计划行事啰？”

“我想是吧。”布朗答道，接着他便压低嗓门对我说，“你知道吗，他们的飞行员昨天晚上到了，他们还付了他好大一笔钱，他就呆在机场外头。”

“你是说，他跟我们住在同一个饭店里？”

“我想是吧。”

玻利维亚人的飞行员就在我住的饭店里，居然无人事先提醒我们，这完全违背了秘密调查的起码准则。这家饭店投宿的人很少，很有可能发生意外，而且这种可能性相当大，一旦发生就可能产生不可想象的悲剧性后果，起码我也许就会离开人世。

我怎么会同这些家伙走到这一步田地，真令我无法相信。我的嘴唇微微颤抖着，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只能呆呆地笑着，像疯了一般。“真卑鄙！卑——鄙！”我说着话，眼泪从眼眶里涌了出来。我必须摆脱他们将我视如仇敌的局面，不管这种内耗是如何一步步地形成的，必须马上停止。

下午三点，我接到斯科佐和其他同伴的电话，电话的内容依旧，没有什么新意。于是就率领我的两名见证人一起乘出租车返回马丽奥特大酒店。

斯科佐的房里依然是空啤酒瓶林立，这中间又夹杂了几个苏格兰威士忌酒瓶。香烟味、啤酒味、威士忌酒味渗和在一起，散发出一种浓烈的酸味。屋里在座的有：卫腊、莉迪亚、胡帕、斯科佐和布朗。

这个身材高高的粗俗的酒鬼斯科佐道：“玻利维亚人正在谴责贾杰搞破坏，使一切都起了变化，门德萨正从玻利维亚出发奔这里来了。这些该死的家伙如此玩命地向我们推销毒品。我正式通知你，他们正厚颜无耻地要我们接受这批毒品。”

卫腊开始只管自己在那里解释。斯科佐只能勉强地将他的脸对着卫腊。“听我把话说完！”斯科佐怒道，“他们谴责贾杰搞破坏！”说着又将脸转过来对着我：“如果我们此刻再不采取行动，那么我们苦心经营的一切将前功尽弃了。”卫腊躲在角落里，背对着那张脸，一个劲地发笑。这出戏看你怎么唱法？我心想。

“我不明白，”我忍不住问道，“他们为什么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鲁曼身上呢？”心想，邓肯一定有伦巴多的电话窃听，他说过能搞到情报的。那么斯科佐他们还掌握了些什么别的情报呢？

“见鬼！我不能把这事告诉你！”斯科佐嚷道，“我什么也不告诉你，还有其他的事也不告诉你！”他看上去有点歇斯底里。我倒是有点希望他失去控制。

我急中生智，决定调换一个话题，不过这似乎晚了一点。“别墅和公寓的事准备得咋样了？”我问。

“我们还没有落实呐！所以你什么风声也不要向那些家伙透露！”

“你是总负责人嘛。”我说着看了看加纳和刘易斯，“就像我上次说的，您让我咋办，我就咋办。”

“如果还谈不好，”他含糊其辞，“我们就退回到这里来。”

确切他说，我弄懂了。于是，我慢慢地站起来，暗示了一下加纳和刘易斯，他们跟上我，回咱们自己的住处去了。

晚上七点三十分，一场风波最终爆发了。当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斯科佐先生打电话来传达紧急情况。

“嗨，你们在城外呆多久了？”法斯特·阿尔伯特·斯科佐在电话里道。

“此事怎么还没了结啊，拖了那么长的时间。”我问。

“吃过晚饭了吗？”

“还没有呢！”我答道，立即又后悔自己说了实话。

“赶紧来酒店吧！”他接着就在电话里用暗语跟我说：“你知道，我们已对这事摸了下情况，所有的人在今天和明天早上都必须呆在城里的南头。”

我想同你谈谈。今天早上，噢不，明天早上就得让他们看看这些‘设备’。我要求在两至三个小时内将一切都安排妥了。我们要和那些呆在北头的人开诚布公地谈谈，跟他们说，我们已决定好一切了，明白吗？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就来帮帮我们。但是最主要、最关键的是，你必须在巴拿马市呆到26日为止。”

“噢。”我答应道，但是心里完全糊涂了。为了让他把话说完，就道：“我完全愿意接着办这件事。”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在电话里说话的速度总是很慢，又讲不清楚，不知道他是喝酒了呢，还是清醒着。“就是过了1月26日，让我呆着，我也会再呆下去的。”我接着又说。

“那就好，我要告诉你该怎么办了，你能过来，这是关键，我要告诉你和你的同伴，该干些什么。你了解那些人的情况、爱好，那些人已出发了。”

“你是说就在今晚？”

“是的，明早就到。”

“我们住的地方搞好了吗？”

“嗯，让我给你解释，你的对手已带上他的朋友在路上，他们到你那里就会停下来。”

我听了半天才听懂，他要说的是有个玻利维亚人已住在我住的饭店里了。“是啊，我在这里是用我的真名登记住宿的。”

“嗯，这没关系，你可以马上换个新的住处。我们正在同他们进行着全面的较量。”

“噢。”我应了一声，心里终于明白了，他对此开始担心起来了，“在我离开他（指鲁曼）时，我告诉他，我会找个别墅或公寓进行这场交易的。”

“这事就发生在明天。”斯科佐喻声喻气地道。过了会儿他又道：“那个老家伙今晚也到了。”我明白，他说的是艾菲尔·门德萨已从玻利维亚启程了。

凭感觉，似乎这笔交易流产，公司方面要追究鲁曼和门德萨两人的责任。

我想跟斯科佐解释，玻利维亚人同我们走到这一步田地，首先是因为门德萨喜欢上了我。这场谈判转成了秘密的商谈之后，我没有意识到会取得如此之大的效果。我实在没有能力再扮演那样的角色。

“假如让我再出来与他见面，”我道，“我恐怕没有把握会有什么进展，他也会明白这是个骗局。”

我已经三次出席了这种警察与强盗面对面谈判的闹剧。

“那么，你马上来这里，再与他们坐下来谈一次，到时候他们会去的，你得准备一下，”斯科佐一本正经地道，说话的腔调也快起来了，语气也变得硬起来了，“我宣布，同来的人都得呆在城里，不准再四处游荡了。”

“我懂他们该怎么做。”我答道，对他突然改变说话的腔调觉得惊奇，“但是问题是我的这些伙计对此事也疑心重重，我甚至还不知道飞行员到底在那里，也不知道我们的飞机到底准备好了没有。我不知道拿什么方法去劝他们。”我明白刚才的一席话是跟他白说了。

“我告诉你一些事，”斯科佐说着又激动起来，“我们陷入困境了。现在是七点半多了，那些家伙在凌晨两点就要到了。”

“照我说是到了可怕的境地了。”

“让我再跟你谈些其他的情况。”斯科佐继续道，“唯一的办法是你来

坐阵，解答这一切，你再同我们一起好好地切磋切磋。”

我感到脑袋“嗡”地一下，像是被猛击了一拳。“噢，”我开始放慢了说话的速度，“我们只听你的指挥。”

“我告诉你目前的情况。”他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如果你还想接这桩案子的话，那么就来吧！我们设法在公共场所同你取得联系，最好去体育馆那样的地方。总之不能在你的房间里。”

我竭力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冷冷地说：“我想我会提出书面的反对意见的。”

“伙计，我要对你说明这一切的真相。”他像放连珠炮似的对我道，“你如果愿意干，就过来干吧。”他说话的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相信这会是斯科佐的讲话。

“我也要告诉你一切，”我道，“每次都是我围着你转，你只用一半的注意力放在这上头，有时根本就心不在焉，我活该费了那么多的唾沫跟你说废话，……如果是我，领着一班人马，让他们替我掩盖喝酒喝得烂醉的样子，我自己就会打电话给上头，让他们把我这个蠢蛋从这里赶走。”

斯科佐突然安静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想你应该来这里平心静气地谈谈这事。”

我为了表明自己是正确的，就猛地将电话听筒搁在那个塑料机座上。

我赶紧召集刘易斯和加纳，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要他们为我作证。过一会儿，我们就上路返回马丽奥特大酒店。

大约到了晚上八点半的光景，我们三人来到了斯科佐的房间，见布朗、胡帕两人都紧张而又忐忑不安地等着我们的到来。斯科佐显然不在屋里。在我发言之前，布朗首先讲了十五分钟的开场白。

“我们都是缉毒署的人，所以我可以讲几句，”布朗道，“碰巧CI（卫腊的代号）也不在这里。如果我要是你的话，麦克，我早在四十八小时之前就整理行装离开了。但是，我还要恳求你留下来，再呆比四十八小时更长的时间。”

布朗喋喋不休地指责“一箭三雕”行动在许多方面条件恶劣。他指责阿尔弗雷多·邓肯不给我们任何的支持，指责卫腊撒谎并误传一些实际情况。

“卫腊在利用我们，”他道，“他在你的背后捣鬼，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毒品让他过瘾。现在所有的人都被蒙在鼓里。这是从对上层人物的电话窃听里得知的。”他神秘地道，“这个案子牵涉到了这三个该死的国家的最高领导层。”

布朗终于讲完了。他想干什么？难道他要制止整个世界？布朗想要我现在就动手，在四十八小时内就制止艾菲尔·门德萨的行动。哪那么简单。巴拿马还有玻利维亚人，同时还得让卫腊飞回加州的拉加拉，让他在那里打电话给墨西哥人，说，飞机即将起飞，飞往墨西哥来接墨西哥的将军和他的随从吉荣和阿瓦兰兹。用卫腊的话说，飞机即将起飞带他去拉加拉，在那里吉荣和阿瓦兰兹会得到一笔介绍费，还要商定下次毒品交易的装运时间和安排通行证。当然他们将以违犯美国毒品法而被逮捕。那样的话，不管是谁，我都得负责将他们扣留在巴拿马，然后再引渡去美国受审。

现在又有一位墨西哥的将军卷了进来。我推测海关总长冯拉伯必定在一旁为自己捏一把汗。这才叫是一枚真正的军功章呐，他马上就要走红了。当然事实证明议会是帮蠢蛋。缉毒署的那些大人自然正在准备如何奉承他的计

划，以取悦于他。至于玻利维亚方面到底会出现什么人物，关系就不大了。冯拉伯害怕的是，万一因为海关方面走漏了风声，使对方有所防备，从而鱼儿不再上钩。这可是件骑虎难下的事。

布朗的整套计划全仗着卫腊，他保证说能控制住墨西哥人。令我感到诧异的是，他居然会信这么个孬种。尽管他现在已意识到那家伙是个地道的骗子，然而他对此仍抱有幻想，还在用这个骗子提供的情报。但是我对这一切早已不感兴趣了。

既可恨又可喜的是，“一箭三雕”已被大人们判了死刑了，可现在突然又红得像个俏佳人。等墨西哥人一入境就请他们银铛入狱。

令我头痛的是，还得继续收集所有关于本案的文件材料。我还得对他们提出的所有计划表示赞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得让我的见证人先记下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件事。

布朗终于否认了他的那项特别行动计划。门德萨凌晨两点就到，卫腊去机场接他，将他安排在我住的饭店里，在那里我就让他看看这五百万美元的现款。按卫腊、布朗和斯科佐的想法，好像我有催眠术，能哄骗他和那些玻利维亚人，让他们都呆在巴拿马一直到墨西哥人都被逮捕为止。

“卫腊已告诉那些人，他因为燃料等特殊原因没有走掉。”布朗道。

我纳闷的是，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告诉了他们。卫腊真够“精明”的，他们几乎还都比不上他。我敢肯定他还有什么自己的小算盘，尽管这是项愚蠢的计划，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又有什么办法呢？

布朗深深地吸了口气道：“最后我指出一点，AI（指斯科佐的代号）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偶尔喜欢喝点酒，但他没有误过事。我不想为他的行为作辩护与开脱。我和胡帕跟他直接相处也只有五天的时间，以前只在电话里接触过。”

“我实在也不想去议论他。”我说着把他的话题岔开了，“让我说什么呢，我宁愿当面直接对他说。”

“等会儿吧。”布朗道。

“既然那样，我会说的。”我又一次将他的话题扯开，为了控制局面我又一次将谈话的中心转到了热点上来。事情到了今天这份上，似乎这一切是我在从中作梗。他们还有更多的信息捏着不肯透露出来，但又不得不将一切都慢慢地公开出来，因此就显得格外的谨慎小心。“到目前为止，这案子还没有一位绝对的领导人，也没有计划。”我道。

“我宣布：莉迪亚不再是这个房里的指挥人，因为她是海关的人，凌晨三点她就得滚蛋。情况的发展海关方面还蒙在鼓里。”布朗道。这就算是诞生了一项新的计划。“你和这些担任秘密行动的人，我们故意不同你们发生联系，为的是让你们将任务完成得更棒。”

故意不联系，那才叫有趣，这不是正在这儿谈天吗？我心里暗暗问自己。

“但是还有许多事要做，得跟中央情报局在巴拿马的特工取得联系，还得跟中央情报局在玻利维亚的特工取得联系，甚至还得落实那位该死的飞行员……总之，我告诉你们，这项计划必须在最后两小时前形成。我们已给了你们四十八小时了。”布朗道。

斯科佐上次谈话好像有许多奇怪的消息，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我不再是个配角了。我接着便重复了斯科佐最后一次在电话里所谈的一切。“这次调查，”我道，“我已尽了力了，计划上所有内容都已传达了，并且正在执

行。”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市朗道，“让你去那里呆了这么段时间是不对的，他让你受委屈了，他也是迫于压力。希望你们二位能合作完成这次任务。”

“我直说吧，我们已决定了。”话到了嘴边又让咽了回去。我想说：我们将要求稽查处对此事作全局的调查。

“我恳求你放弃那个决定，”布朗不安地说，“我希望你别那么做，我求你再给我们二十四小时。”

我觉得这家伙有些可悲，我感觉到真正破坏“一箭三雕”的罪人不是他，也不是斯科佐，而是有个更大的后台老板。真正应该受稽查的是缉毒署、中央情报局和司法部的那些诋毁这场毒品战争的个别实权人物。谁能去向他们喊冤呢？谁能去告他们呢？

“这桩案子不仅既无领头的，又无计划，而且我和我的伙什都处在危险境地中。如果我错了，就让缉毒署来调查我，看看是否真错了！”

“我劝你别为了这事而那么做：半小时前，有位上层人物打电话来，我们向他解释了计划中要派一架飞机去接三位墨西哥人时，他说：‘你那些该死的人在替谁打算？’”

“自我来这里之后，也第一次听说有关计划问题居然掺杂个人的感情问题。”我谎称道。

“那是那个线人在捉弄你。”布朗道，说着又把话题转到那份计划上来，“他曾把这事、那事、还有其他许多事都怪罪于你，阿尔贝特后来还为你辩解呢。”

我真感到有点恶心，卫腊捉弄我？这可不是怪事。斯科佐为我辩解？这是屁话。

“你明白，贝尔，我可不需要什么人为我辩解，我自己足以为自己辩解。”

“我们在谈三个不同的国家。”他接着道，“我们在谈墨西哥、巴拿马、玻利维亚三国的最高领导层，在谈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如此热衷于本案的发展，为什么美国海关情愿出两百五十万美元，而缉毒署不愿出太多的钞票……。”布朗在那里毫无边际地闲聊个没完，最后终于又把话题转回到这项计划上来，“这是我们许多计划中最完美的一项计划，就是失败了，也是一部生动的教材。”

一项失败的计划也是一部生动的教材，这可是只有毒品战争才有的概念。

“我将参加这次秘密行动。”我终于毫无顾忌地道。同布朗和斯科佐在一起呆了一星期，像是受了感染，我的敏感度明显减弱了，于是便作出了既可笑又毫无逻辑的陈述：“但是，我要落实一个替补人员，也就是说，不仅要采取适当的行动，而且要他有清醒的头脑，不准酗酒，不准语无伦次地唠叨个没完。我不信任这家伙（指斯科佐），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得让莉迪亚负责监督酗酒之事，你负责监督CI（指卫腊），同时CI也可以监督你是否酗酒。这些话都是他们跟我谈起的。我并不想在此指手划脚地责备何人酗酒等等之事，我之所以跟你讲这些话，是因为我知道有人喝了酒。要知道，现在你请我去执行的任务要冒很大的风险，说不定是要掉脑袋的。”

最后我让布朗向我保证，在计划执行过程中，不管发生了什么，甚至失败，都得接受这项秘密任务。目前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再拖延和折腾了。他和斯科佐这对庸人终于向我保证，他们完全服从“一箭三雕”行动。

几分钟后，斯科佐羞红着脸走了进来，后头跟着莉迪亚和卫腊。我一把握住斯科佐的手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咱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吧。”此时我甚至又觉得对他有些内疚。接着我们花了足足半个多小时，讨论拟定新的主体计划。咱们之间的帐终于清了，相互打了个平手。

我一边望着卫腊，一边仔细地听他说话，一边又观察着他的神情，揣度着：一旦这个线人的操纵地位被拒绝，他会调转枪口攻打缉毒署吗？布朗和斯科佐的保护伞，那位打电话的“上层人物”似乎此时也失去了作用。我一言不发。天已经很晚了，反毒之战的又一场新战役的计划形成了，我不会再和这些人呆在一起了。

在对计划作大致介绍之后，已是晚上九点三十分，我正式签字出发。

十点三十分，执行主体计划的时间快到时，莉迪亚惊慌失措地打电话给我，说，墨西哥人不会来了，他们起了疑心，在元旦之前他们不会去加州了，不管卫腊如何解释，他都无法驾驭墨西哥人。我无话可说，只是静静地听她说。等莉迪亚说完话，我说：“十分遗憾，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这次行动的一个秘密特工。”

12月23日凌晨一点，卫腊到我的房里，他准备上路去机场接门德萨。我让刘易斯和加纳留神。卫腊好像全然不知这事已翻车了，墨西哥人已不再来这里了，过了节，他们会去加州的。他对此十分肯定，门德萨的飞机两点之后准到。我们计划把这个老头带到我的房间来，在这里我们给他亮亮这五百万美元的现钞，因为已延误了时间，我们怕可卡因再运入美国也已失效，所以我们在节日之后再开始新一轮谈判。

凌晨一点三十分，卫腊去了机场，阿尔贝特、贝尔还没把五百万美元运来。

大约到了凌晨一点四十五分，斯科佐、布朗、胡帕领着一位巴拿马籍的秘密警察来敲我的门，我一见这位巴拿马人提着一只皮箱，心里一阵紧张，心想，难道是毒贩子们先动了手？于是我不得不在门上先打了个暗号，等回了暗号，心中踏实，方开了门。斯科佐和中央情报局又一次达成协议，我们可以将这笔资金筹码保留到元旦之后上交。

两点半，卫腊回来了，他说：“老头的飞机晚点十二个小时，”说着奇怪地一笑。为了求生存，二十五年来我一直在从事这项疯狂的事业，时间都用在阿谀奉承别人上，现在卫腊却在围着我转。

两点四十五分，所有的人都在张罗着准备离开我的房间。天快亮了，还不见阿尔弗雷多·邓肯的人影。我问斯科佐到底怎么回事。“狗的一定是睡过了头。”斯科佐道。求生的本能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它像是一种刺耳的警报。为什么缉毒署驻巴拿马的全权代表对此总是离得远远的，深怕惹祸呢？

折腾了一个晚上，这会儿终于能躺下休息了，随手便戴上索尼牌的随身听耳塞，闭目欣赏起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来。我想从思想上抹去一切，静静地睡它一觉。天亮了，晨光透了进来，计划也批下来了，大人们也不知道这里的究竟就开门见山地授权，让我全权负责本案的调查工作。我想我能担此重任。再有什么人想反对也没用了。

我既欢喜又害怕。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似乎有点离奇。此次行动的关键是那位老头门德萨。他被派来这里，是查明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要做的一切是向他澄清，造成这个僵局是鲁曼的过错。如果我能做到那样，接下来就

可以邀请墨西哥人和玻利维亚人一起去拉加拉，举行进一步的会晤。

我只得谎称，因误期，美国海关的放行已泡汤。为了保证我的毒品能安全地通过，我现在只能要求借道墨西哥了。我还要求同墨西哥的“铁腕人物”在我的地盘上进行个别会谈，以确保我的毒品的安全。不管是谁，只要他来我这里就保证付一百万美元的预付款。还要答应向吉荣和阿瓦兰兹支付佣金。

我要求玻利维亚人提供飞行员，让他们整装待发。可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派往玻利维亚去取毒品的飞机、飞行员还都没有落实。鲁曼和门德萨不得不同意跟我去加州留作人质，直到飞机运着毒品安全返回，到时候我会付门德萨两百万美元的佣金。所有这一切要求，他们似乎都无法拒绝。

当然这一切行动都得在那幢已安装了秘密摄像监视系统的房子里进行。最后送他们上法庭，谁也跑不掉。

这项计划的未了，也是计划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必须等我们逮捕了所有人之后，才能发布新闻。这个步骤是：首先我们还得再来一趟巴拿马，逮捕那位洗钱人伦巴多；接着就得通知“雪峰行动”的部队，同时捣毁那些被卫腊、杰克侦察到的玻利维亚毒品集散地；最后才能开新闻发布会。这是整个秘密反毒计划中最有力、最有攻击性的一着。所有的被告将被指控非法囤积、买卖和运送十六吨的可卡因。“一箭三雕”虽未能彻底粉碎贩毒集团，但是它至少并没有一败涂地。

更绝的是，整个计划都受我的支配，不管什么人或什么原因，想反对甚至破坏这次行动都已无济于事了。如果缉毒署、中央情报局其他别的什么人现在还想扼杀“一箭三雕”，他们必定就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那样就会露了他们自己的马脚。有的事他们永远不敢于，因为现在一切全操在我的手上。下面得轮到艾菲尔·门德萨·杜那兹和路易·冈萨雷斯出场了。

一大早我打电话给斯科佐，通知此事并且对我的这项计划作了安排。他对此事相当理解，强打起精神，显得十分的清醒，为确保那笔资金的安全，也显得十分地卖力。他不但不反对这项计划而且十分理解，这是十分可喜的。这也表明了他不是敌人，只不过是故意装疯卖傻去应付他的那些上司。

下午一点，卫腊来到我的住处，准备上机场接门德萨，我再次提醒刘易斯和加纳格外地留神。再导演一出新的好戏，对卫腊来说应该是毫不困难的事。但是他却显得十分的呆板，好像有些担忧，想反对这项计划。我耐心地听着他的不同意见。他谈的尽是一些模棱两可的废话，意思是，他同斯科佐、中央情报局也能侥幸办成这事。

对把玻利维亚人和墨西哥人安排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碰面，卫腊好像显得尤为不安。他的反对不仅是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进行，恐怕这里头还暗藏他自己的小算盘。这本帐非同寻常，他可是一只不纯的 子。

下午一点二十分，卫腊紧张而不快地离开了我的房间，去了机场。过了一会儿，斯科佐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带来了五百万现钞。我们就在房里策划好，让刘易斯充当我的侄子，介绍给门德萨。我坐着，静静地恭候老头的到来。

突然我房间的电话铃响了，我一看手表，是下午一点五十分。

“我们发现目标了。”卫腊的声音显得格外的紧张。

“他的脸色如何？”我问。

“阴沉着脸，显得十分的紧张。”

“带他去菜馆，我马上就到。”

过了会儿，我走进菜馆，看见卫腊正毫无表情地在陈述什么。那老头脸色苍白，像一架钢琴被拉紧了所有的琴弦。不等他开口讲话，我就在他的边上坐了下来。

我对自己的组织采取偏激的行动向他表示歉意，接着便重复了我给鲁曼讲过的事。“这是一切的起因。”我对他说，“当巴拿马警方在机场对我们进行搜身并投以怀疑的目光时，如果鲁曼站在边上又会发生什么呢？”我相信这事马上就会引起门德萨对鲁曼的不满。

“警察问我们上哪儿落脚，我回答在马丽奥特，我估计他们会去那里对我们进行调查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的人坚持要呆在那儿，让鲁曼去那儿同我们联系。”

在他讲话之前，我先用鲁曼这张王牌压他一手。“在我动身时，著名的银行家曼诺尔对我说，这事十分奇怪，问题的焦点只是在钱货的交割过程上。我也觉得此事有些怪。”我立即意识到一切，他已同军事强人诺列加私下会过面了。

门德萨终于有点憋不住了，那张瘦长的脸充满着愤怒。“你是对的，路易。”他僵硬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恼怒，“此人对我们交往显得格外小心。你没错，你还不了解他。贾杰干了不可饶恕的傻事。”

“这就没事了。”我对他道，“我原指望在圣诞节将可卡因运入美国。我们同海关约定的事已不再起作用了。”他衰弱的神情看上去像肩负了一个沉甸甸的世界，现在他终于可以把这副重担从瘦骨嶙峋的肩上卸下来，喘口气了。

“但是我想咱们还有一线希望，一次性了结了这笔生意。”我看见他的脸浮现出了希望的笑容，便继续说道，“来我的房间，咱们再好好谈谈吧。”

刘易斯就像“迈阿之音”里所讽刺的那种等情人的“灯泡”，站在大厅门口恭候着，迎候我们去我的房间。门德萨一进门，便朝放在角落里的两只大皮箱先瞥了一眼。

我开门见山地跟门德萨谈了我的打算。“我的兄弟，”我开口道，“如果你能将大伙儿都带去圣地戈碰面，大家坐在一起将这桩买卖给了结了，这样也少一点误会和猜疑。”我表示跟他谈完之后就亮钱给他看，他高兴地笑了。

“但是我有两个条件必须跟你谈清楚。”我加了一句。

“噢？”他开始仔细地观察起我的神情来。

“首先，这五百万我要换两吨可卡因的货，而不是一吨，当然另一吨的货款我会等飞机安全回美国之后，再补给你。”我突然增加了这个条件，是为了印证我便是鲁曼所称的精刮鬼，“第二个条件是你和贾杰都留下来，作为我的客人陪陪我，等飞机安全地从玻利维亚起飞再走。”

门德萨的脸上慢慢地露出了笑容。“当然，”他道，“我们会乐意去那里的。”我心想他已跑不掉了。

卫腊突然插嘴道：“可以给他看钱了吗？”一面说着一面朝两只大皮箱呶呶嘴。不管老头是否愿意看这笔钱，在亮钱这个问题上，卫腊是违背了斯科佐的主张。我知道一个真正的贩毒人到了那种份上根本就不在乎这档子事，只有缉毒署最拿手这档子事，才会别别扭扭地作出让步。卫腊说着将我拽到角落里。

我朝彼萨罗点点头，他便将两只大皮箱“叭”的一声放到了床上，又“叭”

的一声将它们一齐打开。这位瘦弱的墨西哥人惊呆了。这么一大笔货款，五百万美元哪！全是一百美元一张的大钞啊！

“这些你先瞧瞧，我们可是个大客户。”我说话的语气显得有些僵直。

门德萨盯着我，心已在怦怦直跳，汗毛都耸将起来。“你不必那么做。”他说着走向门口，要告辞离开。他心中断定这百分之一的回扣是不成问题的，决不能让这事吹了。

“对不起，”我道，“到现在我们在这里呆了那么多天，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我理解，路易。”说着话我们一起来到了走廊上，一直朝饭店的前厅走去。在饭店大厅门口的遮雨篷下，我们默默地相视了好一会，他终于道：“路易，你的条件能被接受，我保证。”

卫腊将那辆十一月份就被我租来的西德拜尔轿车开了过来，停在大厅的遮雨篷下。我望着老头钻进车，带上车门离去。我把手上的牌都亮完了，看来门德萨会帮我这个忙的。但是我还是不能确定，只好着急地等着卫腊回来。

大约下午五点光景，卫腊电话来报：“你又赢了。”据卫腊说，门德萨见了鲁曼像发疯一样。老头憋着的这口气，见了鲁曼统统发泄了出来。可怜鲁曼不得不背上了这口黑锅，于是他们加紧筹划成交的事。不光那样，门德萨还打电话给墨西哥，让墨西哥一方面制定计划，一方面准备邀请我或者卫腊飞往墨西哥，去查勘我的飞机着陆、加油的地点。

这似乎真有点神奇色彩。总之，“一箭三雕”还有旺盛的生命力。

第六章 圣地戈巧布天罗地网

我一回美国，就接到了好些电话，都称颂这项“灿烂”的计划。问德萨的反应正像我所预料的那样，为我组织好了一切。他竭尽全力地工作，确信双方在巴拿马那段对立的插曲，都是因为缺乏生意上的信用而引起的误会，并且决定来圣地戈赴约会。

整个过程是门德萨、鲁曼、瓦加斯再加上拉公司一名还不知名的飞行员从玻利维亚赶来，这名飞行员听门德萨讲起过，他从前驾机来过美国。他们四位是来要这五百万元钱的，然后再替我的飞机领航去玻利维亚，提走这第一批成吨的可卡因。当然门德萨、鲁曼都得留在加州作为人质，直到可卡因交易成功为止。吉荣、阿瓦兰兹按我的要求，还要带另一些墨西哥军队的“高级将领”来。这笔总共一百万美元的佣金，其中有六十万是孝敬墨西哥军方的，作为军队保护满载可卡因的飞机能在墨西哥境内加油的酬金。这些赴会人，管保来得去不得。

据胡帕和斯科佐说，毒品侦缉署现在也已孤注一掷了。

“一箭三雕”现在真是活跃透了。如果说在圣地戈已布下了天罗地网的话，那么接下来缉毒署和海关就要让我们去打击拉公司的核心，逮捕巴拿马洗钱人伦巴多。还有许多的大人想破坏此案，因为它仍然威胁着他们的偶像——“雪峰行动”。他们有他们的打算，我有我的打算。在外要同毒贩子作斗争，在内要对付缉毒署党

羽间的争斗，然而我更害怕的仍然是党羽间的争斗。秘密行动不仅仅是毒品战争的执行工具。我作为一名行动组的监察，现在正连续不断地投入一个接一个的秘密行动。要知道，这个表面上温文尔雅的机关派出的那些特务，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真是无所顾忌，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我就已经吃过一次苦头了。

我正不断地在影响着那些大人，使他们也产生了必胜信心，毫无理由再去畏惧“一箭三雕”，案子已在呈现出使他们感到最满意的格局。这不再会使他们的偶像——“雪峰行动”遭受什么风险。谈到“雪峰行动”这场伟大的毒品战争，自然是以“胜利”告终，大人们将会听到新闻界、政界和公众的欢呼声。

另一方面，我也要使案子的结局更圆满些，规模更浩大些，让大人们出乎意料，甚至能摧毁那帮势利的党羽，这才是我计划中要达到的目的。

1988年1月3日，艾菲尔·门德萨将一切都张罗停当了。他会同赫克特·阿瓦兰兹和帕罗·吉荣，让墨西哥的一名将军波班·席尔瓦同意提供在墨西哥普韦布普省让出一条通道来。只要盖上萨尔瓦多·德拉维加上校的军用图章，运可卡因的飞机就能保证顺利地着陆，能在墨西哥士兵众目睽睽下加油，然后飞往美国。这些服务居然要价一百万美元，这些钱将完全被纳入将军个人的私囊。更具戏剧性的是，有位乔吉·卡伦萨上校竟是墨西哥前总统梵纽斯蒂诺·卡伦萨的孙子。众所周知，梵纽斯蒂诺·卡伦萨是墨西哥宪法的起草人，在墨西哥算是了不起的一位巨人。

老头通过电话同卫腊和尤瓦乔取得联系，他们二位现在全天二十四小时都守候在那幢秘密别墅里。在电话里，老头说，他已在去玻利维亚的路上了，一到那里就会去联络贾杰·鲁曼、玛利欧·瓦加斯和拉公司一位头面人物的飞行员，并同他们一起前来圣地戈。与此同时，对那位在巴拿马有银行账户头的玻利维亚人巴图·皮萨罗的调查也在进行着。据玻利维亚方面报告，此人

很可能是活着的最有实力的毒梟。对于谁是世界上最大的毒梟，争论不一，大多数新闻媒介更相信，能够当得起这份“荣誉”的应该是著名曼德林卡特尔中一位或几位奥克哈兄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不可否认的是玻利维亚人为曼德林卡特尔提供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可卡因精。正是这位皮萨罗控制着这些百分之七十或八十的可卡因精。

我立即意识到，尽管我们还不能直接得出结论，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充分地掌握了墨西哥将军席尔瓦和这位玻利维亚毒梟皮萨罗相互勾结的事实与情报。

还没有一名秘密特工敢直截了当地夹在这两股势力的中间说长道短，只有卫腊敢到处撒谎，毫无顾忌。他的话毫无依据，就是再年轻的律师也能看出破绽来，很容易地将它驳倒。如果将他说的一切记录下来，就会叫那些玻利维亚和墨西哥大亨们都笑掉大牙，尤其是墨西哥这一方。

美国政府对墨西哥政府的态度，就如同国务院、司法部长米斯以及所有的头面人物和政客所说的那样：我们两国的关系特殊，墨西哥是我们毒品战争的通力合作者。有了这个头衔，在近几年里，墨西哥就得到了特别的贷款、捐助、反毒基金等等，加在一起达几十亿美元。少数政界人士、高级官员们称这是一场胡闹，他们在新闻媒介撰文，认为墨西哥军队、警察和政府的内部存在着“一片腐败”，甚至包括参与贩毒。

墨西哥政府则反驳所有的这种指责，要我们“拿出真凭实据来”。

这场宣传战中，喊得最响的那位就是海关总长冯拉伯，他曾受到议会的批评，说他的论调是毫无根据的。等海关方面称其为“军刀行动”的“一箭三雕”逮捕了那些墨西哥人，那就有好戏看了，这场争斗会牵涉好多人，到时候就热闹了。这场牵涉斯科佐、布朗和缉毒署的巴拿马闹剧的起源是冯拉伯。我猜到最后说不定会一直捅到总统那里，到时候只有总统的电话才能出现神奇的效果。

我记得墨西哥警察是如何“逮捕”秘密缉毒特工柯克·卡玛利纳，又如何“审讯”他，然后活活地将他毒打致死的。记得墨西哥最高官员一面笑脸相迎缉毒署的官员，一面又帮助杀害卡玛利纳的凶手逃离墨西哥。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能亲临这场向那帮杂种们讨回血债的复仇中。我们用各种方式记下了这一切，记下了这位墨西哥将军的贩毒事实。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啊，怎么也抵赖不掉的，而这项计划就是获得这一事实的最好途径。

这项计划也是让皮萨罗和拉公司的其他成员包括鲁曼在内的一切统统完蛋。我们要录下他们密谋将成吨的可卡因运入美国的谈话。现在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元合在一起，他们再也逃脱不掉这个天罗地网。

还有一位我不能忘记，那就是巴拿马洗钱人伦巴多。从门德萨和鲁曼的介绍里，从他说话的西班牙口音里，我可以肯定他是位玻利维亚人，因此就可以将他从巴拿马引渡过来。我力求取得圣地戈缉毒分署和美国司法部联合签发的国际逮捕令，并报美国国务院备案。那样也许伦巴多就会被缉拿归案，等他清醒过来这是场骗局时，早已从巴拿马被骗到美国了。

斯科佐和胡帕向我报告，他们已同巴拿马的邓肯联络过了，伦巴多早已在严密的监视之中。

他们告诉我，巴拿马毒梟头领“伯莱克摩上校”曾告诉他们，伦巴多是个“骨干分子”，为了一些买卖上的事他曾和伦巴多一起合作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完全合乎逻辑。邓肯曾告诉我，正设法在伦巴多的电话里安上窃

听器。必须让他们搞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记得上次在巴拿马夭折的行动里，鲁曼跑到伦巴多的套房里去打电话，也是在这个套房接到了拉公司打来的所有电话。在巴拿马的一些地方，只有录下谈话的重要内容，才能打探到拉公司内部的情况。我想伦巴多的被捕，也许是整桩案中最富有积极意义的部分。

因此当斯科佐说在圣地戈大逮捕之后我和尤瓦乔有必要立即飞往巴拿马查明伦巴多的身份时，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忽然，我的耳边响起了卫腊的声音，他又在那里重复着玻利维亚人提过的事，说，巴图·皮萨罗的巴拿马的银行户头受诺列加的保护。如果这一切是真的，又怎么能寄希望于巴拿马能够帮助咱们逮捕这个公司的主要洗钱人伦巴多呢？这似乎不合逻辑。卫腊还夸张道，逮捕伦巴多是件特别困难的事。他说，伦巴多在中央情报局有靠山，尤其受到一些秘密机关或其他组织的保护。这事巴拿马特使邓肯也曾提起过。伦巴多的名字在我的头脑里盘旋着，他是这个案子的核心。

最终的一步，也是关键的一点，在行动中必须保守秘密。这是最重要的事。在这次会面以后，玻利维亚人相信，可以笃定等着飞行员杰克开着飞机、带着卫腊和五百万元钱去玻利维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将第一批成吨的可卡因成交了。只要我们能够创造一种确实可信的环境和气氛，将五百万元钱、飞机和飞行员按要求圆满地备齐了，并准备飞往玻利维亚。他们会同玻利维亚再进行最后联系的。几乎可以肯定，到最后的一刻，他们会通过电话或电台与拉公司取得联系的，甚至兴许会同皮萨罗本人直接通话。这样就有机会录下这些谈话。照我的想法是，让他们自觉自愿地那么干，顺水推舟才不会出乱子。我们大家接着要干的，就是将他们统统软禁起来，封锁一切消息，至少等两三天之后，才向新闻界透露。那样我们才能赢得时间，确保“雪峰行动”的军队将士们最终有效地到达玻利维亚，让卫腊和杰克有时间对森林的那些目标进行空袭。那些拉公司的会员就等着束手就擒吧，那些种植地就等着被扫荡吧，这也为我和尤瓦乔去巴拿马逮捕伦巴多争取了必要的时间。

1月4日，胡帕打电话到纽约告诉我，鲁曼在玻利维亚来美国签证被拒绝，但是还好，门德萨带他去墨西哥，在那里获取了签证。“难道我们没有为此和大使馆的有关部门打过招呼？”我问，“不是已打电话给大使馆，让他们给鲁曼办签证嘛。”我在海外工作多年，一个缉毒特工想要安排一次签证，十分方便，只需打个电话就成了。一个活着的最大的可卡因贩来美国就擒，居然还不予办理签证，真是笑话，只有在电影里才见过。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这种事真是既可怕又可悲。胡帕同往常一样又没作答。我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

“这不打紧，”他道，“门德萨把他带去墨西哥了。我们就在边境上等着，向他挥手示意吧。”

挂上电话后，我本能地意识到，大人们幕后一定有什么肮脏的交易。想到这里，就又打电话给胡帕，他作为案子的代理人，安排好秘密工作的日常事务是他的职责。

“听着，哈伯特，”我一拨通电话就听出是他的声音，“自从听了你同我谈的那事之后，我想了很多。”

“你说吧。”

“真的，许多重要的情况我们得落实。”

“是啊。”

“首先，得跟美国司法部谈谈，能否在秘密房子的电话里，安上窃听器，我们之所以要那样做，是为了在那些人给他们各自国家的后台老板打电话时，取得一些情报，假如我们窃听到了鲁曼和皮萨罗的通话内容，那么他们的任何借口都会在窃听器里反应出来。”

“嗯。”

“如果你没在电话里安窃听，我可以说不，要是那位将被扣留的上校打电话给将军或者别的什么大人物，我们就失去了对方的第一手证据。”

“对。”

“你听清了吗？这是相当重要的。在罗伯托·苏亚雷斯案中，我碰到过类似情况。他从玻利维亚打电话到迈阿密我的秘密房子里，我同他谈话时，他的得力助手就站在我的身旁，察颜观色地望着我的脸，我根本没法记下那些对话。当时就因为没人想到在电话里安窃听的事，我们失去了这些原始对话资料。所以我说这次要吸取上次的教训。”

“喔，喔。”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他道。然而我还是不放心，不断地坚持要在那幢秘密房子里录下所有打来的电话，怕我们将会失去第一手证据，从而失去控告巴图·皮萨罗和席尔瓦将军的机会。

胡帕答应去美国司法部长助理保尔·狄保罗那里提出这个请求。接着他又告诉我道：“从墨西哥方面最新的电话报告看，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墨西哥人已万事俱备，就等着过境了。他们对此正在紧张地张罗中。

“太好了。”我道，“我和我的‘侄子’刘易斯·彼萨罗过两天就动身去那里。看起来这事不能就这么简单地走过场，得好好地合计合计。”

挂上电话，我就找刘易斯谈，告诉他，让他再作一回“见证人”，以争取主动。“我们又得去干些绝密的差使了。”我对他说。

我们订好了1月6日飞往圣地戈的机票。我所期望的是，去那里能让这位“见证人”尽可能地了解事态的发展，我总觉得这一点变得尤为重要了。

1月5日，当我一走进纽约的办公室，就得到斯科佐捎来的简单口信：别去了！我赶紧拨通圣地戈的电话，一会儿这个说话慢条斯理的加州佬来接电话了。我觉得自己的牙齿在那里咯咯地打着颤。

“噢，门德萨动身迟了，这会还在去南方的路上。”他又开始用那种可笑的腔调道，“盯梢的人说，门德萨今天才从墨西哥动身去南方，因为那家伙还遇到了签证问题。当然，那事可以解决。我们已带信给那家伙，让他去墨西哥，我们会让他入境的。”

斯科佐说，他不想让我“呆呆地闲着，坐等他们那些家伙的到来”，等到他们确实出发来美国了，他会电话通知我的。

“我不会闲着的。”我道，“我们还可以利用时间，对整桩事再来合计合计。”我和刘易斯已订好明天的机票了，我去那里，难道会破坏“一箭三雕”的计划不成？斯科佐最后只得同意了。我和刘易斯明晚就能到达圣地戈了。

在挂电话之前，问起斯科佐有关电话窃听的事。他说别墅正在安线，为了能在屋顶上窃听并录下所有的电话内容，“我想还应该装个报号器。”他道。这种报号器，能将对方打电话所用电话的号码自动读出来。

“不”我们需要的是套‘三号’窃听器。”我道。心想怎么那么奇怪，

他应该了解，这只是基本的常识，它是所有的缉私行动甚至一般的刑事侦察中都必需的基本工具。

停了好长一会，他说：“我同意你的意见。”

我挂上电话，可心里总是不踏实。我有一种预感，接下来的这几周里，我得为此付出代价。

1988年1月7日，我又回到了圣地戈，同来的还有我的“侄子”刘易斯。我们一到就参加了系列计划部署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海关和缉毒署两个总部的官员。海关的特工们几乎都有些狂热和激动，冯拉伯总长本人也情绪高涨地期待着案情的每一步发展。墨西哥宪法起草人的孙子也动身前来圣地戈，准备接受贿赂，看美国议会现在怎么解释？难道这还不够证明墨西哥人的腐败吗？野心勃勃的海关特工们早就梦想着承办这类案子了，这会儿他们正像一群饥饿的鲸鱼，乱纷纷地相互争抢着这桩要案。

我们到圣地戈的同一天，也就是1月7日，计划部署会议召开这天，“一箭三雕”行动组的人从四面八方聚拢来了。其中有吉姆·罗斯、阿尼·吉拉多、阿尔伯特·斯科佐、哈伯特·胡帕以及刚刚又被提升的莉迪亚·苏托。到现场来的还有海关和缉毒署在圣地戈的现任头目，海关方面是凯恩·英格列斯贝，缉毒署是查理·西尔，还有好些人我都记不清了。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提出了一些要求：

1、三号窃听器必须安装在拉加拉的那幢房子的电话里。

2、五百万美元的诱饵必须准备妥当，使玻利维亚人确实相信，让他们直到最后的一刻都认为这桩交易是真的。

3、秘密专用飞机必须随时都停在圣地戈的机场里，玻利维亚人会按着要求作为例行公事处理的，拉公司只有敲定了一切，才肯同我们进行交易。这样，他们在巴拿马的所作所为，大家就不感到有什么奇怪了。

4、准备好那架专用飞机也是为了便于我和杰克、尤瓦乔、卫腊在圣地戈大逮捕之后即刻飞往南美。第一站，要到巴拿马逮捕伦巴多；第二站，要去玻利维亚攻打拉公司。

在海关举行的那次部署会议之后，发生了一件打乱计划步骤的事。吉姆·罗斯给我看了一份巴拿马行动报告，上头列出一条行动失败的理由：“是玻利维亚毒品走私者提出无理的要求。”

“这是胡说！”我说着将报告搁在他的面前。胡帕和刘易斯正好也在场。“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毫无根据。”我又重复了一遍，彼萨罗肯定听见我清楚响亮的回答。我接着又道：“行动失败的真正理由不在于我们所干的一切，而在于强迫我们使用马丽奥特大酒店。”胡帕和罗斯都没有作任何评论，脸色通红。他们脸部的表情已足够表明这内幕的复杂，我有什么好自相惊扰的呢？海关的意见我只当儿戏，根本就甭去重视它，我只听从缉毒署的号令，现在甚至可以不再相信他们所说的是实话。

谁不想在电视屏幕上博得美国公众的喝彩呢？

这标志着另一个有趣的事件正在孕育之中。回想起去年九月，我第一次遇到卫腊的时候，他对缉毒署评头论足，攻击缉毒署腐败透顶。现在看来，这些评论不仅一针见血，而且这种现象相当普遍。这一点，包括加纳和刘易斯在内去过巴拿马的我们这些缉毒署和海关的特工们，几乎都有同感。

“我根本就不信任迈阿密缉毒分署，”记得卫腊当着满屋子缉毒署与海关特工的面，那样说道，“整个分署都在受贿，我就亲自塞钞票给他们。”

他还讲过，缉毒署特工穿着如何考究，开的尽些高级豪华轿车。

我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奇怪的立场上。我十分地相信毒品侦缉署的腐败，但是这和卫腊的立场有所不同。他认为整个缉毒署都在接受贿赂和贩毒，而我则认为大人们是在向美国公众撒谎，来无休止地积累机构自身的财富，盲目地上项目，当然这是他们的本分。他们为了千方百计地接近新闻界就暗暗将一切押作赌注，希望赢得他们个人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他们提出众多的理由，只是因为一旦毒品战争取得了胜利，那就等于被解雇一样无所事事。

我真要气疯了，我计划好的一切又被他们这些混蛋全给搅了。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因为相信他们，所以我总是任他们摆布。我要做的只是收集每一次行动的文件资料，希望有一天能够用上这些资料。卫腊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这些奇出怪样的故事。

缉毒署对这些揭发腐败现象的言论，有着非常严厉的规定。一个特工听到揭发别的特工腐败的言论必须立即将它整理成书面的报告，这是他的本职。在我接手此案之前，卫腊早就作为线人在本案工作了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是海关和缉毒署的特工仍旧丝毫没有阻止他讲述那些奇出怪样的故事。我猜想，一定有某些人已写好了正式书面报告，唯一没有成功的原因是，那些报告还未敢呈上去，生怕调查会捅出漏子来。

可是，我不怕调查，相反我渴望调查。几个月来，各种居心叵测的政客们正开始对“一箭三雕”和“雪峰行动”分别进行单独的调查，我已被他们所戏弄。这些政客咋会信我呢？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报纸上撰文，一个劲儿地支持“雪峰行动”。谁又真正知道我计划的这项行动更富有特殊的意义呢？我可以断定那些文绉绉的家伙们袖口里藏着的那些东西是什么。但是要我去证实那些东西，实在是太累了。我有足够的勇气去同我所在的机构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卫腊的言论突然给了我一个启示，那就是我可以用这些奇出怪样的故事去开展一次调查。

傍晚时分，整队人马都聚集在拉加拉那幢别墅后门悬崖边的空草地上，开始排练这场秘密行动的细节。在场的除了我和卫腊、罗斯、胡帕、刘易斯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人员正在摆弄着摄像机和录音设备。时而有些其他有关人员在那里进进出出。等我们开始以后，胡帕告诉我一个坏消息。

“总部不肯出五百万美元作为诱饵，”胡帕道，那股神情像是在回避我的样子，“他们说，只需一百万就足够了。”

“太妙了。”我道。大人们终于公开地反对“一箭三雕”，这对我来说早就见怪不怪了。他们仍然怕它声势太大，下不了台；怕这个不肯循规蹈矩的麦克·列文将损害他们宠爱的心头肉。所以，他们在演出开始时，就来拆台了。

“他们也不再提供什么秘密专用飞机了。”胡帕道。

“我想干的事他们都想到了，在那里堵我的后路，让我如何打进去？如何飞往玻利维亚去？……还听见什么更好的消息了？”

他笑了笑：“没有了。”

我没有其他的法子可想了，只能就此罢休。门德萨早些时候打电话给卫腊，提出的要求正好对我们有利。他说，玻利维亚人和墨西哥人不能相互碰头。老头也许怕这两国主要犯罪势力的最高头目相互碰头联合，反而削弱了他本身的力量。目前他是唯一的认识两股势力的中间人，他要使这种关系保

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微妙的细节很容易让人猜到。要这样，就两股分开碰头，将他们一股一股地抓起来。我计划先“款待”墨西哥人。

我们排练时就把上校的位置正对着隐蔽的镜头。各种各样的话题都得考虑到。为了引诱他们说出更多的有关墨西哥人腐败的内幕，我们大家都去一流的表现学校，专门进行人物性格方面的培训。我工作得就像一名专业演员一样，真还可以领略一番当导演的滋味。我建议请求上校打电话给将军，说，“一切已敲定，没有问题了”。录音带将录下起诉墨西哥高级指挥官无可辩驳的证据。这时卫腊在一旁表示反对。

“假如他们察觉苗头不对怎么办？”

罗斯点点头，表示赞同。

“这有什么不对的呢？”我道，“事已至此了，我劝他打个电话。我们掌握的口供足以证明他在这项阴谋中有罪，如果引起他怀疑，那就逮捕他。”

这事没有再往下争论。但是，卫腊的反对，足以使计划再遭搁浅。这事也无逻辑，也许本身就没有逻辑。我注意到，每当我一提及将军，卫腊的神情给我的印象，就像一只守候的警犬一般。过去我在空军时，也曾遇到过这档子事。他不定就是颗定时炸弹，在收网的最后时刻再同他算总帐吧，假如这个心怀鬼胎的畜生在他的袖管里真的隐藏着什么花头的话，到时候就会水落石出了。等那些墨西哥人离开这里之后，可以想象，他们在驾车回边境的路上就会被捕。接着，我们就可以在那幢秘密别墅里上演第二场戏，款待玻利维亚人的到来。

款待玻利维亚人的这场戏更要耍些花招。他们还会带来一名飞行员，以作为杰克驾机去玻利维亚时的领航员。对付他最妙的手段，就是咱们也找一个飞行员，在镜头前讨论一下这趟飞行的航线。已通知飞行员杰克在不久的将来任此角色，这对我来说真是棒极了，玻利维亚人早见过他了。我们款待得越是周到，他们聊得就会越多。

还有一个问题要我们克服，那就是钱的问题。谢谢大人们居然还肯出一百万美元，这就可以拿给玻利维亚人充数了，希望他们没有看出破绽——这些钱不足五百万。通过巴拿马的较量之后，我肯定，鲁曼不会一点疑惑都没有，因而他也就不会最后再打电话通知玻利维亚，说，一切就绪了。这样看来，我们也就失去了巴图、皮萨罗或公司其他要员的电话录音。我们所有的机会只有集中到军队攻打玻利维亚身上了。但我还有一个计划甚至连那些大人也无法制止：我是放高利贷者的儿子，我知道怎样才能将一百万看上去更像五百万。可怜的鲁曼已站到同我相反的立场上去了。

我计划里还有刘易斯·彼萨罗，门德萨在巴拿马也见过他。等把钱亮过之后，将他们的奶也在镜头前给挤完了，就让刘易斯带着一百万送那些玻利维亚人去机场。我会对鲁曼说，为了节省时间，钱已备齐，有部分放在飞机的机舱里了。在离开别墅之前，在镜头前，他会点清这一百万美元的。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希望能多骗他一些时间，至少能够保证我们打电话……，因为这是他在世上最后一次作为自由人，要准备上路了。

我是专干秘密工作的，具体的逮捕计划就不涉及到我，那是由缉毒署和海关的监察们联合制定的，是对是错都赖不上我。只有一件事他们通知我，执行逮捕这两路人马都得在秘密别墅外一定距离处进行。

快近子夜了，门德萨打电话来，是卫腊接的，这个墨西哥黑帮的执法人终于到了玻利维亚，并带那些玻利维亚人去了首都拉巴斯，为签证的事再去

碰碰运气，他们去了两趟大使馆，都被拒签了。老头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

卫腊建议他去墨西哥，然后从墨西哥偷偷过境来美国。在这桩几百万美元的可卡因交易中，老头似乎不喜欢冒太大的风险，只落得个非法入境而被捕的下场。他话语里流露出有些不安，最后说，如果他们真要那么干会再打电话通知的。

“这我就不明白了，”我对胡帕道，竭力压住自己的火气，“你不是说，有关方面已同意让他们过境嘛。”

胡帕看了看卫腊和罗斯说：“那也是听来的。”

他那样儿我就够明白了，那又是卫腊在胡言乱语。这是为什么？更重要的是，罗斯知道他在撒谎吗？

“我的哈伯特啊，”我道，“我告诉过你，得电告玻利维亚缉毒分署，让有关方面立即给他们签证。”屋子里静悄悄的，我真是厌恶透了。斯科佐在泰国呆了那么多年了，他总该明白一切吧，有许多的信息管道可以通往玻利维亚的，可以将发生的大概情况告诉有关方面。再没有经验的特工也能拿起电话，通过电话把签证的事给办妥了。胡帕事先没有告诉我墨西哥人将要过境的事，本来我也可以打电话的。

1月8日这天，我一直在等着卫腊。上午11点钟，他打电话到我房里告诉我，他已接到口香糖吉苏斯从玻利维亚打来的电话，说门德萨、鲁曼、瓦加斯和飞行员在早上五点已动身去巴西的圣保罗，还说，等到了那里会再打电话通知秘密别墅的。

我注意到卫腊曾说过，前些时候，他打电话给门德萨，说他们已向里约热内卢去了。我也不想点破他，现在还不到火候。

卫腊又说，他已打电话给墨西哥的赫克特·阿瓦兰兹，已告诉他说，我们付钱给将军的期限定为星期一，也就是1月11日。“将军已决定了，”卫腊接着道，“为了使飞机着陆不受检查合法化，采取封锁道路的办法。为此将军命令要重新铺设一条长达二英里半的路面。”

“那太好了，”我说，心想有多少电话是这个线人随心所欲地编造出来的，没有人知道。我决定就采用这些电话内容来制定计划，有些谎言倒也对我有利。

“你听我说过，罗斯的报告中提到的发生在巴拿马的一切都是‘胡扯’，对吗？”

“嗯，是的！你知道海关怎么对我的吗？他们说：‘这是政治，对此别瞻前顾后，最终我们会将一切都摆平了。’但是他们要这事尽量地处理得圆滑些。”

我同卫腊约定抽半小时的时间，在拉加拉的别墅里面谈一次。刚放下电话，又马上给彼萨罗的房间挂了个电话，我们说定在别墅里碰头。

在别墅里，胡帕、卫腊、罗斯和莉迪亚的未婚夫这位缉毒署的特工汤米·夏普都聚在一块。夏普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一见到他在那里我挺高兴，因为他对行动很有用。卫腊很快看出我写的报告与罗斯的报告完全互相抵触，尤其是在巴拿马我们与鲁曼谈判的那桩夭折的生意上。我的报告十分详细地记载了我们在那间又小又热的屋子里谈话的内容。就是这么一个报告差一点被大人们给枪毙了。我唯一的证人就是卫腊，他在电话里也同意罗斯的报告是“胡扯”，及不上我的报告。我要他当面给我说清楚了，说得越清楚越好，免得他将来再矢口否认。

在训练有素的刘易斯面前，卫腊才到他肩膀那么高。这个又瘦又丑的线人几乎将那二十五页的报告卷曲起来，他读得又慢又仔细，一行指着一行地念着，只是铅笔改动的地方稍加停顿，不时地瞟一眼罗斯。当他读完之后就：“那就是发生的一切。”然后将报告还到我的手上。我看了看刘易斯，随手把报告放进了卷宗袋里。

我们便围坐在一起，相互闲聊着，此时正好是说话的机会。我便绕着弯地说起迈阿密的事来，惹得卫腊又气恼起来。

“迈阿密缉毒分署个个都坏透了，”他道，“我亲自掏钱给三个特工。”

我故意又设个陷阱道：“你敢将这些胡话都写成正式书面报告吗？”卫腊望着我目瞪口呆，似乎我说的话他都听不懂。“我是说，你跟我谈过的这些，写过书面报告没有？你说的那些人是谁、那个部门的官员，能记下来或者进行调查吗？”

“我曾试过，”他说着朝屋里的四位环顾了一下，“缉毒署不感兴趣。”卫腊说，他在俄克拉何马被捕后，曾告诉过缉毒署的特工有关腐败的情况，但那个特工说，对此事不感兴趣。

“啊，我非常感兴趣，”我说着话，拿出一本记事夹来，铺上一张纸。他的脸上流露出令人惊讶的微笑，瞅了一眼罗斯，希望得到支持。但是卫腊并不了解当官的心理。对当官的而言，有人在作反腐败的调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能阻止得了的。“我要确切地知道你了解的有关缉毒署腐败的情况，”我说着，就要做笔记，“要是那位特工拿了你的钱，我可以拿我的人格保证，他们会被送进大牢的。”

屋子里死气沉沉，我慢慢地、井井有条地向卫腊询问了他所知道的每一点情况，至于问得是否详细这不打紧。尽管他说什么还有待于考证，但是至少令人大吃一惊。他说的多半是他同毒品走私者有联系，能从迈阿密缉毒署买些有用的情报；他还说，有一次付了钱之后，又送了礼物；他接着向我详细地描述了三个特工的情况，他有时也搭他们的便车。能得到这个把柄我很高兴，我能将那些品行不轨的贩毒特工送进大牢。以前我就这么干过一次。对我来说，他们是玷污像章的叛逆。但愿卫腊的话是真的，因为戴维·卫腊式的真话总有某种夸大的内容。

对这个报告，我有更宏大的计划，最终我会把它写出来的。我可以用它来逼迫一些人做一次无人想作的调查。我要影响缉毒署的大人们，让他们对自己作一次调查，有些事能使他们永远光彩不起来，如果进行调查，就是他们让位的信号。什么样的腐败也抵不过他们在“一箭三雕”中所干的一切！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对我的报告做出一点什么样子，这就是当官的本性。我得静观事态的发展。

下午三点至六点，在海关总部，召开了一次大型的计划会议。目前的联络组又一次被扩大了，由胡帕、苏托、罗斯、吉拉多组成；行动组由我和尤瓦乔、卫腊、彼萨罗、夏普组成。那一大帮人担任什么角色我也弄不清。

胡帕又有有趣的消息要告诉我。“美国司法部长助理说，我们不需要再安装三号窃听器。他说，别墅已具备能够录下电话的能力了。”

“那种设备不能立即找到我们需要的内容，”我道。尽管我不是律师，但是我生命的大半辈子是在联邦、州、地方以及国外等法庭上度过的。我可以肯定美国司法部长助理一定是搞错了，不然就是胡帕根本就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如此重要的事怎么能让它溜走呢，这关系到能否拿到墨西哥将军

或者公司某个头目的直接证据。

这就错过一次揭秘的机会，或者说是犯了天大的错误。为什么司法部长助理要保护玻利维亚可卡因贩子和墨西哥将军呢？

“那叫双倍监督。”我对胡帕道，我的本能意识到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墨西哥人和玻利维亚人在议程上再有二十四小时或四十八小时就要到了，“如果我们不能申请到三号箭听器，以后我们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我已明白，情况紧急，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大量的文字工作，包括获得法院安装窃听器的许可，这项请求还得有一组专门人员飞往华盛顿，去司法部获取许可证。我开始担心起来，万一发生什么紧急情况，这点人哪够用的。这需要缉毒署官员们的通力合作。机会难得。

胡帕向我保证在会议结束后，他将再跟司法部联系一次。

计划会议持续到下午六点半，绝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逮捕的具体杂务上，尽是谁逮捕谁、在哪里下手、在哪里进行审问方面的问题。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讨论罪犯在何处受审的争论上，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对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老是争论不休，如审讯员穿什么制服、每个审讯室如何摆设、犯人坐在哪里、面向哪里等等。我干了二十五年的秘密工作，在联邦的五个秘密机关都呆过，还从未见过这等事。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意识到他们完全没有去注意如何获取墨西哥将军和皮萨罗的谈话录音，只字未提如何接着去巴拿马调查，如何去玻利维亚袭击公司的计划。当我提到“新闻封锁”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能够继续执行任务时，我受到的只是一些白眼。整个会议的时间都被一大堆白痴似的废话占据了。

这次会议上，我注意到海关方面已筑起一条鸿沟，卫腊已在利用这条鸿沟了。他的所作所为俨然像一名特工。一个骗子、重犯、贩毒出生的线人，居然允许他自由地出入海关的公堂，使用办公桌和电话，而且还能打探情报，使唤别人；他的名字排在秘书的后头，甚至能够进机要室查找档案、随便翻抽屉、使用机要电话。真是不可思议！计划会议期间他被当作受人尊敬的预备督察一样。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他居然也参加逮捕行动。秘密行动允许让一个反对过美国政府机关的人加入，使我十分吃惊。

他是个比地狱还可怕的人物，甚至比我想象的更坏。

会后不久，我就提出如何指使上校给将军打电话。卫腊又跳出来反对：“我认为会引起上校怀疑的。”并且又复述一遍。

罗斯显然表示赞同。

“上校来这里是为他的上司将军取一百万美元钱的。”我气恼地道，“我只要请他站在摄像机镜头的前面，略略地说几句，以证明他知道这些钱是捐给将军的，接着就将他扣起来。懂吗？”房间里的人除了点头表示赞同之外，都默不作声，房里一片寂静。

“我们除了想对付将军这个真正的后台老板之外，难道还有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可干吗？如果我们办不到，那么就毫无理由再拖延这桩案子了。起诉吉荣、阿瓦兰兹，我早已拿到无数确凿证据。只要等上校一接受钞票，我们就该将他扣留起来，案子就算了结了。”

“那么玻利维亚人怎么办呢？”罗斯在一旁问道。

“嗨，还记得吗，我们在巴拿马不是差一点将他们也扣起来吗？等他们一到这里，我们照样将他们这些蠢驴也统统扣起来嘛。我们掌握的证据足以

定他们的罪，他们的罪恶够坐十辈子的牢。我为什么要在房子里装三号窃听器来对付他们那些家伙呢，就是因为怕他们到时候会打电话给巴图·皮萨罗，或公司别的要员。我要的就是录下这些谈话的内容。”

我又道：“假如我解决不了整桩案子接踵而来的一切，不能歼灭案子里真正的后台，不能扣留巴拿马的那个杂种伦巴多，不能扫荡公司在玻利维亚的种植地和实验室，能办到的只是逮捕了入境的那些家伙，我们紧张的行动就到此为止了。”

半晌，这个拥挤的大屋子里静悄悄地。彼萨罗看看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将目光移开。没有人说一句任何反对我的话，看来我假定的观点也许最终会被采纳。讨论又持续了半小时，又回到协调的老话题上：如何协调逮捕、如何协调审问……。最后，在临近结束时，莉迪亚提出了一个想法。

这个新提拔的海关分署的副局长，要那些被告同她和夏普一起乘船游览。她想这是个绝妙的办法，让他们先轻松一番。我怀疑地朝大房间环顾了一圈，没有人张嘴说话，所有的眼睛都望着我。我的目光正好遇到了尤瓦乔的目光，同他相互对视了一下，他遗憾地摇了摇头。

“那些人来这里来做毒品买卖的。”我说话的语气里夹杂看几份讽刺，“在经受了巴拿马的磨难之后，在要他们完蛋之前，再让他们乘乘船、散散心，对吧？”我也许应该讲得再婉转些，但是实在是憋不住了。

莉迪亚还不肯死心，她已是海关分署的副局长了，如果她坚持要同被告一起乘船，那么海关的总长也会依她的，谁敢去阻拦她呢？

不过我兴许能阻止她。

“请注意，”我总结道，“如果整桩案子的方案中就安排了上豪华游艇的事，那么好吧，就请接着上船吧。但是，你要办的是一桩毒品案，这简直是个无聊愚蠢的主意！”

“我认为这是绝妙的主意，”卫腊在一旁插嘴道，“我觉得他们真是天生的一对。”

“我先警告你！”我厉声道，“这是特工在安排逮捕方案，没有线人的事。”

又是死一样的寂静。

“走着瞧，我得在这个案子里担任个角色。”莉迪亚道，“大家都想在这个案子里担任个角色。”

“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邀请大家呢？为什么你不在大厅里公开地贴出招聘广告，去邀请大家都来呢？”我知道自己有些失态，“我要办的是桩毒品案。”

又是一阵寂静，会议接着终于打破了沉闷的格局。海关一位老资格的特工将我拽到一边，“很抱歉，”他说，“我想为你说几句，但是她是我上司。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实在是十分尴尬。”

“请相信我，”我道，“我懂得该咋办。”

约晚上八点三十分，我正在旅馆里打脑，突然罗斯气喘嘘嘘地打电话告诉我，墨西哥人已确定明天，也就是1月9日赶到这里，而玻利维亚人将于明天晚上到达。所有的安排必须在1月10日星期天完成。我早已从卫腊那里听到过这个消息。罗斯还说，所有的人都集合好了，就等你了。

约到了九点，我和刘易斯一同参加了整个秘密行动组的活动。在座的还有那个大联络组的人员。在拉加拉别墅里，继续排练着行动的细节。在场的

有尤瓦乔、卫腊、胡帕、夏普、莉迪亚和技术人员，阁楼里技术员们在调试着录音设备。我一到，胡帕又来报“喜”。

“部长助理说：你们真敢干哪！他说，我们不能录下任何被告的电话。”胡帕又道，“他说，那是非法窃听。”

“真叫棒。”我喝倒彩道。说着，看见卫腊脸上隐隐约约地表现出似笑非笑的神情。胡帕继续向我解释，司法部长助理说，申请三号窃听器现在已太迟了。

所有的事都坏在为了图个方便上。

“再问问他，假若我们用其他设备录下这些该死的电话，行么？”我道，说话的声音和语气都在喉咙打颤，“假如我能哄上校同意在电话机上再安上一根分机线，听他们的谈话。”我早就懂得这套法律游戏手法。以前我就这么做过多次，这么干就根本甭理睬什么司法部长助理了。不管怎样，我想听听胡帕会怎么说，我不再信任何人。

在排练和计划会议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如果明天一早墨西哥人来，门德萨和玻利维亚人也来了之后，说不定还会出什么漏子。卫腊扬言玻利维亚人和门德萨要在明天晚上才到，但是他和罗斯反对我马上去见墨西哥人，他们两个让我等玻利维亚人来了之后再去看墨西哥人。而我倒想立即就去会会那位卡伦萨上校。

“我是那个他所期望的能使他得到一百万元现钱的富翁，对不？我是一个他想要利用的人，我同他呆得越久，他就越容易向我泄露些内幕。我要说‘上校，我真喜欢你，相信你’等等之类的话。我还要说：‘一百万元可是个大数目。我想你不会拿它去犯罪或干别的事。我想，在你打电话给将军的时候，不在意我在分机上旁听吧？我只想落实一下咱们这次安排确实无误。’”

“但是他会察觉的。”卫腊道。

“我想是吧，”罗斯道，“他会察觉的。”

“见鬼！这又有什么异样呢？”我道。我们又回到昨天曾争论过两次的话题上。罗斯最后认为海关对案子有决定权，作为“本案的代理人”，应该站出来履行其权利，打破卫腊的企图。我看看胡帕，他是缉毒署的“本案代理人”，然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在那时，戴维·卫腊完全控制了“一箭三雕”的行动。

卫腊的方案是让墨西哥人过得轻松快活些，请他们吃晚餐，再喝点饮料。“也许你该在稍晚点再去会他们。”他道，“在晚上，什么时候都能在家里找到将军。”

我看到他们勾搭的样儿，谈吐的口吻，就觉察到，他们要等到走投无路了，最后才希望我出面，去见见墨西哥人。我可以想象，为什么他们不愿把打给将军的电话录下来。

最后一步计划就是由尤瓦乔、卫腊把墨西哥人带过境，然后带他们来别墅。莉迪亚和夏普呆在别墅里，按莉迪亚的意愿干，罗斯也默许了他俩作为我神秘组织的成员，帮我“款待”他们，告诉那些墨西哥人，就说：“路易还没回来。”

我看了看彼萨罗，他则故意瞅着别处。我的嘴唇在那里微微地颤动着：“你们咋不带他们去美妙的迪斯尼游园呢？还可以领他们去逛逛成群结队的动物标本，在游玩中再把他们抓起来怎样？”整个“一箭三雕”行动又一次

成了“乘船游玩活动”。

“我不明白，”卫腊贪婪地笑了笑道，“我想莉迪亚和汤密才是天生的一对。”

又一场争论开始了，不是这些人失常，就是我不正常。大家围坐得挺齐整的，最终我道：“你们这些人，所作所为真像是千方百计地恳求那些畜生，来接受我这百万元无人要的锭纸钱。那简直是乱弹琴。我们只需要五分钟就足够抓住上校的把柄了。”我又觉得有必要再强调一番，“假若我们不能把将军拉进来，那么剩下的整个行动只是让我把钱送给那家伙，然后将他扣起来不就完了嘛。”

“那么玻利维亚人怎么个对付呢？”卫腊问道。

我感觉自己像进入了一场打乒乓球似的愚蠢游戏之中。莉迪亚、罗斯、卫腊在这场游戏中你来我往地相互扯皮，而我只不过是他们打着玩的一只乒乓球而已。只能跟他们的感觉走，自己毫无发言权，甚至连说句公道话，让他们停止这场疯狂的游戏，都不行了。我终于同意他们在这地方作出的决定——告诉墨西哥人：路易不在城里，他很忙。等他们对墨西哥人好好地款待之后，我才得在晚上去看望墨西哥人，然后才能要求上校打电话给将军。

电话铃响了，卫腊急忙去接。我一着手表已是凌晨两点了。但愿你们旅途愉快，我不禁心里暗想。

卫腊说，门德萨来报，他正在里约热内卢。现在已是星期六的早上了，他们要等到星期一美国领事馆开放才能去办签证。当卫腊放下电话时，房里顿时鸦雀无声。门德萨和玻利维亚人肯定得在星期一的晚上或星期二才抵达美国，这将晚到两到三天的时间。

罗斯和卫腊都惊呆了。即使激怒了墨西哥人，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他们有什么怀疑，又有什么要紧呢？同墨西哥的席尔瓦将军已约定最后的期限是星期一，他们拿钱上路回墨西哥不得迟于星期一，现在让我们咋办？

“这可是我们的最好机会。”我说着拿起电话，“现在我们真可以打电话给将军了。”时逢周末，已没有时间去争取合法的窃听装置了，而且我可以肯定华盛顿毒品侦缉署的大人们正千方百计地在拆我们的台。我有充足的时间来打发上校给将军挂电话，我可以跟着在一旁分机上听他们谈话。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位朋友，缉毒署巴西分署头目约翰·雨果。我打电话到他巴西的家里，告诉他我们的情况。

“没问题，”这位美国达拉斯的老牛仔说，“我保证你介绍的人能得到签证。”约翰决定立即动身去里约热内卢。

我挂上电话之后，又忍不住要求罗斯，让他告诉玻利维亚人，必须在星期六的晚上赶到里约热内卢，又要求卫腊通知门德萨，让他向巴西的圣保罗进发。我要来它个将计就计。他们打他们的小算盘，我也打我的小算盘，让事实来证明这一切。

罗斯对拖延时间，让墨西哥人度周末确实有点惧怕，“假如他们喜欢单独行动，那么我们就在他们分手的时候扣留他们。”他道。

“那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竭力坚持主张趁机捣毁将军，来它个“一锅端”。罗斯有些犹豫不定，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一会儿他说，要带墨西哥人上游艇去散散心，一会儿他又主张，只要墨西哥人在南边一露面就逮捕他们。“还是让他们来此地取走这一百万元钱吧。”我道，试图安定一下他的情绪，“假如我跟他们说，玻利维亚人误期了，等我把这桩交易

敲实了再付钱给他们，他们是会理解的。”

罗斯茫然地看着我，似乎我是在说外国话。

凌晨三点，我们最终同意墨西哥人于早上十点抵达美国。接下去的几天就得用好酒好菜来款待他们，当然不许乘船。这个胆怯的罗斯突然站到我这边来了。然后墨西哥人要被领到拉加拉的那幢别墅里，在那里，我将以“路易”的高贵身份和他们谈延期的事，自然就应该让卡伦萨上校打电话给将军，要求更改日期。

1月19日星期六，早上，大约七点半，胡帕打电话到旅馆找我，我们讨论今晚怎么个安排。

“你知道，”我道，“你对我说话的口气，咋像是海关的人。要做好逮捕墨西哥人的准备，不要问为什么。”

“是啊！今天一大早就和罗斯谈了一会，我想昨天晚上我们一定是太激动了。现在罗斯了解了，当我们在途中抓住玻利维亚人时，海关不仅要逮捕墨西哥人。我想这些事你昨晚已讲得够精彩的了。当时你说，这是最好的机会，在电话里录下将军的声音。”

“是啊！”我真想从心底说出一句“太妙了！”的话。这可是第一次有人说我的计划“太精彩了”。我倒希望胡帕在昨天夜里争论的时候就那样站出来支持我。然而昨夜他对我却是另一种态度，对我的观点显出一种迷惑不解的神情。

“那么莉迪亚对这事是什么立场呢？”我问道。忽然又想起，她提出她自己要和夏普一起挤入这场秘密行动中，还有所谓的乘船游玩。“她现在也倾向这个计划？”我又道。

“不知道。”胡帕答道，“她有时到场，有时又不来，我又要几周见不着她了，又出事了，让她去照料呐。”

“昨晚她还对我说，她仍坚持她的乘船计划呐。我很生气。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次行动居然有她竭力推崇的乘船计划。”

我同胡帕讨论了海关所有监察人员同卫腊之间的神秘关系。令我感到宽慰的是，我发现胡帕同我一样对这些也感到奇怪。我得找出并弄清楚此事的答案，这个联盟的根基何在。

“这么离奇的事，这辈子还未碰见过一次。”我道。

“是啊。”胡帕应道。他还告诉我所有他知道的一切。

“这事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恶梦。”胡帕冲口而出，“拿这事跟海关方面说，捅它一下，你看如何？”说话的声音语气几乎第一次有别于他原有的气质。

我明白了。忽然觉得对他有点歉意。他还只是个年青的特工，所遇的事已超过他头脑所能承受的。他同我一样，都是官僚们众多的牺牲品之一。胡帕名义上是本案的代理人，那是因为对这个位置别人都没兴趣，尤其是这场联合调查是在两位主要竞争对手权力之争中引出的。

缉毒署的前身是“烟草型毒品和麻醉药品管理局”。为了避免它与海关的内战，1973年，尼克松总统重新组建成了毒品侦缉署，将原来的“烟草型毒品和麻醉药品管理局”撤销。原机构的所有人员归属新的毒品侦缉署管辖。还有海关的七百五十名烟草型毒品调查人员也划归新的毒品侦缉署领导。我便是这七百五十人中的一员。但是这场内耗战并没有彻底消除，仅仅是推迟而已。

1987年，这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便相互揭丑，当然，在公众的面前，这两大机构又显得在一起合作愉快。这些年来，双方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敏感，他们在报章上展开了一场战争。这是一场官僚的热核战争，最终两败俱伤。双方都竭力找出对方欺诈和不称职的毛病，为了使不知内情的公众对一切都信以为真，相互间的诽谤、攻击一桩接着一桩，连绵不断。

可怜“钢盔”胡帕成了对付海关的一块球拍，新闻出版成了所有这一切的焦点。而对毒品的调查、特工的生命，那就一文不值了，他们懒得再一个个地处理这种小事。

“这牵涉到了政治。”胡帕突然抱怨道，“真无法相信，他妈的，是不敢相信！今天早上，我和贝尔、布朗也谈起了这事。他说，最好的办法，是需要有像你这样个性强的人，要不然海关，他妈的，会吞了这事，逃之夭夭的，那样就惨。”

听着胡帕的谈话，我认识到自己比他也好不了多少。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缉毒特工都明白，整个毒品战争除了是场游戏之外，什么也不是。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毫无意义的游戏，再这么玩下去就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了，但是风险恐怕就是他们的职业。我同他们都一样，害怕这事。说害怕，才是真话。自从罗伯托·苏亚雷斯这场恶梦之后，我发誓拒绝再办案子了。

“听着，”我对胡帕道，说话间又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来，“昨天夜里，卫腊说，老头已去了圣保罗，前些天他说去了里约热内卢，我不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我已通知约翰·雨果，让他去里约热内卢了，这恐怕又毫无结果了。”

胡帕听见这个自相矛盾的事情后说，他要问罗斯检查一遍录音电话的磁带。我的心一下就凉了半截，恍然大悟，我派那位朋友横穿巴西，又是一件竹篮打水，徒劳无功的事。卫腊又会重新安排他的计划。这里头究竟有什么原因呢？

“你怎么不去吃早饭和点心呢？”胡帕问，“他们早上可能不会来了，也许会在下午赶到。”

“卫腊昨天不是说十点钟来嘛。”

“我不知道。吉姆·罗斯说，他们离开墨西哥的第一站才是早上十点钟。”

有关这事，已毫无意义再进一步谈下去了。卫腊、罗斯一伙在那会儿，是在按他们各自的目的计划、安排一切，没法弄懂这里头的奥妙。

我刚放下胡帕的电话，又接到斯科佐打来的电话，情况令人不安。“你有约翰·雨果在巴西的电话号码吗？”他问，“根据情况，我们只得在巴西就将他们逮捕。”然后他向我泄露了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内幕。“你还有什么办法，将玻利维亚人再诱到巴拿马去？”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在发生了那些事情之后，我们不会有什么见鬼的机会了。”自我到了圣地戈之后，他早就对本案躲得老远老远了，现在出现，定是缉毒署的大人们又粗暴地降罪了。我推测，海关方面会牢牢地盯住并逮捕墨西哥人，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激烈。而缉毒署的上层人物担心海关的上层人物会抢先将掌握的情况泄露给新闻界。这表明一场真正的“毒品战争”开始了。

“我问过了，有个重要的原因，”斯科佐接着道，“就是咱们在巴拿马有许多人手，我和巴拿马警方谈过，他们将鼎力相助，来缉拿伦巴多。”接着这只加州的大公蜂又摆出那股腔调，在这个无望的电话里嗡嗡地呻吟着：

“呃，和我谈过话的那些人，都情绪高涨，都愿意帮咱们的忙，我们把钱都装上飞机，然后发个电报过去。”

“你会出大问题的。”我道，决定让他打消这个胡思乱想的念头，“海关方面早已严阵以待，准备扣留那些狗东西了。”

“我明白。”他道，我反倒疑惑不定起来，“哈伯特和你谈起过那些事吗？”

“谈过。”我谎称道。

斯科佐用那股腔调，又“咿咿哑哑”笑了起来。我估计，他的意思是说，缉毒署突然又变得关心起此事来了，因为缉毒署的人都不希望作为“被告人”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卫腊、海关的特工们，甚至斯科佐他们都正在这么干。即使墨西哥人已被逮捕了，我也不觉得奇怪。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又突然要冲进去抢先实行逮捕呢？对我来说，这根本就不值。我坐在那里，听着他“嗡嗡”的叫声，但是一句也没听懂。他好像只在发出一种声音，不是语言。

“海关方面能干些什么呢？他们只是邀到了全国的各大新闻社，在那里大肆操办着‘军刀行动新闻发布会’。”

这就是罗斯的把戏，原来是想在星期天或星期一的部分新闻中，大肆报道被告墨西哥人。当然，墨西哥前总统的孙子卡伦萨可成为冯拉伯一枚巨大的奖章。这是海关方面在致力于挽回总长的面子。

“嗨，”我说着，想到一个妙计，我得把握住唯一的机会，那就是，将剩下的行动再放一把火，让斯科佐这个笨蛋去承担吧，这明显就是不可能办到的，“按‘军刀行动’就得把玻利维亚人弄到巴拿马去逮捕，对吗？”

“对。”他应道。

“我们先不要动手，对吗？”

“对，”斯科佐又应道，“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倒使我想到一个妙计了。”斯科佐突然不等电话挂断，就要我和他的上司查理·西尔谈。我只希望他能高兴，这个可怜的傻瓜比我和胡帕都差劲。

上午十点了，我还没想好下一步该咋办，便带上见证人彼萨罗一同去别墅碰头。胡帕正在那里，忙着同几个技术员在布线。电话铃响了，是卫腊打来的，奇怪，他正在寻罗斯。

“他娘的！下一步咋办？”我问。

“我们动身去边境接他们。”他莫名其妙他说了一句，“这是一项非同一般的计划。”

“什么意思？”我又问。“嗯，我要告诉他们，路易还没有到，他还在筹钱。”

“你这个婊子养的，下流货！”我骂道。这标志着我控制一切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假如他这会站在我的面前，也许我会在这个畜生的胸口上狠狠地揍上一阵。“这事了了之后，你他妈的给老子滚得远远的。你还得按我们认可的计划来！”我先在电话筒里大发雷霆。

“这是英格列斯贝作的修改决定。”卫腊说，此人就是前头提到过的圣地戈海关分署的局长，是最高权威了。

“我才不管哩！”我咆哮着，“你得按着我们的计划办！”说完便“砰”地一声撂上电话。一转身见彼萨罗正在那里偷偷地发笑，胡帕则呆呆地瞅着我。“对不起。”我说着朝大门走去，边走边说：“我得去活动活动。”说着话，便来到园子里的体操房里，两个小时的紧张工作累得我够呛，也该调

节一下了，我要调节一下我扭曲的内脏。

不久，我又回到了旅馆。刚一进门电话铃就响了。胡帕告诉我卫腊、尤瓦乔即将去接墨西哥人，等他们回来之后，还按原计划行事。我问胡帕，有没有听到雨果或玻利维亚人的消息，“阿尔伯特在那里照料此事。”他说，“有什么新情况，我立即告诉你。”一小时后，胡帕又打电话来，说：“他们已到了边境了。”他打电话通知这事，是想让我布置一下下一步的行动。

胡帕的另一个电话，是在傍晚时分。他告诉我说，海关方面现在已同缉毒署商定，在玻利维亚人到达之前，暂不会逮捕墨西哥人、那场新闻战也到此暂时休止，目的为了使毒品战争得以进行下去。

所有的事显示，又出现一片好兆头。墨西哥人那方也不例外。胡帕报告说，他们十分放松，一点都不紧张。他们在尤瓦乔和卫腊的陪同下又吃饭又喝酒。接着，他补充一句道：“已经决定，在明天之前你甭去见他们了。”

我也没有追问，是准做的决定。

逮捕将军的机会就是在这天给错过了。

晚上八点三十分，电话铃又响了，是尤瓦乔在饭店的餐厅里打来的。他向我报告：情况一切正常，那些墨西哥人正在尽情地玩。他笑道：“有件赫克特的风流事要告诉你。你最好留意这家伙，这个多情种正沉醉在爱河里呐。”

我感谢他带给我消息。确实，我十分喜欢乔治。看来他才是本案唯一一名抛弃双方政治利益的真正的特工，在实实在在地工作。我要他试着去打听墨西哥人和玻利维亚人是否还有单独联系的情况。他说，等他们回到那幢秘密别墅之后，就立刻打电话来。

晚上十点半，我接到胡帕打来的另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我，安放在那幢秘密别墅的窃听器窃听到三个墨西哥人在谈论一位名叫萨尔瓦多·德拉维加将军。说他估计可以得到三十万美元的报酬，吉荣和阿瓦兰兹还在那里要求各自再添十二台录像机作为额外的奖励。

十二台录像机？这算得上一流的毒品贩子吗？简直与他们的身分不相称，荒唐得令人无法相信。这种事对吉荣和卫腊之流倒正合适。

“胡帕，”我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引诱上校给他的将军打电话。现在提到了两位将军的名字，可是我们要查清到底谁是有罪的，除了掌握他的电话录音，没有其他的法子可想。”

“嗯，嗯，”胡帕应道。他沉默好长一会。见鬼！我在鞭打一匹死马！他这个人真是一点事也办不成。

“上校急待与你见面。”胡帕最后道。

“好的，在什么时候合适？”

“他们要你在明天早上，在他们上船之前过来。”好啊！乘船游玩还在实施。胡帕沉默了好长一会。我猜他是在那里等着我发脾气。但是，我实在没那份劲儿再来发火了。“联络组现在已盯着他们回旅馆了。”胡帕又道，“卫腊也许这会正在喝酒。”

“好！”我道，“下一步咋干？”

“等墨西哥人一个个地离开，卫腊和尤瓦乔立即回到卡特曼丽娜酒店1056号房间，海关在那里设立了一个临时指挥中心，对发生的一切作些简单的布置。你也想去那儿吗？”

“你认为我应该去吗？”

我和彼萨罗到那间临时指挥所，大约已是晚上十一点半了，罗斯和胡帕在那里等着尤瓦乔和卫腊的到来。墨西哥人被安顿在靠近海滨的一家旅馆里，由海关和缉毒署的一支武装特工守卫着他们，万无一失。缉毒署的上层人物在新闻战失利后，就不肯放弃任何机会。这已经太晚了。

胡帕告诉我，假若我能顺利地获得上校和将军通话的录音，美国司法部长助理已同意不予干涉。“但是，部长助理又说，你在分机监听，必须得到上校的许可。”

“呃，知道了。”我道。心想，是否能得到这种机缘呢？

尤瓦乔和卫腊来了。卫腊早喝得酩酊大醉，像是病了。他什么也不想说，只想上床睡觉。尤瓦乔在边上说，卫腊在吃晚饭时说，要回家去睡觉了。

“我真不明白，这家伙在搞什么花样。”我道。

“我也不知道。”尤瓦乔道，“我还同他呆在一起呢。”

卫腊病了。尤瓦乔跟我们一起谈论一天来的情况。卡伦萨是位小个子，他是穿着一身军装来的，让人印象深刻。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他来此，居然还带着一本军官学校的年鉴。这就证明他是怎样的角色了。听尤瓦乔说，他的英语相当流利，甚至还是个耍嘴皮子的人。他老吹嘘别的一些事，说曾帮助培训过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尤瓦乔这么一点，倒使我立即警觉起来，更加深了对这事的兴趣，看来“一箭三雕”正面临着更大的对手。

“我想这才是他来这里真正目的。”我道，“他讲这些，是向我证明，他才是真正有用的人。只要我请他打电话给将军，那么将军也会被钳住。”

“嗯！”卫腊突然插话，又一次提出反对打电话的事，“帕罗·吉荣真有趣，”他道，“我想他已嗅出味儿来了。”

“见鬼！这不是一回事，懂吗！”我道。我真想能回到十六七岁，在布罗尼斯街上，要遇上这个身材干瘪的 子，就非揍他不可。

我突然记起西尔·弗罗萨诺警官的一些往事。他跟我在纽约特遣队里共过事。几年前，他对我为什么能在秘密特警这一行干得如此出色作了解释：“列文，你知道，坏蛋们都认为你也同他们一样是孬种，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所以，他们才会屡屡出错。但谁知道你吃尽苦头，已改邪归正了。”

什么叫“正”？我心里十分纳闷。

“也许戴维·卫腊说得对，”罗斯在边上道，“不要莽撞。”

在这场战斗中，我又一次发现自己是枚“孤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为了例行公事。我实在累得不想再干了，但是已太迟。我们暂时达成协议，同意刘易斯出席明天与墨西哥人的会面，交换的条件是，得同意莉迪亚和夏普一同完成“乘船计划”。

第七章 历尽艰险的荷马史诗

1月10日，星期日的上午，出现了令人惊慌的局面。上午八点四十分，胡帕来电话告诉我，卫腊报告说墨西哥人坐立不安，疑神疑鬼，提出要玩女人、吸毒。阿瓦兰兹说：“如果路易不给我们女人和麻药，我们就回蒂华纳去。”

阿瓦兰兹不知道，就因为这句话，他差一点就被立刻缉拿归案了。有好几次，只要这几个墨西哥人一提起要打道回府，海关总署上上下下就忙作一团。吉拉多建议，就让他们去美国拉斯维加斯花天酒地一番吧，等玻利维亚人来了再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作为路易该登场亮相了。

“卫腊会给你打电话，亲自告诉你最新的情况。”胡帕道，“他说，务必请你向阿瓦兰兹解释事情延期的原因。他还说，其它几位对阿瓦兰兹言听计从。”现在卫腊突然提出让我同阿瓦兰兹去并起并坐，那么以后呢？

我刚挂上电话，铃声又响了。正是卫腊打来的电话。

“早上好，麦克。”

“我已经听说了，”我道，“他们想玩女人、吸毒，对吗？”

“是啊。我把我的枪给了他们，但还是无济于事。”

“什么！把枪给了他们？”我惊慌万分。我当联邦特工已有二十五年了，允许线人带枪真是闻所未闻，更何况卫腊是个毒品犯，现在保释在外，居然允许他把枪交给几个我们即将捉拿归案的毒品贩子，简直是……

卫腊继续说：“我对他们说，我只有这么个小玩意儿，拿去玩吧。”卫腊要我立即赶到那幢秘密别墅里。

“墨西哥人还在那儿吗？”我问。

“不在了！我们等你过来，谈妥此事，顺便还能听听你的高见。”

“知道了。”我不愿多说。他想探出我是否想给将军打电话。我没那么傻。据报，将军白天下在墨西哥的家里。我想稳扎稳打，不出手则罢，一出手得狠。我不愿将我的计划透露给卫腊。他肯定会捅出乱子来，把我的计划给搞砸了。我换了个话题道：“听说吉拉多让他们去拉斯维加斯。”我还试图弄清楚他和罗斯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

“是的，”卫腊说，“不过他并没有强求。”卫腊鬼怪机灵，在电话里还不肯露口风。其实卫腊比那些真正的特工还要机灵得多。他疑心也许我会在这个电话里安上录音：“你咋不过来？”

大约在九点半光景，我和彼萨罗来到秘密别墅。胡帕、罗斯、吉拉多、卫腊、莉迪亚、夏普都在那里，还有些技术员在阁楼里安装调试电子设备。在随后举行的会议上，老有些人进进出出，吉拉多也坐不住，不时出去又进来。

卫腊打电话给我还不到二十分钟，居然又使罗斯和其他人惊慌了一阵。卫腊再次令他们深信，这几个墨西哥人已是些惊弓之鸟了，一有风吹草动，便会逃之夭夭。一份由联络组采写的监视报告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面说，那几位墨西哥人夜里在饭店周围转来转去，直转到凌晨才回各自的房间。

胡帕告诉我，将给我五万美元用来款待墨西哥人。吉拉多说，海关总署将批准给墨西哥人一万美元，去拉斯维加斯赌场，尽兴地度周末。

狗杂种！这难道就是你们的惊慌吗？我在心里骂这几个墨西哥人。

现在才是星期天上午，从里约热内卢的飞机航班时刻表上得知，玻利维

亚人至少也要在星期二的上午才能赶到。而且现在还无法正式确定他们是否已到了里约热内卢。

我看了看周围众人的脸色，只有莉迪亚还在埋怨，担心乘船计划，彼萨罗在那里微微地笑着，剩下的人一个个紧绷着脸，就像是飞机上的一群乘客，刚刚听说飞机有台发动机熄火了。

“这件事就交给我了。”我劝道，“他们来这儿，是想从我手上拿到一百万。他们受制于我听命于我，这事就让我来处理。”

“你怎么对他们谈呢？”罗斯疑惑地问。

“这容易，实话实说。钱，要给的，但是得等玻利维亚人来了，我要敲定这笔生意能不能成之后再说。然后还要客客气气地请上校给将军打电话，确定将军这一方有没有问题。”

“这没有用。”卫腊道，我恨不得杀了这个卫腊，“他们已吓破了胆了，很想一走了之。知不知道，吉荣昨天对我说了些什么？他说：‘卫腊，我认识你有年头了，你现在有些反常。’”

我不知道卫腊正常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心里莫名其妙地又窜上一团火来。气得真想把他给宰了。我要敦促墨西哥人给将军打电话，罗斯和卫腊不同意，莉迪亚则想着游山玩水的事，忙着挑选要乘的游轮。

最后我们同意，毒枭路易必须得登场亮相以控制局面。是让墨西哥人去拉斯维加斯，还是先给他们五万美元花花，都由我决定。但是，还得催他们给将军打电话。

我身着一套雪白的衣服，全身披金挂银，珠宝相缠，活脱脱一个波多黎各大亨。中午十二点，我的那辆梅塞迪斯轿车停到了别墅里。摄像机早已转动了快有一小时了，墨西哥人正慌张地等着我——路易·冈萨雷斯的到来。我要的就是这股神气。无疑，我将控制这个局面。

一眼见到上校，差一点让我叫笑给憋死。一进门，矮墩墩壮笃笃的上校正成立正姿势站着，身穿一套崭新的墨西哥军服，胸前还挂满了勋章，戴的那副眼镜镜框相当的厚实，我怀疑是在哪个玩具店里买的。我瞟一眼尤瓦乔，他侧转身去看窗外。

跟他们的会面历时一小时，顺利得出乎意料。三个墨西哥人对我毕恭毕敬，宛若我是一国之君。一切正如我预料的，他们竭力奉承取悦于我。上校随身带着一本军官年鉴，他翻阅着这本年鉴，将愿意为我的组织效劳的军官的照片一一指给我看，那架势像是整个墨西哥军队都可拿来推销。这时，上校的讲话也没了戒心。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是奉命行事，席尔瓦将军是他的顶头上司。

上校推开地图将载可卡因的飞机着陆的地点指给我看，然后又拿出这个地点的照片来。三英尺之外，老式电灯内隐藏的摄像机镜头正对准着我们。同时在楼上，四见方的阁楼里，录像、录音设备正在运转着。上校一一指出他的部队设防的位置，介绍了怎样保护飞机，怎样为飞机补充油料。继而，我们又讨论了怎样安排今后其他的可卡因运输。

矮子上校同我相处得已十分融洽了。不久的功夫，只要我一提起什么话题，他总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向我解释，甚至还没等我提出想知道哪些情况，他也主动地告诉我。接着又在地图上标出了一个区域，说是训练基地。当然，这个情报对我来说毫无利用的价值。

上校终于不再惶惶不安了，千方百计地迎合我，我差一点忍不住请他打

电话。估计他肯定会满足我的要求。但我不能这么做，即使我要推翻承诺，也要等到晚上将军在家的时间。游戏才开始，现在就同罗斯唱反调，还为时过早。反正玻利维亚人迟迟没有露面，促成上校打电话给将军的机会肯定会很多。

这个决定，后来使我后悔至极。

我向上校解释，得等门德萨和玻利维亚人来了，才可以付钱给他们，但又表示这笔生意双方都有诚意，几乎已成功了。上校听罢，正如我所预料的，表示没问题，墨西哥方面愿意等玻利维亚人到来，甚至同意打电话禀告将军延期之事。

见面聊了快一个钟头了，“侄子”彼萨罗带着一大包钱进来了，总算在迈阿密拿到了一百万现金。

“我侄子现在替我管钱，”说着话，我便漫不经心地拿起一万元一叠的美钞，随手抓起了一叠塞给卫腊，故意将钱对准了暗处的镜头。

“这些先生们都辛苦了，陪他们去拉斯维加斯玩玩。”我又道，显出对钱毫不在乎甚至有点厌恶的样子，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有用的情报和证据之前，尤其是在录下那个将军的电话之前，让他们对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

会谈结束之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了下来，脸上盖了一块湿布，就这么睡着了。到了晚七点左右，电话铃声唤醒了我。胡帕告诉我，大家对这次会谈非常满意，卫腊、乔治和三个墨西哥人早开车去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了，还有一大帮联络组的特工尾随盯梢。

我重新睡了过去。

1月11日星期一，上午九点，我打电话到分署找胡帕了解情况，我特别想知道，上校是否如我预料的那样，已从别墅里给将军挂电话了。

“估计已挂过了，”胡帕道。只有上校中了计，给抓住了重要的证据。这件事反而使他这个缉毒特工能有飞黄腾达的机会，我真是气坏了。“不过，上头也想起诉那个将军。”他又加了一句。

“你想想看，假若电话录了音，我们会有咋样的证据？”我问。

“这我知道。”胡帕无精打采地道。

“至少你聪明起来了。”我道，心想，这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替你交的学费。

“目前巴西方面的情况一切正常，”胡帕又换了个话题，“明天上午他们就能拿到签证了。”

“明天上午？”

“是的，实际上阿尔伯特要约翰·雨果弄的是旅游签证，并一路跟他们到美国。”

“好极了。”至少那一方面情况进展得令人满意，真得感谢约翰·雨果。

“有个滑稽的故事想听吗？”胡帕已得知墨西哥人在拉斯维加斯奇遇的报告了，“矮子上校问卫腊怎样寻女人。”胡帕说着话，已经忍不住在那里“嘻嘻”地笑了，“于是卫腊去领了一大帮妓女来，说：‘你拿一张一百元的大票来，随便给其中哪一位看一下，就可以上路了。’上校走到一个妖艳的女人跟前，取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女人，那女人拿过钱，塞进乳罩，然后扬长而去。”说到这里胡帕纵声大笑起来。

我跟着笑了起来。上校原来是这么个人，但他们还说，如果我要求他打电话给将军，他会起疑心的。挂上电话，心想，终于可以休息二十四小时了，

在圣地戈也轻松它一番。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1月12日星期二,大约是上午九点,胡帕打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电话。他傻笑着告诉我,门德萨从里约热内卢打电话到别墅来,说,他和玻利维亚人现在启程去了墨西哥城。

“怎么又突然改去墨西哥城呢?”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我实在想不通。

“情况是这样的,在圣保罗已办妥了美国和墨西哥两国的签证。”胡帕说着又大笑起来。难道这真的可笑吗?

我大怒,这个笨蛋真是笨到家,居然还没察觉整个案子差点就要泡汤了。感谢卫腊错报了方向,让约翰·雨果白跑了一趟里约热内卢;幸好门德萨在墨西哥大使馆有自己门路,终于为玻利维亚人搞到了签证。

胡帕说,他们还不敢肯定有十分的把握,现在正在赶往墨西哥城的汽车上,然后要乘班机去蒂华纳,在那里帮他们过境。“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搞到美国签证,只申请了墨西哥签证,”胡帕说着又笑了起来。

“这个情况我们应当掌握!”我说着,居然气得流出泪来,“我们早就应该了解这些情况,我们是国际缉毒组织,不是他妈的拉屎拉尿的地方。真他妈的见鬼!这话本不该说,让你得怎么怎么的,我只要管好我自己份内的事。”我知道得赶快挂上电话,否则又会出言不慎,将来又得后悔。

“好吧。”他答道,“不管怎么说,来都来了,只是想跟你通报一下情况。”

挂了电话之后,我一个人想了一会。如果顺利的话,玻利维亚人也还得晚一天才到,我还可以在明天将军在家的时候,打电话给他。

下午一点,胡帕又打电话来,说,其实玻利维亚人是在里约热内卢拿到墨西哥签证的,而不是圣保罗。又说,现在人还在里约热内卢。他们打电话到别墅,让莉迪亚转告:“告诉路易一切正常,明天美国见。”他们还告诉莉迪亚,将于下午启程去墨西哥城。

胡帕估计,他们将在明天上午十点抵达美墨边境城市蒂华纳,而我估计,他们至少还要二十四小时。胡帕还说,海关和移民局方面已安排停当,就让卫腊大摇大摆地领他们过境吧。

“看来,一切都像时钟那样,在精确运转着。”胡帕满怀希望地道。

我感到一阵恶心。“这么说,上校已经将延期的事向将军解释清楚了,一点麻烦都没有了。”我道。

“他们玩得早就忘乎所以了。”他哈哈大笑,“他们还记得回家的事?早忘了将军了!”胡帕说着又讲了一段矮子上校的故事,“那个矮子上校,”胡帕说着又笑起来,“把眼镜弄碎了。你知道那眼镜的镜片厚得像可乐瓶底。但是,那里只能配到女士的眼镜,就是又大又弯、镜片上面还有小镜片那种。他就是戴着这种女用眼镜走进赌场的。”

可以想象,这位既矮墩墩又鲁莽的家伙,身着墨西哥陆军军服,戴上他所有的勋章,戴着这副女用装饰眼镜会是怎样一副尊容。我想到这里忍不住“咯咯”地笑了出来,内心充满着对他的讨厌与憎恶。

“他们大家都说他是位滑稽人物。”胡帕强忍住笑,说话不免有些支支吾吾,“这些墨西哥人真会捣蛋。”

我也屏住了笑。

“墨西哥居然出这样的败家子,一点也不奇怪。”胡帕说这话,企图再

次引起哄堂大笑。

“下一步行动是什么？”我问。

“今天下午，墨西哥人要离开拉斯维加斯。吉姆、罗斯乘飞机返回，着手计划逮捕。噢，这架飞机还将送你和尤瓦乔去巴拿马，一切都布置好了，我收到邓肯的信了，他在巴拿马也安排妥了，他们只等我们动手的指令了。你有权对一切行动作出定夺。”

一提到邓肯的名字，我眼前突然就出现了诺列加的形象，还有那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你告诉邓肯，现在要监视伦巴多，因为我们知道，他就在那里。”

“行！没问题。”

“要是我们办不到，那么就挟着邓肯一起去叩他的门。要是他不在，那就表示永远也逮不到他了。”

“是，这是个好计策，得去准备一下。”

“现在就让邓肯去准备所有那些家伙的资料吧：这是谁、那是谁，等等等等。”

“他们办过那种事，”胡帕说，“我不知道伦巴多究竟是谁，不过他们已经准备妥了。”

“好，太好了，”说话间，我对重返巴拿马的事并不感到震惊。但是，联系起邓肯反常的行为，也许跟诺列加有什么瓜葛，这倒确实叫我有些毛骨悚然起来。这些年来，我听到过许多有关这位军事强人的卑鄙行为的谈论，那是他的天下，不是我的天下。

我问胡帕是否有空位子，能带上刘易斯一起去。他回答说，飞机上还有卫腊、布朗、中央情报局的杰克和海关别的特工要去第二站玻利维亚，没有多余的位子了。看样子要扔下我的见证人了，不过也划得来。

我把电话挂断，揣测着墨西哥人会在这天晚上返回拉加拉，于是便打电话准备起一些前期的工作。首先得弄懂如何操作那些录音设备。对这一行，我可是个门外汉。下午两点以后，我打电话给胡帕，告诉他，有一个新的设想。

“我要你向卫腊和尤瓦乔绝对保密。”我对胡帕道，“这个设想一形成，我就觉得它很重要，他们两个老跟墨西哥人在一起，没准一不当心就露了口风。”

“好吧。”胡帕小心翼翼地答道。

“主要是，要让阁楼上的那位贝尔·布朗仔细地听着我的讲话，那样的话，当我和上校在对着麦克风谈话时，他就把这些内容都录下来。”

“好主意。”

下午六点，我正在用晚饭，斯科佐打传呼给我。我找了架电话回传呼。他告诉我，总部的高斯帕德里克已准备将此案向新闻界披露，目的是为了本案成为“一桩大案”。

“阿尔贝特，”我道，“如果他们要向新闻界披露，必须等我们到达南美之后，要不然会搅乱逮捕伦巴多的计划，而且在玻利维亚什么情况都会发生的。千万别急着发新闻，那些记者会把咱们卷入危险的境地的。”

“我会对他们说的。”法斯特·斯科佐道。

接着我又回到餐桌前坐下。

晚上七点，我收到了胡帕打来的电话。他正在卡特曼丽娜酒店的指挥中

心等罗斯、吉拉多和其他一些人，准备筹划逮捕的细节问题。他笑着对我说：“墨西哥人还没有离开拉斯维加斯。”语气里没有丝毫的紧张感。

“他们还没有离开？”我立即想到要失去与将军通话的机会。

“吉荣和阿瓦兰兹都锁上各自的房门，管自己泡妞去了。”

晚上八点，我和刘易斯一起来到指挥中心，遇见了吉拉多、罗斯和胡帕。罗斯躺在床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应付接电话与打电话。如何组织好新闻发布会，处理好本案的结局，对他这位专案组的监察来说是人生旅途中举足轻重的一步。他笑哈哈、乐滋滋的样儿，活像卡通片里的那只“阿兹猫”。

“所以，他们真的有些激动噢。”我听他拿着听筒在那里讲话。

我趁机问那位前联邦调查局的警官阿尼·吉拉多海关如何对待违纪的情报人员，他只是相当笼统地回答了我的提问，而且这些答案尽是一些我早就知道的情况。

“阿尼，”我道，“我吃了二十五年的情报饭，还真未见过有关处理情报人员违纪的详细条款呐。”

令我十分高兴的是，吉拉多居然同意我的看法。“我接了这桩案子，”他耸耸肩解释道，“我在来海关之前，那伙计就已抢到这桩案子。”

等罗斯放下电话，我又一次提出给将军打电话的事。逮捕计划已决定在1月14日执行，离执行计划仅有两天的时间。墨西哥人要在今天晚上的后半夜赶到。因而我只留下星期二那个晚上，也就是1月13日晚上，才能来尝试我的计划。“我记得卫腊说过，我们只有在晚上打电话到将军的家里，才能找到将军。”“知道，我们都知道。”罗斯道。

罗斯只想盯着我，却不关心其他的事，甚至对还呆在拉斯维加斯的三位小丑及玻利维亚人统统不关心。他脑袋里只有怎样扩大这次逮捕行动的新闻报道面，以及怎样利用案子的结果促成升官发财，他是位十足的官迷。我发现，卫腊不在，他摆不出太多的理由。最后他终于勉强同意，在星期三的晚上实施我的通话计划。第二天，1月13日，早上六点一刻，我房里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原来又是胡帕。“咱们的计划恐怕还有些问题呐。”“什么？”

“他们在拉斯维加斯期间，矮子上校一定要按原计划给将军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回来时神情紧张。”

“噢……”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我开始对这个矮子上校的另一件事发生了兴趣。“将军臭骂他挥霍钞票。他说，‘你在拉斯维加斯干些什么鬼名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他妈的赶紧给我带上那些钱坐飞机回来，听见没有！你这狗娘养的！’”胡帕笑道。

这个幽默故事，又一次引起了我的深思。

“甭开玩笑。”我提醒道，突然急中生智涌上一种念头。如果我们今晚上打电话到将军的家里，那么，我们布置这场戏的对白，无疑是相当失败的。我眼前仿佛出现了报纸上刊登墨西哥将军与上校在拉斯维加斯为挥霍毒品赃款而引起的一场争执的对白。这正是墨西哥政府应得的报应。

“我们得让他打电话。”我道。

胡帕在电话里通常都顺从我的意见：“对了，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你现在可以如愿以偿了。”

“那可太棒了。”我道。看来卡伦萨上校是不会拒绝打电话的。这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对整桩交易又有些怀疑起来。我的要求仅是打个电话。

“他们现在都回来了吗？”我问。

“是的，这会儿全都回来了。他们大约是早上四点到家的。”“现在只有那些玻利维亚人还不见踪影。”

“如果早上按时启航，我估计现在他们正在飞机上。卫腊的才能足够应付局面。”

“你是说，玻利维亚人已在墨西哥城飞往蒂华纳的飞机上了？”我们又一次不得不依靠卫腊的报告。

“是的，我想卫腊正在同‘口香糖’吉苏斯联系，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已打了两三个电话给卫腊了。”

“难道他们在墨西哥城打的电话？”

“不知道。”这个“钢盔”，就这么回答问题。

早上九点，我同彼萨罗去了酒店的指挥中心。飞行员杰克正巧刚从迈阿密赶到，正整装待发，去同玻利维亚飞行员碰头，然后就履行他的使命，去玻利维亚着陆在那片旷野里，找出那些曾被他和卫腊参观过的可卡因实验室。

胡帕和罗斯也在那里。有个计划会议将在晚上迟一些时候在秘密别墅里召开。胡帕告诉我，门德萨和玻利维亚人未能赶上那趟班机，可能要再延后一天时间才能坐上飞机，“好吧。”我答应道，“把今天接到的电话录音让我听听。”罗斯看着我一语不发。我知道，我给他们出了道难题。上午十一点半，大部分角色又一次汇集在秘密别墅里，有飞行员杰克、莉迪亚、夏普、罗斯、卫腊、尤瓦乔、彼萨罗，还有另外两名海关的特工被分配在楼上的阁楼里，作监视监听工作。卫腊和尤瓦乔详细地汇报了这次拉斯维加斯之行的情况。“让我告诉你，”尤瓦乔道，“这个矮子上校已打电话给将军了，解释了为什么延迟的原因，你知道他是怎样向将军解释为什么在拉斯维加斯花将军钞票的吗？”尤瓦乔大笑道，“我不知道将军跟他说了些什么，但是他打完电话回来吓得屁滚尿流，脸色惨白。我知道这是给吓的。”

这倒提醒了我。

“看来时间是凑不好了。”我道，作为路易，让我去墨西哥谈这笔生意，说实话我真有点紧张，“我们还要拖住这个讨厌的笨蛋，那个矮子上校，把他带来这儿，也证明证明路易这位亿万富翁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我们不该告诉你这个电话的事。”卫腊道。

“你真不要脸！”我怒道，“你为路易干活，当然得听我的，墨西哥会理解这一切的。就撇开路易不说，我，作为一名毒品侦缉署的特工，同样可以教训你。让你干这事，他妈的哪来这么多的‘怀疑’、‘条件’？他们明天就要完了，今天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机会，制作这个关键的电话。”

“但是，吉荣对此疑心重重。”卫腊接着道，我也不搭理他，“我倒有个主意，假若我们将他们带到莉迪亚和夏普的船上，也许他们会稍稍安下点心来。”罗斯和莉迪亚频频点头，像是十分赞同这个主意。胡帕的眼睛一亮，但是仍然保持缄默。

“胡扯！”我怒道，忍不住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怒目横睁地瞪着他这张脸，这张阴险而又干瘪的脸。我干了二十五年了，从未见过有这样的线人。

“先生！我得跟你好好谈谈。路易让你气成了麦克·列文了，让你气得显了

原形。我让你把那个该死的上校带过来。就明确告诉他，路易还有一些话要跟他的将军联系，你明白了吗？”

过一会儿，似乎是我的恐吓镇住了这房里的一切，他们大都同意了我的意见。但是，莉迪亚不赞同。“我以为不然。”她道，“我想带他们去船上，会使他们觉得轻松愉快些。”

“这我也懂。”我反驳道，“但是我不想叫他们轻松愉快！今晚是我最后的一个机会，这是咱们的职责！”为船的事有一次大动干戈，卫腊、罗斯和莉迪亚为一派，我和其他人为另一派。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我敢肯定，自己看上去像是要在那天晚上采取强硬的手段，设法录下同将军通话的内容。

计划转到了具体逮捕行动的细节问题。逮捕行动就在明天，1月14日。卫腊再次为海关方面制订计划。我忍不住道：“制订逮捕计划是联邦特警的天职。”

“这，我会将这些情况和你通气的。”卫腊道，“我和尤瓦乔不想去那里实施逮捕行动。也许你乐意在逮捕的时候再去观察观察那些家伙的脸部表情。但是我曾跟他们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

我看了看尤瓦乔，他一句话也没说，眼睛望着外面。我又看了看海关的另一位特工，罗斯和莉迪亚，他们都默默无语。难道是这个干瘪的皮球，在向十多年来与他情同手足的朋友下手之际，突然又良心发现？

“我正想同你谈谈，先生。”我道，内心却在那里告诫自己，什么也别谈。于是就又补充一句：“我对我干的一切负责。”我得意得几乎脱口而出：我对这一切感到骄傲。然而这毕竟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即使海关方面不在意，我也不会不小心的。”我又添了一句。

我突然觉得应该尽可能和这种人保持一定距离，离得越远越好。协议总算达成了，我也没必要再呆在别墅里。将近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我起身准备离开。还可以抽点时间去体育馆活动活动筋骨。他们都明白，这个电话录音在今晚是非做不可的。我估计着至少还有三四个钟头的时光。

“我得离开一下。”我说着，朝卫腊又道：“就跟上校说，路易对一些细节问题十分关注。把他带到这里来。来了之后，就打传呼叫我，或打电话去我的旅馆也行。”

卫腊朝罗斯偷偷地望了望，表明他会照办的。下午四点三十分，我在饭店的客房里接到了哈伯特·胡帕打来的电话。他声音紧张地告诉我，他十分失望，制作电话录音的事像是出了纰漏。

“现在情况咋样？”我问，心不禁“怦怦”直跳起来。“嗯，墨西哥人去了那里，就是别墅……”

“噢。”我不耐烦地道。他说话的语气和腔调真有点像阿尔贝特先生。

“嗯……，他们显得特别消沉。”

“噢。”

“卫腊通知他们艾菲尔要到明天才到。”接着他便支支吾吾地同我谈起，说：“他们像是串通好似的。我猜那位上校已喝醉了，赫克特说：‘是时候了……也许我得去一趟蒂华纳会会我的朋友。’帕罗说：‘不，你不能走！我们就呆在这里等买卖结束了再说。’”胡帕笑了，笑声里隐含着一种焦虑。

“卫腊跟他们说没有说，路易心烦意乱，很想见见他们？”“嗯，他只是说路易有事跟他们谈。嗯，尽扯些毫无边际的事，而把正事只是稍微点了

点。”

“也就是说，他在那里我行我素？”

“那倒没有。也因为他们那些人对会面的事毫无兴趣。”“噢？但是路易想见见他们。”

“是啊，我知道。不过麦克，请你再听听我的话。”

“行。”

“从他们的神色上看，他们都显得十分惊慌，只想拿了钱就走。那就是说，他们兴趣在钱上。所以，我想今晚约他们碰头，还不如明天带上那些为他们上路准备的钱坐在他们的面前更合算。你说呢？”

“这话同卫腊所说的‘你不可能在这几天同将军联系’有什么两样呢。晚上你把他给我找来。”

“唉，我们不能在早上找他吗？如果……，嗯。”

“那就迟了。”

“这已经没戏了。”胡帕道，“他们要干想干的事。”“那就是说，已不会有碰面的机会了？”

“是的。”

“那好。”

“已经没戏了，墨西哥人想去海上乐园。”

“我的天哪！”海上乐园！这地方就连好莱坞的明星听了也会大吃一惊的，“那么说，他们已去了那里？”

“是的。”

“换句话说他们已走了？”

“是的。”

“你叫这个线人给说服了，是不想再录将军的电话了？”我责备道，顿时觉得自己已被嘲弄。胡帕对本案的控制就好像宗教领袖霍梅尼对付英国作家诺斯一样，想管，可管不着。

“但是我并不在场，这事也是去海关的时候才听说。”“那么就是说，海关也是刚才告诉你。”

“是啊。你走后，我同罗斯也随即离开了那房子。我们先去了美国司法部办事处，然后又去了海关。在那里我们接到电话，才知道这情况。”

“卫腊可真够敢作敢为的，什么事都敢干。”

“阿尼·吉拉多也这么说。”

“你让将军给溜了。卫腊知道你是不会打电话给将军的。他判断不错，因此他抢先于你和罗斯一步，逼咱们让这项计划下马。”我说着，强压心中的愤怒之情，此刻，要有辆四百马力大功率发动机的汽车，我定会赶过去制止这场突发事件，“明天再说吧，现在无法联系上将军，我料到让他筹划逮捕计划会有这种结果，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也得怨你和罗斯。”

我口若悬河地唠叨了好一阵。问题就出在排练了又排练，让卫腊摸透了一切，我居然中了这个该死的子的调虎离山计。这是为什么？到底该咋办呢？这么些年来，我就是这次给疏忽了，这个该死的毒贩子，把全盘计划都给搅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捅了偌大个漏子，真不知该咋办呢。

“出了这档子事，我是束手无策。”胡帕道。

“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我答道，“如果我是代理人，我会拦截这些家伙，并对他们说‘路易相当的不安……’，不过，这得看你的胡帕说：“好

吧。”但我心里明白这事已是无望了。

我在饭店的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方步，过了近一个小时，终于静下来，又打电话给胡帕，询问出发去抓伦巴多的行动组准备得怎么样了。“我真不想上飞机同这些家伙一起去执行任务。”我道，“我想你不会怪我不愿去这个被邓肯搅得乌七八糟的国家。要不是尤瓦乔见过伦巴多一次，能认出他来的话，我可还得从纽约再飞一趟巴拿马呐。”

胡帕对我在处理这些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和愿望赞赏一番，便将电话挂了。

卫腊交代个人生平时曾说过，在凯曼岛上有一个“庞大的生意网”，他吹嘘自己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年并同别人合伙经营一家菜馆，而且还同那里的所有银行和上层人物有来往。他曾建议把“一箭三雕”的秘密碰头活动放在那里。

我在凯曼岛也有自己的门路，至少有一点，卫腊交待合伙开菜馆的事不是事实。就凭这一点，就省了我再亲自去调查他的生平简历。在破案过程中，调查你自己线人的个人生平，这在秘密调查工作中又是件闻所未闻的事。老到的缉毒特工在立案之前，早就把这些情况弄得清清楚楚。我干了二十五年的特警工作，还从未碰到过类似的事，然而在这种非同寻常的时刻，我能挺住。我必须弄清，卫腊的许多交代，海关方面到底证实了多少。

接着我花了几小时的时间，打电话到迈阿密、纽约、凯曼群岛，了解和证实卫腊交代的第一手资料。事情很清楚，他根本就不堪一击，他是个出了名的骗子和吹牛大王。他被岛上的福利机构收留才住下，奇怪的是，这个组织还给卫腊一笔补助金。他身无分文，更无力投资菜馆和其他的生意。这就是我所了解的第一手的原始的资料。

这天晚上很晚了，我考虑到对卫腊交代的材料进行核实会牵扯到中央情报局，但我还是决定要弄它个水落石出。尽管我的行动快捷，但是仍不知道还有几多隐情尚未查明。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那次教训，又一次隐隐约约地出现在今天，我不禁警告自己，悬崖勒马吧！

见鬼！我在干什么蠢事？过了明天这事就算大功告成了。所有这些玩火者将像一只只小绵羊，被捆绑起来，作为牺牲品祭祀正义之神，最后将他们的头颅一颗颗地砍下来。那些西装革履的大人们自然会庆祝他们取得的辉煌胜利，然后悠然自得地走进他们的深宫里。新闻媒介当然会欣然报道这条喜讯，以扩大报纸的发行量，还要对贩毒的行为进行谴责。政坛人物更会大肆抨击国外罪恶的贩毒贵族。还有，诸如政府官员通力合作又一次捍卫了公众和社会的利益，又一次战胜邪恶胜利凯旋。末了，是公众代表，那些先生们和女士们的发言和摇头惊叹，最后就是踊跃纳税。这种千篇一律的胜利场面我实在见得太多太多了。

我翻身便入睡了，记不清做了多少多少个梦，但是当我在深夜醒来时，只觉得自己做过一个梦。我住在一幢欧式小木屋里，望着太阳从金色沙漠里缓缓落下去。屋外，一位身材魁伟的男子背对着我，坐在一条木制廊檐的扶手上。他也一动不动地望着西沉的太·179 阳。我朝他看了看，想走近他，可是不管我再怎么使劲，总是无法靠近他。我瞅着他，起初便觉得他那样儿好生面熟。很快我认出他来，他便是我的弟弟大卫。大卫——大卫——！我喊他的名字，但是他总是不肯转过身来。我叫啊叫啊，叫得嗓子都哑了，“自你死后，我一直未见到过你。”我激动地说，“请你转过来，转过来让我见

见呀。”他还是不肯转过身来。我要见！要见见我小弟弟那张满是伤痕的脸。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终于哭了出来，哭得很伤心。

我从梦中哭醒。这一晚我哭了很久很久。自从我弟弟吸毒自杀，十一年了，我还是头回梦见过他，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

1959年的一天，有人端着枪对准我肚子，一扣扳机，枪没响。后来这一杆枪在验枪中，发现枪能打响。从那事件之后，我相信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支配我人生的道路。缺少了这种力量，什么都会发生。

1月14日星期四，这天是执行逮捕计划的日子，早上八点一刻，罗斯打来的一只电话，标志着新的一天的开始。

“让我向你提供案子的进展情况。”他道，讲话简短十分商业化，“门德萨和玻利维亚人约十点取道入境。卫腊奔那里将他们带过境。特别联络组紧盯其后。”他接着讲述，还特别安排了诱他们进美国的诱饵。他说，卫腊去边境这会儿，汤密·夏普和乔治·尤瓦乔将履行职责，看着那些墨西哥人。

“是吗。”我应道，心里还在念叨将军的事，以及他百般阻挠，破坏那个关键的电话制作。从他冷淡而有分寸的语气里我知道，这事同样也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之中。

“就这样，”罗斯接着道，“如果卫腊同玻利维亚人和门德萨入境遇到什么麻烦的后，卫腊会打电话给宾馆的那些墨西哥人的，他们相互间会联系上的。只要墨西哥人在这里，保证不会有事。一切准备就绪。墨西哥人不会保佑玻利维亚人万无一失地通过边境。”

卫腊？罗斯说，去接这么多玻利维亚人过境，用他一个人就够了。罗斯的话我不太相信，听他说话的口气也有些狂妄。卫腊？可真够称职的，这个卑鄙杂种，一个星期内就到处游山玩水，跑遍了整个美洲，行程七千多英里，刚领了美国签证，罗斯就担心他们不肯入境。但愿这种担心不是因为某种个人的目的。

果不其然。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又过了一会，他开始谈起那件痛失机会的事，然后又转了个话题道：“我还是把情况都讲完吧。”罗斯讲述了卫腊去就近的宾馆或酒店，先替玻利维亚人找个住处，尤瓦乔和夏普则领着墨西哥人去那幢房子碰头，等着在那里最后动手逮捕他们。

“就在现在，”罗斯道，“我想你应该了解，墨西哥人的末日就在今天早上六点。他们二位和那些家伙喝了一个晚上的酒，一直闹到深夜。他俩知道如何按卫腊要求去对待每一位墨西哥人。卫腊的意思是，另外再给每一个家伙一万美元的等待费。如果墨西哥人被捕，可以再没收回来（事后在审讯过程中，卫腊否认了这一点）。

“噢，我的天哪！”我道。

“我想这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这不关我的事，我不会从中插一脚的。”我道。其实我真想问问这家伙，他到底站在什么立场上。

“你的意思呢？”他问。

“我想是因为卫腊的操纵使我们失去了与将军通话的机会。”说话间，我气得全身发抖，心想，就是这个线人操纵了美国政府的特工，让他们出错，失去了一次有利的战机，也许这是一个唯一能取得墨西哥高层领导人从事毒品买卖活动证据的机会。去什么海上乐园，真让人瞠目结舌。

“没有吧？”他开始放慢了说话语气，“我和胡帕……”

“还有件事顺便提一下，你知道卫腊跟谁说过凯曼群岛的事 181 吗？”
我打断他的话。

“有关凯曼群岛的事？”

“是啊，所有的话全是撒谎，所有的情节都是无中生有。”“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便将凯曼群岛的调查结果讲给他听，最后道：“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你在看管着他。”

罗斯停了好长一会儿，然后道：“你百分之百的肯定？”“百分之百的肯定！每一个情节都是谎言。”

“那么他在那里认识那个人，又怎么说呢？”

“完全是胡扯！”我道。心想，使我了解情况的就是“那个人”，他是我的朋友。

“他不认识他？”

“不！他肯定不认识他。”我道，于是再重复一遍我弄到的情报。“唉，他到过那里。”罗斯道，那口气像是卫腊到过凯曼群岛，就足以证明整个情况都是真的。

“他是你的探子。”我道。

“呃，那就是说探子要与地区联系在一起？”

“那我就懂了。”我心里暗想，这家伙真让人吃不透。难道我一定要跟你说这些不成？你也不见得就能戴上立功的奖章。“嗯，我很欣赏这份情报。”罗斯道，他说话的声音显得有些慌张，“嗯，不管怎么说，卫腊正在张罗着对付这十来个人呐。我给他们这点钱也只是一瞬间的功夫，一等到六点这个最后的期限，就统统得收回来。墨西哥人说，愿意等到十二点，不能超过十二点，如果再没有结果，他们就得了，因此我们不得不对那些家伙及时下手。”

“现在，我尽力设法弥补昨晚的那只电话。”他接着道，“这是我和胡帕的意见。并不是卫腊的意见。”

“什么电话？”我心想这事开始之前，他就指使胡帕对我撒谎。“能听我说吗？”

“你说的电话，什么电话？我不知道。”我装聋作哑地道。“将军的电话。”

“噢。”

“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那都是我和胡帕的主意。我们不想在昨天晚上安排这场碰面，是因为我们不想砸了整锅汤。我们想至少能维持现状，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得稳扎稳打，让他们也觉得平平安安的。”

“好啊。”我道。

“我们面临最后的选择。”他继续道，不知咋地他未能把事情说分明了，“卫腊也是无计可施，才带他们去了海上乐园的，我们对此事也没作同意。”

我默默无语。这个芝麻绿豆官也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儿，企图把可怜无辜的胡帕也拉入他的同谋行列，来表明这项决定是由他俩共同作出的。

“呃，这就是我知道的所有情况。”他最后道。

“知道了。”我说。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毫无问题。”我回敬道。心想，有问题也绝不找你解答。“好吧，那么你什么时候起床，过来帮忙？”他是在卡特曼丽娜酒店1059号房间的指挥中心打来的电话。

“你需要我起床后过来帮忙？”

“不是，我想不着急。”他道，接着又不知什么原因，他又不让我走开，“你会一直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吗？”

“我会呆在房里的，有什么情况或让我出力的地方你也可以打传呼通知我，一定尽力。”

“嗯，你下一步行动的时间，可能在十一点左右。我喜欢你来参加制定计划，你认为这事下一步该怎么动法。我是说，哪些先入场，谁首先登台。你想赶在墨西哥人之前去别墅呢，还是等玻利维亚人到了之后再去做？”

我们零零落地谈了几个不同的细节问题。他说话时，我一直在用心听着，这些年来我经历多少风风雨雨，使我养成了冷静、精明的秉性，正是这种个性一直在保护着我。但是此刻我内心实在无法再冷静下去，再也按捺不住心中云集的愤怒道：“瞧你说的，我想让我加入这档子事还差得太远呐。”说着，真想把电话给撂了。

“你太谦虚了。”罗斯道。

“我尽力而为吧。”我像个孩子似地答道，说着话又觉得自己实在太可恨。

“你来参加制定计划便是最大的帮忙。”他接着道，语气显得有些咽噎。我突然清醒地意识到，他是在骗我出来，然后再咬我一口。

“哎呀，多谢了。”我道，忍不住笑出声来。他的回答只是一阵紧张的咳嗽，显然这一切真是恰到好处。我不想在我们之间造成更大的裂痕，这样会阻碍跟他的对话。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他道。

“好啊，我只想这事尽可能圆满结束。”我尽量用温和友好的态度对他道，“路易这个人物具备了各种真诚的品质，这会他可要发怒了，让那些家伙给将军打电话。”

“这次碰头会你能来照个面吗？”

“行。”我答道，“不过请劳驾，千万别告诉卫腊我要干些什么。不知咋地他反对打这个电话，我不想让他再把这事给搅了。”

“可以，”罗斯道。我总算在这场取名为“一箭三雕”的反毒战役中，取得了小小的胜利。

大约到了上午十点三十分左右，我来到设在酒店的那间指挥中心，来“领领市面”，看看有否变化。我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决定再次要求仍同乔治去一趟巴拿马。因为我曾向自己暗暗地保证过，要弄清这个案子里头每一件卑鄙和肮脏的勾当。现在就快接近案子的尾声了，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就要停止对这一切的调查了。

想到这里，我不禁连一个字都说不出口。尤瓦乔已告诉胡帕，他要我陪他一起走一趟。我顺水推舟，很快地就答应了下来。胡帕说，所有该准备的都已准备了，嘱咐我，实施逮捕行动之后，马上带上我的行囊直奔机场同他会合，在机场他会给我机票和钱，并向我传达命令。

上午十点四十五分，我乘上梅赛迪斯轿车朝北驶去，汽车驶在通往拉拉拉的林荫大道上。我打开车上的录音机，放下一盘《波多黎各感伤爵士乐》

专辑，这盘磁带是拉丁专辑中我最喜欢的一盘，它狂热的节奏起源于美洲拉丁舞中舒尔萨舞蹈的音乐节奏。飘飘然的音乐使我进入了路易的角色。

随着卫腊把门德萨和玻利维亚人带进美国，与墨西哥人的会谈已成定局。夏普和刘易斯按计划带来了成百万元的现金。刘易斯将皮箱搁在桌子上，面对着墨西哥人，然后打开皮箱。当他们正盯着这一大堆一百元一百元的大钞票时，我便走进大厅。

“啊，亲爱的上校，”我道，“我不想成心叫你为难，但是我在纽约的投资者们非要我在付钱之前再去敲敲实。我知道你跟着将军也不容易，可他们说，那件事怎么老是误期，是否在墨西哥出了什么问题。”

“这当然，”这位矮子上校道，“敲敲实这也合乎常理。”

你能否打个电话给将军，我在同线电话里听着，那样也好让我的人放心来，这不成问题吧？”

“当然，路易，”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一点不为难，我十分理解你的处境。”

“如果将军那边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告诉他，我将另外再预付一百万美元，作为下趟货的费用。”

185

上校吃惊地望着我，像是对这笔额外的一百万元表示拒绝，又像是在说不必那么客气。他只希望得到该得的这笔佣金。不管他怎样地疑惑不解，他先前留给我的诚实的印象在这时已经荡然无存。吉荣凝视着上校，张着大嘴，像是患了心肌梗塞一般。

过了一会儿，我走进卧室，坐在房间的一角上，心“怦怦”跳个不停，手握着同线电话仔细听着。卡伦萨就在别墅的另一头那间主卧室里拨打电话，拨号声和主卧室的空旷声一并通过话筒传了过来。突然电话筒里传来有节奏的“嘟——嘟——”的声音，这表明电话已接通了远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南方。

一个男子的声音传了过来，我一听见这个声音心都要蹦出来，人就像着了魔似的。

“将军整天都不在家。”那个声音道。

“我是卡伦萨上校。”

“噢，你好！”那声音谨慎地答道。

“我打电话主要想落实所有的事是否都办妥了。你知道，我们的通道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一切都弄好了。”

“那好，告诉他，我很快就动身回来。”

“那位是佩罗，将军的兄弟，白天很少能在家碰上将军。”上校挂上电话后对我道。

我就知道会有这个结果。“那好吧。”我道，心里只想瞧瞧卫腊，再次认清他的嘴脸。

这个电话作为起诉将军的证据是毫无价值的。卫腊知道将军不在家，这表明他已经赢了，他制造政府特工之间的矛盾，最终赢得了胜利。我对他玩弄的一套骗人的把戏突然有一种新的认识。

上次失望的巴拿马之行以后，回来时，墨西哥人就邀我赴墨西哥亲自去落实飞机着落的地点、加油的地点等等。可海关方面又决定派卫腊独自一人

假冒我的雇员前往。他回来后声称他见到了波班·席尔瓦将军和他的贴身随从，并且说跟将军讨论了整个运输过程。假如这些都能被证实的话，那么我们已经掌握了墨西哥最高领导层中有人贩毒的阴谋，这类录音磁带也就应该制作出来。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从卫腊可能所处的立场看，如果我录下这段席尔瓦将军和卡伦萨上校谈话的录音，兴许会戳穿卫腊的许多谎言，在我提出这项录音计划之前，也许卫腊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撒谎不仅会损害他的诚实的形象，而且也会成为他重返监狱的证据，要知道他费尽心机从俄克拉何马的监狱里出来，这可不容易啊。

这也是卫腊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这次重要取证过程的原因之一。另外是否还有心理的原因，他想成为这次行动中一名像德克萨斯州那样的孤星，只有那样他才可以自称为整场戏的编剧，以便将来他能将这些素材改编成电影，获得电影版权。他竟异想天开地编造了如此胆大妄为的情节，要么他和中央情报局真有什么关系。但这又好像不太可能。不过卡伦萨上校倒确实提起过帮助培训反政府武装的事。要不然就是为了保护席尔瓦将军。

不管卫腊出于什么用心，事实只有他自己心里有数，波班·席尔瓦将军也许知道这一切，但是墨西哥政府会对这样的证据不屑一顾的。

我观察着吉荣、阿瓦兰兹，他们二位还沉醉在拉斯维加斯那段醉生梦死的浪漫生活之中。两双贪婪的小眼睛一眨一眨地盯着那只装满一叠叠钞票的皮箱，一只皮箱的钱正好是六十万美元，我暗暗对自己道，他们就像抓住的其他成千上百个毒贩子一样。我让他们点点这些钱。吉荣和阿瓦兰兹便开始动手，但是上校傲慢地制止了他们的行动，他完全相信我，在他看来点我的钱是一件相当不礼貌的事。

当我起身要离开时，乔治·尤瓦乔将我拽到一边，让我留下，支付吉荣和阿瓦兰兹每人两万五千美元的介绍费，他俩都不想让上校知道这件事。这二位正饥饿地望着我，我朝他俩点点头，让他们跟我和彼萨罗来我的卧室。彼萨罗提着另一只装有四十万元钱的箱子。两人争先恐后地同时挤进卧室的房门，我把钱递给他们。只见两人激动得将钞票胡乱地塞入他们衣服底下的一个暗兜里。我心里不禁暗笑，这个吉荣同卫腊一样，真可算得上毒品界少有的“高手”。

又过了一会儿，便是一阵热烈的拥抱和握手。之后，我便将这三位墨西哥走狗送进大牢。当然，这次胜利毫无疑问得归功于罗斯，归功于其他合作的同伴。胜利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取得的。这也是大人们在反毒战争中取得的又一次“胜利”。

我疲倦地坐了下来，等待玻利维亚人的到来。心中不禁将波班·席尔瓦的名字列入了国际犯罪分子名册之首。但是他也许永远成不了囚犯。什么政治的腐败啊，什么谋杀警察啊，以及发生在眼前的这件被缉毒总署阻挠破坏的五百万美元的买毒计划，统统跟这位未曾露面的墨西哥贩毒将军有关。我不禁联想起柯克·卡玛利纳被拷打惨死的事，也许正是同出于此人之手。我得提防着点。想到这里我不禁想痛哭一场。

“喂，路易。”门德萨微笑着领着鲁曼、瓦加斯和另一位皮肤黝黑，趾高气扬的年轻人进来，此人就是玻利维亚人的飞行员。他们一进门便被暗藏的摄像机镜头统统摄了下来，卫腊就在他们的身后龇牙咧嘴地奸笑着。老头同我拥抱之后，我同他们一一握手。门德萨疲惫地晃动着脑袋说了一句使我

永远忘不了的话：“路易，这真像历尽艰险的荷马史诗奥德赛。”

“说得好！兄弟。”我答道。“不过终于将尽尾声了。”

“Ojalá让它变成上帝吧！”他用希腊语道。

会谈进展就如同对待上次那帮墨西哥人一样的顺利。我把门德萨和三位玻利维亚人引到摄像机镜头前，找了个最佳的位置坐下，然后着手讨论磋商每一个细节问题。尽管这些我已推敲过成千上百次了，在我心目中似乎这些已是无可挑剔的了，但还是出现了许多未曾料到的交易上的细节问题。我表示下回可能会派出两架飞机去运十吨的可卡因，他们对我的话表示相信。他们来回穿梭于南美大陆，度过了这个艰难的一周，这是因为他们信任我，现在才可以明确地说，这些已无关紧要了。

在结束我们之间这些细节的磋商之后，我同门德萨、瓦加斯和鲁曼在客厅稍稍放松一下，张罗着让他们痛饮一番，这是他作为自由人最后的一次畅饮。我察觉到他们的眼神和脸神像是已经轧出苗头有些不对。他们似乎格外地放纵，周围的气氛显得有些悲伤凄凉，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能觉出这一切。

与此同时，在饭厅里，飞行员杰克正和拉公司的飞行员，那位年轻的快机手罗兰多·爱勒呆在一起。他以为，从天上千里迢迢地赶来，能为我们的飞机驶入目迷五色的森林领航。爱勒在奔尼长大，他同许多玻利维亚青年人一样，能下地走路时就能驾机在天空中翱翔。小时候在驾机飞行中，他对美国就有所了解，但只是在边境上，根本无法了解这个强大国度神奇的内涵，向北面运去大把大把的可卡因是他和他的国人梦寐以求的夙愿。但是这一来，再也等不到驾机返回故土的那一天。

半晌，我又有了的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感伤的情绪突然向我袭来，我仿佛看见了他们那些人的妻子、儿女、母亲、兄弟等家庭成员，我依稀听见他们在那里窃窃私语，这次的变故将让他们这些无依无靠的芸芸众生如何地受生活煎熬。对他们来说，世上的事千变万化，如果让他们选择，我肯定他们中有些人兴许宁愿选择死亡。这不悦的感觉萦绕着我，冷不丁地使我打个寒颤，内心竭力使自己有意地从这种不悦的感觉里挣脱出来。

按计划，汤密·夏普和我的侄子刘易斯·彼萨罗携带着从墨西哥人手上抢夺回来的那一百万元来了，又一次放到玻利维亚人的面前，再花在他们的身上。所有人物这会都挤在这间屋子里，那些扮演路易·冈萨雷斯组织中人的伙计们个个都演得炉火纯青。这场面倒有点像军官学院授衔仪式那样，隆重庄严。在胜利这天，秘密特工个个表现杰出。

“把这些钱带上飞机吧。”我道，“这是最后的一百万。你们也许最好现在一点一点，抓紧时间，我们还要去机场呐，我等不及了。”

他们真的动手点起钱来，点得相当的仔细。等他们将钞票点完，鲁曼微笑地望着我，请求我让他打个电话给玻利维亚，说家里人等着他的电话。一会儿功夫他就接通了给巴图·皮萨罗的电话。我预感到此人也许就是当今世上最厉害的可卡因大亨。在简短的通话中，他向皮萨罗暗示一切顺利，飞机不时将起飞回玻利维亚。

“好了，现在万事俱备了。”等他放下电话时我道，“在我离开此地去玻利维亚之前，也必须给我的庄家们打个电话。”

这得感谢美国司法部圣地戈办事处，他们不准我们安装三号窃听器，使这电话未被录下来。我记得十年前，司法部南佛罗里达州的办事处作出另一个奇怪的决定，在罗伯托·苏亚雷斯案中被捕的许多案犯里，近几十年来最

大的毒泉——罗伯托·苏亚雷斯事后居然被释放了。

巴图·皮萨罗后来据说被冲锋枪击中受伤了，谋害他的人宣称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组织，拉公司疏忽到同意跟我做起买卖来，这说明他们当时正集中精力铲除哥伦比亚人的势力。

玻利维亚人兴高采烈地一头钻进我的车队，心里正在幻想那架根本就不存在的飞机。我告诉他们，我还得办点事，稍后就到，咱们在机场见面。说罢心中不免一阵伤心，心想，今天我终于看着他们被送往监狱。

第八章 巴拿马追捕无影无踪

我驾驶梅赛德斯轿车，尾随着玻利维亚人乘坐的那辆车。目睹他们最后的旅程，真有些于心不忍。飞行员杰克与我同车而行。我放慢车速，十几辆普普通通的轿车，陆陆续续从路边的街道上、车道里、停车场里一一汇入他们后面的车流中，每辆车上都有两三个乘客。这时，头顶上冒出一架直升飞机来。我望着这些尾随而去的车流翻过一个小山坡，消失在视线里。门德萨和鲁曼还在汽车的后排上坐着聊天，什么也没有注意到。

我一个急转弯，调头，一踩油门，将门德萨和玻利维亚人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接着，又转了个弯来到使命街，一直朝卡特曼丽娜酒店驶去。“一箭三雕”的第一步行动已成了历史。我的注意力要集中在巴拿马和洗钱人伦巴多身上。近来，所有的专家在各种公共场合声称，要赢得毒品战争，最佳方案就是堵住钱的流向。我此行就是要逮住有史以来最大的洗钱人。如果“一箭三雕”还有什么值得全力以赴的话，就是将伦巴多缉拿归案。我有一个感觉，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那就是抓住伦巴多，就可以顺藤摸瓜，缴获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诺列加本人也就无法逃脱这层关系。伦巴多要让所有的钱从巴拿马流过，诺列加是不会不知道的。

时针已指到下午五点。我们必须赶上六点飞往达拉斯的航班。海关的一架小型专机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四个，带我们重返南美，上演“一箭三雕”最后的两幕戏，一幕由我和尤瓦乔去巴拿马，另一幕由卫腊和杰克去玻利维亚。

现在成功的关键在于保密，在四十八小时内不能让新闻界知道我们逮捕了一些案犯。如果走运，我们将在巴拿马擒获伦巴多，在玻利维亚一举缴获几千千克的可卡因。巴图·皮萨罗正心安理得地等着我们，公司的一些高层人物也会等着我们。被捕的人中只要有一位采取合作态度，就不难叩开这个神秘世界的大门。杰克对为飞机领航去他早些时候去过的地方胸有成竹。凭他多年在南美丛林中飞行的经验，我信任他。

我一时激动得难以自制，前些时候的不快之事早已忘却。一切似乎都还有希望。

我驱车急驶着开进酒店的停车场，路人都吃惊地望着我和杰克，我将车“咕”地一声猛然刹在了自己房间的门口，彼萨罗已在等着我，杰克一下车就直奔自己的房间，我也冲进自己的房里，彼萨罗跟了进来。我手忙脚乱地一把将衣服统统收拢，塞进两只手提箱里。彼萨罗站在一旁，焦躁地摇着头谈起逮捕经过。海关让他先后为墨西哥人和玻利维亚人这两伙人开车。他将玻利维亚人带到一个购物中心时，借口要买点东西，刚一停车，特工和新闻记者、摄影师们就一拥而上。

“上帝啊，”彼萨罗说，“光摄影记者就有五十个，还有电视台的摄像机，他们都在那里等着我们。”

“他们把你拍入镜头了吗？”我问。这个年轻的特工在纽约参加过许多秘密行动，前程远大。如果他的照片被登在了报上，这就对他很不利。

“见鬼！所有的人都没有漏掉。”他笑道。

“新闻封锁是怎么进行的！”这简直难以理解。如果新闻透了出去，“一箭三雕”就会付诸东流，那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离开美国，到了巴拿马和玻利维亚这两个被毒枭控制的国度里，我们甚至还有生命危险。“一箭三雕”撼动了两国政府最高领袖。“我只能告诉你，”彼萨罗无可奈何地道，“缉毒署那些特工就像那些罪犯一样被惊呆了，这都是海关一手安排的。”一场

新闻战开始了。海关开了第一枪。

不久之后，杰克同我又驱车赶往机场。杰克朝我遗憾地摇摇头道，他在远东和南美为中央情报局和缉毒署效力多次，所见所闻均比不上“一箭三雕”。“我过去还不太相信，可现在确信整个行动简直就是一堆臭狗屎。”杰克最后道。

确实，这也是我的心声。但我有个臭脾气老是改不掉，只要有一线希望决不肯放弃。伦巴多正在等着呐。

我们赶到圣地戈机场，总算赶上六点去达拉斯的航班。斯科佐和胡帕果然拿着钱和机票等着我们。卫腊和尤瓦乔早已登上飞机。这次可真的安排好了，我们无须通过安全检查就可直接登机，因为我的小腿上还绑着一支九毫米口径的手枪。

“如果消息上了新闻，我们这样急急忙忙地赶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愤然地问。

“他们答应过四十八小时后发新闻。”斯科佐道，“我也被弄糊涂了。我同华盛顿方面谈过，他们已向我保证过。”

“如果他们背信弃义。”我道，“不仅会使这些大犯要犯统统漏网，而且把我们都置于死地。这架飞机上几个秘密特工的性命可都摸在你们的手心上。”

“他们发过誓，”斯科佐道，“劳恩总长和冯拉伯总长都保证过四十八小时后，才举行新闻发布会。报社方面将对这条消息保密四十八小时。”

“海关真的把我们给耍了。”胡帕漏出一句道，“他们不仅预先通知了记者，上星期没有人的时候，他们还偷偷地把全美广播公司的摄影记者带进阁楼里，拍下了控制室所有的情况。”

“你是说我们还在那里卧底的时候？”我问道，有点不敢相信这话。

“没错。”胡帕说。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审查过那些摄影记者？”我不无嘲讽地道。

“没有。”胡帕一本正经地说，“他们甚至还将这事瞒着我们。”

“这个案子里的一切我统统不信。”我说着才如梦初醒，开始明白罗斯的举止，他原来只是关心新闻表演这一件事。如果他在逮捕行动之前一个星期就把摄影师带进阁楼，可见他只是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卑鄙小人，一个十足的官迷。

“是的，海关真的把我们全给耍了！”斯科佐又加了一句。

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我一面登上 256NY 次航班，一面心里还在想，这事居然让美国人自己给搅了。

1月14日，一架小型专机由海关的飞行员兰迪·耶茨和大卫·库恩兹驾驶，从达拉斯起飞，途径德克萨斯，然后拐向南方，朝巴拿马方向航行。机舱里满是“一箭三雕”行动组的秘密特工。如果当初这架飞机坠落大海的话，那么四个腐化堕落的墨西哥人和三个玻利维亚毒品贩子今天还不会坐牢。我相信这个宏伟的蓝图要想兑现还会惹出不少的麻烦。想到这里，不禁深深地吸一口气，定了定神。

机舱里还有一位海关的特工杰克·布兰特，他是被华盛顿海关总署派来参加这次行动的，他随卫腊一起去玻利维亚。后来我才听说，他的真正使命是保护卫腊免遭缉毒署的暗算。在临行前，卫腊执意要带枪。“那不行！”卫腊道，“我既要去玻利维亚，又要防着缉毒署，得保证我的生命安全。”

政府特工出国未经批准也不许持枪，海关方面正在钻法的空子，让布兰特带枪来保护卫腊，这是在公然帮他逃避《1968年枪支控管条例》。按条例规定：服刑的罪犯携带武器跨出边界就该判重罪。看来他对缉毒署已害怕到了极点。

再有几分钟就要在墨西哥的柯什梅尔（Cozumel）降落加油了。布兰特看看他的手表，告诉我们，再过一会儿记者招待会就要开始了。

要知道，官僚们之间的新闻大战就像十几岁的孩子谈恋爱一样，毫无自制能力，也不考虑别人的死活。

我们在墨西哥作短暂的停留。这是一次令人心悸的冒险。墨西哥机场的一位管理员记下我们所有人的名字，接着又让我们出示证件。我当时担心，要是我们的名字被公开，这个新闻不知是否会传到墨西哥。柯克·卡玛利纳在墨西哥第二大城市被墨西哥警方逮捕惨遭杀害，这个消息早已证实了，我们还来这里干嘛呢，去找墨西哥政府麻烦不成？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的话，全是因为过早发布新闻。海关、缉毒署、司法部如此冒冒失失地发布新闻，这不是逼我走绝路吗？也许我的名字注定要被刻在华盛顿喷水池前的纪念碑上。我死后，希望卫腊在司法部的公共休息厅里，会公正地回忆起这段往事。

度过了令人难熬的一小时之后，我们终于起飞向巴拿马进发。

千万别在巴拿马出什么岔子，我对自己道。据斯科佐和胡帕说，缉毒署和巴拿马警方已在秘密监视伦巴多的行动。如果新闻一发布他们便可以直接逮捕他。如果发生了什么敏感的问题，像诺列加出面求情等等，邓肯也会提醒我们。

缉毒署驻巴拿马临时代办迈克·托狄，是位年轻的特工，等我们的飞机迫降在哈沃德（Howard）空军基地时，他已在那里等着我们的到来，下午五点三十分，又一场恶梦即将开始。

“你是干什么的？”在他自我介绍之前我先问道。

“干什么的？”托狄茫然地望着我脱口而出。

“知道我们来这儿做什么吗？”我怀疑地问。

他不知道。毒品侦缉署驻巴拿马特使阿尔弗雷多·邓肯仅要他来机场接人。托狄一点也不知道有关案子的情况。

在马路上，我便对一个市民做了次恰到好处的试探，我要打听的情况，不但乔治想知道，而且海关的另两位飞行员也都想听听。

“邓肯在哪里？”

“不知道，有部分人已搬出玛丽娜别墅。”

“巴拿马警察在吗？有什么人呆在拉斯维加斯大酒店？”我只想了解巴拿马秘密监视的情况。

他紧张地耸耸肩。“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今天来这里。今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等托狄把我们送到马丽奥特大酒店后，我对他说：“告诉邓肯，我现在到了。如果他不想跟我联系，那么就请便吧，我得准备打电话了，给约翰·劳恩打电话，如果总长也不在家，那应再往上面打，也许一直打到司法部长爱德华·米斯那里。”

“一箭三雕”的新闻发布会现在已惊动了整个南美洲。十一月初我和乔治·尤瓦乔第一次相识以来两个月了，早就听说已在秘密监视这位巴拿马洗

钱人了。他不仅是玻利维亚拉公司的洗钱人，而且也为哥伦比亚卡特尔洗钱，他是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就在我离开美国时，我们得到消息，邓肯正二十四小时监视着他的行踪，等我们一到就将他秘密地逮捕归案。这可是招险棋，不仅因为他在那里逗留时光长，更重要的是这家伙肯定同诺列加有裙带关系，而我们只有我和尤瓦乔两个人，耳目有限，想逮捕他不是件容易的事。

晚上约九点，邓肯终于打电话给我，他在玛丽娜别墅举行晚会。他因为我们中途打岔，显得有些不耐烦。他压根就不知道巴拿马洗钱人在哪里，只知道一件事，那家伙不在了。

“他是出去了，还是溜走了呢？”我问。

“我请几位警察打电话到他的住处去过，他不在家。”邓肯下结论道。

“谁打的电话？”

“难道要传讯我不成？”

“哎，那儿的话，弄清楚准就请告诉一声。”我充满期待地恳求道。

“哎呀，我忙得团团转，要对付五百个人。”他厉声说，显得有些不耐烦，“让我怎么记得住谁打的电话？”

我强忍着自己的火气，提醒自己，他可是缉毒署在巴拿马的特使，是全权代表。按我目前的处境，无法逃脱他的手掌心。我问邓肯他已掌握的伦巴多的情况。

我最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邓肯表示，从去年十一月我离开后，除了查明了伦巴多是拉公司在巴拿马的主要洗钱人外，再没有进行过任何调查。

我的心乱了，十二月份那次在马丽奥特斯科佐的房里谈话时，他亲口对我说，会在伦巴多的电话里安上窃听器的。斯科佐所有的情报都是从这个窃听器里得到的，诸如拉公司责备鲁曼把一切都弄得糟了等等。而且布朗曾说：“要打电话给总统，中央情报局有人如何如何插手此事……”，“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又是如何如何“他们已经知道他是谁，他是个重要的角色……。他们暗中监视他。万事俱备只等着你去那里了。”胡帕也曾说起过这事。

我不敢反驳这事，这会站到邓肯的对立面去。他要不是传讯的证人，那么缉毒总署派他到这里来干啥呢。尽管我怀疑他们从中做了手脚，但是邓肯不像那种没有上司的命令就敢断然冒险行事的人。

“噢。我们现在都到了，”我道，“如果查清了是谁，让我们见见他。”

邓肯勉强同意跟巴拿马警方联系后，来我们的旅馆里会面。我放下电话，尤瓦乔已听懂刚才谈话的意思，脸上露出十分焦虑的神色。“你估计我们会有什么危险吗？”他问。

“我也不知道。”我道，“估计咱们的处境不妙。”

在邓肯到来之前，尤瓦乔接到了一些海关人员从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他们说，案子的新闻大标题已拟好，但是墨西哥政府指出卡伦萨上校早已退休了，而且与将军根本毫无瓜葛。按墨西哥权威人士说，最后一个打给佩罗的电话，电话号码根本就是空号。

卫腊无意中帮了罗斯的一个大忙，罗斯干得真是天衣无缝。

过了大约一小时，邓肯终于来到我下榻的马丽奥特大酒店。他说：“好啊，我乐意效犬马之劳。”

“你说那里话，谁敢劳你大驾呢。”

“甭客套。”

我赶紧接通美国的电话，正巧斯科佐接的电话。“邓肯在这里。”我道，

“他说，你说的关于对伦巴多进行秘密调查和监视，以及得到巴拿马警方的配合之事，根本就没有落实过，他说他只是按你的吩咐行事。根本就没有那回事。”

斯科佐那里肯信这番话，让我把电话递给邓肯。他便和斯科佐聊了好一会，接着又拿着听筒默默地听着。大约半支烟的功夫，他脸色变得很难看，慢慢地放下了话筒。屋内静静的，我听得见斯科佐还在话筒里发疯似地直叫喊。邓肯厌恶地摇摇头，把电话又还给了我。

“我猜是他引我们去那儿的，”斯科佐道，“我发过一个电报，向他询问过，找到那伙的行踪没有。……我这就去查查那几份电报稿。”后来斯科佐和胡帕证实了他们曾拍过好几份电报，询问邓肯有关对伦巴多的调查情况。这会儿，斯科佐显然怕跟邓肯闹翻，说话变得有些支支吾吾起来。给斯科佐打这个电话是个错误。我是在巴拿马，是邓肯能翻云覆雨的国家，应该争取他的帮助才对，这样才能抓获这个历史上最大的专洗毒品款的洗钱人。为什么我偏偏要证明他在说谎呢？斯科佐和胡帕两个月来同邓肯频频联系，而且接到报告说洗钱人的身份已查明，他受到警方的监视，只等着我和尤瓦乔来实行逮捕。就这么一个间歇的功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在那会儿我全然不知，也无从知道。

邓肯也不是个傻瓜。自我们十一月份那次来巴拿马，他就完全意识到伦巴多是个重要人物，十二月份他还告诉过我，他通过一个巴拿马警察在他的电话里安了窃听器。作为缉毒署驻巴拿马的官员没有掌握伦巴多的基本情况，可以说是不称职，但是邓肯并不是那种人。

是出于什么特殊原因，或是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还是有人故意放跑伦巴多，使情况发生了突变呢？那家伙手里攥着数以亿计的毒品款，这么一大宗巨款释放出来的能量与影响力足够抵挡我和尤瓦乔两个人。他必定受到诺列加的保护。我们两个美国人只不过是两只孤零零的惊弓之鸟，在巴拿马会有什么作为呢？可以断定伦巴多我们是没法找到了。但是，我又不得不让邓肯像捉迷藏似地继续寻找他的下落。每一个细节、每一次谈话都得整理成文件。当我们抬头撞见停在我们旅馆门口邓肯的车时，我朝尤瓦乔递了个眼色，可他，我的这位新证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半小时之后，我同邓肯、尤瓦乔带上一名名叫戈曼兹的巴拿马警察离开了。拉斯维加斯大酒店矗立在一片黑暗之中，我们就站在饭店外头那片黑暗之中。身着制服的一位保安人员依旧在门口来回地巡逻，记得他就是我十一月份来此会见伦巴多、十二月份第二次来此见鲁曼时所见到的那个人。前几次来这里留给我的感觉是：这里是一个庄严肃穆、戒备森严的地方，附近总有两三个衣冠楚楚的保安人员，大厅里还有保安警察。可这次只有他一个人。

邓肯和戈曼兹上尉走进大厅同守卫嘀咕了几句，我和尤瓦乔等在黑暗中有些紧张。当他们在嘀嘀咕咕说话时，那个守卫转过身来朝黑暗中的我们瞟了一眼。我们本能地背转身去，朝远端黑暗深处的大街上又走了几步。

“真他妈的活见鬼！”尤瓦乔骂道，“我受够了！”

我一见到他的脸，心里同样觉得有些害怕。我方仅有两名特工，又在别人的国土上，谁都知道敌强我弱时寡不敌众的道理，我们的处境是何等地危险。如果我和乔治被伦巴多他们干掉，连作证的美国人都没有。我们活着，伦巴多会担心，在他的余生中，有位美国毒品贩子路易会对他作出起诉的。

邓肯和戈曼兹上尉从饭店里出来时，带来了一份最新的客人名单。“是

这个吗？”邓肯一边问上尉，一边在名单上点给我看。

“上帝啊！你还不知道他住几号房啊？”我第一次跟邓肯通电话时，他说：“我让巡警趁他不在房里时在他的电话里安了窃听。”如果邓肯说他不知道伦巴多的全名或者他住哪间房间，那么他又怎么搞电话窃听的事呢？”

“不知道。”他慢条斯理地答道。

我和乔治仔细地翻阅了那份名单，上面有客人的姓名、国籍。既没有伦巴多也没有相仿的名字，甚至六楼根本就没有玻利维亚国籍的人。

“他包下了六楼右边的整个楼道，”我反驳道，决心再次跟他唱对台戏，“出了电梯朝右拐，那一片全是他的住处。”

上尉和邓肯再次走进拉斯维加斯大酒店。乔治看着我，脸色苍白，颤抖着对我说：“麦克，这事有点奇怪，太悬了。”

“怎么个悬法？”我问，禁不住想起那次可怕的十二月之行时，斯科佐对我怒吼道：“我不会告诉你那些事的。”那些事究竟是指什么呢？

的确，真是有点悬。

邓肯和戈曼兹向保安人员询问了大约有十分钟的时间。当他们第二次出来时，邓肯说：“有一名叫伦巴多·罗吉格兹，是玻利维亚人，圣诞节前夕已离开拉斯维加斯大酒店了。他的妻子估计是德国人，去向不明。”这就是我获得的此人的所有情况。

我同卫腊就在圣诞节之前到过这里，那时他们就在伦巴多电话里窃听到消息了。

“现在咋办呢？”我问，眼睛却在注视着门口那位正在望着我和乔治的守卫。“那我们还是先回去。”不等邓肯回答，我又道。

在回住宅的途中邓肯说，巴拿马移民局要求所有的外籍旅馆住宿一律采用电脑登记，所有的宾馆、酒店必须每天将他们客人的登记汇编成册。他说，他能弄到这些记录，这样就能弄清伦巴多·罗吉格兹的去向：是去了别的饭店，还是已离开巴拿马。我看了看手表，已过了午夜，进入1月16日星期六的凌晨。

《迈阿密先驱报》的国际版已到了马丽奥特大酒店的报柜上。“一箭三雕”的新闻标题已刊了出来，传遍整个南美大陆。报道和往常一样，热烈祝贺美国海关和缉毒署的官员们联手合作取得辉煌胜利，内容和格调同其他成功的反毒故事大同小异。文章描述了整个过程，还刊登了逮捕时拍摄的明德萨和鲁曼的照片，并且还报道了玻利维亚森林里生长着175000磅可卡因。这个数据就是卫腊曾见过的那批可卡因数。

很明显，缉毒署和海关之间正在相互比手腕，为了争夺这场胜利的果实。我接到自己组织的特工打来的电话，缉毒署对海关在这场新闻大战中戏弄缉毒署的行动十分恼怒。我把这一切向尤瓦乔保密。圣地戈缉毒分署就海关偷偷摸摸发布新闻的事跟海关闹翻了，但是只字不提他们搅了这个案子，也没提及威胁特工生命的后果。毒品侦缉署的大人们到底在想什么呢？他们对案子的结局也许还在那里沾沾自喜呐。

《先驱报》的文章里有一份被逮捕与被迫捕的被告名单，其中就有巴拿马洗钱人伦巴多的名字。

上午十点三十分，我接到邓肯打来的一个电话，他说，星期六抽空去巴拿马移民局，等移民局一开门，他就去查找伦巴多的资料。我感谢他的帮助。他说，他正忙着一桩海洛因调查案，如有什么消息他会通知我的。

我刚挂断了邓肯的电话，便接到了斯科佐打来的长途，他催问我们进展如何。我便将发生的一切如此这般地告诉他。“总之，”我道，“像昨晚我同你说的，邓肯在这里一点事也没办成，他甚至连伦巴多住哪间房间都不知道。我同乔治在十一月份就汇报过的那个地方他也不知道。”

斯科佐沉默了好一会，此时他似乎也无话可说。我接着说：“不仅如此，我们根本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我和乔治只是等着，等飞机来接我们回去。”

“等着吧，他们会来的。”他答道，“嗯，我这是，”我心里念叨着：千万别再支吾不清，我的天哪！“我，嗯，正在跟他们取得联系……”

“你知道，这新闻已在南美弄得满城风雨！”我急忙打断他的话。

“是啊。我告诉你，这里闹得更凶，像森林失火一样。我们俩是海关进攻的重点，他们曾带一个摄影记者上了那间阁楼，你当时还不信他们会那么干。他们把那幢房子的一切都拍下来了……。”

我一声不响。胡帕也曾经跟我说过这一切。

“你在听吗？”

“在听。”我说。

“知道海关干了些什么吗？他们只会在我们面前吹老牛。整个过程我们跟他们共同合作，但是在公众面前，在上层决策者面前他们处处在贬低我们，打击我们……。这几天正在恢复我们本来的形象。”

斯科佐接着往下道：“但是，嗯，怎么说呢。一切都扭回来了……”见鬼！他又这么含糊其词，“我正在同我们设在其他国家的分支机构联系……”

“噢。”我笨拙地答道。

“我在想，消息尽管公开了，但是我们还有一线希望，我认为仍有可能逮住个把毒犯。”

我笑道：“但愿如此。”

当重新谈到邓肯的话题时，斯科佐说：“我更多地考虑这个问题，我几乎可以肯定，有份电报发给邓肯，仔细地询问过他。不管怎么说，那件事我们会处理的。”

“阿尔贝特，我可真不想卷入这件事。”

“假如你卷入这桩事，你就会带伤疤退休。”

“可不是，我无意中踩了邓肯一脚，等我给你打完电话之后，就觉得我太傻了。”

“他倒也不至于耿耿于怀。有好几件事都可以证明邓肯不肯合作。只不过搞到了那个白痴的身份证明。”

“那家伙的资料是昨天晚上我和乔治搞到的。”我申辩道。斯科佐称那个洗钱人是个白痴，这话倒引起我的沉思。“到逮捕之前他们什么也没干，甚至不知道他住几楼。”我又道。或许他们只是那么说而已。

“嗯，这事是，”斯科佐嚷嚷道，“假如那家伙不是在圣诞前后走掉，我们不会有他的资料。”他的老毛病又犯了，说话让人听不懂，“邓肯现在最重要的是同他的助手去查清那家伙究竟去了何处。”他又说了好一阵有关如何寻找伦巴多以及案子涉及的另外一些人如何引渡的废话。我很快被斯科佐说话那种腔调弄得糊里糊涂，不知所云。

“还有什么新鲜事？”我问，只想了解更多的有关新闻战的事，“海关将这事向新闻界透露，好像这案子只是他们一家办的一样，是吗？”

“唉！麦克，你肯定不会相信，我甚至还不知道，还有一盘我讲话的录

音带。一直等有人告诉我知道。他们倒没有把他们自己的那些事抖落出来。他们干了些什么？是在同摄影师串通，在逮捕行动之前就走漏消息。”

“他们挪用了我们的监视照片没有？”

“怎么不用，都用了，而且不作任何的处理。我从来未见过如此大胆的，还刊登在国内的新闻网里。”

“上帝啊！”他们简直瞎来。我以前也跟新闻界的朋友合作过，提供过照片，但是涉及特工人员的地方，得把特工的脸部遮起来。海关居然直接向新闻界提供未加处理的照片，并且还是在逮捕行动之前。他们是在拿特工的性命冒险，破坏进一步在毒源国家中追捕、调查的行动，甚至有可能帮助这个南美最大的洗钱人和贩毒集团的毒枭们统统漏网。

“我还要告诉你一桩事。”阿尔伯特·斯科佐道，“所有的人部打电话祝贺我，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我内心是什么感觉。他们只认定这个事实，问题是国家级的机构，像毒品侦缉署总部的那帮人居然也出来，为这样的结局欢欣鼓舞，甚至大卫·威斯权特也打电话祝贺我。”

我们“成功”地放跑了三国最大的毒枭，而毒品侦缉署总部却还在那里欢欣鼓舞，高唱凯歌。

不知是哑巴了呢还是不愿说话，说到底他们最关心的是“雪峰行动”，是他们个人的事业。正如阿特·伊哥伯特所说：毒品侦缉署的幸运倚仗着“雪峰行动”的成功。成功将属于我们大家，要么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要么另辟蹊径。看来他们需要“另辟蹊径”。

我和乔治决定去周围巡察一番。于是就乘着出租车，绕着拉斯维加斯大酒店周围的街道来来回回地兜着圈子，等待出现奇迹：也许伦巴多会牵着狗出现在大街上，也许会带包垃圾什么的从里头出来，也许……。

其实我当时倒希望他不要出现，我感到如果我们与他邂逅，我和乔治也没法把他带回美国去过复活节。

当我们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行走时，我们的力量脆弱得不堪一击，命运又一次冲击着我。这些年来，我经受过多少次被别人跟踪追击的事，神奇的是每次都有贵人相助，化险为夷。对我来说，主要的一点是一种幸运，它源源不断，取之不竭。尽管多少次我深陷囹圄呼喊救命，多少次生命垂危，但在紧要关头我总得到贵人的关照，这一切就如同缉毒总署的大人们一样令人猜测不透，神奇无比。不知是因为什么，那天当我们走在大街上时，曙光照在我的身上。当时，离我退休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了。

就在这时，我和乔治部注意到了一位身穿便衣、长得难以形容的家伙，他注意我俩足有十分钟了，一直盯在我们后头。我们若无其事地继续走着，朝前穿过一条拥挤的街道。刚到拐角处，两个戴墨镜的人坐在一辆看似官方的汽车上，不露声色地盯着我俩。突然，柯克·卡玛利纳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墨西哥警察逮捕的景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预感到死神正在向我俩招手。当我们转过拐角时，我注意到，跟在我们后面的那家伙忽然有多个同伴，而且他们正加快步伐朝我俩逼来。

我俩都明白，在巴拿马，要想甩掉这些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作为美国特工，在此无法得到任何的增援和保护。这是我们有意暴露自己，引蛇出洞。因为在大街上闲逛，暴露无遗，就如金鱼掉进玻璃鱼缸一样，滑稽可笑。我们赶紧钻进出租车里，我回头望去，只见一辆轿车正横冲直撞地冲过红灯，紧紧跟在我们的后头，直到我们开进了马丽奥特大酒店，这一切才算完事。

晚上十一点，邓肯打电话到我的房间，告诉我，他为缉毒署特工雷纳·德拉珂瓦的海洛因调查案忙了一整天，没有时间同巴拿马的官员取得联系。

“不管怎么说，还得谢谢你。”我道。其实我知道这是他的借口。早些时候我刚同德拉珂瓦谈过话，他负责的这次海洛因调查，根本就没有邓肯的事。

双方在电话上沉默了好一会，他说：“别客气。移民局办事很拖拉，有消息就马上告诉你。”

“我们打算星期一就走了。”我说，“你想我们离开之前他们还会干什么事？”

“那很难说，我也不知道。”

我立即给圣地戈的斯科佐打电话，告诉他邓肯在哄骗我们，我很担忧，想尽快离开巴拿马。斯科佐说，海关的飞机将在星期一回巴拿马。

乔治脸色铁青，忧心忡忡，决定打电话给海关，落实飞机来接我们离开的事。可以完全肯定这事泡汤了，我俩感觉越来越紧张，得赶快离开这里。

接下来的二十个小时中，我和乔治接到了一连串来自缉毒署和海关的电话，试图弄清是否有专机在完成任任务后再顺道将我们带回美国去。到底会有什么结果，我俩脑子里一片空白。千万不要出现飞机不来这类靠不住的事。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包围、攻打拉公司森林设施的海关与毒品侦缉署正在进行着一场内战。目前冲突的焦点是：能否允许海关特工和卫腊这个被缉毒署释放的犯人投入这场战斗；能否允许卫腊持枪。事后，缉毒署派往南美玻利维亚参加这次行动的一名特工告诉我，缉毒署南美分支机构还不知道有这次行动，最后没有办法，只好等卫腊和杰克到来。又是一次没准备好的行动！新闻发布后过了两天，他们还没有开始寻找可卡因实验室和那几块种植地的确切位置；现在出现的情况可以肯定，“一箭三雕”的最后一只“雕”又得跑了；拉公司在新闻发布后有足够的时间清理那些曾被杰克和卫腊参观过的设施。从缉毒署的一份电报上得知，最后由杰克引路，缉毒署的飞行员们找到了鲁曼的可卡因实验室地点，据报道，实验室在玻利维亚的奔尼地区，是当时捣毁的最大的一个可卡因实验室，日产量可达四百千克。但是，卫腊则称这次行动是他领的路。

1988年1月17日是星期天。深夜，我们仍然不知道专机的下落，也没有邓肯的任何消息，我也不知道邓肯的动机何在。不管怎样我俩现在是在他立足的国度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到了1月18日的早晨，我和乔治集中精力突击打了一连串的电话后，他们终于安排我们去美国大使馆。到了那里，邓肯递给我们两张簇新的回国机票。

在临别之际，我忍不住问：“伦巴多有新的消息吗？”

“没有。”邓肯简短地回答。

机票只买到迈阿密，还不到整个旅程的一半，我心里越想越生气。回顾我这些年来从事的秘密工作，成千上百个毒品犯都被我制服了，在毒品战争中，我头脑里的敌人很明确，只要你贩毒，不管是几克、几盎司或者几磅，你就是我的敌人，我就会宰了你。但是，“一箭三雕”反倒让人变得从未有过的糊涂。

伦巴多·罗吉格兹之谜，也许能在之后不久读到的两篇有关起诉巴拿马军事强人诺列加走私可卡因的新闻评论中找到解答。第一篇是1988年2月5

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由埃利尼·茨考利那撰写的，题为《值得怀疑的巴拿马》，文章指出：“三周前，司法部和毒品侦缉署的一些权威人士和官员们在争论，最近发生在圣地戈的一起国际走私可卡因事件（即“一箭三雕”行动），巴拿马当局是否应受到赞扬？”

第二篇是1988年2月12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题为《缉毒小分队说，不能忽视诺列加走私事实》，文章的作者是菲利普·申侬，据信是一位司法部官员的笔名。文章抨击道：“我尽管不愿提及此事，但还是渴望提请公众注意，希望能在此事上（指缉毒署忽视诺列加参与贩毒一事）扮演重要的角色，缉毒署这个机构已是孤立无援，如果能得到巴拿马的支持，就能顺利破获此案。也许他们就没有集中精力去注意，诺列加究竟在干什么？”

一个月之后，我在纽约收到从巴拿马打来的秘密电报，电文写着：“未能发现伦巴多·罗吉格兹的踪影，他已离开巴拿马，因而推测他使用假护照。”

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气得我将电报稿捏成一团给烧了。离开的可能大些，但是也有可能他还呆在那里，是吗？

从此再也没有收到有关的消息。

这个案子同其他离奇的案子一样，一切线索突然都中断了，接着就从新闻媒介中消失了。从我掌握的情报中得知，司法部本身曾顿促海关和缉毒署的头目们停止对本案作出任何调查和评论。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任何一名调查人都会揭露“毒品战争”其实是一场骗局。它就像一个苹果，里头的芯子早就被某种官僚主义、政治倾向、腐败现象所蛀空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一切就像以前的越战一样，是场永远打不赢的战争。

与此同时，在玻利维亚，海关和缉毒署之间经过几天的吵吵闹闹之后，最后决定，允许卫腊由海关特工保护，参加飞行任务。但是不许他在直升机着落时离开飞机。他们终于同意由这两个密探领着一支玻利维亚小部队和缉毒署特工乘直升机抵达拉公司的三个可卡因实验室。鲁曼实验室正如他跟我谈起过的一样，日产量可达两百到四百千克可卡因。后来在审理过程中，圣地戈的专家们鉴定，这个实验室日产量可达四百千克。

几个月之后，缉毒署在1988财政年度报告中指出：“‘雪峰行动’带来了成功的一年。”可我们花了一百万美元，共缴获十五吨可卡因的成品、半成品和可卡因精，尽管这个数字还不到鲁曼实验室十一周内生产的可卡因的一半。“雪峰行动”涉及十二个国家，1988年全年它在玻利维亚估计有六千万美元的花销，但是只搜缴可卡因成品546磅，仅有鲁曼实验室一天的产量。一位官员说，要逮捕的不止是一个当权者。

第九章 备忘录大战惊心动魄

我从巴拿马回到纽约的头个晚上，一夜没合眼。心想，又失眠了，不如起来干点什么。用斯科佐的话说：“总署正高兴得大唱凯歌。”他们就此事在新闻媒介大肆宣扬。所有的人都高兴得忘乎所以了。大人们都沉浸在自我陶醉中，在华盛顿关上门睡大觉去了，好个太平无事。他们搅得我头昏眼花，坐立不安。我寻找一瓶牙医在我做牙根手术时配的镇静药可待因，在黎明到来之前，吞下了三四颗药丸。大人们都在睡安稳觉，而我却在房里踌躇、碰壁。最后我走到我自己的那台电脑跟前，坐了下来。

我打开电源开关，将磁盘插入微机的狭槽里，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光屏。我有足够的证据，将发生的一切来个大曝光，但是结果又会怎样呢？我在苏亚雷斯的案子里已经有过一次教训了。我只有这个办法，将发生的一切都记录在纸上，我要用这种方式让大人们不能得逞，逼迫他们进行调查，逼迫他们暴露事实的真相。必须采用间接的方式让他们想想我只是为干点事，并不想反对他们。我在缉毒生涯中也已度过了二十四个春秋，了解他们。要迎合他们的口味，得先阿谀奉承，捧得他们心花怒放，然后反戈一击，打它个措手不及。我要让他们骑虎难下，这是他们的报应。

这次调查中发生的绝大部分细节都被我通过四个文件地址储入磁盘中，我急促地在键盘上查询这四个文件地址，终于找到了。我开始在键盘上“的的哒哒”地输入一个标题：《迈阿密地区支署三名不明身份的特工接受贿赂的报告》。一小时之后，我终于输完了一份有两页内容的备忘录，寄往毒品侦缉署内部稽查处。报告内容主要是卫腊说的有关贿赂迈阿密缉毒署特工的故事。我仔细地读了一遍，自己觉得写得文理通顺。大人们相当憎恶有错别字和语法错误的文件。汇报腐败的事件是缉毒署特工的天职，这纯属是份正当的备忘录。忽觉得缺少一点魅力，于是又补上这么一段文字：

但是请恕我重申，在这一段调查中，情报员公然经常在众多海关人员众目睽睽之下，评论有关毒品侦缉署的腐败，他的谴责危言耸听。希望能作彻底的调查，将调查到的事实立即公布于传播媒介，这位情报员是电视剧专业编剧，因此这将潜在地威胁着毒品侦缉署的声誉。

最后的一席话是让他们引起注意，为的是能让这份备忘录冲破层层关卡，使缉毒署总部敢下大赌注。我躺下身子，心里大致勾画着可能被召见谈话的情景，盘算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我明白在他们召我谈话之前，他们会做些什么，他们一定会有强烈的欲望。这必将还我本来的面貌。在大人们心目中，我，是做秘密工作的。这就是我本来的面貌，我珍惜这份荣誉。我在枕头上听着自己的心跳，很快就睡着了。

1988年1月20日，我将这份备忘录正式寄给稽查处，等待着回音。

1988年1月22日，我收到劳恩总长的一份命令：警告所有毒品侦缉署特工，必须抵制个别特工不愿加入“雪峰行动”的言论。命令说，令人特别奇怪的是，有些特工甚至挫伤别的自愿参加者的积极性。劳恩的命令用威胁的口吻，来迅速纠正反对者的思想。

1月26日，我接到乔治·尤瓦乔的电话，说他已接到圣地戈海关特警队的电话，在逮捕前的那天晚上，也就是在案子的扉页标题制作完毕之前，司法部长密斯打电话给墨西哥司法部长西里哥·戈里加·罗米雷兹，通知他有关这个案子的情况。密斯还命令，海关总长冯拉伯、毒品侦缉署总长约翰·劳恩不准再将此案在新闻媒介作进一步的评论。这便是“一箭三雕”行动为什

么在一夜之间突然在新闻界和国际新闻摘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原因。

米斯事件后来被公布出来，激起毒品侦缉署和海关那些街头特工的愤怒，尤其是那些了解卡玛利纳谋杀案的特工。认清了米斯戴着面纱的尊容之后，人们瞧不起他，认为他居然同墨西哥的将军勾勾搭搭。尤其让人受不了的是他同墨西哥司法部长西里哥·戈里加·罗米雷兹也有瓜葛。柯克·卡玛利纳被谋杀之后的一系列后事处理中，在寻找柯克尸体的过程中，在抓流窜凶手时，在着手调查取证方面，墨西哥当局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和国务院的许多大人们以及政坛人物的兴趣，旨在塑造一个偶像，至于它是真是假这都没有关系；还旨在改善、增进同墨西哥政府的友好关系，来促使他们在这场反毒外交中给予美国以合作。为此他们采用冷处理方法，将卡玛利纳事件草草了事，报道也不放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柯克的铁杆兄弟们、缉毒署的街头特工们个个磨拳擦掌，要为他查个水落石出。一把复仇的怒火要烧毁狗的墨西哥政府。许多街头特工兄弟们通过这件令人憎恶的事件，更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小小的特工的生命在整个政治利益中，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

海关的高级官员们将米斯打电话的秘密透露给尤瓦乔，这里头似乎在表示，他们对部长大人的命令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也表明他们被部长大人吓破了胆。把这事透露给尤瓦乔，他们的用意是想让乔治开口说出他们要想说的话，惜尤瓦乔的口来反对司法部长。

1月27日，高级官员们终于吃了我放下的鱼饵，上钩了。我接到稽查处一位稽查员从华盛顿特区打来的电话，他想详细了解有关的情况。我便把许多丑闻概括地向他讲述了一番：在长长的秘密侦破过程中，这桩麻烦事就已潜在地发生了，卫腊不仅将它抖落了出来，而且对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如果将此事公开出去，毒品侦缉署就不太体面了。沉默了许久之后，他说：“我要一份有关情况发生的详细报告。”他要所有调查的细节：卫腊说的、做的，都在报告上写明了，还有他的个人隐私。我的心在胸口“怦怦”直跳，我肯定他要将这份报告当作重点了。

我慢慢将话筒放回到电话机的机座上。因为紧张而上腺素增生，我的手颤抖得厉害。我的强烈呼吁终于取得惊人的胜利。我终于有机会搜集一份正式的材料，将这场毒品战争中许多最阴险毒辣的欺骗事例汇集起来。这份材料放在缉毒署那群犹如卡福卡（德国作家）笔下的官僚们面前，他们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对整份报告里得出的情况的叙述，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涉及那些腐败的内容，必须说得十分巧妙。不管怎么说，这得先引起那些大人身边爱传小道消息的宦官们极大的关注。我得仔细注意观察他们的表情。

这事可能使我立功受奖，并且出名。我揭露了那些有意破坏缉毒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案子的坏人，他们应该为此受到谴责。把隐藏在特工中间，在政治上仍逍遥自在的这些人揭露出来见见太阳，这是十分有必要的。我肯定这份报告将使世人最终明白，“一箭三雕”没有完。这份材料是正确认识整个缉毒事业的一个典范。

这桩颇具讽刺意义的事件倒也能向大家敲敲警钟。一提起那些内好，我就有些恶心，那些狗男女为了金钱或优厚的待遇，居然出卖同胞、背叛朋友。因为缉毒署偏执地相信那个狡猾的奸细，这使我忍耐、等待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已没有时间来做什么黄粱美梦，沉面于幻想之中。我心须小心行事。苏亚雷

斯案子给了我一个教训，只要大人们认为你是个有威胁的人物，那就要出事了。下一步我得更加掩饰自己的进攻，得让他们觉得这份报告似乎来自三个不同的方面。我打电话给加纳·伯拉哈托和刘易斯·彼萨罗，让他们来我的办公室。然后我关上门，告诉他们，总部稽查处打来电话，命令他们准备好备忘录，将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一切都整理成书面材料。从卫腊声称缉毒署腐败到在巴拿马的酗酒作乐以及在圣地戈窝藏新闻记者，一古脑儿地都抖落了出来。

等他们走后，我在打字机边上坐下来，开始“的的哒哒”地打起字来。我先打上文件的收件单位：总部稽查处、稽查官，接着开始打出正文：下面的讲述，按您今天电话中的要求而提供。我把这份文件取名为《事件经过——附美国海关情报员戴维·卫腊的陈述》。这看起来只是件无关痛痒的事。我看看手表，已是中午十二点整了。我将一大叠打印好的稿纸放进机器，装订成册，接着用手快捷地翻了翻装订好的小册子。到了晚上八点，我将这份初稿大致地数了数有几页，觉得有点头痛。办公室空无一人，我决定回家在电脑上完成这份材料的定稿。

十二个钟头后，寒冬乳白色的晨曦照进我的屋里，我两眼昏花地望着电脑打出的这份四十二页的情况叙述。这份简短的报告像一颗炸弹，锋芒毕露。一切都是在这次调查中发生的，只是从卫腊的暗示中加以展开，还带有某种隐私的成份。这中间包括：海关提出承担五百万美元的货款，而缉毒署却犹豫不决地表示反对；缉毒署固执地坚持行动地点必须在巴拿马的马丽奥特大酒店，致使毒贩子起了疑心；卫腊所有的谎话和前后矛盾的陈述，加上他的回数众多的指责缉毒署接受他的钱财；毒品侦缉署在巴拿马的全权代表阿尔弗雷多·邓肯令人费解的行为；巴拿马洗钱人奇怪的失踪；海关和缉毒署头目秘密举行记者招待会，威胁到前往巴拿马执行逮捕任务的特工的生命安全；卫腊成功地阻止了我企图获取墨西哥波班·席尔瓦将军的电话录音；在巴拿马买捕行动中的酗酒取乐；在执行任务时，海关秘密地将全美广播公司的一位摄影记者带入那幢秘密别墅里；我指责罗斯对巴拿马失败的真相进行的掩盖简直是胡说八道。我把话题扯得很远，甚至包括了卡伦萨上校提到的中央情报局卷入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事。我希望这些内容至少不过于露骨。见鬼！这究竟图个啥呢？上校不仅在同卫腊的交谈中提过我报告中的内容，而且他还对着镜头谈起过这事。

我将这份四十二页的备忘录放进我的档案袋里，觉得沉甸甸的，这个卷宗似乎比以往任何一个卷宗袋都沉，这并不是说它重得让人提不动。我已经疏忽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可能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参与所发生的一切，贝尔·布朗在巴拿马曾说：“中央情报局现在正参与此案呐。”的确，后来在审理中，卫腊的很多奇巧之事，以及以上提到的、有许多国击者都证明为确实的那些隐秘情况，表明中央情报局的人参与了“一箭三雕”行动。还据说，伦巴多可能与巴拿马军事强人诺列加关系密切。最重要的是“雪峰行动”关系到高级官员们在公众中的形象。这些都可能引起他们对“一箭三雕”的奇怪态度。

总之，这一切正在加剧我对卫腊鬼辩的怀疑。读到这里，他们应该明白这一点，像苏亚雷斯案一样，我会成为众矢之的。我已下过一次地狱了，全然顾不得那么多了。为了别人，也为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必须挽救这一切。我耐心地等待着，等到了1988年12月28日。离开1989年12月20日我退休的日子不远了，我也许就只能这么老等着，希望我的沉默不会付出

任何的生命代价。

沉默啊沉默，死一样的沉默。备忘录的内容事实充分，如果将调查过程公布于众，将会在这片沃土上爆发一场因毒品引起的战争，一场反对官僚的核爆炸，备忘录是我发射的一颗炮弹。

那天早上，我一踏进办公室，有人转告我，让我给稽查处打电话。我给稽查处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他想从刘易斯和加纳那里证实备忘录的内容。他注意到，备忘录只集中了卫腊曾说的以及他亲自经历过的一些缉毒署的腐败现象。此刻，我担心他会让我重做，不过他没那么说。等挂上电话，看了看桌上放着的台历，意识到下周一，也就是2月1日，必须去一趟华盛顿。去拜访一下特区的稽查机构和它的执行机关。我在缉毒署呆着还有一个间接的职责，那就是起到稽查官的作用。也就是说，各种稽查的执行机关不定时地邀请我，提供缉毒署有关缉毒管理、全体人员遵守职责方面的情况。我在给稽查官的回电中告诉他，那份备忘录已发出，可他说，他可能不在，稽查处有位叫拉斐尔·哈尔芬的稽查员会接管这项调查的，如果我愿意的话，请将材料交给他。

2月1日上午九点，我在华盛顿毒品侦缉署总部一张黯淡的金属办公桌对面坐了下来，望着哈尔芬在阅读我的那份备忘录。派他主持这桩调查，我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说不清是喜是忧。我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来处理这桩事。现在我肯定会将一切事实都摊开在桌面上。

哈尔芬，一位高大沉稳的汉子，足有一米九十个头，九十多公斤重，四十开外。既不像稽查官，也不像当官的模样。他是出了名的务实派调查人。他敦实，不因政治的原因或者个人的私欲而动摇不定。我曾好几次和他在同一个办公室共事，但是只跟他合作过一次。一年前，我被派同他一起前往巴哈马群岛稽查我们设在那里的分支机构。他作为一名老手，派我去调查一些言过其实的情况，这便是缉毒署耗资巨大的一项国际行动，号称“海湾行动”。这次行动证明其他部门的统计完全是失实的胡扯，这有点像当时美国副总统布什的南佛罗里达州的特遣部队：全是有名无实的统计。巴哈马警方截获了一船卸下的毒品，在押往美国的途中，他们与毒品商私下串通，再赎走一切。但他们又要求缉毒署特工承担押运，旨在向总署申报这笔有名无实的统计数据。这是案子调查史上破天荒的一大创举。那些毒梟也不会受到起诉，有的甚至身份都不明。被抓获的船员扣留都不出一两个星期，有的只要等钱一汇到，那些被抓获的船、船员和船上的货就会奇怪地失踪。

我将缉毒署违反国外行动准则的这些事补入这份报告中，哈尔芬毫不犹豫地在这份报告上签上名表示同意。尽管如此，仍不容置疑，一些大人或政客的走狗们会干预这事。同其他的报告一样，我们的报告同样也毫无结果，但是我对哈尔芬印象更深了，更信任他了，当然他会像对待其他事一样，公正地对待这事，我听说他是位秉公执法的铁包公。

拉菲尔看了大约前面十五页左右，抬起头来，朝我看看，摇摇头，吹了一声口哨道：“热门素材。”我试着从他的眼神里看出点什么。他像对待一件难以欣赏的艺术品一样，没有加一句评语。“如果我需要我会打电话给你的。”他说着，领我走出房门。我心里琢磨着，朝拐角上的伦敦地铁站走去，一种欣慰之情油然而生。一切都解脱了，炸弹被投下了，而且是通过正当的途径。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还有一事使我还有点迷惑不解，那便是“雪峰行动”。这是一场要命的骗局，当然这颗炸弹是炸不到它的身上的。

地铁呼啸着驰往特区的最南头，我在这里的特区办公室等着，度过了两周辉煌的稽查历程。这是一项沉闷的工作，不过倒能帮我从那里头解救出来，至少能听见大人们的心声，无需再转弯抹角地得到这些情况。说不准会接到劳恩总长本人或者他的助理凯利打来的电话，也许他们会留下我，提升我，或者调我去想去的地方。我和海关的尤瓦乔共同承办这事，会怎么个发落我呢？只有让时间来证实。

2月6日，我住在一家公路边的汽车旅馆里，这条公路直通华盛顿国家机场。我呆呆地望着那架电话。我还没有接到通知。就在本周，彼萨罗和伯拉哈托都打电话给一些稽查官，他们又一次命令他俩删去他俩所写的备忘录中有关卫腊说过的、干过的那部分内容。我考虑着给哈尔芬打个电话，但是正碰上星期天，办公室放假。

电视荧幕上突然播放了一则新闻公报：两名缉毒署的特工在洛杉矶被杀，据悉他们名叫乔治·蒙托扬和保罗·西马。我的心一沉。保罗是位漂亮的小伙儿，长得像座铁塔，1976年在纽约，他曾为我办过事。我曾是他毒品侦缉署的一位“街头”监察。在越战期间，他曾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泰国籍雇员，后来同缉毒署的一位秘书结了婚，又被派往美国驻曼谷大使馆工作，在那里成为美国公民，并作为缉毒署特工驻扎在那里，随后又被调往华盛顿。缉毒总署在这时才发现他的英文说得十分勉强。这对美国执法官来说，可是非同寻常的外交事件。那些大人不知在忙些什么，竟会没有察觉他的英文不行。于是将他调到纽约。

保罗的英文程度介于会与不会之间，正好适合参加三十二号行动组——“被遗弃的孩子”。他的一些轶事居然成为纽约街头不会讲英文的缉毒便衣的笑柄。1988年《纽约时报》合订本中报道，在秘密行动中，保罗想逃跑，被唐纳德·戈达德抓获。我们耻笑他的唯一目的，在于他毕竟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共同分管着这些街道。他毕竟是我们的哥儿们。那些大人哪里懂得这种兄弟的情谊？哪里知道失去他的那种感受？他们在利用他的死，如同利用所有其他那些死伤的哥儿们一样，旨在扰乱整个世界的公正。这一切都是他们一手操纵的，表面上打着漂亮的旗帜，背底里却在暗算着那些对他们的动机与真诚表示疑惑的同胞们。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他们的乌纱帽、他们在新闻媒介的形象、他们个人的前途，他们是十足的流氓，十恶不赦的流氓。

2月9日，我完成了华盛顿之行的工作。在我启程回纽约时，我打电话给哈尔芬，说我想见见他，问问有否必要。“我们如果需要，会电话通知你的。”他简短地答道。

2月10日，纽约分署分管我们部门的局长巴巴拉·巴克利通知我，稽查处正在调查我枪杀一条狗的事，甚至几乎将彼萨罗调往布罗尼斯的袭毒队。

到了2月22日，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打电话给哈尔芬，询问有什么新的进展。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好一会，然后说：“卫腊否认作过这类申述。”

“但是他是当着彼萨罗、伯拉哈托、胡帕和所有海关人员的面说这番话的……。”

“是啊！但是他拒绝跟我们谈。”

我拿哈尔芬没办法，如果我写的这份备忘录真的有损毒品侦缉署的形象，那么我对他再使劲，就会把事情弄过头的。他又一次对我说，如果需要，他会打电话给我的，说完便挂了电话。在这事上，我没有利用充分的想象去

看清事物的本质。毒品侦缉署和海关两家上层高级官员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势在必行。卫腊目前仍在俄克拉何马的监狱里服刑，海关方面必须确保缉毒署对他全面管制。对双方官员来说，处理我那份备忘录，最好的办法是：对腐败的揭发有待核实，先拖着再说。

又过了十来天的时光，离我退休只有二十个月了。

2月26日，又一位二十二岁的纽约巡警爱德华·波恩被谋杀，当时他正坐在一辆巡逻车里，保卫毒品审理案的证人的家。据分析，他是被当地一名贩卖可卡因的暴徒所杀。这场谋杀使这场毒品战争中，又多了一位牺牲者。他的死对我打击很大，我的亲生儿子凯斯刚满二十三岁，也在纽约当巡警。

总统竞选已步入轨道，所有的政客们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们仿佛也已发现了我们正在卷入一场毒品战争。“锐减吸毒现象”已成为共和、民主两党普遍呼吁的一个问题，因而，波恩被谋杀的那大早上，那些由我们供养的小丑们针对这件事又开始了舌战，他们在麦克风前、在摄像机镜头前，呻吟着、呼喊着的、怒嚎着道：吸毒者同贩毒者一样有罪！我们必须制止吸毒！制止吸毒的宣传！锐减吸毒是我们的回答！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呐喊着，“锐减吸毒”的标语贴得满街都是，老是挂在每一个大人和政客们的嘴边。在每一个电视频道里，每一种报纸的版面上随处可见“锐减吸毒”的词句。

2月28日星期一，是年轻的爱德华·波恩的下葬之日。早上六点，我被无线电的闹铃唤醒。我把收音机调到霍华德·斯特恩主持的节目，他是纽约出名的快嘴。有报纸报道说，经这家伙播出的广告收益，每年可达一百五十万美元，他的嘴里具有巨大的推销能量。斯特恩道：

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我，我还是我，我不能像南茜·里根那样，可以说：“来，请跟我来瞧瞧，也许能发掘出什么东西。”……我以为可卡因能使电视节目更丰富，当这些嗜好那东西的人被毒品麻醉成一团的时候，电视能看见他们。但是你们看不见我，知道吗，在节目开始以前好几个小时，我正忙着追寻，哪儿能买到这些毒品。

我把声音开到最大，但是仍无法信他的鬼话。这家伙不仅说毒品无害，而且还说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乐事。他正吹嘘着让吸毒者怎样按他所介绍的地方去获取可卡因。也就在那天早上，在之后整一周的每天早上，只要你一打开电视，不管在早上的什么时候，全是电视新闻节目，能看见高级官员和政客们全都在呼吁“锐减吸毒”是“唯一的途径”；总有些跟毒品带上边的事，便如此这般地纠缠个没完，连篇累牍地倒过来顺过去播个没完没了。

一头是这个名声显赫的，覆盖面达七个州的，收听者超过一百万人的电台，在那里鼓吹亵渎毒品法。另一头，却在那里“锐减吸毒”、“锐减吸毒”地喊个不停，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我困惑不解。假如那些高级官员和政客真想动真格的，他们应该堵上这张在为可卡因作广告的嘴，一架功率超过五万四千瓦的电台，犯罪的能量远远超过世上最大的毒枭。他还有部分的理由，说，拉公司和麦德林卡特尔为什么会取得畸形的经济实力。

我一直听着，如同听所有其他类型的笑话一样。他说，他的一个搭档上了飞机，又说，他也在飞机上，原来是买到了毒品和代用品。斯特恩扮演的那角色想要代用品。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开玩笑的。这两个活宝已具备被判刑三十年的资格。我抓了一大堆罪犯，在破案的窃听器上听到的内容，也比这场闹剧要收敛得多。那些将脑袋系在裤腰上作案的人，对其

他人用毒的影响不大，或许有，也只能在一些残墙废墟附近偷偷地进行。在秘密毒品案中，你得拿出这些阴谋集团的证据来，才能定罪。他们居然在电波里就开始这么交易起来了，这种公开的行为旨在表明推动促进那些地下秘密的交易。我要揭露这场闹剧，我就是最可靠的证人，斯特恩和他的搭档试图演出一场买毒品的闹剧，但是这已完全构成了犯罪。

别忘了，在整个“一箭三雕”里头，也没有毒品存在过。只是为了谈论毒品这一点，就冒出了去年十二月的已拿马之行。对所有被告的指控，也只是密谋毒品交易，其实连毒品的影儿都没见着。

到了第二周的周一，斯特恩又继续大鸣大放地谈论开了他的奇遇。他四小时的广播节目，通过广播转播无线，在华盛顿和费城都能收听到。与此同时，高级官员和政客们仍旧在为吸毒引起的犯罪唏嘘不已，指责引起吸毒泛滥的原因是偶然用毒。

周末，有位不是大人便是政治家模样的人说了一番有关电台的话：有位少女的母亲，在一封写给斯特恩的信里道，他说得头头是道，他同毒品贩子一样，对波恩巡警的死负有责任，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们必须对此作出解释；斯特恩在电话簿中查到那位妇女的电话号码，并打电话跟她说，这事同样属于儿童不宜，不能让孩子收听。就在这天，我终于打电话给美国司法部曼哈顿办公室，告诉他们，我要写信给《每日新闻》的编辑，作为证人起诉斯特恩鼓吹的“奇遇”。

“假如有一位可靠的证人主动站出来，你们会将案子递给联邦陪审团吗？”我问。

“完全可以！”对方道。

于是我便写信给纽约《每日新闻》编辑部，不久便刊登了一篇题为《播音员》的文章，新闻一公开，接踵而来的是全国新闻界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整个调查计划被淹没在这场急风暴雨之中。毒品侦缉署的大人们被新闻媒介吓坏了，仓促应变。纽约分署总头目罗伯特·斯图曼彬彬有礼地电告“电视名将”（这是纽约街头的年轻人授予节目主持人的荧幕雅号），又打电话要我去他的办公室。“你肯定他不是开玩笑？”斯图曼问我。

一年后，秘密特工艾文特·海特奇在可卡因交易的谈判中被暗杀。斯图曼在许多全国性的电台新闻中讲话，在海特奇的尸体被运上他的那辆警车的背景中，斯图曼道：“如果有人认为吸毒很有趣，那就看一眼这位年轻人怎么个有趣法。”自此之后，他便会同其他的大人们和政客们一起呼喊：锐减吸毒！锐减吸毒！锐减吸毒！就这么当口头禅似地念叨了足有两三个星期。

“电视名将”警告我，不要再去新闻界陈述了。并且告诉我，对斯特恩的调查不会有结果的。那天早上，有人来办公室讲起说，整个这项调查已移交给一位两周前刚从缉毒专科学校毕业的特工。之后不久，这位新手通知我：“有人对我说，对斯特恩的调查，查不出个名堂来，就先搁着吧。”

胡帕从圣地戈发来的最新消息说，玻利维亚人和墨西哥人两方的辩护律师要求推迟审理案件，这根本就毫无意义。按理说，对被告而言，赶在毒品侦缉署和海关对两国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之前，越快审理对他们越有利，时间长了会对他们不利。正在那时候，社会上出现了缉毒“实验理论”。我很想学个究竟。真是个天赐的良机，有机会演示一下“实验理论”本身的内涵。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个理论用在中国和日本，短期内就能消灭毒品泛滥的问题。这两国竭尽全力，在社会上铲除吸毒者，与其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里，倒不如永远地使得毒品市场完全地枯竭。吸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仅因为吸毒能使犯罪加剧、疾病流行，而且它使人类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吸毒者抵抗力弱，最易染上某些病毒，毒瘾一来便轻易地将钱源源不断地投入毒贩子的无底洞中，靠罚款制止根本无济于事。社会必须重新评价吸毒者，他们不是“牺牲品”，而是无用的吸血鬼。吸毒也应该蹲监狱，而且是长期的监禁。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期内消灭大部分毒品市场。

东方国家做法看似简单，但合乎逻辑。我们的高级官员和政坛人物，还没有一位敢采用这种方法。相反，你如果逮住了什么人在用过量的麻醉药品，你不仅仅只是找不到律师起诉，而且你甚至有可能受到来自缉毒署大人物的谴责，责备你的工作毫无价值。近年来，我开始怀疑毒滥是否是官僚主义的产物，这些杂种简直毫无一点责任心。我的观点很明显：如果想要奏效，最好采用东方的方法。

1989年3月15日，塞尔温尼·拉伯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刊登一篇题为《曼哈顿黑帮为争夺地盘大战》的文章，报道说多米尼加的可卡因团伙强占曼哈顿西109号街，毒品交易在附近地区效益可观，警方很快速捕一名卖毒人，但他又立即被他人劫走。这条街上已抓了成千上万的人，也有过销毁可卡因的事，但仍不见成效。我有一个朋友，就住在西109号街地下窝点上面二楼的公寓里。我的朋友说：在这条被搜查过许多次，搜查的足迹遍布绝大部分建筑物的街道里，整夜，排队买毒的汽车停得像长龙似的，他们根本无视几乎每周一次的搜捕行动。我应邀前往，亲眼目睹了这壮观的场面。

我花了一周时间，呆在昏暗的窗口里，看着一辆接一辆络绎不绝的汽车开来，大约有一半的汽车没有牌照，大多数人都来自中上阶层，一个个衣冠楚楚地出来买毒消遣。交易已到了如此公开猖獗的地步，我不禁心自问：难道我所见到的这种勾当，真是已被禁止取缔了三十年之久的毒滥吗？一位买毒人突然从对面人行道停着的汽车里出来，冲过马路，窜入我窗下的地害楼梯里。我隐约听见他们在问：要多少令人心醉的毒品？八分之一？一盎司？一克？

警方的搜查总有一定的用意。有一天夜里，毒品生意正红火，六辆无牌照的汽车，“咕——”的一声一齐刹在了地音的门口，随后又有几辆有牌子的汽车跟着停了下来。衣冠楚楚的官员冲进地音，就在此时，另一些官员不容分说地制止了街上所有的行人。眨眼间便办妥了一切，四个衣衫褴褛、非法入境的多米尼加卖毒人被抓获，他们脖子上戴着粗实的金项链，手上又添了一副沉重的手铐。路上所有的人都在偷偷地笑着，这天路人们遇到了十多次类似的抓人场面。车门“砰”的一声又一齐被关上，接着便是启动发动机的声音。他们又得在监狱里度过二十四小时，然后付一笔保释金，再付一笔改过自新的保证费，最后再回到大街上去贩卖毒品。

抓这四名新毒贩的警车刚一消失，中产阶级、那普阶层（指美国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高薪阶层——译者注）从四面八方汇集成又一支买毒队伍，等候在外面。转眼的功夫，这里的生意又同往常一样。这地方真是我最理想的试验田，我要来此卧底，追踪那些吸毒者。但是，等我把这个实验性计划付之以行动，还得得到毒品侦缉署和检察官的认可，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得过我的顶头上司乔·伏那克拉这一关。我找了个借口说，自己需要在街道执行些小任务，以便能给我那帮有许多新手的行动组增加些街头工

作的经验。我要逮捕些买毒人，对他们不客气，也许真的会去搜捕那个地下毒品市场。有《时代周刊》的文章为我撑腰，我的提案便成了重要的议案。逮捕买毒人的提案对缉毒署的科级头目来说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这不仅是违背分署头目的政策，同时也是对美国政府和美国司法伦理观的一次挑战。斯图曼喜欢干大事业，这就是要能够接近新闻界的事，这可是毒品战争取胜的一件大事业。你扣留吸毒者，老百姓便指着脊梁骂你，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小事。大概乔自己也是一个街头老特工了，另外我猜他有把柄攥在我的手上，不管怎么他同意这个提案了。“别弄得太过头了。”他告诫道，“你知道‘电视名将’会怎样看待这桩街头案子吗？”

下一步便是我检察官，让他认可这个逮捕计划。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去联邦法院，上那里很难，除非这案子牵涉到知名人士。要获得认可就差这一点了，于是我便同史特林这位纽约城专管毒品的检查官取得联系。我认识史特林已很久了，但总不敢贸然打扰，他是少数几位真诚希望毒品战争取胜的政治实权人物。他好冒险，为厂原则不怕遭惹报刊的攻击。他很赞赏这个提议，立即认可逮捕买毒人。我们便张罗开了。

头天晚上，我领着八个特工，乘着四辆汽车，在大街上穿梭。我坐在车窗口，手里拿着一只报话机。这好似在琵琶桶里捉鱼。到了凌晨三点，我们便逮住了八个白领那普，收缴了几克焦糊糊的毒品、三辆汽车。现在对他们就不客气了。这些家伙嚎叫着，又哭又闹他讲述着他们的职业、家庭，详细交待了卖毒人的特征，在供词上签字，并同意为此作证。他们统统是一群可怜虫，一群受毒害的吸毒人，就先放他们一码。我们抓的已远远超过留在地害里的人。更何况那次行动，又会使过去三年的历史重演。如果我们扣留了这些买毒人，又会捅出什么漏子？我倒真想看看。

从3月24日到3月29日，又过了一周，22号行动组一晚又一晚接连扣留了一些买毒人。大部分人对此开始不以为然了，在供词上签字，哭诉他们以后不再干了。在我看来，有一件事很明显，那就是大部分人再不会在老地方买毒了，他们相信，有可能会再次被捕。我们怎没注意到呢？

到了周末，我逮捕了地害里所有的人，并开出了搜查令，但是流动的买毒者正在减少。与此同时，这种小规模毫无意义的逮捕，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波及地区法律界人士，他们不得不传讯那些买毒者。我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被迫中断这桩事。乔·伏那克拉提出，斯图曼态度坚决，决意要对我的“小规模”逮捕行动进行批判。我终于屈服了，计划搜捕到明天截止，也就是3月30日。这是我最后一晚“惊动”西109号街的买毒人。

九点二十九分，出了件奇怪的事，那里竟连一个买毒人都没有。我们一行十五名特工，隐蔽在通往地音的三个街区的五辆汽车里。大伙都密切注视着周围的动静。街头的小贩依旧在四处走动，像是在说，这一套早就领教过了。公寓的地害里一位顾客也没有。大半个晚上，纽约街头的卖毒者也寥寥无几，没有一个买毒人。两个卖毒人走出地窖子，站在街头上，朝街区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一个说：“QuePasa？”（人呢）另一个环顾一下，耸耸肩，道：“QuiénSabe？”（谁知道）

到了3月30日的傍晚，我们搜查这个地窖时，才发现原来里头早就空荡荡的。他们老早已关闭了一切。三年来，这里第一次停止出售毒品。当然，他们可能已转移到别的安全地点，继续兜售。要是我们国家改变政策，把吸毒作为犯罪进行打击，那么还有什么安全的地点这档子事呢？中国和日本能

做到的，为什么美国就不能呢？

也许是太激动的缘故，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对毒品侦缉署的大人们来说，这正好又是件败坏名声的案子。我对史特林·乔森讲述了有关会同城市的部分巡警，组织一支小分队。在纽约华盛顿高地街区，物色一个卖毒人活动最猖獗的地段，推广这次试验。他一口赞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次是抓那帮卖毒人，计划要通过斯图曼，我估量着，这段时间自己还是安分为好。他对斯特恩事件仍十分地紧张，于是便提出一项计划，想在新闻媒介露面之前，将自己打扮成缉毒开拓者的形象。鬼才相信！让大人们去信吧。我只想给自己换个环境，长长见识，二十五年前我就开始干这行了，我相信该有个结果了，现在也许正是时候。

这项抓卖毒人的计划永远不可能尝试了。“一箭三雕”和“雪峰行动”一直在困扰着我，街头行动是我事业中最后的一线希望，终于也破灭了。

狗杂种们想暗算我！

1988年4月，毒品侦缉署正忙着招聘参加“雪峰行动”的志愿者。我十分鄙视这桩冒险的行动，将年轻的生命一个个地葬送在玻利维亚的丛林中。他们“在波托马克河沿岸推行这项计划”。这些话一宣布，就在我脑子里时时敲起了警钟。倘使在那里死了个把人会咋样呢？大家似乎都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又一次全然不知克制自己的这张嘴。我同个别人私下谈起，我以为“雪峰行动”的那些人也许都有些神经不正常。这只是我对“雪峰行动”的一种感觉，我的话却传得很快。有两三位年轻的特工在报名参加这次行动之前，决意向我讨教，问我如何看待这件事，我毫不含糊地劝他们别去应聘。

4月5日，在我办公桌上，我发现一封很大的封口的信，信封是用牛皮纸制成的美国军用信封。上头写着“收信人：麦克·列文，普通级别”，没有回信的地址。打开一看，是一份由弗朗克·怀特写的十二页的备忘录，评价“雪峰行动”。怀特不是那种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甘愿保持沉默或断章取义的人。备忘录是他对所遇事件进行精心提炼后编写出来的。他严厉指责这项行动：计划粗劣、仓促上马、对特工危险巨大。“除非我们立即修改‘雪峰行动’的作战方案，”怀特写道，“缉毒署的特工们将在这片与世隔绝的森林里一个个被痛苦地折磨而死。”

怀特试图把他的批判集中在条件危险这一点上，丝毫没有提及这次行动完全是一场骗局的本质，也许这点他也已经感觉到了，但并不彻底。他写道：“我并不是有意要重复这番祷告失败的论调，也不想告密。”但是他正在建议肃清动摇思潮，以加强安全，加强战斗力。他提到特工们在怨恨将他们置于危险的境地，他写道：“因为有人对现实情况不加任何的思考与研究。”

说白了：整个计划无法执行，没有能耐执行，我们不想死在一群政客们愚蠢的行动计划之中。

“这是缉毒署明显流行的一种说法，”怀特写道，“‘雪峰行动是不寻常的战争，因而就得有一支不寻常的部队。’正是这个承诺，让我们走进了灾难之中。”这份备忘录接着往下阐述，但总的来说，是对大人物的漠视，只是为了求得特工的苟活。备忘录道：他们派往玻利维亚森林的装备极差，领导能力缺乏，队伍缺乏训练甚至根本就没有受过训练，总之根本没有安全可言，部队既缺乏医疗保障，又缺少行动的主动性，整支部队没有几位听得懂和说得了西班牙语。

最后，怀特在报告里又补充了一些话，大意是：

在我递交这份报告的当天，我接到了一位“雪峰行动”特工打来的电话，请求帮助。那位特工说，他被一百磅烈性炸药爆炸的冲击波卷入了一个秘密通道的洞穴里，这些炸弹都是国外制造的，就如雷管爆炸一样，说来就来，有很大的随机性，根本无法预见。我们也应该采用美国军用炸弹。这位特工告诉我，如果我能传授他怎样操作机关枪，他将永远感激我。我尽管有这方面的技能，但是来得到这方面的许可，去帮助这位朋友。

记住，下回你们就会看见，不知是哪位大人会在那些缉毒署特工的葬礼中，在电视镜头前，装腔作势地解释他的严重失职。怀特的可取之处，在于补充了在玻利维亚的情况。他说的全是真话，只是没有一句提到有关整个行动计划，是否还要继续在波托马克河沿岸大肆宣传，也没有一句提到是否继续驻扎在原先的地方。他的主要意图就是保护美国特工，让他们都活着撤回家园。撤军，对大人们来说是审判这场战争。弗兰克建议，假如缉毒署想在议会讨论之前改变“雪峰行动”的固定模式，应当采取相当于战争时期的措施，将特工都武装起来，像特遣部队似地受训，这项措施可以应付紧急状态的发生。他写道：“必须在1988年底减少流入美国的可卡因的百分之五十。”

4月19日，缉毒署总长约翰·劳恩打电报给所有的分支机构，指出，“雪峰行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电文写道：“困难重重，比我们去年预想的要严重得多。”显然街头特工们并不像劳恩预想的那样热心。他满腔热情的报告里蕴藏着隐隐约约的警告，这一切似乎有点直接冲着我而来：

我无法容忍某些人对考虑、申请、参加“雪峰行动”的特工泼冷水……。

从4月19日那次电报事件之后，大人们腻透了我的那一套，认为我干涉了他们的行动。乔·伏那克拉打电话，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收到总部的指示，“你被派去执行‘雪峰行动’。”他道。

“他们想干什么，难道想杀我？”我道，“罗伯托·苏亚雷斯和哥蒂纳兹仍在悬赏要我的命，而且我刚才在圣地戈又抓了两个拉公司的会员，他们一个月生产的可卡因数目抵得过‘雪峰行动’一年缴获的数量。缉毒署要我去玻利维亚，这不是去送死吗？他们是什么用意？也许他们想设圈套让我钻。”

乔耸耸肩道：“去和凯文谈谈，也许他能帮你。”

心想再和这个小秃子去谈，也已毫无意义了，他会第一个把我弄上飞机。我边想边快步走向幽长的弯弯曲曲的楼道，朝行政办公室走去。凯文·拉加赫是副分局长，他的办公室紧挨着局长斯图曼的办公室。我屏住呼吸，不知不觉地来到他办公室的门口，心想千万别让他看见我。

拉加赫有一副枯瘦的身材，他在反毒战争中转战曼谷、巴黎、纽约的街头，从战斗的第一线已退下来多年了，头发都白了，然而精明干练。谁能比拉加赫知道得清楚：这项蛮干的计划，它的好处实在小得可怜。当我告诉他大人们想让我干的一切时，他毫不惊奇地道：“我都听说了。”他显得有点疲倦，“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不过我可以给特里·伯克打个电话。”

“问问他对此有没有办法？”

特里·伯克就是那个曾写状子告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里将收音机开得很响的那批大人的领头。他对我的成见在缉毒署无人不知。我十分为难。

4月25日，乔·伏那克拉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还没有开口说话，我便从他脸上的表情中得知，他要说些什么。肯定是让我去玻利维亚；拉加赫已给总部打过电话了，重任在肩，不许推托；他们要我去玻利维亚倒霉。此时我完全相信，如果我去，那么就甭想再回来了。大人们在把我当球使，他

们已在向那些拒绝接受调遣的人开刀了。“雪峰行动”按劳恩总长在最近一次电报里的说法，它已成为缉毒署“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死亡或者反抗。我想起特工博比·贝克过去曾跟我在缉毒署的一个空手道队里习武，他被委派参加总部的“雪峰行动”组。他不是什么官僚，也许我可以跟他谈谈。我拨通博比的电话号码，在电话里跟他谈了我的事情。

“列文，你这不又得成为侦探了吗？”他笑道，言下之意是，他也没办法。贝克也无能为力，但他知道谁有办法。他把电话接到了“雪峰行动”组组长劳埃德·克芬顿那里。

“我不知道我是否见过你。”我道。

“我当然已听说过你的大名了。”克芬顿道，“不过这恐怕要跟他妈的天王老子谈。”他笑道，他也没办法。

我思绪翻腾，我像是在秘密接头一般，尽量找些话来应酬。你想依靠这些三流大人，那你甭想。最好的办法是揍他们，强迫他作出决定；对于这一项公报私仇的决定，只有歪着来，如果再不成也是我命中该死。如果我能依靠这些三流蟹将来避过这场灾祸，哪一位大人肯接这个球呢？准肯担这份责任？没有，没有一个敢。克芬顿听我跟他侃我的人生经历，以及我的那次“一箭三雕”行动，不时打断我的话，带着一种不耐烦的“嗯，噢……”声。

“哎——”他说着，做作地发出咯咯的笑声，这笑声带有某种意图，“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你会到过那里，你怎么不去见识一下那里的文明呢？我的意思，你应该去森林。”又是一阵做作的笑声。

我想从他那里打探个究竟。我和他彼此都明白，不管哪里，他们总要把我派出去的，这只是迟早的事。走之前，我得表明我愿意去所有的国家。“将红旗插在房顶上这是件有趣的事。”我道。

“你还有什么别的计划？”克芬顿冷冷地道。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会派我去那该死的森林。等我死了之后，他很可能会跟那帮家伙一起来看我的尸体。

先生们、女士们、美国的纳税人们，他们要杀列文了，这是一场迫害。我们需要更多的线索，来制止那些罪恶的毒泉。我心里纳闷，到底是谁在摆布一切。现在是打他个措手不及的时候了。

“我乐意前往。”我听自己那么道，“我唯一的要求是，那些长官把我的身份调一个，我现在不想以麦克·列文的名字参加这次行动。今天我就把我的生平证明寄给你。”

过了好一会，他终于说：“没有这个必要吧。”

我要他中我的圈套，来了个将计就计。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如何如何地喜欢参加这次行动。

“我们也许不很需要你参加这次远征。”他说，“再过几个月，不管出了什么事，都得启程了。”

“跟上头说一声，我很高兴参加这次远征。”我记得自己这么说，这又是一次表露，可实在有点太频繁，“有一件事，我要求他们派我去玻利维亚得用其他的名字。”

又停顿了好一会，然后克芬顿说：“好吧……，你的枪伤怎么样？”

“你是说我的牛痘疤吗？”我心里一沉，他是非要我去不可了。

“好吧，”克芬顿道，“我会给你一个急救包的，这个包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好吧，”我慢吞吞地答道，“也许除了玻利维亚外他们说不定会派我去别的地方。”“雪峰行动”还有其他十一个国家参加，是一次国际联合行动。

“那里才需要你。”克芬顿最后道。他指的那里当然是指玻利维亚。

我挂断了电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克芬顿不想看见那份带威吓性的“生平证明”，好，我不想给他有选择的余地。对付官僚，想得到幸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切都写下来。我将转椅转到打字机的前面，用力地压上一张纸，像是在说：滚他妈的，离职算了。十个指头用力地在打字机的键盘上摁个不停。我循着同克芬顿通话内容的路子，重申反对派我去玻利维亚的决定，并附上一份电报的复印件，以及在玻利维亚、已西、巴拉圭写的调查报告，主要反映那里正悬赏二十万美元要我的性命，悬赏令用西班牙语写着：“El agente de IDEA, Mike Levine, el Judiotrigue ode Argentina (缉毒署特工麦克·列文，咖啡色的肤色，犹太人，非阿根廷公民)”。我把材料打成一式好几份，一份留底，然后分发给我的上司人手一份，一份给总部的高级官员，一份给我的律师。这份文件到现在还叫那些大人们不敢忽视这只已踢出去的皮球。至少在我离开家去地狱之际，也留下一份很好的法律依据。

我的备忘录完稿时，已是4月27日，毒品侦缉署总部新任的第二把手特里·贝克亲自打电话给我。令我奇怪的是，他在电话里显得十分真诚。“嗨，我可真不想再提十年前你毁了我度假的旧事。”他向我承认道，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事。这是苏亚雷斯案种下的恶果，当时我被稽查处看得很紧，贝克是三位去阿根廷对我工作进行评估的稽察官之一。那些家伙收集了我的黑材料，告我在美国大使馆内“故意让收音机播放摇滚音乐，而且放得很响”；“不知道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地点”；……我写过材料反驳这份调查内容，事后，大人们真的将一切都纠正过来，对此我自鸣得意，而贝克却不得不中断圣诞度假，让他解释这一切。

“噢，是你啊，我还不知道。”我对他的承认感到吃惊。

“我不知道怎么会让你去玻利维亚的。”

我苦苦思索着，追忆起刚递交的那份备忘录里批评他和他领导的大人们让我暴露身份去冒过于大的风险。想到这里便道：“噢？你不知道，我想所有的人知道了。”

“我不知道！麦克，我为什么想到你，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玻利维亚的情况不很熟，还没有到过可卡因生产基地奔尼，也没有建立一个情报网络。”这个臭名远扬的玻利维亚可卡因生产基地奔尼，就是我的那位“老朋友”苏亚雷斯的家乡。

“噢，喔。”我道，心里琢磨着为什么这家伙要亲自打电话给我。

“我正在想，有谁能率先跟某些决策人物反映反映，让那些年轻人能在那里降落，这是一点；第二点，让一切都走上正规，而不是老在直升机上盘旋，浪费汽油。”

这是他的本意吗？难道就没有一点为泄私愤，才派这个捣蛋鬼列文去玻利维亚的欲望吗？我根本就不信。浪费汽油？不是他亲口对我说“雪峰行动”无法开展吗？我奇怪，这简直是废话，这得跟议会反映。过了一会，我考虑去玻利维亚亲眼看看，“假若能给我个假身份，那么我会十分高兴的……。”我的整句话的潜台词是，如果你敢出具一份假身份证明，那么我就去。此时我已无所顾忌了。

“不可能了，我不能给你这次机会了，麦克。”

当然你不会，我心里暗想，如果没有那份备忘录放在你办公室的台子上，谅你也不会就此罢休的。“我已准备好上阵了，不要管你的那些人怎么想。”我道，“你是对的，这次行动应该放在玻利维亚。”

“嗯，你知道我怕什么吗？我们在九十天内，将特工陆续降落在那里。他们都到齐了，他们还要接受各种飞行前的训练。”

他的声音就好像贾杰·鲁曼在说：这次行动真是可笑之极，拿一百万美元来做游戏。我决定调个话题，把话引到苏亚雷斯案和“一箭三雕”上头来。“我想告诉你我在阿根廷时的一些成功经验，我要建议你们到了国外尤其是进入玻利维亚，千万别追根究底，因为这关系到秘密行动的结果。平心而论，我们怎么能抓到罗伯托·苏亚雷斯呢？我们最多只能派些谍报员去。那些玻利维亚的毒品贵族，也不想离开玻利维亚的。”我接着道，“举个例子吧，假如你查阅过即将审理的圣地戈的‘一箭三雕’案卷，你就会发觉我们是怎样在玻利维亚绞尽脑汁引玻利维亚人出洞的。”

“你知道，”贝克道，“当司法部长米斯和约翰·劳恩一下飞机，玻利维亚人就向我们提出，‘请给我们一份“一箭三雕”的起诉书，要不然就把他送上飞机。’我们的一位女秘书花了三天的时间，把这份神圣的起诉书通过电传发了过去……玻利维亚人和米斯部长打哑谜，还好没有出事。”

“送谁？”

“他们把罗伯托·苏亚雷斯送上飞机。”

这绝对不可能。苏亚雷斯对玻利维亚人来说是个英雄，而米斯只是个虚伪的外国佬，一位政客而已。但是谁能知道这些呢？真是荒唐。“不是苏亚雷斯，我谈的是最近发生在圣地戈郊外的这起诉讼案。”

“噢？可是这个墨西哥人和玻利维亚人联手的那个案子？”

“对了。”

“是啊，我在玻利维亚着陆了，还引别人去实验室，你会在杂志《缉毒世界》上看到好些照片。”“不是开玩笑吧？”我边说边想：引别人去实验室？鲁曼和瓦加斯的实验室？据我所知，这家伙终日呆在办公室里，也许他是在地图上用铅笔引路吧？

“不骗你。”

“我看了照片一定会感到吃惊的。”

“那地方真叫有趣，我太兴奋了。”

只有当官的才会说那种话。

“好吧！那就祝‘雪峰行动’胜利成功吧。”我不无讽刺地道。“噢，谢谢！”贝克感叹地道。

我就此放下电话。夸夸其谈地说了不少客套，到了末了我猛地一下放下电话筒。“一箭三雕”被歪曲成“雪峰行动”成功的结果。

第十章 等待法庭最后的审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个子两米出头的战神帕球，他身材魁伟，皮肤黝黑。有位阿根廷的巫师告诉我，他是我生命的守护神。我只在这场梦里见过他一回。他一句话不说，端着长矛直挺挺地站在我的身旁，眼睛注视着周围那片黑暗。我转身望去，才知道自己立在这片黑暗之中，街头满是一幢幢的空楼，不知是什么地方。一个模糊的黑影从黑暗里朝我逼来。我赶忙去寻帕球，可他已不见了，我从梦里惊醒。我可不是信鬼神的人，但是这么多年来，我总是很走运，我的运气总有一天要离去的。近几周我老是心神不定，预感自己要出事。这个预感果然灵验，终于，出了一桩麻烦事。

4月6日，纽约分局长斯图曼，这个好在新闻媒介上出风头的家伙，让我带上法通社记者威廉·福雷德肯和《时代周刊》的摄影记者弗兰克·米克罗特，参加我们行动组的袭击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圣尼赫鲁大街138号的公寓底楼里搜查可卡因，捣毁窝点，实施逮捕。情报员购买了部分毒品后报告说，这地方是一伙臭名昭著的牙买加武装匪徒开设的，全是帮亡命之徒，曾是牙买加返非主义运动的武装人员，因而非得用武力不可。

我决定将车停在街头125号赫德森河的附近。包括两名记者在内，咱们总共二十六人，大家就像参加哥们儿聚会一般。那天下午，天色灰蒙蒙的，有点阴冷。大伙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忧郁，不知道他们是否也有那种无法摆脱的同样的预感，可我帮不了他们。死神牵着我卷进了这场袭击行动。这真是件棘手的事。

我们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孬种龟缩在那幢公寓里。情报员好几次注意到那里约有十二个人，总是并排地摆满了枪，其中有一支冲锋枪。更麻烦的是，他们还安装了一套闭路电视系统。只要我一走进大厅，靠近那里，里头的人就会得到警报。我们必须行动快速，捷足先登。

好了，没有时间再去考虑了……。

咱们唯一的一件重武器是我的搭档威利·格雷那支十二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威利是越战退伍的老兵，他总喜欢唠叨个没完：“嗨，这鬼枪令人想起越战。”就在前几周，在街头的一次搜捕中，威利就是用这支“鬼枪”搏斗了一番，他端着枪，边冲边开枪，在不远处倒下去一大片犯人，好像他就在当年的战场上一般。

令我庆幸的是，那幢建筑物造在一个斜坡上。造成后窗落差至少有六米来深，因此，我就只派了三个人隐蔽在屋后。我估计如果打斗起来，不会有人敢从这么高的地方跳窗而逃的。其余的人都得从房子的正门破门而入，然后快速通过摄像机的监视镜头，摧毁公寓过道后面的大门。

约下午四点，我们一支小型车队停在了据点南面的三个街区里。我派那位情报员先进去谈买毒品的事。大约十分钟之后，他出来了，我们在街头碰头。他面带惧色地向我报告道：“里头约有十二个人，有些是他们的顾客，我还看见起码有三支枪。”说完呆呆地望着我，等我的反应。我让情报员离得远远的不要回来，免得让人生疑。心里不禁又打了个寒颤，回想起那个恶梦来。威廉·福雷德肯站在我的边上，将一切都录了下来。他瞪大了双眼，显得异常激动，一点没有害怕的样子，我不知道这家伙到底见没见过这种动真格的场面。我对他道：“再呆会儿我们就得冲进去了。”他说，他想跟我们一起攻进去。这家伙一定是疯了。“你是我的客人。”我道。

被指定进攻正门的伙计们都隐蔽在一辆大篷车的后头。我向他们又重复

了情报员的话。他们中有两三个人拼命在胸前划着十字。“都穿上防弹衣了吗？”我问。“都穿上了。”他们回答。我没有什么话可交待的了，只是再次重申那句讲了成千上百次的话：“行。记住，这不值咱们去献生，安全第一！出发吧！”我又打了个寒颤。可我已顾不上这一切了，一切都被我抛到了脑后。

车队从三个街区缓缓驶向目标。我同福雷德肯以及那位《时代周刊》的摄影师所坐的那辆车紧跟在大篷车的后头。当我们一个个穿过街头时，马路两旁的行人都惊诧地望着我们。我的头“嗡”的一声响了。我一只手拿着那对讲机，另一只手接着那支九毫米口径的自动手枪。一串奔跑的脚步声，一阵急促的喘气声，又一阵低低的咒骂声。只听见我喊道：“快！快！快！”而心在“砰！砰！”地猛跳。我琢磨着能否活着度过这难关。

被指定派到后窗的那几位迅速迂回过去，不一会就不见了。我们一拥而上，从大厅的监视镜下闯了过去。他们看见我们的行踪了？他们作出什么反应，是开枪还是逃跑？一个身材魁梧的墨西哥人慌忙关门，想跑上楼去，很快，我看见他已淹没在一阵拳头里。有人嚎叫着“警察！警察！”我又听见一阵破门而入的响声。我前面正好有一团黑影，门朝内打开，“唰”地一下照亮了这团黑影。我冲了进去，突然间已到了一幢乌烟瘴气的公寓里，阴森森的房间显得有点拥挤。随着巨大的爆炸声，一位肉墩墩的黑人妇女双手捂着脑袋，摆出投降的架势。我冲了过去，她两眼翻白，吓作一团。这地方到处充满着恐怖与死亡。慌乱中我的脚踢到地上横躺着的一杆枪，踉跄地朝前冲了几步。一个身影跑进后屋，不见了，我跟了进去。突然我听到“咳咕——”的一声，像是子弹与枪膛磨擦发出的可怕声音，原来威利正站在我后头，一个弹壳从他那挺机关枪里掉了出来落到屋里。

后屋正在激战着，这个两米高的大个儿猫着腰，蠕动着身躯，正注视着那位返非主义者，他试图从一扇小窗口里跳出去逃跑。那家伙手抓住窗框，惊呆了，不敢从窗口往下跳。他瞧见下面他的五位同党像肉饼似地躺在硬梆梆的水门汀上，鲜血直流。为此，他迟疑了一下。我正好有时间放下那对讲机，腾出一只手来，一把抓住他衬衣的后背，衣领正好扼住这家伙颈部的喉结。我转身朝边上望去，吓了一大跳。原来房里只有我和威利两个人，那些坏蛋已都转过身来，注视着我和那个被我揪住的家伙。一场恶战一触即发。我一面紧攥着那家伙的衬衣不放，一面用枪揍他。边上的威利用枪托使劲地敲他的头。我用力地打，边打边喊，大概这也是一种喊“救命”的方法吧。等其他特工听到打斗声，赶到这房里时，只听见一阵震耳欲聋的枪声。

枪声过后突然安静了，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所有的人，坏人，好人，都一样，都卧在地板上一动不动。一股烟雾慢慢地向空中飘散开去。“都没事吗？”我问。感谢上帝，总算没有人受伤。就在我和另一位特工吉米之间的地板上，堆积了好些一颗颗圆圆的致命的弹头。我俩都差点被击中。

大厅里挺着一堆可怕的尸体，威廉·弗雷德肯把肩上扛着的录音机高高地朝空中挥动，瞅着我说了句：“我喜欢这一切。”

“我知道你的心情。”我不冷不热地道，“还有什么人喜欢这种‘好’事？”

4月19日，“雪峰行动”宣布在玻利维亚缴获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批可卡因。一共是一千三百七十五磅。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罗伯特·吉尔伯德道：“无疑这已超过了去年一年缴获的所有可卡因的数目。”这话是1989年4

月 19 日美联社记者彼特·麦弗雷透露的。这只不过是鲁曼实验室两天的产量。

天气渐渐转暖，商务也逐步繁忙起来。这中间我又着手办理了另外六桩袭击案子，但都因心绪不宁而忘却。5 月 4 日这天，我正计划着又一件袭击案。这次计划是冲着华盛顿高地街区的那帮多米尼加毒品贩子而去的。既固定又流动的行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是我从“一箭三雕”中汲取的经验，也是我多少个不眠之夜摸索的结果。

下午三点整，我坐在一辆无线电指挥车里，指挥十六名缉毒署特工乘坐八辆化装过的汽车，采用两面夹击的战术包围西街 154 号那幢楼，此楼我曾有过两次搜查行动。秘密特工扮成买毒人的模样，我们的逮捕证上指明要逮捕三个毒贩子。我坐在汽车里，发动机“突突突”地响着慢速前进，刚走到 154 号与百老汇的拐角处，汽车熄火了。我命令刘易斯·彼萨罗悄悄下车去买毒品，然后一踩油门，车又行驶在大街上。我们得马上从这里挪开。刹时间，街道的两头出现了好些人，都呆在车里，这便引起了路人的注意。

几分钟后，我从对讲机里听到刘易斯的声音：他们都在往外冲，已有二三十个毒品贩从这里跑出去了，街道上围满了人。

我手握对讲机的麦克风喊道：“OK，动手吧！开始！开始！开始！”我猛地打开车顶上的那盏一闪一闪的红色警灯，这辆棕色的卡马罗轿车绕过拐角，飞驶在长长的街道上，另外三辆紧跟在我的后头飞奔起来。前方不远处，我看见另一队人马正呼啸着从又一头飞车过来，等接近目标，大伙一齐从四面八方冲向街头逃窜的卖毒人。

我将车刹在一幢二次大战之前营造的老式洋房跟前，认出有个罪犯正跑着窜进这幢洋房的园子里。我穷追不放。和我一起冲进这幢洋房的还有威利·格雷以及其他同伴，他们都同我一起参加过另外六桩袭击案。我们的身后，警笛声、尖叫声交织在一起。我就喜欢这声音，听了让人感到全身充满了活力。

我们撞击一间关着门的公寓门厅，门厅的另一头是漆黑的一片。这间公寓曾被我们搜查过。木槌终于砸开了那扇门，我冲了进去，手里握着把短枪，跟随着声响又穿越到了另一间陌生的公寓里。我赶到后间的卧室，正巧碰见一个男子持枪从窗口上纵了出去。这只是底楼的公寓，会有多高呢？我跟着也跳出了窗口。心中急于想着追击，只觉得肚子贴着肋骨一阵剧烈地震动，人已到了地上。那个家伙着地，从地上跃起就跑，我能听到那个家伙两条腿在地面上奔跑敲击路面发出的“噔噔”声。我完全错误地估计了窗口的高度。也许是上帝在为上个月出事的那帮返非主义者讨回个公道，当我最后落在地上时，我被震呆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从脚心一直到背部浑身酸痛。这两者之间截然不同：一个是四十八岁的犹太毒品警察，另一个是二十二岁的多米尼加逃犯，他起身还能奔跑。

我挣扎着起身，威利从窗口探身望着我，那窗口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威利的表情像是在埋怨我：是怎么想的，一定是疯了。“你没有事吗？”他问道。我心中无数，但又不知怎么说：“请把我那只对讲机扔下来，我的腿是断了。”我的踝部肿出鞋子，脚几乎撑不住任何重量。威利从窗口掷下那只对讲机给我。我拔出手枪，一瘸一拐地朝巷口走去。整个后园像是都被围墙围住的，那家伙就很有可能被圈在里头，再转回来被我撞见。

我不自觉地向后园的上面望去，见有一垛两米高的围墙，墙头上站着一

群巴基斯坦籍的建筑民工，他们一张张苍白而恐惧的脸注视着我。其中一位用结结巴巴的英文说道：“他往那里去了。”他朝那家伙的后背指了指。这个逃跑的毒贩子，从窗口跳下来，不但安然无恙而且还能翻越两米高的围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毫无法子。

对讲机里传来了呼救声。我的目光从那角落里转到又一件突发事件。我转过身，正好撞见一只巨大的德国猎犬朝我奔来。它一声不吭，这是它的惯用伎俩，它眼睛充血，张牙舞爪地朝我扑了过来。我正好攥枪在手上，急忙向它开了一枪。刹那间，这条狗受伤倒下。这东西正好让我的枪先解解馋，当然这也是我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我又往它的头部开了一枪，这尤物确实死了。

“啊！太棒了！”一个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我转过身来，原来是第一次参加袭击行动的新手华利·凯那克。他就站在我的身后。“真像一部森林电影，我的意思是它冲锋的样儿。”华利道。他和另一位特工尼斯·西蒙都是第一次听见枪声，激动得像我一样，从窗口上纵了下来，想来增援我。他俩跳下来均未受伤。在这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太老了，老到了不适合这种职业了。

打扫战场时，才知道放出来咬我的狗，是被毒贩子喂养在地害里，专门用来袭击联邦官员的。我受伤了，要在越南战场上，那被称作为“富贵之伤”，因为那样永远就可以什么也甭干了。我的腿和背分别上了夹板和护腰，被送进医院。医生嘱咐我年内不能再有剧烈运动了。直到1989年1月，“一箭三雕”审判之前，我就再未执行过任务。跌伤的后遗症就一直留在我的身上，不时会觉得疼痛难受。但奇怪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还得感谢这次受伤。我总觉得帕球战神在从中保佑着我，使我免于死，躲过了大人们安排的一次葬礼。

5月20日，“雪峰行动”中第一位缉毒特工不幸遇难。他叫雷克·樊利，与他一起遇难的还有其他八个非缉毒署特工。飞机载着他从“雪峰行动”的露营地出发，在秘鲁境内突然坠毁。

暗杀与谎言：

6月22日，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在向缉毒署提供的一份情报中指出：“麦德林可卡因卡特尔已将所有袭击它或跟袭击它有关联的人，列入一份黑名单。”在黑名单上，就有我的名字；名单上还有史特林·乔森，纽约毒品检察官；还有其他四名缉毒署的特工。所有的人都是反毒前线的斗士，或是秘密工作者，或是哥伦比亚可卡因案的办案特工。这份情报中还指出：哥伦比亚人的目标还对准了一位特工的妻子。

令我吃惊的是，公众对这类丑恶的事件印象深刻。这大概是报纸上的大肆宣扬吧。特工只要在街头缉毒时间干长了，并且又常常受到暗中的威胁，他的妻子总是担惊受怕，最终要求离婚。这类事常有发生，有的几乎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我那帮哥儿们中，威利·格雷就是其中之一。纽约周围的一半毒品贩子都要他的命，每次逮捕之后，他总要在毒品贩子的脸上留下个记号。我们在附近宣称调查暗杀事件，并拘留了相当一批地痞流氓，最主要的是，假若你被那些恐吓吓破了胆，那么你最好把缉毒的像章交出来，因为这一行不适合你。这一行要求你有相当的个人素质。

我当了二十五年的特工了，最终还在做秘密工作。成千上百个报告里提到要暗杀我，但是只有四件事令我格外地担心，特别地小心。然而要警惕的

事，实在太多了，多得连我自己都记不过来了。第一件事，是为了秘密侦破工作，我在“摩托车帮会”整整呆了三个月。这伙杂种有一种病态的心理，他们认为杀人是一种男子汉气概的表现。这一切都已在我的一本传记《卧底》中提到过。他们时时刻刻都可能把我给杀了。但是那些白痴孤陋寡闻，脑子死板，按情况显示，我怀疑他们一直都在迈阿密寻找我的踪影。

第二件事就是罗伯托·苏亚雷斯的暗杀令，这是个完整的故事。据一些情报员提供的情报说，在南美好几个国家，那帮人雇杀手，悬赏我的脑袋。他们还想搞到我的材料：长得什么样、何处可以找到我。一份情报说，他们甚至不问材料的内容与价值，只要响应者是出于真诚愿望。

第三件事是我承办的“虎”行动对玻利维亚前内政部长路易斯·阿荷·戈曼兹进行的调查，并最终将他送上法庭。还有一位被送上法庭的是人称“帕博”的杀人如麻的哥伦比亚头号杀手奥克塔维欧·麦加（注：路易斯从来未被引渡到美国，因而起诉至今搁着，也未被判罪。麦加被判刑三十年。1989年10月，此案的又一位被告安娜·托玛雅在哥伦比亚的一次缉毒战中被俘后，被引渡到美国）。

最后一件令我担心的事，那就是错综复杂的“一箭三雕”。戴维·卫腊、乔治·尤瓦乔无疑已深深地烙在我心中。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捍卫自己的生命。我再不可能去巴拿马、墨西哥、玻利维亚这些地方度假了。

我收到这份最新的情报，便彬彬有礼地打电话给史特林·乔森。我俩对这份情报都一笑了之。如果麦德林卡特来美国杀缉毒署的特工，那么他们驻扎在哥伦比亚的整伙人才会真正受到威胁。感谢上帝，我们派往哥伦比亚的特工，在十年里，无一身亡。至于暗杀的事，所有缉毒警察都意识到，这只是情报员用来赚钱的手段。反正政府愿意出钱购买这些情报。对那些街头线人情报员来说，很容易地就赚到了两三百元的美钞。倒是那些毫无经验的特工对此十分害怕，好像真会被暗杀一般。

从另一角度来说，我和史特林反倒觉得是件悲哀的事，因为哥伦比亚人来牧害美国的官员，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如果这不是儿戏的话，那么我们竭力采用法律的机器来制止他们犯罪的行动，显然是荒唐可笑、毫无效果的。纽约一年缴获的可卡因总数还不到鲁曼实验室两个月生产的数量。就算我们的缉毒再怎么无成效，也会引起可卡因价格的直线上涨，那么为什么哥伦比亚的可卡因贩子要杀美国官员呢？这根本就毫无道理。如果麦德林卡特在过去几十年里已证明他们自己是地道完美的商人，那么暗杀美国官员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只能证明他们是拙劣透顶的商人。

所以当我7月2日看到新闻中报道有关威吓我生命安全的事，又惊又奇。也许有人忽视了这条消息：

据联邦权威人士透露，毒袅们已将纽约市毒品检察官史特林·乔森列入暗杀名单，他是怎样对待这种威吓

的呢？他说：“我要继续永远地捍卫我的职责，我要继续打击他们，直到把这伙地痞流氓打得鼻青眼肿为止。”

在新的一份黑名单上，阶有乔来和另一位迈阿密检察官外，还有四位毒品侦缉署的特工人员，其中还有一名特工的妻子。这正说明了麦德林卡特尔的恶毒残暴的本质。

我对此毫不奇怪，隔一段时间后，那些情报员也就是消息的制造者，又会开动造谣的机器编撰出拙劣的消息来。

一星期之后，又一位情报员提供了类似的威吓暗杀密报。这次要杀的是缉毒署纽约分署局长罗伯特·斯图曼、市长爱德华·科尔和州长马利奥·柯姆。市长科尔表示他很高兴，居然有幸被列入这份黑名单里。州长柯姆似乎有点出乎意料，仅报以嫣然一笑。在此之后，又有好些警察的名字被列入这份哥伦比亚人的黑名单中，也就被人们所关注起来。但是斯图曼的反应与众不同，这本来就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

在纽约毒品侦缉署的指挥部里，正在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与会者是来自各行动组的特工，大家一起聆听“斯图曼防卫值班措施”。这项措施是二十小时全天值班制度，当然得挑选些精兵强将。毒品调查等层出不穷，有些直接牵动了世界上最杰出的毒品调查人员，这些名人从世界各地纷纷介入，吓得这位缉毒分署的决策者整天在饭桌上、在电视荧幕上频频亮相，发表谈话。为了个人的人身安全，为了保证不被暗杀，在我们电梯外的大厅里布上了全副武装的卫兵。纽约警察署要求在纽约缉毒分署的指挥部里，长期采取两人收发值班制度。

在我早期的职业生涯里，也曾常常被派去加强安全警卫工作，为保卫尼克松总统、约翰逊总统、汉弗莱副总统以及各种外交事务担任警卫，也保卫过总统候选人等等。斯图曼防卫值班措施可和以上的任何措施相媲美。我一生中最失望的一件事，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儿子也跟着作为巡警，被派往北中区，站在雨里守卫着这位被惊吓得可怜的斯图曼先生。他躲在别墅里，周围布满了武装到牙齿的缉毒署的特工，电网、防弹玻璃、私人侦探包围了这个可怜先生。

“电视名将”则一个又一个举行着记者招待会，解释他被列入谋杀名单的原因：“缉毒署搜缴了两个巨大的可卡因地下摊点，激怒了麦德林卡特尔，破坏了他们苦心经营的纽约市场。”他的形象不断在各种节目中露面，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晚间新闻》里，“电视名将”出现在荧幕上，被采访他作为哥伦比亚暗杀名单上的成员有何感想暗杀令上怎么又有了他？这正使他有幸一举成为国家级的“名将”了。大概没有人记得，在几年前也曾有过类似的事件发生。当时还有一位毒品位缉署波士顿的分局长上了名单，理由是他干扰了可卡因流入新英格兰地区。

这起源于真正毒品贩子们饭后茶余的娱乐，他们习惯于欣赏这种不可思议的恶作剧，来取乐公众，但是随着时间和情节的发展，连续不断地出现了这类情况，弄得我们大家处于尴尬的境地。这类谣言的真实性，甚至连那帮大人都怀疑起来。现在这种玩笑又开始席卷纽约的白领阶层了。有一幅精装的世界地图上，被标上许多个箭头，像是出于女人的手笔，箭头分布的面很广，一直涉及到南北两极，每个方向分布得既不对称也无规则。斯图曼的安全路线也包含在内。

最后，稽查处的一位稽查员详细地一一讲述了各种制造假情报的线人的罪行。斯图曼在这场考验中败下阵来，大家也不觉着奇怪。

我知道的这条消息没有在《晚间新闻》上以及任何新闻网中披露过，也没有见过报。事实上这条消息在缉毒署内部也鲜为人知。这项“保卫值班”措施也就被暗暗地取消了，也未再加评论。安全保卫员站在大厅里足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为此斯图曼已向中央情报局递交了一份长篇大论，要不惜代价破获“暗杀令事件”。几个月之后，这份报告的内容被美联社记者撰写成故事。当我读到这段故事情节时，觉得有一种压抑危机。这段故事就刊登在《休

士顿记实》里，它描写了发生在缉毒署的一个冒牌毒品袭击案，是为让特工获得毒梟的秘密（这个故事在 1988 年 11 月 27 日被收入美联社第 1530 号奇闻）。

“ ‘ 调查过程和平常一样， ’ 毒品侦缉署在华盛顿的发言人莫里斯·希尔道， ‘ 但等调查一开始，我就不能告诉你们具体的进展情况。 ’ ” 故事详细地讲述缉毒署如何赞赏当地警方对新闻界的撒谎。故事有这么个情节：“ 报纸上转载了这次虚假的搜缴情况，大帮倒忙，使毒品贩子们也信以为真。

“ ‘ 如果缉毒署对有关的问题想欺骗新闻界，欺骗公众，那么他们还想干什么其他的欺骗勾当呢？ ’ 《休士顿记实》的编辑托尼·佩德逊问道。

“ ‘ 这似乎没有义务表明整个过程。 ’ 佩德逊补充， ‘ 至少让有关法官复审，这样有利于制止其他执行机关的弄虚作假，重要典型得有人监督，但是如果有人愿意监督，又有谁来复审这个过程呢？ ’ ”

“ 保尔·拉罗克，一位达拉斯‘南基督教卫理公会大学’新闻学副教授请问道： ‘ 如果报纸成了政府的手腕，那么如何来取信报纸的读者呢？ ’ ” 换句话说：公众不会相信政府宣传的毒品战争情况。长期以来，容忍大人和政客在新闻界泰然处之的撒谎，那样儿简直就同越战一模一样。他们哄骗着我们踏上另一场流血的战争。

在随后的七个月里，我的街头缉毒战演变成战争理赔处，要求赔款的医疗费单据很快就堆积如山。就在这时候，由唐纳德·戈达德撰写的一本反映我早期秘密生涯的书《卧底》问世了。在临近出版的前夕，缉毒署的公关人员传阅了这本书的手稿。他们读后极不满意，尤其是书里提到的我在南布罗斯的那段街头帮会生活，还有我兄弟服海洛因自杀。书里描写了我在官场刚正不阿的光辉形象。

“ 你在缉毒署是位传奇的人物， ” 缉毒署总部的一位官员多尔蒂道， “ 我们不能让外界知道我们雇佣了像你这样的人。 ”

我呆了一会，想看看他是否在开玩笑，他非正式地命令我，如果不删改书里的内容就甭想出版。之后又毫无理由地禁止我在公开场合露面。我在总部的一个耳目提醒我：我对毒品战争的一系列观点，尤其是对“雪峰行动”的看法，引起他们的担心，这种担心超出了任何其他的忧郁。

许多年来，我已在缉毒署的行动中频繁地露面，成为勇于冒险的秘密特工的一名代表。我耐人寻味的形象博得公众喝彩，几乎成为广播节目报道的热点之一。1986 年 8 月 26 日，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的 DWSA 电台要采访我，大人们对此十分感冒，他们怕我会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于是只同意采访必须有人作陪，陪同就在我的边上。让这位陪同直接控制对我的采访，理由只是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

这种担忧天长日久便生出了罗伯托·苏亚雷斯案里跑出个稽查处调查的事。现在他们首先要调查的是，我是否经过官方的许可与人合作出书。如果确定没有的话，书要被销毁掉，我二十五年的秘密工作将一笔勾销，甚至连退休金都拿不到。这项调查比对我那份四十二页的“一箭三雕”备忘录查得更凶，投入的时间更长。尽管大人们想通过稽查处来查清并找到开除我的证据，结果还是宣布同意让我享有退休的权力。

“一箭三雕”行动的审理就在这时候，在圣地戈、华盛顿和墨西哥城，一场围绕“一箭三雕”的辩论正闹得风风火火。争论的焦点是审理和取证，

这才是第一次集中地暴露出毒品战争最虚伪和丑恶的一面，为什么我们在战斗中永远不能取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像一幢支离破碎的房屋即将倒塌。

如果这样评价是正确的话，那么“一箭三雕”行动就意味着一点，墨西哥政府应该接受这个事实。卡伦萨上校是带着墨西哥军事学院毕业生年鉴来圣地戈见“路易”的。在摄像机镜头前，他同我这个冒牌的毒枭透露了所有政府官员大多与他共过事。他甚至提到墨西哥安全防卫总司令贾·阿勒伏·加德奎将军也能帮忙。从柯卡·卡玛利纳这位缉毒署特工兄弟被墨西哥警方活活打死之事，到走私毒品以及之后的一系列事件，都受到墨西哥政府的庇护与掩盖。这些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如果这些指控被证明是确实可信的，墨西哥政府就负有許多不可逃脱的责任。

美国国务院每年签发给毒源国家的许可证，是我们反毒斗争中可以信赖的合作标志。1986年提出一项毒品综合议案，要求总统明确接受“全面合作”，给予各种援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墨西哥政府对卡玛利纳谋杀案加以掩盖、包庇，尽管墨西哥政府的许多法律责任根本不予履行，但是，墨西哥政府作为“合作国家”仍然收到美国纳税人支付的一年五百多万美元的援助。另外，假若墨西哥当局收回承诺，那么所有的美国议员们就会要求世界发展银行否决并反对再给他们提供任何贷款。

墨西哥当局总是在领会美国国务院挤眉弄眼的暗示，他们能做的只有在还未得出合作不够的结论之前，急急忙忙地拥入德克萨斯州或者加利福尼亚州。卡玛利纳被谋杀之后掀起一股怒潮，使得墨西哥人学乖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法院的各位法官身上，像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这类人物都和他们促膝谈心。墨西哥当局甚至也和毒品侦缉署拉上关系。墨西哥一位联邦调查局头目在卡玛利纳谋杀事件中表明，尽管他们通力合作，但都没有奏效；与其说他们尽了力了，不如说他们对美国国务院提出的要求竭尽全力。但是，“一箭三雕”逮捕行动离卡玛利纳事件实在是挨得太近了，这桩丑闻或许实在太丑、太臭了。墨西哥面临着失去“合作国家”待遇的危机。除非他们能提出对这桩案子的质疑。得感谢司法部长米斯，他打电话给墨西哥司法部长，在逮捕执行之际提醒他们有关“一箭三雕”行动的进程，这就形成了与美国公众的对立。

海关的一位不知名的官员对米斯的做法十分气愤，他说：“一个电话说明了一切。”我不知道让全美广播公司的摄影师在十二月份的那个晚上悄悄溜进秘密别墅这个决定的作出，是否也有这位官员的一份意见。

墨西哥政府官员指出：卡伦萨上校已离开军界十八年了，现在和军队没有任何的瓜葛；那位帕罗·吉荣也不是什么联邦警察；赫克特·阿瓦兰兹和总统或者执政党根本毫无关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家伙全是些骗子，他们的目的在于骗取秘密特工手里的那笔钱。

墨西哥当局在美国大使中寻求直接的同盟，查尔斯·皮勒德就是其中之一，此人后来与包括贾·阿勒伏·加德奎在内的政府官员遥相呼应，完全赞同这是一起诈骗案的结论。2月12日，在《圣地戈联盟》的新闻报道中，有篇题为《美国专家对墨西哥毒品案磁带内容的分析》的文章摘录了美国大使的这段话：

因为我们被诈骗所愚弄，在整个过程中那些心存疑虑的人，甚至怀疑波班·席尔瓦将军等等一些高级将领，这是所有人的错觉，不管波班·席尔瓦

将军是否守法，我们都必须找出证据来，现在我们正在作这方面的努力。

文章的大部分内容对我来说觉得由衷的不安，我估计这家报纸为了达到欺骗的目的，有意刊出错误的消息：

美国正打算派出一支由视听专家组成的队伍前往墨西哥，为调查确证上月在圣地戈毒品走私起诉案中，一盘涉及陆军总司令短暂谈话的录音磁带其内容的真实可靠性。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查尔斯·皮勒德说：如果磁带上的声音确实是那位将军的声音，那么墨西哥政府同意，在墨西哥境内，对他进行起诉。

皮勒德说，美国派专家去墨西哥还有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要澄清本案中有关案犯伪造的一些关系，所谓将军的讲话录音也许只是其他人的讲话声。

根本就不存在席尔瓦将军讲话的录音，卫腊和罗斯在这次秘密行动的最后两天里，早就成功地阻止了我的取证行动。卫腊当时就把卡伦萨上校引到了海上乐园，到了2月22日，这位大使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内幕吧。这完全是在为墨西哥政府构筑一个防御的堡垒。

最后，只要新闻媒介一公布磁带上的声音是别的其他人的声音，那么墨西哥当局的主张和那位皮勒德大使的意见都将被接受。磁带的声音是“佩罗”的，据卡伦萨说，他是席尔瓦将军的兄弟，这本身就是毫无价值的证据，却被拿来作为反驳我们的论据。在新闻界，只有大人和政客申辩明理的天地；而我们却成了愚昧无知地怀疑一位墨西哥的将军卷入这件丑闻的人。“一箭三雕”行动则被这位大使和墨西哥政府辩解成为：美国的秘密警察卷入了一桩墨西哥骗子制造的骗局里，并且这些骗子还在采用类似骗局使我们上当受骗。或者用皮勒德大使的话说：“我们被诈骗所愚弄。”

尽管毒品侦缉署墨西哥城办事处有一份调查的内容，可将有关电话号码、地址、“佩罗”的讲话录音给墨西哥军方辩认，但是这一切统统被“被诈骗所愚弄”的结论一起扔进了地狱了。但是事实正如胡帕所说的“这太奇怪了”。缉毒署居然没有提出任何支持调查的要求。

凭我在海外和在缉毒署总部工作的经验，还未听说过，美国驻外大使预先未征得他大使馆内缉毒署特使代表的意见而陈述毒品侦缉署调查的案情。皮勒德大使的毒品事务首席顾问爱德华·赫斯，是毒品侦缉署派往墨西哥的特使，对缉毒署在墨西哥的行动负有全责。

在柯克·卡玛利纳被暗杀之后，赫斯完全肯定地得到了这一丑闻的真相，当卡玛利纳和他的队长吉米·库肯德尔将一封一封众多的电文和备忘录发出，诉说墨西哥城市瓜达拉哈拉情况险恶时，居然没有一份电文被传送到缉毒署的总部。对缉毒特工们来说，瓜达拉哈拉至今仍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城市。在卡玛利纳遇刺之际，缉毒署对在哥伦比亚的特工采取了格外严厉的安全措施，以吸取沉痛的教训，然而对瓜达拉哈拉的特工却无动于衷。

“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是否还非得死些人不可呢？”这是柯克悲凉的预言，不久他便真的死去了。

库肯德尔和其他驻扎在瓜达拉哈拉的缉毒特工们肯定，这个悲剧性的噩耗被爱德华密封在美国大使馆内了。大使馆里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和毒品侦缉署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容忍墨西哥政府把任何消息的内容过滤掉，埋藏在美国与墨西哥两国的“特殊关系”之中。

美国大使查尔斯·皮勒德这位“诈骗愚弄”的专家，在卡玛利纳遇刺后，

迫使美国接受墨西哥是“完全的合作者”的说法。丰年橡胶轮胎公司的退休总裁反对为控制毒品采用商业联网的做法；他呼吁在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记下更多的有关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对该国主动迁就的例子，他说，这种卑躬屈膝的奴态已超过他的前任约翰·盖文大使：皮勒德对“一箭三雕”的评价是“被诈骗所愚弄”，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在柯克死后不久，几位缉毒署特工为重新了解事实的真相，由约翰·劳恩率领前往墨西哥。爱德华·赫斯依旧表里如一、守口如瓶，而皮勒德则在劳恩总长面前一个劲儿地给他说好话、唱赞歌。

皮勒德和墨西哥政府，现在又为“一箭三雕”的辩护律师创造了一个伏笔。他们的申辩只能说明那些被告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要故意作出什么许诺；他们要做的并不是什么虚假的骗局；他们在提醒政府的检察官们，应该意识到给辩方的目击证人皮勒德和赫斯发出两张传票。

卡伦萨上校，这位墨西哥前总统梵纽斯蒂诺·卡伦萨的孙子，是被告席上的头号人物。他的交代如同是墨西哥政府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一样。说他已于1971年退休，与墨西哥军队不但已毫无关系，而且已毫无影响力。并且说，戴维·卫腊在那次墨西哥秘密之行时所说的全是谎言。这也证明卫腊是个十足的骗子，至少这里头有什么鬼名堂。只有对被告作彻底的调查，才能弄清事实的真相。

这个打给“佩罗”的电话录音，目前在这场世界新闻大战中，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审判的关键问题变成我们能否证实那帮墨西哥人是比骗子更加狡诈的假骗子。

至于帕罗·吉荣和赫克特·阿瓦兰兹，假如他俩否认他们的身份，那么他们又是什么人呢？从那次秘密碰面之后，我不敢百分之百地肯定吉荣真是一位联邦警察。但是，他毕竟是这个“一箭三雕”传奇故事的引路人，是卫腊知道的唯一线索。作为引路人，他或多或少地吐露了墨西哥内部的一些情况，倒有点像骗子或无赖。这仍旧令人迷惑不解。总之有必要让缉毒署墨西哥城办事处对“佩罗”进行调查，就从这个电话号码入手，弄清吉荣和阿瓦兰兹的后台到底是谁。

说说容易，做做难。

这天是7月3日，“一箭三雕”的辩论在国家级新闻中被报道出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检察官们和墨西哥当局说法不一》，它叙述了圣地戈这桩毒品案。墨西哥政府对起诉波班·席尔瓦将军和萨尔瓦多·德拉维加上校暴跳如雷，不同意对这两位现任官员进行起诉和调查，除非有相当确凿的证据，否则对那些“道听途说”一概不予理睬。文章引用一位“精通毒品的外国专家”的话：“卡伦萨、吉荣和阿瓦兰兹实质上都是‘胡言乱语之徒’，他们隐姓埋名、周游世界，只想成为哗众取宠的角色。”而这位专家自己却身份不明。

到了8月24日，我仍在卧床疗养，为治疗那次袭击行动留下的外伤。既没有听见备忘录的回音，也没有案子审理的消息，因此就打电话给胡帕。他告诉我，被告共聘请了九名律师，原来我还蒙在鼓里，审理计划早就安排好了。他还说，根本就没有伦巴多·罗吉格兹的下落。这么看来，这个盘踞巴拿马的最大的洗钱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也不会有人再关心起这事了。所有要求替换墨西哥缉毒署特使爱德华·赫斯的调查，看来也是理由不足，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逮捕至今有八个月了，但是政府方面仍旧没有反驳被告

交待的内容，对他们的结论仍旧是一帮“胡言乱语之徒”，没有更进一步的结论。

到了9月12日，我已在家呆了好长一段时间，仔细考虑了所发生的一切。早上突然惊醒，我意识到，那份备忘录永远不会有音讯了。很明显，如果我听其自然，那么伦巴多·罗吉格兹、琼斯·罗伯托·加塞将随同罗伯托·苏亚雷斯一起统统消失得毫无踪影，只有上帝才知道那葫芦里的奥秘。我完全有正当合法的权力，提出我那份备忘录究竟处理得如何。我必须证实我写的这份报告，将它公布于众。我有责任将这份备忘录的事实提请圣地戈检察官注意。

上午我打电话到稽查处，得知那份备忘录是“非3500号材料”，因而就不必向被告公开。未等我开口说话，稽查处特工便道：“让我查一下，我会给你回电话的。”几分钟后他打来电话，提醒我打电话给圣地戈起诉律师史蒂夫·尼尔森，去问问他，“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他会见你的。”那位特工道，“他觉得很有必要，就会向稽查处提出书面申请的。”

当我给尼尔森在圣地戈的办公室打电话时，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他是一名杰出的检察官，很有打赢这场官司的荣誉感，这是件大案，是一件复杂而又有预谋的案子。我有一个重要的情况，要打电话告诉他。

第十一章 令人费解的法庭调查

在我打电话给史蒂夫·尼尔森之前，我对他的了解只有一点，那就是他是位忠于职守的检察官，在法庭上是位出了名的敢作敢为的斗士，打赢过许多重大的官司。这也是毒品案有史以来最值得庆贺的喜事。他经手调查的案子和法庭战绩，早已被詹姆斯·米尔写成传记《开路先锋》。当他的秘书打传呼给他时，我有点紧张。我备忘录里叙述的，对检察官来说，还有很大的漏洞；所揭露的事实不会给美国政府的毒品战争增添什么光彩；我希望它对这次审理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甚至能影响整个美洲。但是我还是不信它真会影响这次审理的结果。不过这份备忘录应该能定他们七个人的罪。可要使它全面地被采纳，这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史蒂夫·尼尔森在电话里谈话的语调和蔼可亲。我俩就整个审理的准备工作聊了好长一会，得知他不是美国司法部反对在秘密别墅里安三号窃听器的成员，心里像是得到了宽慰。在逮捕行动一结束，史蒂夫就接受了这桩案子。一直到最后，他似乎都没有想提起备忘录的事，于是我便主动先提了出来。

“没问题，”尼尔森道，“这事已注意到了。”我心中不由一动。他兴致勃勃地解释了他将备忘录的内容推荐给本案的法官大人，在这之前他特地去拜会了辩方的一些律师，要求对我的人品、价值观等等作出评价和衡量，甚至请他们了解我有否胡作非为的事。在此前提下，我的备忘录才能被列为“与审理有关的议案”。法官威廉·伊莱特也同意这么处理。

“那太好了。”我道，心里不禁生出一股怒气。他们还会删掉多少内容呢？他说话洋洋自得的样子，像是故意在搅和这桩事，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他不明白，揭露这些杂种是理所应当的吗？

真诚的谈话持续了好长一会，随后我挂上了电话。我答应在1月份的第一周里去圣地戈，参加审理开始前的筹备工作。一股愤怒之情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但我马上又意识到这怨不得尼尔森和法官大人。要怨就怨整个体制。他们手上拿着印把子，得保证百分之百的公平。我的那份备忘录被稽查处、国会、参议院一一审查过，可就是没能被对毒品案的审理所采用。最后便被稽查处当做破烂给处理掉了。

1989年1月4日的夜晚，我到达圣地戈，这天离逮捕的日子过了已快一年。一年过去了还是毫无结论。我独自走在机场过道上，跟着那帮旅客一起涌了出去，忽然脚背一阵疼痛，全身发麻，那次跳窗的老伤又犯了。半晌，眼前一亮，终于走出那条该死的过道。胡帕就会来接我了。

事到如今，圣地戈大概所有的人都知道我那份备忘录的事，我也甭再同他说这事的废话了。圣地戈的一位朋友（他的名字我不能透露，因为他目前还在从事秘密工作）已告诉我，圣地戈缉毒署总头目不愿在缉毒署的办公室里召见我。在圣地戈，我成了个不受欢迎的人。说实话，兴许胡帕真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但是等我来到中央候机楼时，我看见胡帕背靠着墙，伸长着脖子。他还没留意到我，无意中让我看见他紧张的神情，一副苦相。我心中便掂出个大概。

“哈伯特，在等谁？”我问。

“啊，麦克。”他道，强打起笑脸，双方也没有握手。我们被一串停得横七竖八的汽车困住，只得走走停停地朝机场的出口处走去，足足走了二十

分钟。我同他交谈甚少。等我们坐上汽车，已是晚上十一点了。我在圣地戈呆过，这么晚碰到这样的交通堵塞还是头一回，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否有某种征兆在里头。他坐在那里用劲地敲着排档，这时前方早已停满了一长溜车。我听到一个谣传说，他的妻子已离他而去了，为此他心都碎了。

“我来开行吗？”我问。他终于从驾驶室挪开了身子。他有些尴尬地道：“嗯，我们办的这案子，我已和我的顶头上司谈过了。”

“好哇！”我又一声不吭。他们将我安排在月牙型的海滨中段深凹处的一家旅馆里，周围没有一辆汽车。猛然间，我清醒过来，原来我已被圈了起来。我看了看胡帕，心里十分失望。他好像也无可奈何。

二十分钟之后，我们驱车向北行驶，大约又过了五分钟，他终于打破沉默。“你知道，卫腊已把这个案子的电影版权出卖了。”

“别胡扯了！”这只是个卑贱的线人，在俄克拉荷马走私八百克倒霉的毒品，就被逮住了，而且出卖他墨西哥的朋友，只为保全自己的小命。他将政府的案例拿来出售电影版权，在此之前，他就打证明，既证明他参加了这个案子的调查，又证明他自己被判刑的事。我甚至不敢相信这就叫法律。我只相信如果我这么干，毒品侦缉署肯定要起诉我。

“没错。”胡帕说着憨笑了一下，我真不明白这有什么值得他乐的，“这不是胡说的，丹尼斯·豪伯买下了制作权。因为那天我打电话时他接的电话，我亲口问过戴维的，你还不信？”

说着，我们的车正好驶过“海上乐园”的标牌，我想起我们失去让墨西哥将军接录音电话的机会。“不！杀了我的头也不信。”

1月15日，早上七点三十分，我旅馆的电话第一次响了起来。我操起话筒，心想准是胡帕为我的车的事，或者是史蒂夫·尼尔森。没料到是卫腊。

“你还认得我吗？”

“认得，你这个倒霉蛋。”我道，我希望他听了别往心里去，我只想跟他轻松愉快地聊天，尽管他胡说八道，但他仍是我了解此案最好的信息来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干了二十五年的秘密工作，在我事业的旅途中最大的一桩案子里，这个一子掌握的情况居然比我多，我不得不依靠他。他已摸熟了美国政府的脾气。

“想来看看你在做些什么。”他道。他还告诉我，飞行员杰克在他那里冲浴。他俩还有一位海关的特工在那里警戒，保护他们的安全。这两个人突然亲密到令人怀疑的地步。但我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手指，不让电话给挂断了。见鬼，卫腊的一切怎么听起来就这么悬呐。他证实他和丹尼斯·豪伯把这桩案子的内容改编成电影。他还提到了“触石制片公司”已制定了这个方案。不管我出不出售电影权，他仍然掌握了大量的这案子的内幕情况。我立即想到，他在套出我知道的内幕消息，我便变得态度冷淡起来。

“我要把你的形象搬上大银幕。”他说着哈哈大笑，主啊！现在我全听清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考虑过他曾偷运可卡因！这事仍有可能把他再送回监狱。

“那种事好多人都喜欢做。”我答道，告诫自己千万别让骗子给骗了。不一会我便中断了和他的谈话，他也能察觉到。等把电话挂断之后，才想起我们还没有谈到一句有关审理的事。我得控制住卫腊，他已在操纵，想使我落入他安排的鬼把戏里。

正午十二点时，电话铃又响了。卫腊在大堂带着他那帮保镖邀我共进午

餐。我不由得警惕起来。我们之间毫无感情可言，像卫腊这号人不会只是想装装门面，他肯定有什么用意。但是我又无计可施，盛情使我难以推却。

十分钟之后，我们便进了巴哈旅馆的餐厅，大家围坐在一张圆形的餐桌前。卫腊的一对保镖年轻秀气，看上去倒像是美国种，一位叫科铁斯，另一位叫卡罗。他们对这个线人的崇拜似乎像一年前罗斯他们那帮人一样。这个狗娘养的，“风采”依然如故。他或许又在于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就如同那次绝密行动一样。这不像从前了，我拿大主意，然后他跟着执行。他是想知道整个“一箭三雕”执行的执行过程中，毒品侦缉署总部都发生了些什么内幕故事。这顿饭旨在跟我交换缉毒署在玻利维亚森林这场遗憾表演的内幕。

“不，”我若无其事地道，“我想我不必吃这顿饭。”他却开始显得十分骄傲的样子，像是在对我说，不管怎样他都无所谓。

“你知道，我是唯一的和猎豹特警队共过事的外国佬，跟他们一起穿越过森林，寻找到鲁曼实验室。”

“别给我吹牛。”我笑道，“有位总部的先生叫特里·贝克告诉我，他们去寻找实验室，是他引的路。”

卫腊哈哈大笑，他说，他见过特里·贝克。“我是唯一一名跟他们一起找到实验室地点的外国佬。”他坚持道，“缉毒署的特工真他妈的没用。他们在森林里吓成了一团，三五成群地凑在一块，战战兢兢地向前蠕动。”他自得其乐地将森林历险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番。他说，一位缉毒署特工喝酒喝得神志不清，不肯走出直升飞机；一个缉毒署监察被烈日高温逼得虚脱而昏厥过去；还有其他一些人被毒蛇吓得缩在一起，蹒跚踟蹰，这帮惊弓之鸟在整个穿越过程中始终纠集在一起。他说，猎豹队的指挥憎恶缉毒署的人，如此无能，怎么能经受得了一场风波，便扔给卫腊一支自动步枪，说：“拿着。”卫腊最后道：“知道吗，我们找到这个主实验室不容易啊。”

我提起巴拿马洗钱人的事。我期望没准他或许知道个一丁半点的。在政府部门似乎已无人知晓，也无人过问了。他没让我失望。他的一双念珠眼忽然一亮，神情激动起来。

“我来告诉你一些内幕吧，中央情报局已把他带到康泰德拉岛上，有人二十四小时守护着他的住地，等整个案子平息了之后再说。如果你和乔治想去碰碰运气，那你们就等着找死吧。”

我打了个寒颤，不禁想起我同乔治·尤瓦乔在巴拿马大街上遇到的怪事。“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他朝科铁斯和卡罗嘘了嘘。“你在开玩笑吧？伦巴多关系到‘伊比亚美国银行’，还有另外两本秘密帐户都跟他有关：一本是诺列加的私人帐户；另一本是中央情报局运钱给反政府武装的帐。你想他们能让他就这么倒台吗？”

我又茫然不知所措。伊比亚美国银行的部分故事是真的，那次卫腊跟我去那里，鲁曼也曾跟我提起过。看来可以肯定，每洗一定金额的钞票，拉公司也得往诺列加的帐户上记上一笔佣金。伊朗门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巴拿马这块跳板，运钱运枪给反政府武装，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央情报局当然要感谢诺列加。也许我再怎么用力，也无法得到他掌握的那些特殊情报。

“你知道吗？”卫腊好像要解释发生的一切，“我们在巴拿马那会儿，邓肯一直在保护着诺列加，你能说他是百分之百地在同缉毒署合作？”接着

他便将腐败的内幕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这些内容至今尚未被证实过。

“你把这些跟别人讲过吗？”

他望着我，好像我是疯了。我俩都没再提他以前曾谴责、反对缉毒署的事，当然也没谈起我备忘录的事。如果他不提起这些事，我同样也不会提这种事。尽管如此，他似乎仍一点不顾忌，当着海关这两位保镖的面跟我谈了这些情报。也许，等他们一转回去之后，他就又会否定所谈的一切，除此之外，他干脆一走了之，也就放弃他所讲的一切。他有什么好顾忌的？政府给了他撒谎的权力！

“你说，你正在考虑和一位参议员谈谈？”我问道，想起他曾在巴拿马说过要同参议员谈谈。这回他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不快的表情。看来正好问在点子上了。

“我们已同参议员牛恩的侍从谈过了，”他狡猾地道，“但是他们说，在案子审理之前不想跟我们谈任何事。”

我不知道这个“我们”指的是谁，难道是卫腊同海关的代名词？是他们设下新闻埋伏，让全美广播公司来采访那幢秘密房子，让墨西哥人去海上乐园游玩，召开那个差点让我送命的记者招待会。我希望他能见着参议员，如果他见不着，也许我倒能见着。

滔滔不绝的闲谈陷入了低潮，好一会之后，又转了个话题，卫腊突然重新谈起凯曼群岛的事来，而且提到了我朋友的名字。我不知道罗斯是否把我说卫腊撒谎的事告诉了卫腊。“我帮这家伙在凯曼岛上建立起了一家餐馆。”他对科铁斯和卡罗解释道。好哇！至少现在不再提他是合伙人了。

我们谈了好一阵有关案子里很难表明的事实和那些难以进行盘问的内幕。卫腊一谈到这些事，就显得格外地紧张，“实话实说嘛，”我道，“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就实话实说。”

1月6日，我遇见了乔治·尤瓦乔，便同他一起共进早餐。自去年我们二人最后一次共事以来，海关所有承办此案的特工都升官了，只有乔治依然老样子。我什么也没多说，只觉得他拿我当朋友看待，为此他已向上头隐瞒了许多事，帮了我不少的忙。

我早就想再见见乔治了。除此之外，我还喜欢并敬佩他：为人具有崇高的原则性，并且对海关忠诚坦白，他也是本案中一些无法无天的事件的第一目击证人。海关的许多特工早已听说要带全美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去那幢秘密别墅的事，而乔治只在事件发生后才知道，我需要从他那里证实这个事件的发生经过。

“这事发生在十一月。”他道。

我大吃一惊，道：“你是说，我们和那帮记者一起工作了两个月，新闻界完全知道那幢房子以及发生的一切？”我相信他们干了一切，在十二月马丽奥特大酒店里的那次行动，差点惨败。

二心

乔治耸一耸肩。“他们那时也许估计这案子接近尾声了，但是案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预料。”他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一切，他一个人呆在拉加拉的别墅里，照料着墨西哥和玻利维亚打来的电话。一天，那房子的门突然被打开了。“我几乎想去掏枪。”乔治道，“我是说，那些蠢种们都知道那幢房子的地点，知道我们正在做的是两千万、三千万的大买卖。这是否是他们带这一对家伙来搜我们的房子？一对家伙是否是他们雇的私人侦探？我正在胡

思乱想时，两位海关最高层官员带头从门外走了进来，接着，一帮人带着摄像机和其他的设备也跟了进来。

“‘这是记者，’海关副总长夏鲁汉道，‘别怕，小鬼，他们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我再一次想到那帮记者一直在那里打转转，了解的情报能叫我们都去见阎王。在我们去已拿马之前，他们就那么干起来了，只要有一位游手好闲的家伙在鸡尾酒会上这么一评说，那整桩事就会砸锅。‘一个电话就决定了一切，’这是海关的一位官员就米斯电话事件发表的评论。我想到这里不禁气愤极了。

“‘谁他妈的叫这些人来的，这不是拿我们的生命在开玩笑吗？’我说。”

“瞧，我是个新手，”尤瓦乔抱谦地道。“他们告诫我，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事。”

“我不怪你，小子。”我道。不管怎么说，乔治总是同我一起去巴拿马追捕过伦巴多回来的患难兄弟，可他到现在才鼓起勇气向我道出了真情。如果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早就像尤瓦乔似地说出来了。谁也料不到，原来麦克·列文也这么嫩，像个新手。“那么他们拍了照片没有？”我问道。

乔治苦笑了一下。“先生，他们把什么都拍了。他们把他们的摄影机扛到了阁楼上，拍下我们所有的设施，诸如录像监视器等等所有的东西，甚至连隐藏在灯泡里的摄像头子也不放过。总之，全给拍下来了。”

我们相对无言了好长一会。之后，乔治又谈起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打电话给墨西哥司法部长，就有关“一箭三雕”的事向他们提出警告。

“罗斯告诉我，米斯在本案收网之前二十四小时，打了这个电话。”乔治道，“据小道消息说，帕罗·吉荣是墨西哥司法部长派来的。”

我俩又沉默了好长一会。那帮家伙所干的一切，真叫人胆战心惊，他们眼里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别人的生命根本就一文不值。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那帮家伙掌握着你的生死大权。在那会儿，真令人又伤心又气愤。看出乔治的眼神在对我说，这个沉痛的教训他永远也忘不了。沉默吧，不必再说！

1月17日是星期六，我去了史蒂夫·尼尔森的办公室，首次参加预审会议。

那天早上阳光灿烂，市中心的街道围绕着联邦大楼，大楼空空的。我刚停好车，便看见吉姆·罗斯朝我走来。看他冷若冰霜的那张脸，我就猜到，他已看过我的那份备忘录了。当他领着我穿过这幢荒凉的政府办公大楼时，他尽量装出十分热情的样子。我觉察出这个气氛有点紧张。不一会，我们来到史蒂夫·尼尔森的办公室，这是这幢大楼的分设部门，上面的牌子上写着“毒品罪证特种处”。我们俩都默默不语。

史蒂夫·尼尔森是位不肯轻易服输的人。他有一身健壮的体魄，头发花白，四十开外，一双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天生一副争强好胜的样。当他从办公桌里头绕出来同我握手时，我注意到那铁文具柜里摆满了“一箭三雕”的档案、证据、地图和海图，我立即明白我们的案子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件罢了，相当的普通。但是，这件案子关系到我们的命运。我这一生和许多联邦检察官打过交道。他们大多数绝顶的聪明，但都没有毒品战争的实践经验，绝大部分有一个政治的幌子，集中了他们所有的精力，为了一个客观的目标，就是在法庭上打赢官司，至于世界观的正确或错误都毫无意义。我还不够了解尼尔森，只是在衡量他是否是我所想象的那种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如果他像大多数检察官一样，那么“一箭三雕”将会比他以往所承办的案子更需要用法律的逻辑加以鉴别。

“我肯定缉毒署和国务院是绝不肯合作的。”尼尔森道，“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有什么高见。”他抱怨，自逮捕至今已过去一年了，他还没有得到国务院任何的消息，也没有得到缉毒署的有关调查材料来反驳墨西哥政府提出的阿瓦兰兹、吉荣和卡伦萨是冒牌的骗子；他们许诺受墨西哥军方的保护，完全是为了骗取毒品交易的巨款。有一件事，墨西哥政府说得义正辞严：那就是帕罗·吉荣不是联邦警方的官员；卡伦萨上校1971年就从军队退役了；那个阿瓦兰兹与墨西哥执政党毫无瓜葛；而且波班·席尔瓦将军不分管普韦布洛地区（前面提过，是墨西哥的一省，也是可卡因飞机加油处）。对被我们录下音的卡伦萨称他是将军兄弟的佩罗，最后他们则未加评论。他们拒绝任何指控将军的调查，除非有确凿的证据，也就是说，非得有将军本人出现在录像或录音带上的内容。

我胸中又升起一股愤怒。我看了看罗斯，他独自静静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一会儿又坐下，从裤兜里拿出报纸，自管自地翻阅起来。我又想起，墨西哥人最后时刻去了海上乐园，使我们错过了录下将军讲话的机会。“我对那决定负责。”罗斯那天晚上是这么说的。

尼尔森还叙述了好些事，被告方面还将传讯证人：美国驻墨西哥大使查尔斯·皮勒德、缉毒署驻墨西哥全权特使爱德华·赫斯。皮勒德振振有词地在新闻界发表文章，支持墨西哥政府的声明，认为我们是被愚弄了。他肯定墨西哥政府的立场：美国政府毫无根据地指责墨西哥前总统梵纽斯蒂诺·卡伦萨、席尔瓦将军和德拉维加上校。照这位驻墨西哥的大使所述，他必须竭力劝阻在他大使馆任职的缉毒署的代表爱德华·赫斯，一年以来，赫斯的确没有答复任何尼尔森的要求，得供对墨西哥被告的调查情况。调查的关键是那个卡伦萨被逮捕前与他通过电话的人，也就是卡伦萨说的“佩罗”，“将军的兄弟”。

尼尔森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说，他和赫斯联系过，赫斯采取不肯合作的态度。在卡伦萨被捕之后不久，就向爱德华·赫斯的一位朋友了解了详情，这位朋友的制服上也别着一枚奖章，这是参加“神鹰行动”的标志。1985年缉毒署和赫斯办公室一起主持一次一网打尽的缉毒行动——神鹰行动。就在这事件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墨西哥政府才说，卡伦萨已退休了。然而赫斯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仍在他的通讯录中。爱德华·赫斯在那些与他共事过的街头特工心目中，是位缺乏信誉的人，他们在执行任务中从不向他透露要办的事的目的。

尼尔森还告诉我，他正准备尽可能逐步跟一些老海关人员和缉毒署驻外特工联系。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将在排除缉毒署的情况下，亲自着手调查，最好能找到一名在墨西哥工作的特工，或者在美墨边境上工作过也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参加过“神鹰行动”。那些特工也许见过卡伦萨或者帕罗·吉荣。尼尔森的分析十分正确，街头特工绝不会对那些大人进行遮掩。我立即明白了他对我的诚意。尼尔森不但得不到毒品侦缉署的支持，相反他们好像完全在隐瞒事实。我知道如果要排除阻力，树立正气，那么他会同缉毒署在这桩案子上斗得头破血流。他是想让我作“内线”，与他并肩战斗，那么我的一举一动也会有千百双眼睛盯着了。史蒂夫·尼尔森准备采用这个方法去打胜这场战争。如果他失败了，那么意味着他在法庭的斗争生涯也就结束了。

我出了好多的主意。“如果卡伦萨上校说爱德华·赫斯是他的朋友，那就责令缉毒署为你调查此事。”我道，“打电话给稽查处，告诉他们，被捕毒犯说，爱德华·赫斯是他的朋友，让赫斯对他们解释。”我怀疑，不到谋杀的程度，那些大人从来就不会因为那些供词而调查他们自己的人。

尼尔森只是听着不表态。打电话给稽查处，真叫做自投罗网。受谴责的只会是赫斯，是他的行为违法，违背了伦理。从他看我的眼神里，我发现他并不会糊涂到这种地步。

我又提议和中央情报局联系，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档案中，有否墨西哥人的材料。我俩都同意卡伦萨提到的一点，就是伊朗门事件的反政府武装，也牵涉到了尼加拉瓜和墨西哥两个国家。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我建议，能否和军事情报部门联系，这样可能摆脱中央情报局。也许会有些笃实的记者在研究墨西哥的报刊资料，没准会查到我们要找的人。尼尔森表示赞同记者这个办法。他十分细心，反让我不觉产生了一种不耐烦的心情。我开始想到，他没准就是我的一个同盟者。

我们用了一两个钟头，探讨了个案子的有关事项，也谈到了美国政府在毒品战争上的矛盾心理。尼尔森突然告诉我，在底层、在公众中应该让他们了解这个案子，还有与此相关的一些情况。他的慷慨陈词鼓励了我，我激动得嘴唇微微打颤，忍不住进出几个字来：“希望你明白我为什么要写备忘录。”说着，看了一眼还坐在一边的罗斯，“我只想将发生在本案中的一些丑恶的现象，客观地记录下来。”

尼尔森瞅了我好一阵子，然后道：“麦克，我越深入研究这个案子，就越理解你这份备忘录。”这句话他在后来的好几周里一直念叨着。

那天，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给了我一本资料，这份资料是参照那份备忘录写成的。但是，我所看见的和推断的都被删除了，剩下部分变得让人难以读懂。那是为被告的律师掘好的坟墓。用他们自己的头脑去理解吧！自此之后，我便称这份材料是“被阉割过的文章”。

1月6日是戴维·卫腊出庭作证的日子，这很快吸引了国际新闻界的注意。早年卫腊在墨西哥走私毒品，他承认曾替纳泽·哈龙效力，哈龙以前是墨西哥安全理事会的一名头目，最近出任墨西哥城治安情报局局长（注：安全理事会在本世纪70年代，相当于中央情报局，后被撤销，并归军队领导）。1974年，美国圣地戈的一位律师威廉·肯尼迪曾准备起诉纳泽·哈龙组织参加国际盗窃汽车团伙，但是起诉被中央情报局和司法部阻止，因为他们不想失去哈龙一流的情报来源。肯尼迪目前是圣地戈的首席法官，将这些事公布于众，这不是等于揭他的老底嘛。

史蒂夫·尼尔森在我的心目中，是唯一一位能助我一臂之力的美国法律工作者，现在连他都战战兢兢、犹豫不决。很显然，许多美国政府的官员，包括一些缉毒署的人都愿意看见陪审团相信本案确如皮勒德大使所述，“是一桩骗子的骗局”。

1月9日，我再次来到尼尔森的办公室，想了解他同缉毒署的交涉进行得如何。事态开始有了转机。爱德华·赫斯已接受规劝，同意接受了解被告情况的讯问。他打电话告诉尼尔森说，他那里有一份帕罗·吉荣的档案。尼尔森想：这是个值得引起思考的问题，以前缉毒署墨西哥分署的回电总是明确表示：“没有吉荣的情况。”史蒂夫·尼尔森充满希望他说了一句：“也许他愿意跟我们合作了。”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在边上道，“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回答你的问题。如何在审理中间打破他对你设置的这道闸门，让他开口讲话？他分管这件事已经有一年了。”

尼尔森只是看了我一眼。

卫腊带着他的保镖到处招摇过市。他被新闻界吹得头晕目眩，在陪审团组成之前，他还得表演一番。“噢，上帝啊！我获得他们的准许了，能在旁听席上就座。”他道。这个细细长长的毒品贩子兼影视编剧，忽然摇身一变成了情报员，他蜡缩着坐在座位上，神采飞扬。整个人像一条盘曲的蛇。

“我跟我的代理人正谈着呐，”他夸口道，“我写的所有稿子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还说，他的那位朋友丹尼斯·豪伯已给他介绍了好莱坞杰出的代理人迈克·奥维兹。说他已签下了一份365,000美元的合同，作为本案改编成电影剧本的稿酬。

“他们已着手开始在写剧本了。”他沾沾自喜地道。

1月12日的下午，我又回到史蒂夫·尼尔森的办公室，对证据再次进行核对。卫腊继续接受法庭的盘问，而显得越发狂妄自大。他有些装疯卖傻的样子，我知道，他是在演戏，至少有些地方是在演戏，这样对他有利。我微笑着朝他使了个眼色，像是在提醒他：我知道，你全在瞎说。这也使罗斯对卫腊大为懊恼，不时在我面前开始谈论起他来，顺便也提起了有关洗钱人的一些机密。这个狗娘养的，谎话出口成章，连罗斯都没有听说过。

后来才知道，我并非是唯一一位意识到这是一次绝密调查的人，卫腊也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审理前几个月，卫腊向最近出版过一部反映毒品战争书籍的作家吹嘘说，洗钱人最近去的那地方，曾被墨西哥联邦安全理事会的上层官员投资过一百万美元。海关的官员们就是按照他的这份情报，顺藤摸瓜，对洗钱人进行了追查。这里头还有一些机密的事……。

卫腊完全蜷缩成了一团。半晌，我想到了第二次巴拿马秘密之行的事，便要他当着史蒂夫·尼尔森的面再重复一遍他曾告诉过我的一些事。他迟疑一下，便叙述起，他曾看见斯科佐的房里啤酒罐头堆积成山之事，然后他按我要求，重复了他和邓肯谈论过有关诺列加的事，并原原本本他讲述了一艘价值四十万美元的游艇的事，他说邓肯还给他看了那艘艇的照片。

这种交易的内情他也不会知道得太多。我心里暗想。

显然，爱德华·赫斯的合作不会十分的圆满。尼尔森仍在一个劲地推敲：为什么赫斯先前一口咬定说他没有任何被告的情况？这究竟是何道理呢？我再次提醒他，这很简单，毒品侦缉署的大人们要制造这堵石闸，旨在拖延时间，等着这案子渐渐地消隐掉。“你打算咋办？”我问，“在这个案子审理结束之前，如果赫斯干脆不理你，又咋办？”尼尔森没有回答。但是，那双眼睛则在滴溜溜地打转。

1月13日下午很迟了，卫腊结束了他的作证。关于证据的时间要追溯到9月21日，在拉加拉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我有点奇怪，那些被告对他出卖本案电影版权之事，怎么不揍他，我曾听说，他们雇佣了一个高级私人侦探机构。卫腊在盘问中也如此走运，这七个被告的律师们居然不提出反驳，这说明他们无视他的口供，只有罗斯和其他特工的作证，才是重要的依据。有一次，他曾试图劝说史蒂夫·尼尔森采用他的起诉策略，气得尼尔森毛发耸立，将目光不由得朝外边移了移，卫腊对此好像毫无察觉。可以想象，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在法庭上，在众目睽睽之下，阐述一桩牵涉政府责任的重大案子。

他把我对整个法律的逻辑都给弄糊涂了：只凭一个探子的几句话，就能裁定一些人是否有罪。

法庭休庭，要到1月18日才重新开庭。卫腊拖我去他那里，问我下一个长长的周末准备怎样打发。“你想去阿尔伯克基玩玩吗？我要和丹尼斯去那儿。我想也许你喜欢跟咱们一起去逛逛。”

到了1月18日早上，我终于坐在了证人席上。过了一会儿，那七名犯人鱼贯地走上法庭，就坐在我前排的被告席上。门德萨满脸胡须，满头白发蓬松着，就像《圣经》中的摩西从埃及的西夸山上掉下来一样。他朝我笑一笑，玛里欧·瓦加斯也朝我笑了笑，其他的几位都阴沉着脸走进大厅。他们是七位失去灵魂的人，他们悲惨的命运完全无人关心。我看着他们一个个戴上耳机，这些耳机连接着麦克风的电子通道，倒挺像是现场的口译员。他们如果不说那些话，至少在他们的生命里不会有这种板着面孔的游戏。这怪不得别人，只怪他们自己。我不禁提醒起自己来。老头瞧着我还在那里笑。

整个上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作证，证明我化名“路易·冈萨雷斯”，第一次来圣地戈，冒充秘密犯罪组织的头目，以及我印象中的吉荣、门德萨和阿瓦兰兹。不知道玻利维亚人对我是什么印象，他们阴沉着脸看着我，目不转睛。卡伦萨上校则坐着，低垂着眼皮，思想不知在什么地方，一切是真实中的梦，还是梦中的真实，满脑子都是些离奇古怪的幻想，还没有弄清个究竟就被带到这个地方来了。鲁曼的反应是，先是阴险地瞪着我，充满了杀机，然后又避开我的眼神。

到了那天的最后，七名被告的律师已用尽心机，试图将第一次听证会的内容反驳得一文不值。他们的提问方向相当的明确，他们要证明的就是，除了卫腊的供词外，根本无法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被告，卡伦萨上校的辩护律师孔迪·艾伦的陈述有点离题，她道：“所以，列文长官，你没有用心去想过，这些被告的身份到底是谁。”我立即回答：“我已意识到墨西哥政府对我们努力查出他们究竟是谁的行动百般阻挠。”艾伦女士对我的回答报以嘲笑。威廉·伊赖特法官道：“律师，你有什么问题要问？”

那天下午尼尔森告诉我，他为爱德华·赫斯的事已打电话给稽查处。他们对他很无礼，缉毒署和赫斯给了他闷头一棍。我只能说：“我早告诉过你。”但是我也没法子。

1月19日是轮到尤瓦乔出庭作证的日子，他证实与卫腊跟被告取得联系，引出我们一进巴拿马与玻利维亚人会面的情况。我去了史蒂夫·尼尔森的办公室，一直呆到正午时分，见到了一位墩实如熊的男子，他长长的灰发盘在脑后，梳理成一个发髻。他好像在法庭上见过面。在他的背后站着一位十分俊俏的妇人，她穿着一身农家服饰。卫腊兴高采烈地向我介绍，他叫乔迪·米列锡维克，另一位是他的妻子贝茜。按卫腊说，他和米列锡维克正合作写电影剧本。后来卫腊告诉我：“这位米列锡维克先生是电影《出轨列车》的编导。”已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他们邀我跟他们一起去下馆子。这好像是有预谋的，真令我有点进退两难，但我还是一同前往。

我们穿过法院大楼和繁忙的街道，来到霍顿广场集市的林阴路上，罗斯和两名保镖跟在卫腊的两旁，而他则和米列锡维克滔滔不绝他说着话，十分显眼。据此便可以想象那顿饭的情景。此时我看见卫腊好像在精心设计芭蕾舞动作，他已将“一箭三雕”皈依后搬上他自己的生活舞台，而且要拖我加入这帮表演者的行列。等来到饭馆，我已不再有胃口，道一声“请原谅”，

便扭头去了尼尔森的办公室。

办公室空无一人，尼尔森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电话记录，是写给罗斯和卫腊的，让他们回头给华盛顿参议院的两位调研员回个电话。看起来这位卫腊先生已经在筹划电影的结尾了，让参议院组成一个小组调查整个毒品战争的成效。我背靠着椅子坐着，不知道这家伙崇拜的是什么样的偶像，如果这个偶像存在的话，那么这部电影的发行也许会促使他转成崇拜他自己。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对他自己来说，已经找到了出路，想必他会为之而奋斗的。

那天黄昏很迟了，我和史蒂夫·尼尔森、罗斯、尤瓦乔和卫腊在“使命海滨”我的旅馆附近一家空荡荡的墨西哥餐馆里会面，讨论一进巴拿马同玻利维亚人谈判的证词内容。卫腊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我们点菜时，他又把话题扯到了毒品侦缉署如何怎样地“搞破坏”；再次绘声绘色他讲述了他怎么领着那帮吓成一团的特工，艰难地跋涉在大森林里。令我奇怪的是，我还未追究，他倒又谈起他过去如何从腐败的缉毒署特工中购买情报之事。他早就否认对他作出的这类指控。我看了看史蒂夫·尼尔森，想知道他是否也在听。从他脸上浮现的表情里，他已全听见了，但是他不会去认真对待。

一切都相当地放松，也无所顾忌，卫腊的嘴像开了闸的门一涌而出，我从未听他这么谈话来着。当了那么多人的面，也该查查卫腊又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他说，曾有幸替尼罗·贝蒂斯塔运送过一千克的可卡因（其实只有八百克）给他在俄克拉荷马的儿子埃里克·贝蒂斯塔，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第一次在那里被捕。像尼罗·贝蒂斯塔那样的人，是杰出的可卡因毒枭，一出手就是几百千克（据说他将可卡因分成份，一份等于220磅），怎么可能出售八百克可卡因（还不到二磅），这似乎相当荒谬。尤其是卫腊说话的口气，好像他跟尼罗的儿子很熟。还没有人会像我那么去考虑问题，总喜欢刨根问底。最近，我从尤瓦乔、胡帕和其他人那里听到说，卫腊所谓的那位尼罗·贝蒂斯塔是弗杰科·贝蒂斯塔的儿子，从前是古巴的独裁者。我倒要听听卫腊自己说说这段故事。我便又提起他以前被捕的话题。

“尼罗可是古巴独裁者贝蒂斯塔的儿子？”我问道，语气中不免夹杂着几份炫耀自己知识渊博的豪气。

“对。”卫腊应道，顿时便趾高气扬地来起情绪，他骄傲得就像一条非洲大陆的鼓腹蛇一般。

我后来特地查了尼罗的档案，在他的出生一栏里写着：“出生：乌拉圭”。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一点不觉得奇怪。我打电话给俄克拉荷马毒品局的一位特工，原来逮捕卫腊时的经办人，询问他有关供词的事，这位警探说：他记得，也听说过类似的事，但自从这件案子作为国际题材之后，就一并同卫腊其他所有情况一起转出。他们已无法核对这份供词。他说，已将供词移交给了毒品侦缉署。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内容是像那位警探所述，已经无法核对了。

第二天早上，我又来到尼尔森的办公室，继续审核我的巴拿马之行的证据，中午就在联邦大厦的自助餐厅对付一顿。乔治向我介绍了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她每天都参加审理，做笔录。她便是拉加拉那幢秘密别墅的房东。她说，她第一次知道她的房客真正的身份，是在国家电视台播放逮捕情况之时。她表示一定要起诉美国政府。

就在这天下午听到了一桩令我吃惊的消息。我想自己已经听见了这桩案子，每一件令我惊奇和气愤的故事。所有的人正汇集在史蒂夫·尼尔森的办

公室里，这些人是：我和尼尔森、卫腊、罗斯、胡帕、尤瓦乔，我们正在讨论案情。记不清是在议什么内容时，我突然听卫腊说：“我用美国政府支付给我的办这桩案子的三万五千美元金额打赌。”我转过身来，他朝我看了看，笑了。

他是否是在提醒我，他已肯定拿到了这笔钞票。海关想方设法出主意，给这个重犯支付保释金，如此一位渺小的毒贩子，值得拿钱去付他的报酬吗？真是无耻，令人恶心，一个毒贩子被缉毒署的特工逮住了，对特工的报偿只是一块牛排。按我们的说法，办两三件案子咱们什么也捞不到，甚至还不够抵花销的。他以前还在担心服刑的事，哪敢提报酬。可以想见，当后来我得知海关向他支付了二十五万美元时，是一种什么感觉。拿后来卫腊自己的话说，“我关在监狱里，每周拿两万七千美元的工资。”我猜他已计算过在狱中的那段日子。

“你知道吗，”他接着道，“这件案子里的每个特工都拿我当一个忏悔的神父。他们把什么都告诉我。”

“那我呢？”我问道，只觉得自己后脑勺上的头发根根地竖立起来。

“没有，”他答道，“你是唯一一个没有那么做的人。”

“这得感谢上帝。”我道。不知这是否是卫腊故意让我引起注意，这是他的某种暗示，目的在于让我也接受平等待他的礼遇。我对此倒很满足，让他说吧，他说的都是些闻所未闻的事，何况这种场面我也没有什么好紧张的。他坦诚直率地跟我谈到各种标准，诸如报酬待遇、一视同仁的对待、享受机密消息的待遇，他还列出了其他方面的待遇标准。我只记得，他列出的一大堆几乎无所不包。

话题又转到了我们二进巴拿马的那次噩梦，看来当时整个美国政府正在密谋毁掉这个案子。这部分我和卫腊玩得都挺守规则。其他人都坐着，作我俩的听众。这会儿，我又重新详细地讲述了我如何想办法挽回这桩案子，致使墨西哥人和玻利维亚人被引到圣地戈，将他们一一缉拿归案。我就爱说这些，看着他在事实面前辗转反侧，难受的样儿，这些事实自然不适合写进他的电影剧本里。这部电影拍到我那部分，准保卫腊呆一边稍息去吧。这会儿他奇怪地望着我。

“是啊。”他附和道，突然瞥了我一眼，紧接着，再瞥了尼尔森一眼，“当你呆在那个机场宾馆里袖手旁观时，我不得不带上加茜加太太回拉斯维加斯大酒店，解决疙瘩。”他望着我，嗤嗤地奸笑，这笑声里含有某种意思，像是在说，还有莉迪亚·苏托，这位在绝密行动里扮演我女人的加茜加太太。随着案情的发展，等我们到巴拿马之后，鲁曼疑心大起，这一点谁知道了，但是，莉迪亚太没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不可能去拜见鲁曼。带一个女流之辈去南美，本来就是桩冒险的事。从未听人谈起还有这么桩插曲。此后的第二天，就是12月13日，我同意在机场的那个旅馆里与艾菲尔·门德萨会面。假如老头承认的话，那次谈话气氛轻松随和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也没听说我的“女人”已去拜会过鲁曼。那样的话鲁曼反会立即察觉事情有诈。在案子中添油加醋地塞入这一插曲，也许要证明这件案子是被我们大家一起搞砸的。

“我不信，他妈的！就不告诉我？！”我厉声道。“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印象。”我怒道，但是，我心里相当清楚：这又是一通谎言，我听见了，但是又无法证实，“鲁曼也曾经说过，他要杀了我，你别再来烦我。”

卫腊突然脸色通红，接着道：“还不止这些呐，你只知道事情的一半，斯科佐告诉我，什么也不要告诉你！”卫腊看一看胡帕，停止了说了一半的话。

“这是在圣地戈，”我接着怒道，“吉荣也对你说了，他要杀我，对吗？”屋子里鸦雀无声。“而且也没有人跟我提到过那件事。”说着，我转身看了看史蒂夫·尼尔森，“在秘密案件中，有两名被告都谈到要杀一个秘密特工，而且没有人告诉过他。史蒂夫，你更理解这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是1月24日，早上，我在证人席上阐述我们一进巴拿马，会见鲁曼和玛利欧·瓦加斯的故事。到那天快闭庭的时候，尼尔森对审理的程序十分满意，但是对取证工作不太满意。卫腊受《华盛顿邮报》之约，将接受采访。对此他又可以嚼一番舌头。而毒品侦缉署和赫斯仍然守口如瓶。

尼尔森告诉我，他已让胡帕电告墨西哥，要求赫斯解释他与卡伦萨的关系，以及他在调查被告和电话里的“佩罗”的身份中立场何在。因而让人相信，他与被告有关系。我想象不出，胡帕会不会按尼尔森的要求行事。

“就像是我说的那样，史蒂夫，我想你这一枪打过去，稽查处需要对整件事都作个调查。”

尼尔森一句话也没说，但我仍要劝他小心点，适可而止，当心缉毒署和赫斯或者其他人的反扑。问题是案子的审理已接近尾声了。

“被告让他们出庭作证咋办？”

“我要把他们撕成碎片。”他不加思索地应道，但过后他向我解释道，在所有的“也许”、“可能”之中，美国大使就不给予证实。还未被传到，国务院已要求尼尔森废止那张传票了。

1月26日，我发现史蒂夫·尼尔森疲惫不堪，呆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只是在等时间。他递给我一封信，是他写给查理·西尔的，西尔就是那位圣地戈缉毒分署的分局长。“我给你一个副本，如果你不想回答我的问题，就把这封信夹在书里，让天下人都知道。”我读完了这五页纸的一封信。信中开门见山地回顾了整个案子的情况，接着就是被告们提出的：根本就没有毒品，也不准备牵涉毒品走私，“他们想的只是打劫美国的毒品贩子们”。尼尔森称他为“毒品贩子可笑的招供，来自于去年一月我们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免费的广告”。

随后备忘录用了三页半的篇幅，列出了尼尔森提出的要求，对赫斯办公室在去年作出的令人失望的举动进行调查。尼尔森备忘录中没有直接谴责缉毒署和爱德华·赫斯的词句，但又肯定地将这个问题摆了出来，此举的目的是证明他们什么也没干，信中写道：

为了驳斥那些被告提出的论据，完全彻底地表明毒品侦缉署在第一阶段调查中了解到的墨西哥被告人的背景和情况是很有必要的，请尽快给予洽合如下：

1、首先请赫斯办公室告知，帕罗·吉荣是否曾是某省的官员。如果这是个事实，请证实受雇日期，以及他在普韦布洛省司法警署的警衔。

2、另外还有，毒品侦缉署圣地戈的一名独立秘密情报员提供情报：吉荣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曾是墨西哥联邦安全理事会成员，这一点帕罗·吉荣自己在同政府特工的秘密谈判中也已承认，并已被录音。尼尔森所指的圣地戈独立情报员，是缉毒署派往忠诚办公室的特工从一些线人口中买得的情报，这份情报提供了吉荣的身份材料。那封信接着写道：

如果有可能请提供一切情报，尤其是涉及吉荣在联邦安全理事会的职位，请在墨西哥境内予以证实。请注意收集无懈可击的材料，确认吉荣是联邦安全理事会的一名指挥官，是总指挥埃斯特班·戈斯曼和“黑人”里约斯的部下。

这个埃斯特班·戈斯曼曾和纳泽·哈龙一起，被美国律师威廉·肯尼迪起诉，但戈斯曼未曾被逮捕和定罪。

3、有份从墨西哥城寄来的情报说，吉荣于1987年因诈骗而被逮捕，请提供反映1987年吉荣在墨西哥被捕、起诉的官方背景材料，诸如官方的逮捕令、法庭记录等。

4、请墨西哥城赫斯办公室提供乔吉·卡伦萨·皮尼奇在墨西哥军方的背景材料，包括服役的档案、军衔、职务等。在调查过程中牵涉到卡伦萨，他是一位墨西哥军方的上校。被告现在声称，他从未提任过上述的陆军军衔。

5、被告与墨西哥军方的报告产生了矛盾。在军方的报告中提到：1970年，被告已离开墨西哥军方。因此在1970年之后，不应在军方的在册人员之中。但是据可靠情报说，他仍是墨西哥军方的一位军官。这是极不寻常的事，据悉墨西哥军方的军官经常遇到罢免的事，但不会脱离军队。请提供卡伦萨离开军队的情况，他离队时的军衔，离队的原因。如果离队确系事实，那么他自1970年脱离军队之后是否还在其他的职位上积极为军方工作？最近八年卡伦萨在干什么，在秘密录制的录音中，卡伦萨透露了一条有关他参加“神鹰行动”的消息，这是一项墨西哥的倒毒行动，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另外卡伦萨谈到有关他曾替驻墨西哥缉毒分署工作的情况，以及参与打击美国桑德尼斯加卡特尔的战斗。请提供一切有关卡伦萨参加“神鹰行动”的情报，以及证实他与缉毒署和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具体情况。

我看到这里，心想，赫斯和缉毒署很容易回避尼尔森提出的每一个要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拖延时间。等到审理一过去，新闻界就对此不再有兴趣了，有谁会再来关心这事呢？这位圣地戈的检察官在结束之际才向缉毒署特工发起猛烈的攻势，这似乎已无关痛痒了。这些年来，他们操纵掩盖了罗伯托·苏亚雷斯事件，让这个案子中途夭折，“一箭三雕”也是相同的一桩毒品案。但是，当我读到第六条时，又仿佛看到了一轮希望的曙光：

6、1988年1月14日，乔吉·卡伦萨在加州拉加拉被缉毒署和海关特工人员逮捕。在卡伦萨被捕之后，他私人的电话通讯录中记载有美国大使馆毒品司的电话号码，并且还有爱德华·赫斯的名字。在卡伦萨的口供记录中，他说：“爱德华·赫斯是我的一位朋友。”请提供任何与卡伦萨有关系的墨西哥毒品侦缉署机关或者人员的情报，并给予证实，尤其要对赫斯分局长兼特使进行详细了解。据信赫斯认识乔吉·卡伦萨·皮尼奇，如果他认识卡伦萨，那么他认识卡伦萨有多久了？他们何时见过面？达到何种交情？赫斯分局长曾与卡伦萨见过或交往过几次？达到何种程度？赫斯分局长最后一次和卡伦萨碰面或交谈是在什么时候？谈些什么内容？等等。

备忘录上继续列出了所有的卡伦萨和阿瓦兰兹通讯录中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读起来让人觉得像在读墨西哥将帅录。尼尔森要求证实这些人的“身份、职业档案、头衔、职务的情况。”尼尔森备忘录继续写道：

至于乔那·波班·席尔瓦将军，要求墨西哥城的缉毒署提供有关他现在的职务状况和以前的职务情况，主要是在1986年、1987年和1988年这三年在军队中的背景材料；近照一张；现在的军衔和职位以及同国防部、总参谋

部的关系。并且要求提供所有的波班·席尔瓦将军的私人住址及家庭住址，所有的电话号码。在这些内容后面的落款处，请席尔瓦将军或其直系家属署名。

有关墨西哥城的那个电话号码，请调查清楚：电话的具体安装地点在何处？电话安装在该地点有多久了？由谁付电话费？谁是这架电话的主人？近三年里谁住过有关的那幢房子？

墨西哥缉毒署调查的重点，在于弄清这个电话的情况，这个电话就是逮捕这天我让卡伦萨打给将军的那只电话，而且卡伦萨在圣地戈拉斯维加斯和将军通话时，用的也是这个电话号码。

并且请墨西哥方面确定，谁是电话所在地别墅和公寓的房东。谁租用这幢房子，租用有多久了。

请将这幢房子整个拍下来，寄往圣地戈。请提供那位“佩罗”的住址，全面的身份资料：年龄、职业、背景、身体状况（是否残废或者坐在轮椅上闭门不出的）等，尤其是，他是否是西尔瓦将军的家庭成员。

尼尔森备忘录的结尾是一颗重磅炸弹，它总括了一切，将罪名加到了缉毒署和赫斯的身上，证明他们对诉讼案件提供的支持等于零：

最后，从本案的被告履行一切权力以来，致使毒品侦缉署陷入了困境，这表明缉毒署在证实一系列的情况上，未作出任何的努力。驻墨西哥缉毒分署应详细地提供一份吉荣、阿瓦兰兹、卡伦萨背景材料的备忘录，文件涉及的主要调查内容应按上面交待的中心框架；还必须注明由何人执行参加这次调查，大约需要多长时间，调查人和调查材料是通过什么途径、关系得到的。望请注意：被调查的墨西哥政府官员，包括他们本人或他们的组织机构，将是陪审团进一步调查的依据。因为这些资料仍属不可靠、非独立的证据，它还将有待于核实。

在此之前不久，传说爱德华·赫斯已中断了和墨西哥国防部长贾·阿勒伏·加德魁及卡伦萨上校的联系。

我放下手中的备忘录，问尼尔森，他是否已将它发出。他回答，已发出去了。十年来，我第一次从未有这样的感觉，我正在和那帮大人们作对。史蒂夫·尼尔森在“一箭三雕”中，投下了第二颗备忘录炸弹。因为某种原因，他的和我的截然不同，他们对付我的那颗炸弹容易。现在，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对付尼尔森的这颗重磅炸弹。

第十二章 败中有胜的一场判决

到了2月6日，星期一的下午，经过一星期的休庭之后，我又回到了史蒂夫·尼尔森的办公室。明天早上是被告最后一个机会，跟我对质1987年11月巴拿马之行秘密接头的情况。和往常一样，卫腊和罗斯已先到了尼尔森的办公室。尼尔森让我去他办公室里头的房间。罗斯紧张地望着我俩离开。涉及某种原因，尼尔森需要跟我单独谈谈，对此罗斯显然有些害怕。

尼尔森的那封信见效很快，连他也没有料到。赫斯已从墨西哥打电话给他，说，不知道被告有哪些问题，想来问问情况。尼尔森说，他已在扮演“魔鬼的辩护人”，便当即反问赫斯，他参与了被告的哪些问题，说，所有的问题赫斯都必须作出圆满的回答。作为缉毒署墨西哥全权总代表，理应投身于对卡伦萨、阿瓦兰兹和吉荣的调查。

2月7日，由于一位陪审员生病，审理再次暂停。艾菲尔·门德萨的律师路易斯·凯兹提出一项议案，有关卫腊签订电影剧本合同的个人所得税问题，以及他在俄克拉荷马被捕后作的供词等等。凯兹说，他认为卫腊在以往所作的任何表白全是谎言，他怀疑卫腊是政府的“双重间谍”。那天下午，尼尔森收到了赫斯写来的回信，只解释了他与卡伦萨的关系。

赫斯在信中说，他认识卡伦萨是在1981年的春天，当时卡伦萨在墨西哥的玛萨塔兰军队任职；赫斯的一位非墨西哥籍的熟人想跟一位墨西哥公民合伙开一爿餐馆（墨西哥法律规定：墨西哥公民才有权经营本国境内的各种生意），于是就认识了卡伦萨。卡伦萨知道赫斯是缉毒署驻墨西哥的特使，便告诉赫斯他在墨西哥亲自经历了“神鹰行动”的歼灭战，并吹嘘他是墨西哥前总统梵纽斯蒂诺·卡伦萨的孙子。最后赫斯指出：1981年到1983年间，他被调回美国，就一直未见过卡伦萨上校。

赫斯的信中提到，1983年8月他重返墨西哥，接触的都是墨西哥的高级官员。其中有一位叫佩皮·陶特的墨西哥安全部头目，负责社会治安问题。一天，陶特事前未说明任何情况，就将卡伦萨带到餐馆来同赫斯见面。按赫斯的说法，他们的那次会谈，是有关陶特负责毒品公约在墨西哥的执行和监督，赫斯信中提到，会谈时卡伦萨的突然出现，应该说，是表明墨西哥对毒品公约的执行和监督正在完善。

几个月之后，卡伦萨和赫斯又有了接触。卡伦萨约他在餐馆碰头，声称有情报带给赫斯。而赫斯只愿意在大使馆附近的咖啡馆里与他见面。见面后才发现卡伦萨并没有任何的情报。赫斯说，他真正的用意是想兜售他祖父这位杰出总统生前的一件饰物——一把总统佩刀。据卡伦萨解释：这是一件博物馆珍藏品；在墨西哥城外六十英里处，还有一些其他的总统私人用品。卡伦萨要赫斯在美国大使馆给他介绍几位买主。还说，他已离开军队，处境不妙，又需要用钱。过了几天，卡伦萨又打电话来，这次他告诉赫斯，他已不想再找什么买主了，那件饰物正在报价出售，价格令人比较满意。

之后到了1987年的5月。据赫斯说，陶特打电话给他，要求面谈，他告诉赫斯，已辞去联邦地区警察署副统领的职务。陶特又一次不预先申明，带来了卡伦萨和玛利欧·奥古斯塔·查巴罗上校（此人不久提升为将军）。会谈的意图十分的敏感，双方谈话采取小心谨慎的方式。赫斯和墨西哥军事情报局就这样建立起关系（墨西哥军事情报局的前身是国家安全理事会）。在会谈中，查巴罗顿促赫斯，“记录墨西哥总参谋长在墨西哥境内严重走私毒品的情况，目的是为了墨西哥军队更深入开展反毒斗争。”据赫斯说，这

次会谈中提到的总参谋长从来就没有见过面，因为他对这一情况根本未作过追查，这是由于在政治上缉毒署有所不便，所以这事就这么说过了事了。

赫斯与卡伦萨接下来一次会面是 1987 年的 7 月，正好是我第一次遇见吉荣、门德萨、阿瓦兰兹之前两个月。当时，卡伦萨打电话到美国大使馆找赫斯，要求帮忙解决他一位女友去美国的签证。赫斯帮了他一把。过了几天，卡伦萨又打电话来表示感谢，并通知他已结婚的事。“我祝贺了他，”赫斯在信中写道，“我们就结束那次谈话，没有再来往过，这也是我最后同卡伦萨讲的一句话。”

赫斯说，他再次听到卡伦萨的消息是在 1988 年 1 月 14 日，当时他接到圣地戈发来的一份逮捕通知书。“在逮捕名单上，”赫斯写道，“我才意识到，乔吉·卡伦萨便是我在墨西哥城认识的那位，因此我将这一情况向皮勒德大使作了汇报，并向我办公室的同事和缉毒署总部均作了汇报。”

赫斯的陈述漏洞百出：如果他在 1988 年 1 月 14 日已报告大使有关卡伦萨的事，那么为什么大使要引用《圣地戈联盟》1988 年 2 月 22 日和《洛杉矶时报》1989 年 2 月 4 日的两篇报道，重申墨西哥政府提出的卡伦萨于 1970 年脱离军队的立场呢？赫斯在备忘录中明明写道，他在 1981 年春认识卡伦萨，当时卡伦萨在玛萨塔兰军队任职；而且卡伦萨在 1983 年才告诉赫斯，他离开了军队“处境不妙”；甚至更凶险的事实是，赫斯提到的，就在案情发生前不久的两个月，也就是 1987 年 7 月，他还和赫斯有往来；而且卡伦萨两次出席了由墨西哥警方和军方官员参加的敏感性会谈，最后一次会谈离卡伦萨被捕仅有几个月。

“赫斯如何解释他沉默了十三个月的情况呢？如何解释在这十三个月里，墨西哥当局和皮勒德大使口口声声对新闻界说，卡伦萨在 1970 年已退出军方的事实呢？”我问道。

尼尔森耸了耸肩膀。

2 月 8 日，我同被告就第一次巴拿马之行的对质结束了。卫腊回到了证人席上，就他同杰克去玻利维亚察看可卡因实验室的情况，在法庭作证。尤瓦乔也从洛杉矶赶来出庭作证。那天下午，在尼尔森的办公室里，这位十分自信的卫腊告诉尤瓦乔同被告的律师打交道的诀窍：“如果你搞不清他们提问的用意，乔治，就自由放松地告诉他们。”

又一个神秘的幕后剧正在发展着，飞行员杰克突然回美国中西部的老家去了，法庭还在等他回来作证，而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失踪了。卫腊同他的关系已发展成相当亲密的挚友了，所以卫腊说，愿意承担寻找他的任务。他同杰克家一直有联系。据说，杰克去了哥伦比亚，处理一件缉毒署布置的任务。卫腊的所有行为一反常态，几乎像个狂躁病人。他不停地拨着电话号码，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散布杰克的新闻。他的情绪起伏很大，从忧郁转变成幸灾乐祸。

“他在哥伦比亚已失踪四十八小时了。”卫腊报告道，“他们认为他要么是死了，要么就被玻利维亚人扣作人质了。他正在为迈克·鲍华斯工作。”他补充了一句。尼尔森对卫腊所说的情况，显得十分为难。我感觉到，卫腊总还有什么瞒着未说的。我想给迈克·鲍华斯打个电话，但是转念一想，还是等一等再说。

第二天早上，这事就更玄了。我一到尼尔森办公室，就得知事情闹大了。卫腊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哪里知道，原来这事他也跟着掺和。我听到，

他得令停止跟杰克联系。

“我们已约好了杰克了，”尼尔森道，脸上露出烦躁不安的神情，“但是我想，我已不再需要他的佐证了，他又不会西班牙语。卫腊已谈了经过了，难道就非要他的证词不可吗？”

这事说来也真奇巧，杰克是唯一一位能确证卫腊玻利维亚之行供同的目击者，他不能出庭作证，使得尼尔森的方案要作重大的修正。胡帕显得神色慌张，那样儿正好说明，他知晓这奥秘所在，对此正承受着重大的精神负担。飞行员杰克的新闻，突然间就无人问津了，也不再有人提起这个话题。

那天夜里，我打电话给我的老朋友纽约缉毒战线的一名老兵迈克·鲍华斯，他就住在纽约的坦普城（纽约黑人居住区）里。谜底立即就揭穿了。原来杰克和另一位秘密情报员在巴哈马倾销一批可卡因后，被警方逮捕了。他俩弄到一批毒品，想从哥伦比亚偷运入关，卖给美国一个毒品交易市场。尽管可卡因未被查获，但杰克已承认所有的情况。对杰克的指控后来就这么销声匿迹了。

我立即明白了这个探子的反常行为。我问迈克，他是否曾见卫腊。他的回答我并不感到奇怪：几个月前，卫腊跟杰克和弗雷德来过他住的坦普城，吵着要鲍华斯让缉毒署出钱出力，帮助他们三位去哥伦比亚，完成一次观光旅游式的“秘密行动”。我心想，这家伙因出售毒品被捕，被保释后受美国海关的监护，他早就不信任缉毒署了嘛。只有一件事看来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位卫腊先生知道了比毒品案更重要的内幕。迈克·鲍华斯本能地意识到，这事有点露了口风。

“他们就像魔鬼三重唱。”迈克道，“我本来就不信他们。”

就在那天晚上，我同史蒂夫·尼尔森、胡帕一起去吃晚饭，开始就1987年12月二进巴拿马，也就是那次由阿尔伯特·斯科佐指挥的行动，进行了证据的审核。我们谈到了阿尔弗雷多·邓肯奇怪的举止。胡帕再次重申，邓肯曾告诉他，已在巴拿马拉斯维加斯大酒店伦巴多的电话上，安上了窃听器。

我们还谈到了卫腊签下电影合同的事，如果让被告的律师知道，他们可以对他的信任度大作文章：他肯定会为了钱，来夸大其辞。最主要的是他所有的证词都会面临被推翻。我再次表明自己的看法，在对这七个被告的审理中，不管有没有卫腊的证词，我们仍足以定他们的罪，但问题的关键是无法将证词确证后转化成证据。

尼尔森说，他无法确定卫腊的电影剧本中到底有多少是真情。据说，尼尔森从缉毒署、玻利维亚听说了，拉公司最厉害的毒枭是罗查·苏亚雷斯，他是罗伯托·苏亚雷斯的侄子，也是1980年我经办罗伯托·苏亚雷斯案时的一名被告。如果门德萨或玻利维亚人中的一位突然决定改变态度同政府合作，他们反证卫腊的证词是确实的，那么尼尔森就能起诉罗查·苏亚雷斯、威士顿·罗杰古茨和其他卫腊声称见过的拉公司成员。他不想安排太多的时间，来谈论这个线人的电影事业。我也吃不准，这该不该责备他。

第二天早上，卫腊在为玻利维亚之行作证，我同乔治站在法庭外面的休息厅里。《圣地戈联盟》的一位记者比尔·奥特从法庭里头走出来，到了休息厅里。“噢，这个卫腊，简直在白话长篇小说。”他道。

我同乔治互相使了个眼色。“嗨，他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我道。

“你能肯定他是个影视剧作家？”奥特追问。

晚上，我同乔治来到尼尔森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个脸色苍白、全身哆嗦

着的卫腊。他说话含糊其词。被告律师向他提问，他是否已签了根据内容改写的影视剧剧本的合同，他回答：没有。

“你说没有？”我问道。他不是骗了我们在座的几位，那便是已在证人席上撒了谎。

“我合作的本子与本案毫不相干，那上头的毒品故事是关于中央情报局的。这桩案子的事，我一个字都未提到。”

“瞧你，戴维，”我道，真奇怪，他以为我们都哑巴了，“你同我谈起过的。辩方有私家侦探，也许已经发传票给丹尼斯·豪伯和乔迪·米列锡维克。不管怎地，剧本的手稿已在动笔了，把手稿的内容拿出来，一行行地与这件案子作个比较。”卫腊听罢，显得有点落魄的样子。乔治忍不住要笑，赶快别转脸去。

十五个月来，我第二次看见他一声不吭。他有点精明过了头。从他白垩一样的肤色和退缩的眼神中，我明白，已不必再教训他在法庭上作伪证的事了。

尼尔森走进办公室，后头跟着罗斯。史蒂夫对审理的进展十分高兴。但还有个问题。“很不幸。”他道，“他们获得了戴维剧本的内容。”

那天晚上很迟了，乔治谈了他自己的心里话：“从开始到现在，回顾全过程，我怀疑就是卫腊的一个诡计。”还谈了这个子说过的许多言论。他说，他已搞到了“参色米拉”，要将它移植到墨西哥去（参色米拉是从大麻中培育出来的一种刺激性强烈的无籽大麻）。我也记得卫腊在同我一见面时就提起过这事。我曾开玩笑地说：“你是大麻新品种。”卫腊当时被逗乐了，他喜欢这个比喻。他说，他有这种刺激性强的大麻品种的培植知识，说他曾请教过大学里这一学科的教授和世界上著名的专家，认为这品种正在推广。

参色米拉成了一门科学，乔治有些觉察到卫腊的解释是如何的荒唐。乔治说他“似乎更像是在向书本讨教”。不过乔治也无反驳的依据。乔治是海关派来在行动中监督他的人。其实，上头真正的用意，乔治抱怨道，“倒像是保卫这个探子”。

2月24日，星期五，我转入了对1月10日圣地戈最后的秘密谈判情况的佐证。法庭到了九点一刻还未传召被告，我们有时间再审阅我的证词，斟酌案情。我提出，卡伦萨了解“雪峰行动”，我的直感是因为他一定从赫斯那里听到过这件事。

“赫斯失踪了。”尼尔森抱怨道。他早就存着心，要打电话给缉毒署驻墨西哥总头目，但就是找不到赫斯与他的副手狄克·凯恩斯，不知他们到底去了哪里。狄克·凯恩斯也参加了1987年5月同卡伦萨、陶待和查巴罗的会谈。尼尔森说，他准备打电话给赫斯的上司华盛顿国外行动统领斯蒂夫·格格。他说着递给我一本1969年3月31日出版的《体育画刊》，然后又说：“这里有一篇关于卡伦萨的文章。”我将杂志翻到尼尔森所指的一页。

文章报道了墨西哥运动会闭幕的情况。文章的一幅插图上，有一张二十八岁的乔吉·卡伦萨身着军装的半身照片。文章的作者称他为“墨西哥的詹姆斯·博登”（詹姆斯·博登为英国的王子）。卡伦萨的形象铁证如山，这就像缴获了一批数量巨大的毒品一样。真是天降神兵，一举将想逃跑的罪犯缉拿归案。

我们取得了唯一的官方消息。以前只听墨西哥政府说，矮子上校于1971

年已准许完全脱离墨西哥军方，就再没有更新、更有效的消息。现在有个合乎逻辑的解释：那就是，要求他离开军队的主要原因是让他从事机密事务。卡伦萨曾组织召开几次会议，培训洪都拉斯的反政府武装。他当然也介入了1月10日的那次秘密会面。长期以来，他秘密同美国政府保持联络，解释过许多发生的外交事件。

过了一会，我走到证人席上，对我第一次遇见卡伦萨的情况作证。我对法庭表明了，他对缉毒署的大部分缉毒行动、机构内部情况等了如指掌。按尼尔森的提示，我复述了卡伦萨说的原话：“我训练过洪都拉斯的反政府武装。”尼尔森打断了一会，又问我反政府武装的名称，我答道：“是‘尼加拉瓜反桑迪尼斯主义者’。”尼尔森又打断了好一会。我朝法庭环顾了一周，庭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听众，没有一名是记者。审理早成了旧闻，新当选的“毒品大王”是刚被毒品战争揭露的威廉·本尼特。

到了星期一，2月27日，这件案子才开始真正引人入胜。这天没开庭，所以闲着没事去了尼尔森的办公室，看看有什么新闻。史蒂夫仍然没有听到赫斯的下落，但他反而收到一张“佩罗”住宅的照片，说是乔治的一位朋友，一名私家侦探拍下的。史蒂夫走出办公室去接一个电话，是胡帕打来的。他说，情况分析人员仍旧很难开展工作，因为牵涉到十分敏感的资料，尤其要涉及到墨西哥军方和电话公司，他们听说来意，都吓呆了。

胡帕说，他已得到一份材料，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叫佩罗·拉帕兹，对方是在德拉维加上校住处接的电话，上校在那场阴谋事件时，正好去了普韦拉洛军事学院。当时，波班·席尔瓦将军正是军事学院的院长。材料上还说，在1988年1月的逮捕行动之后不久，将军就被暗中调动。而且，席尔瓦将军是墨西哥国防部长阿勒伏·加德奎的妹夫。

一些墨西哥的专家们认为：席尔瓦将军不可能答应卡伦萨的许诺——军队保证运毒飞机着陆、加油；在墨西哥政府的高层领导人中他仅是个将军，根本无权批准这样的要求，像这样的事起码要通过墨西哥国防部长。现在看来，这一点也不攻自破了，材料上说，他小舅子就是国防部长。

临近傍晚时分，史蒂夫终于同那对失踪的活宝联系上了，赫斯在电话里承认，他现在也意识到阿勒伏·加德奎同席尔瓦的那层关系。根据他“现在意识到”的所有情况，他同意，卡伦萨上校可能会作出那样的许诺。“你明白过来了？！”尼尔森道，“你同卡伦萨会谈的事很重要，这是一份很好的证词。”赫斯赶忙推辞，这事还不能出庭作证，因为三月份他得陪同墨西哥司法部长来华盛顿，同美国司法部长举行会谈。

“那次谁陪他去的，”我道，“凯恩斯，赫斯的副官，不就可以替代一下嘛。”

尼尔森说，如果他能请到美国大使皮勒德那就太好了。据说，大使对情况的发展，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子，因而便想争取他来为这场官司作证。

2月28日这天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证人席上度过的，我就最后那次同墨西哥人的谈判，向法庭作证。这是他们自由生活的最后几个小时。最后我讲述了我怎样设法想让卡伦萨给将军打电话，企图把将军的声音录下来。我正在祈求上帝保佑。终于，七位被告律师中的一位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不早点作这样的企图呢？我正想让他们也知道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正希望他们提出这种尖锐的问题。然而我没有得到满足，他们没有再问什么。

3月1日，本案中最令人吃惊的一些消息被抖了出来。玛利欧·奥古斯

塔·查巴罗将军，也就是给赫斯介绍卡伦萨的那位，是列入 NADDIS 名单中的一名成员（NADDIS：毒品和危险麻醉药品信息库）。据查，他同毒品走私者有联系，并且为毒枭提供保障。在 NADDIS 的档案中，还记载着查巴罗于 1988 年 5 月曾见过墨西哥最大的毒枭米格尔·斐列斯·盖拉多。据信，卡玛利纳就是盖拉多下令杀害的。我认为，根据这些事实，结合赫斯的亲笔信，足够令赫斯来圣地戈解释这一切。但是，这会儿史蒂夫又态度暧昧起来。

那天晚上，全美广播公司六点整的新闻中，报道了华盛顿记者莉萨·迈耶斯的通讯，说美国国务院赞扬墨西哥为反毒作出的努力，为确保反毒的进展，将拨出一笔巨款给墨西哥政府，作为反毒基金。

就在那天深夜我听说了纽约缉毒分署的特工艾文特·海特奇在一次秘密接头时被杀的消息。等增援的队员们赶到，发现了这位年仅四十六岁的父亲和他驾驶的那辆汽车。汽车的两只轮胎早已瘪塌塌的，他的头部中了四枪。电视新闻里的罗伯特·斯图曼脸色煞白，颤悠悠地道：“如果谁曾替毒品做广告，认为毒品很有趣，那么就来看一眼这位年轻人怎么个有趣法。”

到了 3 月 2 日的早上，我同乔治来到尼尔森的办公室，见到了“雪峰行动”派驻玻利维亚的特工艾哥·皮里兹。他参加过玻利维亚行动，被邀来圣地戈出庭作证。我们观看了半小时袭击森林实验室的录像。我边看边觉得的确神奇极了，我终于明了，到底是谁领路找到这地方的。电影结束了，看得出这是一部经过充分剪辑的电影，电影的结尾是四架直升机俯冲着，返回地面的森林基地，参加胜利的狂舞场面。

“地面基地有好些议员和新闻记者。”只听见卫腊骄傲地讲解道，“这次行动真可谓牵动了众人的心。”

我当着皮里兹的面斗胆地评论了一句：“我咋没在电影里看见特里·贝克？”

“是没有的。”皮里兹紧张地附和了一句。

“他去了基地没有？”

皮里兹笑道：“嗨，贝克领记者进来时，玻利维亚的军队雄巴师早已经占领了那里。”

当时这位大人说，在缉毒署的森林行动中，他是位“引路人”，原来他是引记者来的引路人。

3 月 7 日，星期二，约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我和乔治向尼尔森工作组汇报。然后，我又接受一项任务，是把最后同玻利维亚人碰面、逮捕他们的情况，向法庭作证。这也是我在“一箭三雕”行动中最后的一项任务。卫腊在我后头，跟着向法庭陈述他最后的证词。

“我猜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向我发起进攻。”卫腊紧张地道。同往常一样，罗斯则紧张地在边上徘徊着。

“就这场审理？”我反问道。

“你的意思，他们还会上诉？”

“上诉？也许吧。你敢打赌？在本案了结之前，还会经过很多法院的审理。”我说话时尽量装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别怕，别害怕！你这子，我心里想想好笑。

我的佐证一直延续到了中午开饭。很少被盘问。显然，证明了卡伦萨是个冒牌的骗子，说他许诺是行不通的论调不攻自破了，而且卫腊吹嘘同席尔瓦将军和德拉维加上校会过面。墨西哥被告已被法律完完全全地套牢了。如

果玻利维亚被告还冒出什么事来的话，那就说明仍然还有什么神秘的内幕。

其实，爱德华·赫斯才是反驳卡伦萨供词最有力的证人。尼尔森却决定不让他担任控方证人，他要等着辩方去召他，到那时，他要猛烈地抨击赫斯，好好盘问一番。我真不知道如果辩方不召赫斯，又该咋办？

第二天早上，罗恩·高斯帕德里克从总部赶来，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他带来了一张鲁曼实验室的照片，照片里仅有个可卡因实验室，其他什么也没有。我见了，不知对这位大个子说些什么好，这个一司之长一定忘记了在迈阿密那个大热天，他扮演了大人物的钦差大臣，企图破坏“一箭三雕”行动的情景。他在回答乔治的提问时解释道，他在可卡因实验室方面的“专业知识”来自于对每天的照片分析检查，再结合他在大学里正规学习的化学专业。就是这么一位高级官员被派到迈阿密来裁定是否执行五百万美元的买毒计划。见他妈的鬼的化学家！在华盛顿，在他所辖的司里，他花了所有的时间，只是在看这张照片。

辩方通知我，要求我和卫腊两人都呆在城里。史蒂夫·尼尔森觉得很奇怪，没料到辩方会召我们作为辩方的目击证人。我也吃不准尼尔森到底是翻车了呢还是没有。但是，卫腊肯定是翻车了，这就够令我开心的。

我同乔治乘车去了一个大学的图书馆。试图查找一些不令人瞩目的墨西哥军事著作，看看有否卡伦萨的名字。我俩回来已是午后了，审理在进行，高斯帕德里克一个人呆在尼尔森的办公室里，在那里打电话。我帮不上忙，但是我听见，他焦虑地说着，要预约一张回华盛顿的机票。难道情况有变？我心想。乔治总那么可爱，他邀我们一起去喝咖啡。我强忍着怒火，试着去找些话来聊。高斯帕德里克说，总部最近有一起大案，也就是威廉·本尼特这个最新毒品大王的案子，将由大卫·威斯权特亲自挂帅，罗伯特·斯图曼作他的助手。我只是笑了笑。

约下午四点，卫腊来尼尔森的办公室，跟我们凑在了一起。他才结束了法庭的作证，忧郁地告诉我们他参与密谋的好些政府的“机密”，“你们知道海关现在即将召开一个最大的秘密碰头会吗？”他问，那双眼睛得意洋洋地望着我。

“不知道。”我道，瞟了一眼乔治，他便调皮地嫣然一笑。我意识到，海关已经召集了他们加州的许多监察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没想到这是个秘密。

“他们召集了所有高层人员参加会议，”他激动地道，说着观察着我的反应，“他们发觉了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墨西哥海洛因渠道……这便是这次会议的议题。”

我回想起这些日子，在缉毒界中，缉毒署正猛烈地抨击海关将一个线人带进满是特工的办公室，让他们暴露在线人的面前。罗斯到底想干什么，假如卫腊被再次收监的话，他会有报应吗？

3月14日，我听说被告的律师又决定不再让我当辩方的证人。这样，我在“一箭三雕”中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我来到尼尔森的办公室向他道别。听说，辩方终于发传票给爱德华·赫斯和皮勒德大使，让他们作为证人出庭，尼尔森已在准备写信给赫斯，这是又一封更具威力的信，信里再次重申他曾提过的要求。赫斯肯定不会予以理睬。尼尔森告诉我，等赫斯陪同墨西哥司法部长访美，同美国司法部长会谈时，他要将这封信亲手交给赫斯。

“把他们都揭穿了。”我对史蒂夫鼓励道。我们握了握手。我真的很钦

佩他。我想他是条好汉，是一位坚韧不拔的硬汉，敢于拨乱反正。

戴维·卫腊带着他那几位海关的保镖也在那里，正在向尼尔森诉说某个制片厂在摄制一部名叫《汤姆·斯特恩》的电影，硬缠着他去担任一个银幕角色，而被告的律师还攥着他不肯放，可是又无所事事地闲着，兴许尼尔森能帮他脱身。

1989年3月15日，早上九点三十分，我登上回纽约的航班，在飞机上我就已准备整理那一大堆两个多月来审理中收集的笔记。离我退休还剩二十个月了，我正好四十八岁，已有二十五年的时间泡在我们所谓的毒品战争之中。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比他们征收的税还多。“一箭三雕”，用他们的西班牙语来说，叫作 el Colmo，意思是一流的。我有一种感觉，自己就像一件穿破了的衣服，的确老了，疲惫极了。但有一事我敢肯定：不管我的精力如何的衰退，仍然要完成毒品战争中我最后的一个战役——将它公布于世。

1989年4月6日，爱德华·赫斯终于出庭作证了。他声称，他对尼尔森提出的要求已向墨西哥政府了解过了，尽了全力；但是他们依旧守口如瓶，毫无反应。尼尔森也没有向赫斯提出一年来他为什么毫无反应，尤其是他在1987年5月同卡伦萨和查巴罗会面等那些难堪的问题，只是问了些卡伦萨被捕前七个月的情况。

1989年4月12日，墨西哥警方逮捕了米格尔·斐列斯·盖拉多，据信此人就是下令暗杀卡玛利纳的凶手。盖拉多于1987年5月13日邂逅查巴罗将军，就在这个月，查巴罗约会了赫斯和卡伦萨。与此同时，查巴罗被捕，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六位“老资格的政府官员”，他们被指控向盖拉多提供情报，并为他提供掩护。爱德华·赫斯从1989年4月13日的《华盛顿报》上，摘下这段消息，借以赞扬墨西哥政府在毒品战争中的“合作姿态”。在此之后，《洛杉矶时报》于1989年8月19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披露了暗杀卡玛利纳的凶手是肯摩菲，指责美国政府包庇盖拉多参与凶杀缉毒特工卡玛利纳的事实。文章说：美国政府回避揭露事实的真相，是为了逃避揭露美国政府的某些部门默许南美反政府组织利用走私毒品积蓄资金，作为推翻政府的战争费用等。1989年4月17日，我在纽约接到吉姆·罗斯的电话。尼尔森正在准备离任演讲，他需要一些材料来帮助尼尔森作好这场演讲。罗斯告诉我，审理已结束，赫斯和那位大使作为被告的证人到庭作证，史蒂夫面对他们的盘问从容自如。“我们不能使他太为难。”罗斯道，“否则会影响案子审理。”

“史蒂夫就让他溜走吧。”我道。

“是啊，”罗斯道，“他是不得已的。”

1989年5月，通过快一个月的协商，陪审团认为，七名被告均有罪，需负法律责任。随后便宣判如下：

老头，艾菲尔·门德萨·杜那兹：判处三十年监禁。那位对我生爱意的赫克托·阿瓦兰兹：判处监禁二十四年零五个月。

飞行员罗兰多·爱勒：判处二十四年零五个月的监狱生活。玛利欧·瓦加斯·布鲁恩：判处监禁三十年零五个月。卫腊的铁杆兄弟，帕罗·吉荣：判处二十七年零三个月的囚禁。

贾杰·鲁曼：判处囚禁三十年零五个月。

矮子上校乔吉·卡伦萨·皮尼奇被判处二十四年零五个月的监禁。

判决书于 1989 年 8 月 4 日正式宣布，美国司法官员史蒂夫·尼尔森说：这是第一次真正触及卡特尔，同这个公司的会员面对面地对话。不幸的是美国司法部的某些人，不肯提供五百万美元构建买毒的陷阱，致使卡特尔更多的成员，包括政界人物、军界人物得以漏网。

